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历史学类 History

中国道教考古

张勋燎 白彬 著

1

中华书局

张勋燎
白彬

著

中国道教考古

1



綫裝書局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2002~2003年度重大项目

教育部“九五”人文社会科学
博士点基金项目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
专项经费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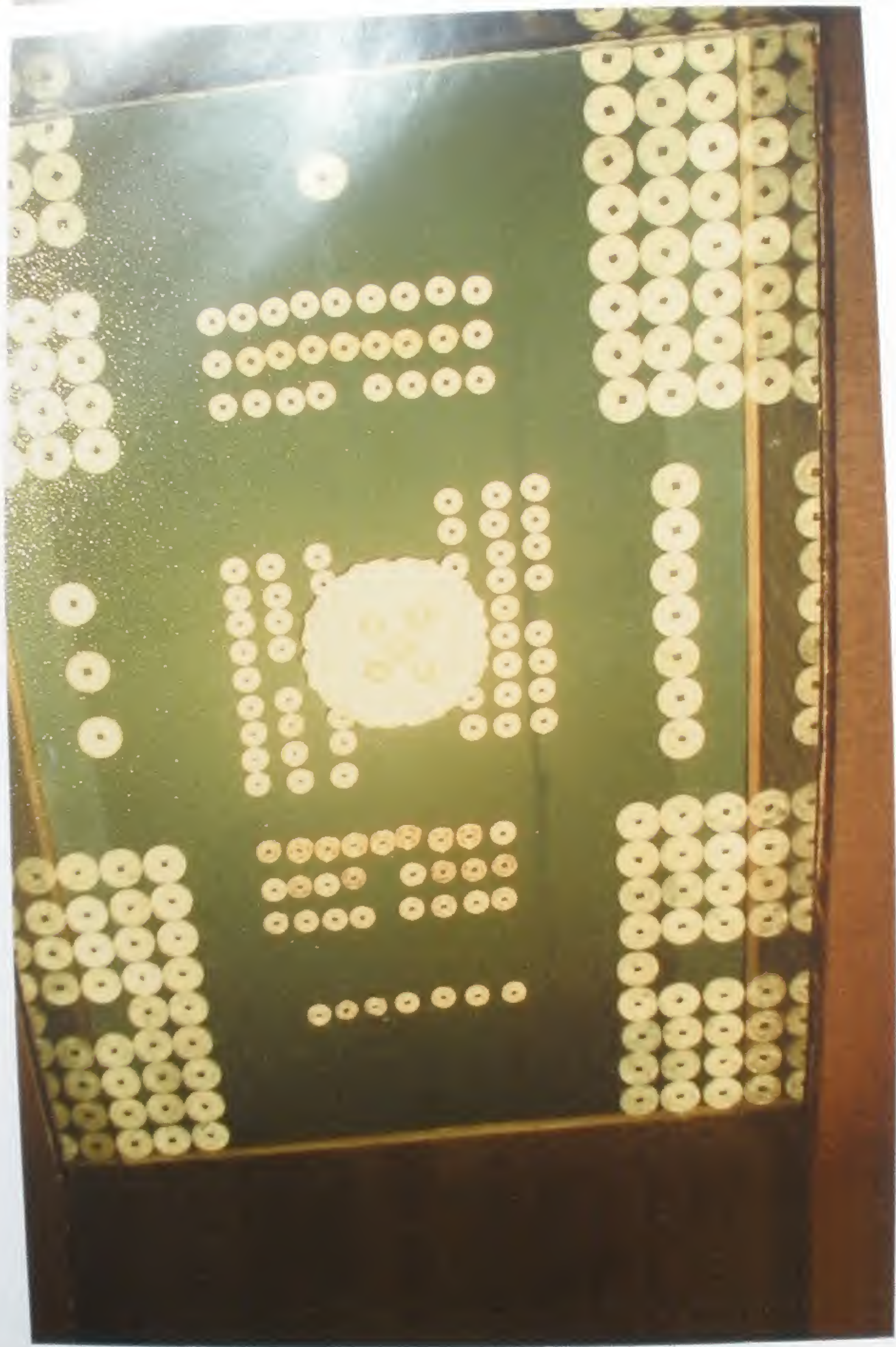
SP. 13. 100











序 言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有近两千年的历史。作为一种宗教，它的构成包括理论思想和具体活动两个方面。以杂而多端著称的道教，包容了古代知识阶层各种不同哲学流派思想和民众的鬼神观念、生活习俗等许多方面的内容，渗透于各种社会活动之中，既是古代各种不同传统文化的集合物，又给予人们的思想行为以广泛深刻的影响。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是古代人们从事各种不同历史活动保留下来的实物遗存，在考古发现的东汉时期道教形成以后的材料中，与道教活动有关的部分，其种类、数量之多，方面之广，是相当惊人的。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最终目的是通过实物史料的研究复原古代历史，探索历史发展规律。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出土与道教有关的遗迹遗物往往有着不同的特点，不仅需要通过整理研究解决某些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划分和分期、分区、发展序列问题，同时还要由现象深入本质，弄清它们的性质、用途、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与之伴出或其他相关的考古材料。中国历史考古学东汉以后阶段的许多问题，从道教的角度来加以认识，常常可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忽略了这一点，对那些与道教有关的遗迹遗物缺乏深刻的认识了解，甚至完全抛

不管，要想真正解决中国历史时期考古汉唐、宋元阶段的体系问题，那是不可想象的。宗教考古是中国考古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道教遗迹遗物的研究谈中国宗教考古，那只能产生出畸形儿，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中国历史考古学体系，也不可能是健全和完善的。

从宗教史的角度讲，古代宗教史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遗迹遗物两个方面。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相比，虽然往往显得零碎、片断，但它是当时留下的实物，具有直观性强的特点，更加真实可信，而且不断有新的材料发现，可以和文献记载互相印证和补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文献记载的内容，补充、修正由于各种原因所造成的大量缺漏和错误。考古学本身的任务就在于通过实物史料复原古代历史，完全离开考古材料，单凭文献记载，许多问题——包括道教最初形成的时间和地域，道教的偶像崇拜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出现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内——是无法解决的。特别是作为以异常复杂的宗教活动为主而很少顾及宗教哲学理论的民众道教，许多内容在文献记载中很难甚至完全找不到记载，它们只能以实物的形式在地下保存下来。按照学界某些人的观点，时代愈晚，文献记载愈详，有关历史情况在文献中大多可以找到记载，考古材料的价值已经不大了，道教史研究自然也是这样。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一位对明清史很有研究的朋友承担了撰写明清四川史的任务，考虑到道教发展状况应该是书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苦于文献不足征，今人有关道教史的论著没有提供多少这方面的成果可以参考，问我考古方面是否有相关的材料。因为当时我刚开始研究道教考古不久，又正在重点研究其他领域的问题，还未来得及研究这一部分内容，知之甚少，愧无以对。后来他的著作出版，对此也就只好暂付阙如了。以后随着自己研究工作的发展，对明代四川道教考古材料稍多关注，发现实际上材料是不少的，打算陆续写几篇东西，也算对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作一个交待。明代距今不过五六百年，在古代史范围内年代是相当

晚的了，情况尚且如此，整个道教考古材料对古代道教史研究的重大作用和意义，这个例子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无论是从考古学，还是从宗教学、古代宗教史的角度讲，都需要对考古发现与宗教活动有关的遗迹遗物进行专门的研究。在国家组织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之考古学卷和宗教卷中，在讲到两个学科的分支学科时，都提到了“宗教考古学”，也就很好说明了这一问题。中国的宗教考古学，无论从考古学还是从宗教学的角度讲，也都不能不包括道教考古的内容。离开在中国土生土长、影响深远、材料丰富的古代道教活动遗迹遗物的研究，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系统的中国宗教考古学。道教考古和佛教考古是中国宗教考古学的两大主干，这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纵观考古学和宗教学界过去的情况，对于道教考古材料的研究和利用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存在问题相当不少。从考古学方面讲，过去由于受到单纯器物形态学观点的影响，对于考古材料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对遗迹遗物外部形态的考察，分型分式，分期分区，判定年代，排出序列，对于它们的性质、用途、发生发展变化的原因，所产生的影响作用等和社会历史有关本质方面的问题则很少顾及。有时虽然注意到了，又苦于缺乏必要的古代历史知识，缺少深厚的文献功底，不能联系有关的文献记载对考古材料作出历史的解释。道教本身是多种古代传统文化的集合体，是很专门很复杂的东西，掌握起来并不容易。不具备道教专门知识，不能很好地运用道书文献材料，对考古发现与道教有关材料的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在已经发掘出土的考古材料中，到底哪些和道教有关，属于道教考古研究的范围，这一最基本的鉴定工作过去做得不多，大量与道教有关的考古材料还没有被识别出来，甚至因不识其价值而存放于文物库房中不为世人所知，有待那些掌握道教专门知识的人再次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发掘。被鉴定出来经过深入研究的，那就更少了。近十年来，情况虽有所改变，考古发现与道教有关遗迹遗物的研究逐渐开始引起学界一部分人的注意，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总的来说工作仍然做得实在太

少，和考古材料本身的数量相比太不相称。从宗教学界的情况看，古代道教史作为古代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文献记载，必须同时对有关考古发现的材料加以充分利用，这一根本性的指导思想问题并未引起广泛的重视。不可否认，道教史的研究近二十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在有关的著作中使用考古材料不多，大量可以帮助解决古代道教史问题的遗迹遗物材料还没能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影响到整个古代道教史研究更好地深入发展，这也是应当看到的事实。正如葛兆光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在研究宗教时往往只注意到了那些宗教思想家的思想，却忽略了宗教神谱、仪式、方法。”（《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323页）古代道教史的研究偏重于理论思想，对宗教活动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多方面的原因。这里我们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如前所说，考古发现与道教有关的材料，一般都是古代各阶层人士从事各种具体宗教活动保存下来的实物史料，它们正是文献记载中最薄弱的环节。例如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道士和道教信众们的丧葬仪式活动，道书文献记载不多，存在不少缺环，有的记载极为简略，只能提供一些线索，在考古发掘东汉以来的墓葬中，却有极为丰富的遗迹遗物出土。缺乏专门的考古知识，这些材料是很难利用的。道教史的研究者缺少应有的考古学专门知识，是造成上述偏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研究考古的人不懂道教史，研究道教史的人不懂考古，这种隔膜是造成大量与道教有关的考古材料不受重视，未能发挥作用的关键。我们需要对道教考古材料作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建立宗教考古分支学科——“道教考古学”。这一任务需要考古学界和宗教学界的共同关注，相互呼应，彼此配合，更需要通过研究者同时掌握考古学和道教史两方面的专门知识的途径来完成。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茂林副研究员在《青城山建福宫遗址试掘收获及其意义》一文中曾经讲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涉足道教文化，四川大学教授张勋燎先生早

已提出‘道教考古’的课题，这是很有意义的。”（《成都文物》1993年4期）问题的提出，绝非事出偶然。我在大学本科修的是历史专业，对中国古代历史有浓厚的兴趣。1957年毕业以后，因为工作需要，一直从事秦汉以后阶段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研究和教学，又以“中国铁器时代墓葬考古”为主要研究方向，先后招收了几届研究生。在研究东汉以后阶段墓葬考古材料的过程中，遇到许多看来与道教活动有关的遗迹遗物无法解释，使整个墓葬考古材料的系统化综合研究受阻。于是横下心来，决定非搬掉这个拦路虎不可。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在系统学习道教基本知识和道教史的基础之上通读《道藏》文献，摸了摸底，从中了解到与道教活动有关的考古材料远不限于墓葬一个方面，也包括墓葬以外的其他不同方面的遗迹遗物；考古发现大量东汉以后的材料，许多都可通过道书文献记载得到不同程度的解释；这些考古材料的正确理解，反过来又可以帮助解决古代道教发展史上的许多问题。通过反复思考和研究实践，最后确定了“道教考古”的研究方向和建立《道教考古学》的课题，发表了一些有关论文，并先后给考古专业和道教史的研究生讲授了《道教考古学概论》专题课，对这一学科概念作了初步的阐述，得到了国内外一些同行们的鼓励。

一门新学科的创建，是一个十分复杂艰苦的过程。在目标确定之后，必须脚踏实地地从一个又一个的专题研究开始，经过长期的甚至是几代人的努力，有了丰厚的积累，然后才能连点成线，连线成面，连面成体，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和浮躁。十多年来，我的研究工作一直主要围绕道教考古这一中心展开，在对公开发表为主的考古材料进行广泛的识别和收集的基础上，归纳出数十个专题加以研究，从具体材料到研究方法的摸索也都形成了若干看法。本书编辑了有关的专题研究论文二十三篇，文字部分约一百二十万言，图版五百余幅，内容涉及墓葬、宫观建筑、石窟、碑刻、简牍、画像、雕像、印章、铜镜、符牌等不同方面的遗迹和遗物，上起东汉，下迄于明，几乎涵盖了各个不同时段

的材料。书中内容绝大多数皆属新作，一部分过去曾经发表过的，这次收录时也经过了增订修改，有的几乎完全是重写。总之，我们始终坚持无新说不成文的原则，蹈袭抄撮之事，在所不为。

一门新学科的建立，大都是多种学科知识交叉的结果。我们的研究，以道教、道教史和汉唐考古的交叉结合为中心，同时利用宗教学、考古学、金石学、历史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多种学科知识方法，对考古材料进行综合研究。在分析材料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在结合文献记载对考古材料作出历史的解释基础之上，尽可能地揭示出考古材料所反映的古代道教史上的问题，对古代道教史上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通过东汉魏晋南北朝墓葬出土的多种我们称之为“解注器”的研究，提出了初期天师道最初是东汉明帝时在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形成的，再先后向西面、西南面和南面三个方向发展。大约在顺帝年间，一支经过汉中进入四川发展成为五斗米道；另一支经过安徽发展到长江下游的江苏等地，为六朝时期江南道教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再有一支则在汉末三国时期沿丝绸之路向西发展到了青海西宁等地，两晋十六国时期在以敦煌为中心的甘肃境内得到较大的发展。而中原地区的道教，至魏晋已大大衰落，到北朝新的教派兴起之后，才又再度兴盛起来。通过对安徽、湖北、江西等地孙吴两晋墓出土墓券、简牘宗教性质的识别，确定了一批墓葬的道教性质和部分墓主的道士身份，对东汉末年中原早期天师道南传和五斗米道由四川沿江东向发展至江南地区的一些活动情况，提出了新的看法。通过北朝碑刻和造像材料的研究，提出新天师道和楼观道两者的更替与它们对待佛教各自不同的态度直接有关，实质上是特殊民族矛盾历史条件下不同民族政策的产物。从隋唐两宋墓葬出土“镇墓真文”砖石刻不同类型和地域分布情况，提出隋唐时期北方上清派和灵宝派彼此界限甚严，各自的活动范围明显不同，上清派主要在以东京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境内，灵宝派主要在以西京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地区流行。经过唐末

黄巢起义僖宗入蜀，两派在北方的中心也都转移到了川西的成都地区并呈融合之势，其中一部分融合形成了文献中不见明确记载的“太上真元大道”（很可能是金元时期“上方真元道”的前身）新道派。……凡此种种，多为学界所未道及，或与成说有异。虽未可视为定论，以实物资料为依据，作为问题提出，亦可供研究者之思考。

二十三篇文章，按研究材料所在的地域范围合编为三卷：上卷为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的材料，可称为“北方卷”；中卷为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南方地区的材料，可称为“南方卷”；下卷中的每个项目也都同时涉及了南方和北方两个地区的材料，属于综合性的内容，可称为“综合卷”。我们在1996年曾向国家教委即现在的教育部申报了《中国南方地区道教考古研究》课题，以“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博士点基金项目”获得资助，本书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即属于这一项目的成果。2002年，我们又获得了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2~2003年度重大项目《中国道教考古研究》课题的资助，本书的第一、三两卷和第二卷的部分内容，就是这一项目的成果。三卷中每卷的文章，大体按材料的时代早晚确定先后顺序。这样的划分，既突出了考古学上区系类型学方法的应用，又能反映出古代不同时期道教的起源发生，活动中心的转移，以及不同时期不同教派活动的地域范围和某些活动形式特点等历史发展情况。一个专题一篇文章，每个专题所涉及的材料数量多少不同，涵盖的问题面大小不一，因此篇幅长短差别很大，字数少者不过数千，多者可达数万乃至二十余万字。根据上述具体情况作不同的安排，凡篇幅大者分章分节，篇幅小者则仅标子目，不另分章节。

白彬博士是一个脚踏实地、刻苦好学、轻名重实、事业心极强的青年学者，在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本科毕业后，先后做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助手，长时间和我一起致力于道教考古的学习和研究，对道教考古有浓厚的兴趣和很好的基础。书中所

收《吴晋南朝买地券、名刺和衣物疏的道教考古研究》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隋唐五代宋元墓葬出土神怪俑与道教》是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重庆云阳云安盐场明代玄天宫遗址和四川地区与盐业有关的道教遗迹》也是他一手撰写的。其余部分虽然是我执笔，但在收集材料、讨论意见、编制图表等方面他都做了不少工作，实际上也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成果。总的说来，全书大约三分之一的成果应当算在他的账上，此书用我们两人合著的方式出版，以申循名责实之意，这也是我要说明的。

我 1953 年进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1957 年毕业留系任教，追随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从事考古教学、科研工作，聆受教诲。先生生前虽未涉及道教考古的问题，但这个命题却是在继承他和他的挚友徐中舒先生共同的学术传统，按照他们强调考古研究不能脱离历史、历史时期考古必须和古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思想指引下发展出来的。饮水不忘挖井人，谨以此书献给两位恩师以为纪念。

本书是我们创建“道教考古学”工作的部分阶段性成果，是计划中道教考古系列著作的第一部，在学术界像这样的专门著作过去似乎也还不曾有过。因为是初创，涉及面又较广，错误不当之处肯定不少，敬请学界的同志们批评指正。

张勋燎

2004 年 9 月 15 日于四川大学桃林村宿舍

Preface

Daoism is China's native religion, with nearly two thousand years of history. As a religion, its structure is composed of two aspects: theories and concrete practices. It is well-known that Daoism had multiple origins. It blends many things, including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from the ancient intellectual class, and ideas of ghosts and spirits and customs of daily life from the common people, and has permeated many different sorts of social activity. Daoism is the combination of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has broadly and deeply influenced people's thought and behavior. The artifacts and traces found through archaeology are the vestiges of ancient people's various and diverse historical activities. Among the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dating from after Daoism's formation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variety, breadth, and amount of material discovered relating to Daoism is quite amazing.

Archaeology is one of the historical sciences, and its final goal is to reconstruct ancient history and explore the principl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rough studying of stuff materials. Artifacts and traces related to Daoism from different eras and regions have different distinctive features. Thus we should not only organize the data in order to solve various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type, periodization, regional division, and cultural series of some archae-

ological cultures, but we must also look at the essences beneath the phenomena, and clarify the phenomena's qualities, uses, and meanings. And this will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rom the same site or which are otherwise related to the Daoist materials. Many problems in the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f the period from the Eastern Han on can often receive good solutions when viewed in terms of Daoism. If we neglect this point, and lack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artifacts and traces related to Daoism, or even pay no attention at all to the Daoist aspect, it will be impossible to tru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archaeological systematicity of the Han to Tang and Song to Yuan periods. Archaeology of religion is an indispensable branch of Chinese archaeology. To discuss the archaeology of Chinese religion without research into Daoist artifacts and traces would be to give birth to a deformed creature;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f China built on such a foundation could never be healthy and whol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eligious history, the study of ancient religions is mainly based on two things: documentary records, and the artifacts and traces discovered through archaeology. Compared with documentary records,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often appear fragmentary, yet because they are concrete objects left from a previous time, they give us a direct perception of that time, and are more reliable. Furthermore, since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re ever and again coming to light, they can be used to authenticate and supplement documentary records, and can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documentary records or rectify the great number of omissions and errors which have occurred for various reasons. The task of archaeology is to restore ancient history by using historical artifacts. If we were to completely ignor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and rely merely on documentary records, then many problems would be insoluble—such as the key problems of the original time and place of the formation of Daoism, and the place, tim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appearance of Daoist icon worship. Popular Daoism, which consists mostly of peculiar and complex religious activities, and rarely deals with the theories of religious philosophy, is a case in point; much of popular Daoism is barely mentioned or completely unmentioned in documentary records, and

has only been preserved in the form of material objects, underground. Some scholars ar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later the period being studied is, the more detailed the documentary record is, and because 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can mostly be found in the documentary record, archaeology becomes of little value. Naturally, this is the case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Daoism. But the real situation is not always being so. In the early 1990s, a friend of mine who has done much work on the history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ook on the task of writing a history of Sichuan Provi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periods. Realizing that his book must touch on Daoism and its state of development, and hampered by the lack of 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by the fact that contemporary scholars have offered little research on this topic, he asked if archaeology could supply any relevant material. Because I had just begun to study the archaeology of Daoism, and because I was mainly studying problems of another field, I was not able to produce any research on this topic in time, and knew too little about it, so I was sorry I had nothing to offer him. When his book came out, he could only leave the Daoist question as a temporary lacuna. Later, as my work progressed, I paid a bit more attention to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on Daoism in Sichuan, and discovered that indeed there was quite a lot of this material, so I planned to write up a few articles on this topic, picking up where my friend had left off. The Ming dynasty is only five or six hundred years removed from the present, and as far as ancient history goes the Ming period is considered relatively recent—since the archaeology of Daoism was so important for a period as recent as the Ming Dynasty, we can use this example to see the great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archaeology of Daoism for the historiography of Daoism as a whole.

The fields of archaeology, the religious studies, and the history of ancient religion all need to carry out specialized research o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related to religious activity. This fact can be seen in the layout of the volumes on archaeology and religion in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a*; when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a* discusses the branches of these two fields, each field is given a branch called “archaeology of religion”. Chinese archaeology of religion, whether it falls within the field of archaeology or the field of the

religious studies, must include the archaeology of Daoism. Daoism is the native religion of China, with wide-reaching influence and rich material remains, so a systematic archaeology of Chinese religion can never be established without the study of the artifacts and traces of ancient Daoist activity. It is an indisputable fact that the archaeology of Daoism and the archaeology of Buddhism are two mainstays of the archaeology of Chinese religion.

If we take a broad look at the past situation of the fields of archae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the study and application of Daoist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have been dissatisfying, and many problems can be found. As for archaeology, because in the past the focus was on the typology, study has usually been limited to the inspection of the outer forms of the artifacts and their type, variety, periodization, and regional division, as well as their dating and cultural series. Too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ociohistorical questions about artifacts' qualities, uses, causes of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sulting influence and purpose. Sometimes scholar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such questions, but they have been hampered by their lack of the necessary multifaceted knowledge of ancient history, and lack of a deep grounding in the use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were unable to use the relevant documentary records in order to interpret the archaeological finds. Now, Daoism is an aggregate of many forms of anci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s a very specialized and complex entity, so it is difficult to gain a good command of Daoism. Without specialized knowledge about Daoism and the ability to utilize Daoist texts and documents, a scholar would be completely unable to study Daoism-related materials discovered through archaeology. The most basic job of judging which of the already excavat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re related to Daoism (and thus fall within the purview of the archaeology of Daoism) has not been done enough in the past, and a great amount of Daoism-relat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has not yet been recognized for what it is, and has been shelved in storerooms, its value unknown, awaiting a second sort of "excavation" by scholars such as us, equipped with specialized knowledge of Daoism. The amount of material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for what it is and studied in detail is even less. In the past decade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somewhat, and research of Daoism-related material discovered through archaeology has little by little begun to attract the attention of some scholars (which is a welcome development), but in general this sort of work has really not been done enough, and when compared with the amount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available, is greatly inadequate. In terms of religious studies, the history of ancient Daoism is a component part of ancient history; the study of ancient Daoism cannot simply rely on documentary records, but must also make full use of relevant archaeological finds. This basic guiding principle has not yet received broad attention. Admittedly, the historiography of Daoism has developed greatly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and has had no small success. Yet the books on this topic have made little use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much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which should be able to solve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Daoism has not yet received its full and proper use, or been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better and deeper development of historiography of Daoism—this fact must be recognized. As Prof. Ge Zhaoguang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ointed out in the 1980s, “in studying religion, Chinese scholars more often than not have on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thought of religious thinkers, and have overlooked pantheons, ritual, and occult practices” (Ge Zhaoguang, *Taoism and Chinese Culture*.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Press, 1987, P. 323). The study of ancient Daoism has been biased toward the study of thought and theory, and has pai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religious activity.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this state of affairs. What we must emphasize here is that, as stated above, Daoism-related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generally are the concretely objectified historical record of the specific religious activities of persons from all social classes, the very segment which is so poorly preserved in the documentary record. Take for example the funerary ritual activities of the Daoist priests and masses of various periods and regions—Daoist texts and documents do not record much of this, and much of the records are fragmentary, some extremely sketchy, providing no more than a few clues. Yet in the graves excavated from the Eastern Han period on, an extremely rich collection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has been unearthed. Without specialized archaeological knowledge, these materials are difficult to utilize. Scholars of Daoist history lack the necessary

specialized archaeological knowledge, and this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ir bias, as stated above.

Archaeologists don't understand Daoist history, and historians of Daoism don't understand archaeology-this lack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is the key reason why so many Daoism-relat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have been under appreciated and never received their proper use. We must make a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in-depth study of Daoist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establish "archaeology of Daoism" as a branch science of the archaeology of religion. The fields of both archae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must both turn a common focus to this task, and work in concert. It is even more necessary that this task be accomplished through scholars' gaining command of the two specialized forms of knowledge, archae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Daoism.

In 1993, Ye Maolin,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his article "Preliminary Excavation of the Site of Jianfu Hall at Mt. Qingcheng and Its True Significance", wrote,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ne must study Daoist culture. Prof. Zhang Xunliao of Sichuan University has long proposed 'archaeology of Daoism' as a topic for study;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Chengdu wenwu, 1993, no. 4). This proposal of mine by no means came as an accident. I majored in history in college, and I have a strong interest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Ever since I graduated in 1957, due to job requirements, I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research and teaching of the Chinese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f the post-Qin-Han period. "archaeology of Iron-age Chinese tombs" has been my major research focus, and I have supervised several generations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from graves of the Eastern Han period on, I came across many artifacts and traces which seem to be related to Daoist activity, and was unable to interpret them, which has hampered my systematic and synthetic study of the grave materials. I steeled myself to push aside this obstacle blocking my path. From the late 1980s, I made a systematic study of basic Daoist knowledge and history, and on this basis read through the Daoist Canon. I

came to really understand Daoism, and realized that Daoism relat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ar from being found only in tombs, also come in many other forms. Of the vast amount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from the Eastern Han on, many can be interpreted to varying degrees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records in Daoist texts and documents, and the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can conversely aid in solving many problem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aoism. Through repeated reflection and research, I finally fixed "archaeology of Daoism" as the direction of my research and established "archaeology of Daoism" as a research topic, published some related articles, and taught the course "Overview of the Archaeology of Daoism" to graduate students studying archae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Daoism. I have made an initial exposition of the concepts of this field, and received encouragement from scholars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field of study is an utterly arduous and complicated process. After setting up one's goal, one must begin by moving in a down-to-earth manner from one specialized research project to another, and over the course of a long period (even several generations) of effort, build up a generous store of knowledge. Only then can one link points together to form a line, link lines to form a plane, and link planes to form a three dimensional body. Even a hint of impetuosity or the expectation of quick results is impermissible.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my research work has mainly revolved around the archaeology of Daoism. With a wide-ranging program of evaluating and collecting published archaeological reports as my basis, I have inductively selected and researched several ten topics, as well as formed some ideas about the material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ies. The present book is the se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twenty-three relevant topical papers. The text is about one million and two hundred thousand characters in length, and book includes more than five hundred plates and illustrations. The book discusses graves, temple construction, cave sculpture, stele inscriptions, inscribed wooden slips, portraits, statues, carved seals, bronze mirrors, and talismanic tablets, dating from the Eastern Han to the Ming dynasty, including materials from almost every historical perio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book has

never been published; some articles which have already appeared elsewhere have been reworked for the book so much that they have essentially been rewritten. We have consistently held to the principle that nothing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book unless it is saying something new. In no instance have we copied, summarized, or closely repeated work already publish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field of study is basically the result of combining knowledge from different fields. Our research combines Daoism, the history of Daoism, and archaeology of the Han to Tang period to form a central focus, while also utilizing the various fields and methods of religious studies, archaeology, epigraphy, historiography, philology, and the study of ancient documents to carry out synthetic research on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In the process of analyzing the material, we have always focused on the task of integrating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s gained by comparing documentary records with artifacts, in order to reveal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questions about the history of Daoism reflected by the archaeological material, and raise new arguments about such questions. For example, through research on many types of what we refer to as “vessels used for dissolving (demonic) infusions”, which have been unearthed from graves of the Eastern Han, Wei, Ji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s, we have proposed that the earliest Celestial Master Daoist movement originally formed in the time of Emperor Ming of the Eastern Han (r. 57–75 CE) in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 with Chang'an and Luoyang as the center of its range, and then expanded successively in westerly, southwesterly, and southerly directions. Around the period of Emperor Shun (r. 125–144), one branch of the movement passed through Hanzhong into Sichuan and developed into the Way of the Five Pecks of Grain; another branch passed through Anhui Province and expanded into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other areas, and established a foundation for the later massiv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Daoism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yet another branch during the late Han and Three Kingdoms period followed the Silk Road west and developed in the Xining district of Qinghai Province, and during the Jin and Sixteen Kingdoms period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of Gansu Province

with Dunhuang as a center. Meanwhile, the Daoism of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had already greatly declined by the Wei and Jin periods, and only flourished again after the rise of the new Daoist movement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hrough a recognition of the religious character of grave contracts 镇墓券 and inscribed wooden slips unearthed from Wu and Jin dynasty graves in Anhui, Hubei, and Jiangsu Provinces, we have ascertained the Daoist character of a group of graves and the Daoist identity of some of the grave occupants, and proposed a new viewpoint concerning the activities of early Celestial Master Daoism in the late Han as it was transmitted south, and the Way of the Five Pecks of Grain as it expanded eastward from Sichuan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into south China. On the basis of research on stele inscriptions and statu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we propose that the replacing of the new Celestial Master Daoism of Kou Qianzhi by Louguan Daoism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ir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Buddhism—in essence they are the products of different ethnic policies adopted in similar special historical situations of ethnic conflict. From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and different types of “grave-securing writs” 镇墓文, inscribed bricks and stones unearthed from graves of the Sui, Tang, and Song periods, we propose that during the Sui-Tang period in Northern China there was an extremely rigid geographical boundary between Shangqing and Lingbao forms of Daoism. The range of activity of each form of Daoism is clearly different: Shangqing was current mainly in the Henan region with the eastern capital of Luoyang as a center, while Lingbao was current mainly in the Shaanxi region with the western capital of Changan as a center. After the Huangchao rebellion (875–884) and Emperor Xizong (r. 873–888) flight to the region of Shu, the two forms of Daoism shifted from the North to the Chengdu region of western Sichuan, and evinced a trend toward merging together, a branch of which later formed a new Daoist Sect——Taishang zhenyuan dadao 太上真元大道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hich was not definitely recorded in the Taoist Canon and other documentary records. It is most likely that Shangfang zhenyuandao 上方真元道 of the Jin and Yuan periods grew out of it……Of these various arguments, most have never been proposed before in the field, or diverge from established viewpoints. Although they cannot yet be seen as final conclu-

sions, they can serve to raise questions and provide scholars with food for thought, based as they are on the evidence of concrete artifacts.

The twenty-three articles have been edited into three volumes, divided by the type of research material used and the geographical region studied. The first volume covers material from the northern region with the Yellow River valley as a center, and can be called the "northern volume". The second volume covers material from the southern region with the Yangtze River valley as a center, and can be called the "southern volume". Each of the items in the third volume deal with material from both northern and southern regions, and the volume can be called the "synthetic volume". In 1996 I submitted the project entitle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Daoism in the Southern Region of China" to the State Education Committee and the present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ceived funding as a "State Education Committee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ine-Five' Doctoral Selected Funded Project". The second volume of this book is the product of this project. In 2002, as a part-time professor of Taoism and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 of Sichuan University, I submitted the project entitle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f Daoism in Ancient China" to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ceived funding as a "Ministry of Education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Key Project for Academic Year 2002—2003". The first and third volumes of this book are the product of this project. The articles of each section of the three volumes are generally arrang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based on the dates of their materials. This manner of demarcation emphasiz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regional divisions and cultural series, and is also able to reflect historical developments such as the origin and occurrence of Daoism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shifting of centers of activity, and the regional ranges of different schools of Daoism in different periods plus the special forms their activities took. Each topic is given one article, but the amount of material covered by each topic is different, and the size of the problems contained within each topic differs, so there is a great divergence in the sizes of various articles, from several thousand characters to more than two hundred thousand characters in length. We have made different arrangement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mentioned above: most long articles have been divided into sections and subsections, while most short ones are only given subtitles.

Dr. Bai Bin is a down-to-earth and studious young scholar, valuing substance over fame and with a strong sense of his vocation. After receiving his bachelor's degree from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Sichuan University with a specialization in Archaeology, he has been my M. A. student, Ph. D. student, and research assistant. He has exerted himself in the study and research of the archaeology of Daoism together with me for a long time, and has a deep interest and excellent foundation in the archaeology of Daoism. The section of this book entitled "Research on the Daoist Archaeology of Land Contracts, Name Slips, and Memorials for Clothing and Everyday Articles of the Wu,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s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completed in 2001; the section "Daoism and the Tomb Figurines of Spirits and Monsters of the Sui, Tang, Five Dynasties, Song, and Yuan Periods", is based on his M. A. thesis, completed in 1991; and the section "Ming Dynasty Site of Xuantian Halls in Yunyang of Chongqing, and Ancient Daoist Traces Related to the Salt Industry in the Sichuan Region", is also his work. As for other articles, although I wielded the pen, he did quite a bit of work in collecting materials, discussing opinions, working out charts and so on, thus they are really the products of our collective effort. Overall, about one-third of the entire book should be credited to his account. This book is being published as our joint product; I must clarify this so that reality may correspond to name.

In 1953 I entered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Sichuan University, and in 1957 I graduated and remained as a teacher, following the noted late archaeologist Prof. Feng Hanji in the study of archaeolog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benefiting from his sage instruction. Although Prof. Feng never touched on the question of the archaeology of Daoism, this topic of mine is actually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scholarly tradition of Prof. Feng and his close friend noted late historian Prof. Xu Zhongshu, having formed under their guiding i-

deas that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cannot be divorced from history and that the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f China must be integrated with ancient documentary records. When one drinks water one must not forget the person who dug the well—I reverently dedicate this book to my two gracious teachers as a memorial.

This book is a partial stage in our continuing labor to create the field of “archaeology of Daoism”, and is but one section of our planned series of works on the archaeology of Daoism. It seems that in the pas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never seen a specialized book such as this one. Because this is an initial foray, and its range is rather broad, there must certainly be more than a few errors, so we respectfully invite the critiques and corrections of our colleagues in the academy.

Zhang Xunliao, Peach Grove Village dormitory,
Sichuan University, 15 Sep. , 2004

目 录

第一卷

壹 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和天师道的起源·····	1
绪论——考古材料的发现和研究·····	1
第一章 道教的注鬼论、解注术和解注器的定名·····	3
第一节 道书文献记载的注鬼论和解注术·····	5
第二节 道书所载不同的解注法术·····	23
一、解注的名称和类型·····	23
二、解注的法术·····	28
第三节 注鬼论和解注术所属的教派问题·····	42
第四节 “注祟”、“重复”与“承负”·····	49
第二章 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	53
第一节 解注器的确定和种类、器型·····	53
第二节 陶容器·····	54
一、东汉解注陶容器的类型和材料·····	54
二、地域分布、年代与组合·····	98
三、东汉解注陶容器在墓中放置情况的考察·····	105
四、器铭校读与考释·····	107
第三节 券版·····	190
第四节 石羊·····	213

第五节 铅人和其他代人用品	229
一、文字	230
二、实物	231
第六节 药物	244
第七节 印章	245
第八节 解注器发展的阶段性	257
第三章 解注器所反映的宗教历史面貌	258
第一节 解注器材料所反映的宗教理论观点	262
第二节 解注器文所反映的神系内容和“天帝使者”、“天帝神师”	266
第三节 解注器文所反映的宗教组织情况	278
第四节 解注器所反映的宗教科仪法术情况	280
第五节 解注器材料所属教派和初期天师道的酝酿形成过程	282
一、教派问题	282
二、文化渊源	284
三、初期天师道的酝酿形成过程	287
(一) 刘邦、刘安、汉武帝与道教有关的宗教活动	288
(二) 成、哀时期《包元太平经》的出现和西汉末年与道教有关的宗教活动	291
第六节 中原地区初期天师道和张陵五斗米道(正一道)的关系	298
第四章 从东汉墓葬解注器看中原地区初期师道的性质和形成原因	307
第一节 中原地区初期天师道的性质	307
第二节 中原地区初期天师道产生的原因	312
一、秦和西汉时期人鬼灵魂观念的转变	312
二、西汉末年至东汉初的天灾人祸、疾疫流行造成大量人民的死亡	318
三、封建统治的严重危机	322
四、谶纬学说的盛行	324
五、家族合葬多室砖、石墓的盛行	326
六、秦、汉大一统帝国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330

贰 河南偃师县南蔡庄乡东汉墓出土道人肥致碑及有关道教遗物研究

.....	333
一、碑文问题.....	333
二、石碑形制.....	342
三、随葬解注陶瓶.....	345
四、总论.....	347

叁 中原和西北地区魏晋南北朝墓葬的解注文研究..... 351

第一章 中原地区魏晋南北朝墓葬的解注文材料和相关遗迹..... 351

第二章 甘肃地区魏晋墓出土解注文材料..... 363

第一节 解注材料的发现和分布情况..... 363

第二节 解注文陶器器形特点及其变化情况..... 370

第三节 陶器文字的校录和器物类型..... 379

一、有纪年之器文..... 380

二、无纪年之器文..... 476

第四节 解注器的年代、组合与分期..... 495

一、解注器的年代..... 495

二、解注器的组合..... 497

三、解注陶瓶、泥瓶与解注陶钵..... 501

四、甘肃地区魏晋解注器的分期..... 502

第五节 部分解注器文字内容的考释..... 503

第六节 关于建兴二十八年合同契券木牍文字的说明..... 525

第七节 甘肃地区魏晋解注器的特点..... 526

第三章 甘肃以西地区汉晋唐墓出土的解注器文..... 537

第一节 青海、新疆解注文材料的发现..... 537

一、青海地区..... 537

二、新疆地区..... 544

第二节 甘、青、新疆魏晋墓解注器文和天师道的西传..... 552

第三节 西北地区出土十六国、唐代文物与道、佛关系..... 562

一、墓葬出土随葬“衣物疏”..... 562

二、石塔八卦..... 569

余论..... 573

肆	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华岳庙碑》与寇谦之新天师道·····	575
	一、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和《华岳庙碑》的著录和关系·····	575
	二、《大代华岳碑》的释文校录和句读·····	579
	三、部分碑文考释·····	582
	四、碑文所反映寇谦之新天师道的有关活动内容·····	594
	五、《大代修华岳庙碑》与汉《西岳华山庙碑》·····	602
伍	北朝道教造像的考古研究·····	609
	第一章 实物材料的发现和著录·····	609
	第一节 有纪年之北朝道教造像·····	610
	第二节 无纪年之北朝道教造像·····	648
	第二章 时代和地域分布·····	660
	第三章 造像名称和造像内容特点·····	662
	第一节 造像名称·····	662
	第二节 北朝道教造像及佛道混合造像的特点·····	673
	一、北朝道教造像的特点·····	673
	二、北朝道教造像与佛教内容的混杂情况·····	679
	第四章 造像发愿文题名和文字·····	685
	第一节 姚伯多造像发愿文考释·····	686
	第二节 其它部分发愿文的校读、考释·····	700
	第三节 造像关系人题名的考察·····	722
	第五章 北朝道教造像的道派关系和兴盛原因·····	730
	第一节 北朝道教造像的起源及其与楼观道的关系·····	730
	第二节 北朝楼观道造像兴盛的历史原因·····	745
	余论·····	750

第二卷

陆	重庆、甘肃和四川东汉墓出土的几种西王母天门图像	
	材料与道教·····	755
	第一章 材料的发现和内容·····	756
	第一节 重庆巫山和甘肃成县东汉墓的西王母天门画像棺饰铜牌	

.....	756
第二节 川南、川西东汉墓出土的西王母天门材料.....	763
一、画像石棺.....	766
二、画像砖.....	772
三、摇钱树座.....	780
第二章 天门与早期道教的最高尊神——天帝.....	782
第三章 道书记载的西王母和天帝、天门与凡人升天成仙的关系.....	788
第一节 西王母和天帝、天门的的关系及其在道神中的职掌.....	788
第二节 天帝使者和天仓.....	796
余论和结语——早期西王母传说的源流和不同区系.....	800
柒 吴晋南朝买地券、名刺和衣物疏的道教考古研究.....	805
绪论.....	805
第一章 吴晋南朝买地券的发现、分布及文字校读.....	811
第一节 东吴时期的买地券.....	814
第二节 西晋买地券.....	831
第三节 东晋买地券.....	837
第四节 南朝买地券.....	843
第五节 隋代买地券.....	875
第二章 吴晋南朝买地券的特点、类型与分期.....	878
第一节 吴晋南朝买地券的特点.....	878
第二节 吴晋南朝买地券的类型.....	880
第三节 吴晋南朝买地券的分期.....	887
第三章 吴晋南朝买地券券文内容及神符.....	889
第一节 部分重要券文内容考释.....	889
第二节 典型买地券通译.....	918
第三节 吴晋南朝买地券与神符.....	920
第四章 不同类型买地券的道教内容及其渊源试析.....	921
第一节 B型买地券的道教内容及其渊源.....	921
第二节 C型买地券的道教内容及其渊源.....	923
第三节 D型买地券的道教内容及其渊源.....	924
第四节 E型买地券的道教内容及其渊源.....	925

第五节 F型买地券的道教内容及其渊源	929
第五章 名刺	930
第一节 名刺的时代、地域分布及刺文内容	930
第二节 名刺的用途和性质	938
第六章 衣物疏	945
第一节 衣物疏的时代、地域分布及疏文内容	946
第二节 衣物疏的用途和性质	957
第七章 买地券、名刺及衣物疏所反映的道教史诸问题	963
第一节 吴晋买地券与早期天师道的南迁	964
一、东汉镇墓文与早期天师道	964
二、早期天师道传入江南的时间和线路问题	973
第二节 吴晋名刺、衣物疏与五斗米道（正一道）的东传	978
第三节 南朝买地券与南天师道	980
第四节 《女青鬼律》、《玄都鬼律》等书的时代和教派问题	985
一、《女青鬼律》的时代和教派	985
二、《玄都鬼律》的时代和教派	992
三、《女青鬼律》与《玄都鬼律》的关系	995
四、《正一法文经章官品》的成书年代	996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及萧梁以后买地券罕见之原因浅析	997
捌 江西、四川考古发现的九天玄女材料和有关文献记载的考察	1003
一、考古发现的九天玄女材料	1003
二、文献记载的九天玄女和九天玄女考古材料的性质	1018
三、九天玄女考古材料的意义和反映的道教史诸问题	1026
玖 前蜀王建永陵发掘材料中的道教遗迹	1033
一、生墓代死之王建石真	1033
二、棺床石刻守护尸体之随斗十二神和天乐图	1042
三、尸体防腐剂水银	1049
四、哀册文中所表现的道教思想内容	1050
附录：杜光庭《王氏神仙传》辑佚	1056

拾 川渝黔地区考古发现的河图洛书与先天八卦图研究	1063
第一章 考古材料的发现	1063
第一节 河图洛书材料及其类型	1063
第二节 先天八卦	1098
一、非墓葬出土类	1098
二、墓葬出土类	1100
第二章 河图洛书数之组合区分及其与先后天八卦之关系	1120
第一节 河图、洛书象数的组合与区分	1120
第二节 先、后天八卦与河图洛书的关系	1133
第三节 安丙族人墓的河洛象数与八卦	1139
第三章 地下出土先天八卦与河图洛书材料的道教性质、意义及其 与堪輿葬术、丹鼎烧炼的关系	1144
第一节 铜镜上的先天八卦	1144
第二节 墓葬出土先天八卦、河图洛书与道教、风水堪輿	1146
一、道教与风水堪輿葬墓术的结合	1148
二、墓葬出土八卦、河洛象数材料与道教、风水堪輿术之关系	1152
三、墓葬出土八卦、河洛象数材料的意义	1157
第四章 从考古发现材料看“河洛之学在蜀”	1177
附说五十五河图五行生成数与四十五洛书九宫数之由来	1185
拾壹 江西樟树北宋道士戴知在墓出土墓志与石刻画像考	1189
一、墓志铭文考释	1189
二、石刻画像的考释	1201
拾贰 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南宋建福宫藏殿遗址试掘材料的考察 ...	1215
一、何谓“藏殿”	1216
二、“藏殿”的不同类型与“飞天法轮藏”	1224
三、会庆建福宫藏殿遗址的性质和进一步发掘的必要	1232
拾叁 江西高安南宋淳熙六年徐永墓出土“酆都罗山拔苦超生镇鬼真形” 石刻	1239

拾肆	四川省自贡市邓井关罗浮洞南宋“太上断除伏连碑铭”石刻拓本	
	考说	1251
	一、碑铭校录及刻碑情况考察	1254
	二、关于“伏连”	1257
	三、解冤释结、保存拔亡与断除伏连的关系	1264
	四、三尸与伏连	1272
	五、关于碑文盟约戒誓内容	1284
	六、碑额之神符、日月与天尊题名	1287
	七、碑末题名署衔	1290
拾伍	四川平武明王玺家族墓出土部分道教文物的考察	1297
	一、“石诰命符”	1297
	二、壁画墓主像和“寿山福海”及其渊源	1311
	三、金龙	1325
	四、余论	1327
拾陆	重庆云阳云安盐场明代玄天宫遗址和四川地区与盐业有关的 道教遗迹	1335
拾柒	江西、四川明墓出土的道教冥途路引之研究	1349
	一、冥途路引材料的发现和释文句读	1349
	二、路引文字重点内容考释	1356
	三、“玄天上帝”及有关诸问题	1369
	四、冥途路引的类型和文字异同	1371
	五、冥途路引与明代通行路引制之关系及其他相关问题	1374

第三卷

拾捌	墓葬出土道教代人的“木人”和“石真”	1383
	第一章 材料的类型和器文校读	1384
	第一节 木人类	1384
	一、北方地区	1384

二、南方地区	1388
第二节 石真类	1403
一、蜀地型	1404
二、江南类型	1415
第二章 建兴二十八年松、柏人木牋文字的考释	1420
第一节 材料的著录	1420
第二节 器文校读考释	1424
第三章 唐宋时期代人材料研究	1435
第一节 器物文字的考释	1435
第二节 几种唐宋代人材料的道教性质	1441
第三节 渊源和流变	1444
结语	1448
拾玖 江苏、陕西、河南、川西南朝唐宋墓出土镇墓文石刻之研究 ...	1451
第一章 镇墓文石刻的类型	1452
第一节 “华盖宫文”与“敕告文”石刻	1452
一、华盖宫文	1452
二、天帝敕告文	1462
第二节 五精石	1484
第三节 “八威真文”石刻与“灵宝五真文”	1494
第四节 “消灾真文”石刻	1511
第五节 “五方五帝灵宝真符”	1530
第六节 “炼度真文”石刻	1534
第二章 几种真文石刻在墓葬中的组合情况	1580
第三章 综论	1585
第一节 关于随葬真文石刻墓葬的墓主身份问题	1586
第二节 唐宋灵宝、上清道派活动中心的转移,教派关系的发展 变化及其他	1595
第三节 川西宋墓真文石刻与“太上真元大道”	1603
第四节 宋代“华盖宫文”和“天帝敕告文”的余波	1608

贰拾 隋唐五代宋元墓葬出土神怪俑与道教	1611
第一章 神怪俑的含义、研究历史与现状	1611
第二章 神怪俑的分区与分期	1613
第三章 部分神怪俑的名称、性质及其用途的考释	1637
第四章 神怪俑分区分期及其性质、作用所反映道教史有关问题的 讨论	1742
贰拾壹 江苏明墓出土和传世古器物所见的道教五岳真形符与五岳真 形图	1751
第一章 道教五岳真形图的形成和道书所载“五岳真形图”的类型	1752
第二章 “五岳真形图镜”	1768
第三章 与五岳真形图有关的“含象镜”	1783
第四章 道书记载和考古材料所见“五岳真形符”	1797
第一节 《三皇内文遗秘》与道书记载的五岳真形符	1797
第二节 五岳真形符的古器物材料	1807
余论	1830
贰拾贰 三件唐代道教石刻和唐代佛道之争	1835
一、河南洛阳出土开元六年《大唐大弘道观主故三洞法师侯尊 〔敬忠〕墓志》	1835
二、四川都江堰市青城山常道观开元十三年、十八年刻《常道 观敕并表》等	1847
三、河南洛阳出土唐懿宗咸通三年《女炼师支氏墓志》	1861
四、综说	1870
五、附说青城山“唐玉真公主墓”辨伪	1871
贰拾叁 “道教考古”与“道教考古学”	1875
一、“道教考古”的概念、性质和作用意义	1875
1、什么是“道教考古”	1875
2、道教考古的研究对象及其特点	1876
3、道教考古研究的学术意义	1880

二、中国大陆道教考古现状简析	1886
1、主要成就	1887
2、存在的主要问题	1888
三、建立“道教考古学”分支学科的一些构想	1890
 图版目录	1899
引用书目	1937
道教考古文献目录	1967
 后记	1983

Table of Contents

Volume One

1. “Vessels for Dispelling Infusions” from Eastern-Han Tombs, and the Origins of Celestial Master Daoism	1
Introduction: The Discovery and Study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1
1. 1. Daoist Theories about Demonic Infusion, Methods for Dispelling Infusions, and the Definition of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3
1. 1. 1. The Theory of Demonic Infusion and the Dispelling of Infusions, as Recorded in Daoist Books and Documents	5
1. 1. 2. Some Different Occult Methods for Dispelling Infusions, as Recorded in Daoist Texts	23
1. 1. 2. 1. Names and Types of Infusion Dispelling	23
1. 1. 2. 2. Occult Techniques for Dispelling Infusions	28
1. 1. 3. The Question of the Sectarian Provenance of Theories about Demonic Infusion and Methods for Dispelling Infusions	42
1. 1. 4. “Demonic Infusion”, “Repetition” (chongfu), and “Inherited Burden” (chengfu)	49
1. 2.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from Eastern-Han Tombs	53
1. 2. 1. The Determination of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and Their Varieties and Vessel-Types	53
1. 2. 2. Clay Containers	54
1. 2. 2. 1. Eastern-Han Infusion-Dispelling Clay Containers: Their Types and Ma-	

terials	54
1. 2. 2. 2. Regional Distribution, Dating, and Composition	98
1. 2. 2. 3. Eastern-Han Infusion-Dispelling Clay Container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ir Placement within the Tomb	105
1. 2. 2. 4. The Col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Inscriptions on the Vessels	107
1. 2. 3. Tally-Plates	190
1. 2. 4. Stone Sheep	213
1. 2. 5. Lead Figures and Other Articles Replacing the Dead or Living	229
1. 2. 5. 1. Written Characters	230
1. 2. 5. 2. Artifacts	231
1. 2. 6. Medicinal Substances	244
1. 2. 7. Signets	245
1. 2. 8.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Development in Stages	257
1. 3. The Look of Religious History, as Reflected by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258
1. 3. 1. The Viewpoint on Religious Ideas Reflected by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262
1. 3. 2. The "Envoy of the Celestial Thearch", the "Spirit-Preceptor of the Celestial Thearch", and Elements of a Pantheon as Reflected in the Inscriptions on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266
1. 3. 3. Religious Groups Reflected in the Inscriptions on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278
1. 3. 4. Religious Liturgy and Occult Methods Reflected in the Inscriptions on Infu- sion-Dispelling Vessels	280
1. 3. 5. The Sectarian Provenance of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 Materials, and the Process of the Fermenta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Earliest Celestial Master Daoism	282
1. 3. 5. 1. The Question of Religious Sects	282
1. 3. 5. 2. Cultural Sources	284
1. 3. 5. 3. The Process of the Fermentation and Formation of the Earliest Celestial Master Daoism	287
1. 3. 5. 3. 1. Liu Bang, Liu An, Han Wudi, and Religious Activities Related to Daoism	288
1. 3. 5. 3. 2. The Appearance of the Embracing-the-Origin Scripture of Great Peace in the Time of Emperors Cheng and Ai, and Religious Activ-	

ities Related to Daoism in the Waning Days of the Western Han	291
1. 3. 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rliest Celestial Master Daoism of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and Zhang Ling's "Way of Five Pecks of Grain" (Way of Correct Unity)	298
1. 4. Looking at the Properties of the Earliest Celestial Master Daoism of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from Eastern-Han Tombs	307
1. 4. 1. The Properties of the Earliest Celestial Master Daoism of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307
1. 4. 2. The Reasons for the Birth of the Earliest Celestial Master Daoism in the Central Plains Region	312
1. 4. 2. 1.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ceptions about Humans, Ghosts, and Souls during the Qin and Western Han Periods	312
1. 4. 2. 2.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and the Spread of Epidemics, Caused Many People to Perish during the Late Western Han and Early Eastern Han Periods	318
1. 4. 2. 3. The Acute Crisis of Feudal Rule	322
1. 4. 2. 4. The Popular Spread of Weft-Text Discourse	324
1. 4. 2. 5. The Popular Spread of the Custom of a Family's Being Buried Together in a Multi-Room Brick or Stone Tomb	326
1. 4. 2. 6. The Influence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fied Empire System in the Qin and Han Periods	330
2. Research on the Stele Concerning the "Man of the Way" Fei Zhi and Related Daoist Grave Goods Found in an Eastern-Han Tomb at Nanchai Village, in Yanshi County, Henan Province	333
2. 1. The Question of the Stele Inscription	333
2. 2. The Shape of the Stele	342
2. 3. The Infusion-Dispelling Clay Vases Buried in the Tomb	345
2. 4. Summary	347
3. Research on Infusion-Dispelling Inscriptions in Tombs of the Wei-Jin-Northern-Dynasties Period in the Central-Plains and Northwest Regions	351
3. 1. Infusion-Dispelling Epigraphical Materials in Tombs of the Wei-Jin-Northern-Dynasties Period in the Central-Plains Region, and Related Relics	351

3. 2. Infusion-Dispelling Epigraphical Materials from Tombs of the Wei-Jin Period in the Gansu Region	363
3. 2. 1. The Discovery and Distribution of Infusion-Dispelling Materials	363
3. 2. 2.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Clay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and Their Variations	370
3. 2. 3. The Recording and Collation of Inscriptions on Clay Vessels, and the Vessel-Types	379
3. 2. 3. 1. Vessel Inscriptions with Dates	380
3. 2. 3. 2. Vessel Inscriptions without Dates	476
3. 2. 4. The Dating, Composition, and Periodization of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495
3. 2. 4. 1. The Dating of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495
3. 2. 4. 2. The Composition of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497
3. 2. 4. 3. Infusion-Dispelling Clay and Mud Vases, and Infusion-Dispelling Clay Bowls	501
3. 2. 4. 4. The Periodization of Wei-Jin-Period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of the Gansu Region	502
3. 2. 5. An Interpretation of a Portion of the Contents of Inscriptions on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503
3. 2. 6. Regarding the Explan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Wooden Tablet Used as a Contract Tally, Dated the Twenty-Eighth Year of the Jianxing Reign Period	525
3. 2. 7. Special Features of Wei-Jin-Period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of the Gansu Region	526
3. 3. Epigraphy of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from Han-, Jin-, and Tang-Period Tombs of the Region to the West of Gansu	537
3. 3. 1. The Discovery of Infusion-Dispelling Epigraphical Materials in Xinjiang and Qinghai Provinces	537
3. 3. 1. 1. The Qinghai Region	537
3. 3. 1. 2. The Xinjiang Region	544
3. 3. 2. Epigraphy of Infusion-Dispelling Vessels in Wei-Jin-Period Tombs of Gansu, Qinghai, and Xinjiang, and the Westward Transmission of Celestial Master Daoism	552
3. 3. 3. Sixteen-States and Tang-Period Artifacts Unearthed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Daoism and Buddhism	562
3. 3. 3. 1. The Unearthing of "Memorials for Clothing and Everyday Articles"	

Buried in Tombs	562
3. 3. 3. 2. Eight-Trigram Stone Pagodas	569
Further Discussion	573
 4. The Northern-Wei “Stele of the Numinous Shrine of Mt. Song, the Central Marchmount” and “Stele of the Shrine of the Floreate Marchmount,” and Kou Qianzhī’s New Celestial Master Daoism	 575
4. 1. The Recording of,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rthern-Wei “Stele of the Numinous Shrine of Mt. Song, the Central Marchmount” and “Stele of the Shrine of the Floreate Marchmount”	575
4. 2. An Explanation of “Floreate Marchmount Stele in the Dadai Period (Northern- Wei Dynasty),” Plus a Collation and Sentence-by-Sentence Reading	579
4. 3. A Partial Textual Study of the Stele Inscriptions	582
4. 4. Elements of Related Activities in Kou Qianzhī’s New Celestial Master Daoism, as Reflected in the Inscriptions	594
4. 5. The “Stele of the Shrine of the Floreate Marchmount Erected in Dadai Period (Northern-Wei Dynasty)” and the Eastern-Han “Stele of the Shrine of Mt. Hua, the Western Marchmount”	602
 5.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Daoist Imag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609
5. 1. The Discovery and Recording of Artifact Materials	609
5. 1. 1. Dated Daoist Imag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610
5. 1. 2. Undated Daoist Imag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648
5. 2. Period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660
5. 3. The Images’ Names and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662
5. 3. 1. Images’ Names	662
5. 3. 2.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Daoist Imag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nd the Coexistence of Buddhism and Daoism	673
5. 3. 2. 1.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Daoist Image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673
5. 3. 2. 2. The Intermingling of Buddhist Elements within Daoist Imag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679
5. 4. Dedicatory Inscriptions and Inscriptions of Personal Names on the Images	685
5. 4. 1. Col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dicatory Inscription on the Yao Boduo Icon-Stele	686

5. 4. 2. Col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Other Partial Dedicatory Inscriptions	700
5. 4. 3. Investigation of the Name Inscriptions of Persons Involved in the Making of the Images	722
5. 5. Daoist Imag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heir Relationships to Particular Dao- ist Sect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ir Flourishing	730
5. 5. 1. The Sources of Northern-Dynasties Daoist Imag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Louguan Daoism	730
5. 5. 2. The Historical Causes of the Flourishing of Louguan Daoist Image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745
Further Discussion	750

Volume Two

6. Daoism and Several Types of Portraits of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and Celestial- Gate from Eastern-Han Tombs in Chongqing, Gansu, and Sichuan Provinces	755
6. 1. The Discovery and Content of the Materials	756
6. 1. 1. The Portraits of the Queen-Mother-of-the-West, Celestial-Gate on the Bronze Tablet Coffin Ornaments from Eastern-Han Tombs in Wushan County of Chongqing and Cheng County of Gansu	756
6. 1. 2. Queen-Mother-of-the-West and Celestial-Gate Materials from Eastern-Han Tombs in Southern and Western Sichuan	763
6. 1. 2. 1. Stone Coffins with Portraits	766
6. 1. 2. 2. Bricks with Portraits	772
6. 1. 2. 3. The Pedestals of "Money Trees"	780
6. 2. Celestial Gates, and the Highest Deity in Early Daoism: the Celestial Emperor	782
6. 3.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and the Celestial Emperor and Celestial Gates, as Recorded in Daoist Book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Idea of Ordinary Mortals Ascending to Heaven and Becoming Transcendents	788
6. 3.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and the Celestial Emperor and Celestial Gates, and Their Official Roles among the Daoist De- ities	788
6. 3. 2. The Envoy of the Celestial Emperor, and the Celestial Storehouse ...	796
Further Discussion and Concluding Remark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Early	

Legends about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and Their Different Regional Features	800
7. Research on the Daoist Archaeology of Land Contracts, Name Slips, and Memorials for Clothing and Everyday Articles of the Wu,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805
Introduction	805
7. 1. Land Contracts of the Wu,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ir Discovery, Distribution, and the Collation and Reading of Their Inscriptions	811
7. 1. 1. Land Contracts of the Wu Dynasty	814
7. 1. 2. Land Contracts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831
7. 1. 3. Land Contracts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837
7. 1. 4. Land Contract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843
7. 1. 5. Land Contracts of the Sui Dynasty	875
7. 2. Land Contracts of the Wu,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ir Special Features, Types, and Periodization	878
7. 2. 1. Special Features of Land Contracts of the Wu,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878
7. 2. 2. Types of Land Contracts of the Wu,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880
7. 2. 3. Periodization of Land Contracts of the Wu,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887
7. 3. Land Contracts of the Wu,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ir Inscriptions' Contents and Spirit-Talismans	889
7. 3. 1. A Study of Portions of the Content of Some Important Contract Inscriptions	889
7. 3. 2. A Translation of a Typical Land Contract	918
7. 3. 3. Land Contracts and Spirit-Talismans of the Wu, Ji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920
7. 4. An Attempt at an Analysis of the Daoist Elements and Historical Sourc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Land Contracts	921
7. 4. 1. The Daoist Elements and Historical Sources of "Type B" Land Contracts	921
7. 4. 2. The Daoist Elements and Historical Sources of "Type C" Land Contracts	923
7. 4. 3. The Daoist Elements and Historical Sources of "Type D" Land Contracts	924
7. 4. 4. The Daoist Elements and Historical Sources of "Type E" Land Contracts	

.....	925
7. 4. 5. The Daoist Elements and Historical Sources of "Type F" Land Contracts	929
7. 5. Name Slips	930
7. 5. 1. The Period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Name Slips, and the Content of Name-Slip Inscriptions	930
7. 5. 2. The Uses and Properties of Name Slips	938
7. 6. Memorials for Clothing and Everyday Articles	945
7. 6. 1. Period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Memorials for Clothing and Everyday Articles, and the Content of Their Inscriptions	946
7. 6. 2. The Uses and Properties of Memorials for Clothing and Everyday Articles	957
7. 7.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Daoism as Reflected in Land Contracts, Name Slips, and Memorials for Clothing and Everyday Articles	963
7. 7. 1. Land Contracts of the Wu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Southward Shifting of Early Celestial Master Daoism	964
7. 7. 1. 1. Eastern-Han Grave-Quelling Writs and Early Celestial Master Daoism	964
7. 7. 1. 2. The Dating and Route of Early Celestial Master Daoism's Transmission into the Regio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973
7. 7. 2. Name Slips and Memorials for Clothing and Everyday Articles of the Wu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Eastern Transmission of the Way of Five Pecks of Grain (the Way of Correct Unity)	978
7. 7. 3. Land Contract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nd Southern Celestial Master Daoism	980
7. 7. 4. Questions about the Dating and Sectarian Provenance of the Demon-Statutes of Nüqing and the Demon-Statutes of the Dark Metropolis	985
7. 7. 4. 1. The Dating and Sectarian Provenance of the Demon-Statutes of Nüqing	985
7. 7. 4. 2. The Dating and Sectarian Provenance of the Demon-Statutes of the Dark Metropolis	992
7. 7. 4.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mon-Statutes of Nüqing and the Demon-Statutes of the Dark Metropolis	995
7. 7. 4. 4. The Date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cripture of the Law of Correct Unity; Section on Petitions and (Celestial) Officials	996
7. 7. 5. A Brief Analysis on Why Land Contracts Were Rare After the Wei-Jin	

Northern-Dynasties Period, and Liang Dynasty	997
8. An Investigation of Materials on the Dark Maid of the Nine Heavens, Discovered in the Archaeology of Jiangxi and Sichuan Provinces, and Related Documentary Records	1003
8. 1. Materials on the Dark Maid Discovered through Archaeology	1003
8. 2. The Dark Maid of the Nine Heavens as Recorded in Documents, and the Properties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with the Dark Maid	1018
8. 3. The Meaning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with the Dark Maid, and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Daoism Reflected Therein	1026
9. Traces of Daoism among Materials Excavated at the Royal Tomb of Wang Jian of the Former Shu Dynasty	1033
9. 1. Wang Jian's Portrait in Stone: A Tomb Built in Life to "Replace Death"	1033
9. 2. Stone Engravings of the Twelve Dipper Spirits Carved on the Bed of the Coffin to Protect the Corpse, and Depictions of Celestial Delights	1042
9. 3. Quicksilver as a Preservative for the Corpse	1049
9. 4. Elements of Daoist Thought Expressed in the Royal Eulogy Inscription	1050
Appendix: Collected Fragments of Du Guangting's Mr. Wang's Biographies of Spirits and Transcendents	1056
10. Research on River Charts, Books of the Luo, and Pre-Cosmic Eight-Trigram Charts Discovered through Archaeology in Sichuan, Chongqing, and Guizhou Provinces	1063
10. 1. The Discovery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1063
10. 1. 1. River Chart and Book of the Luo Materials and Their Types	1063
10. 1. 2. The Pre-Cosmic Eight Trigrams and the Chart of the Great Ultimate	1098
10. 1. 2. 1. Varieties Not Found in Tombs	1098
10. 1. 2. 2. Varieties Found in Tombs	1100
10. 2. Composition, Distinctions between the Numbers of the River Charts and Books of the Luo,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e-Cosmic and Post-Cosmic Eight Trigrams	1120
10. 2. 1. The Composition and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Emblems and Numbers of	

the River Chart and Those of the Book of the Luo	1120
10. 2. 2. The Pre-Cosmic Eight Trigrams and the Post-Cosmic Eight Trigrams	1133
10. 2. 3. The River Chart, Book of the Luo, and Post-Cosmic Eight Trigrams in the Tomb of An Bing Clan, Huaying County, Sichuan Province	1139
10. 3. Pre-Cosmic Eight-Trigram, River Chart, and Book of the Luo Materials Discov- ered through Archaeology: Their Daoist Features, Significance, and Relation- ship to Geomantic Burial Methods, and to Alchemical Firing	1144
10. 3. 1. Pre-Cosmic Eight Trigrams on Bronze Mirrors	1144
10. 3. 2. Pre-Cosmic Eight Trigrams, River Charts, and Books of the Luo from Tombs, and Daoism and Fengshui Geomancy	1146
10. 3. 2. 1. The Integration of Daoism and Fengshui Geomantic Burial Methods	1148
10. 3. 2. 2. The Relationship of Eight-Trigram and Divinatory Materials in Tombs to Daoism and Fengshui Geomancy	1152
10. 3. 2. 3. The Significance of Eight-Trigram and Divinatory Materials in Tombs	1157
10. 4. Regarding “River Chart and Book of the Luo Learning in Sichu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terials Discovered through Archaeology	1177
Appended Discussion: The Evolution of Fifty-Five River Chart FivePhase Progression Numerology and Forty-Five Book of the Luo Nine Palace Numerology	1185
11. The Memorial Tablet and Stone-Engraved Portrait from the Tomb of the Northern-Song Daoist Dai Zhizai of Zhangshu, Jiangxi Province	1189
11. 1.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morial Tablet Inscription	1189
11. 2.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graved Portrait	1201
12. An Investigation of Materials from the Exploratory Excavation of the Southern-Song Jianfu Zangdian (Hall for Storing the Daoist Canon) Site on Mt. Qingcheng in the Du- jiangyan Municipality	1215
12. 1. What Does “Zangdian” Mean?	1216
12. 2. The Different Types of “Halls for Storing the Daoist Canon” and the “Flying Deva Dharma-Wheel Canon”	1224
12. 3. The Properties of the Huqing Jianfu Hall for Storing the Daoist Canon, and the Necessity of a More Extensive Excavation	1232

13. The Southern-Song Stone Engraving of a “Chart of the True Forms of Mt. Luo in Fengdu, for Salvation from Suffering, Being Reincarnated, and Quelling Demons” in Gao’an, Jiangxi Province	1239
14. A Study and Account of the “Stele of the Most High’s Severing of Hidden Entanglements,” from the First Year of the Baoqing Reign Perio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n Dengjingguan, Zigong City	1251
14. 1. A Recording and Collation of the Stele Inscription, and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ircumstances of Its Engraving	1254
14. 2. Regarding “Hidden Entanglements”	1257
14.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vering Hidden Entanglements, and Dispelling Grievances, Untying Knots, Preserving and Saving the Dead	1264
14. 4. The Three Corpses and Hidden Entanglements	1272
14. 5. Regarding the Content of the Stele Inscription’s Oath of Alliance and Precept-Vow	1284
14. 6. The Spirit-Talismans, Sun and Moon, and Names of Celestial Worthies on the Crest of the Stele	1287
14. 7. The Personal Name and Official Title Inscribed on the Tip of the Stele	1290
15. Partially Daoist Artifacts from the Ming Tombs of the Wang Xi Clan in Pingwu, Sichuan Province	1297
15. 1. The “Stone Declaration of Heavenly Thearch”	1297
15. 2. The Fresco with the Grave Occupant’s Portrait and the “Mountains of Longevity and Seas of Blessing,” and Their Sources	1311
15. 3. Golden Dragons	1325
15. 4. Further Discussion	1327
16. Ming Dynasty Sites of Dark-Heaven Halls in Yunyang County, Chongqing and Ancient Daoist Traces Related to the Salt Industry in the Sichuan Region	1335
17. Research on Daoist Netherworld Travel Permits from Ming Tombs in Jiangxi and Sichuan	1349
17. 1. Discoveries of Netherworld-Travel-Permit Materials, Plus Explanations and Sentence-by-Sentence Readings	1349
17. 2. A Textual Study of Key Content in the Texts of the Travel Permits	1356

17. 3. The "Highest Thearch of the Dark Heavens" and Some Related Questions	1369
17. 4. The Types of Netherworld Travel Permits, and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among Their Texts	1371
17. 5. Netherworld Travel Permit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the System of Travel Permits in the Ming, and Related Questions	1374

Volume Three

18. "Wooden Men" and "Stone Portraits": Daoist Grave Goods Replacing the Dead or the Living	1383
18. 1. Types of Materials and the Collation and Reading of the Inscriptions ...	1384
18. 1. 1. Wooden Men	1384
18. 1. 1. 1. Of the Northern Region	1384
18. 1. 1. 2. Of the Southern Region	1388
18. 1. 2. Stone Portraits	1403
18. 1. 2. 1. The Sichuan Type	1404
18. 1. 2. 2. The Type from the Regio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1415
18. 2. A Study of the Texts of the Wooden Tablet of Pine and Cypress Figurines from the Twenty-Eighth Year of the Jianxing Reign Period	1420
18. 2. 1. A Record of the Materials	1420
18. 2. 2. The Col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Inscriptions on the Wooden Tablet	1424
18. 3. Research on Tang-Song-Period Materials Replacing the Dead or the Living	1435
18. 3. 1. A Textual Study of the Writing on the Artifacts	1435
18. 3. 2. The Daoist Properties of Several Types of Tang-Song-Period Materials Replacing the Dead or the Living	1441
18. 3. 3. Origins and Evolution	1444
Concluding Remarks	1448
19. Research on Grave-Quelling Writs Engraved in Stone from Southern-Dynasties-, Tang-, and Song-Period Tombs in Jiangsu, Shaanxi, Henan, and Western Sichuan	1451
19. 1. The Types of Engraved Grave-Quelling Writs	1452
19. 1. 1. Engraved "Writs of the Floreate-Canopy Palace" and "Imperial Edict	

Writs"	1452
19. 1. 1. 1. Writs of the Floreate-Canopy Palace	1452
19. 1. 1. 2. Imperial Edict Writs	1462
19. 1. 2. "Stones of the Five Essences"	1484
19. 1. 3. Engravings of the "Perfected Writs of the Eight Mighty (Spirits)," and the "Five Perfected Writs of the Numinous Treasure"	1494
19. 1. 4. Engravings of "Perfected Writs for Dispelling Disasters"	1511
19. 1. 5. "Numinous-Treasure Perfected Talismans of the Five Directions and Five Thearchs"	1530
19. 1. 6. Engravings of "Perfected Writs on Salvation through (Alchemical) Refi- ning"	1534
19. 2. The Composition of Several Types of Engraved Perfected Writs from Tombs	1580
19. 3. Summary Discussion	1585
19. 3. 1. Regarding the Identities of the Occupants of Tombs Containing Engraved Perfected Writs	1586
19. 3. 2. The Shifting of the Centers of Activity of the Lingbao and Shangqing Sects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cts, and Other Items	1595
19. 3. 3. Engravings of Perfected Writs from Song-Dynasty Tombs in Western Si- chuan, and the "Great Way of the Most High Perfected Prime"	1603
19. 3. 4. The Repercussions of "Writs of the Floreate-Cannopy Palace" and "Imperi- al Edict Writs" in Song Dynasties	1608
20. Daoism and Tomb Figurines of Spirits and Monsters from the Sui, Tang, Five-Dynas- ties, Song, and Yuan Periods	1611
20. 1. The Meaning, Study, and Current State of the Field of Tomb Figurines of Spir- its and Monsters	1611
20. 2. The Reg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Periodization of Tomb Figurines of Spirits and Monsters	1613
20. 3. A Partial Study of the Names, Properties, and Uses of Tomb Figurines of Spir- its and Monsters	1637
20. 4. Discussion of Related Question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Daoism Reflected in the Reg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Periodization of Tomb Figurines of Spirits and Monsters, as Well as Their Properties and Uses	1742

21. Daoist Talismans and Charts of the True Forms of the Five Marchmounts as Unearthed from Ming-Dynasty Tombs in Jiangsu, and as Preserved on Ancient Vessels Handed Down from the Past	1751
21. 1. The Formation of Daoist Marchmount Charts, and the Types of "Marchmount Charts" Recorded in Daoist Texts	1752
21. 2. "Marchmount-Chart Mirrors"	1768
21. 3. "Emblem-Containing Mirrors" Related to the Marchmount Charts	1783
21. 4. The "Marchmount Talisman" as Recorded in Daoist Texts and as Seen in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1797
21. 4. 1. The Bequeathed Mysteries of the Inner Writs of the Three August Ones, and the Talismans of the True Forms of the Five Marchmounts as Recorded in Daoist Texts	1797
21. 4. 2. Marchmount-Talisman Materials on Ancient Vessels	1807
Further Discussion	1830
22. Three Tang-Dynasty Daoist Engravings and Buddho-Daoist Discord in the Tang Period	1835
22. 1. The "Memorial Tablet of the Tang-Dynasty Abbot of Great Vastness Abbey, the Late Master of the Three Grottoes (of Daoist Scriptures), Hou Jingzhong" of the Sixth Year of the Kaiyuan Reign Period, Unearthed in Luoyang, Henan Province	1835
22. 2. The "Memorial and Imperial Edict of Constant Abbey" Engraved in the Thirteenth and Eighteenth Years of the Kaiyuan Reign Period at Constant Abbey on Mt. Qingcheng in Dujiangyan Municipality, Sichuan Province, et Alia	1847
22. 3. The "Memorial Tablet of Ms. Zhi, the Lady 'Refining-Master'" from the Third Year of the Xiantong Reign Period of Tang Emperor Yizong, Unearthed in Luoyang, Henan Province	1861
22. 4. Summary Discussion	1870
22. 5. Appended Discussion on the Authenticity or Dubiety of the "Tomb of Tang Princess Yuzhen" on Mt. Qingcheng	1871
23. "Archaeology of Daoism" and "Study of the Archaeology of Daoism"	1875
23. 1. Archaeology of Daoism; Its Concepts, Properties, and Functional Significance	1875
23. 1. 1. What is "Archaeology of Daoism"?	1875

23. 1. 2. Archaeology of Daoism; Its Object of Study and Special Features	1876
23. 1. 3. The Scholarly Significance of Studying the Archaeology of Daoism	1880
23. 2.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State of Archaeology of Daoism in Mainland China	1886
23. 2. 1. Main Achievements	1887
23. 2. 2. Main Problems Still Remaining	1888
23. 3. Some Plans for Establishing the "Study of the Archaeology of Daoism," as a Branch Field of Chinese Religious Archaeology	1890
Contents	1899
Main Works Cited	1937
Index of Works in Chinese on Archaeology of Daoism	1967
Afterword	1983

壹 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 和天师道的起源

绪论——考古材料的发现和研究

自清末 20 世纪初年以来，在北方地区的东汉明帝以至魏晋墓葬中，发现大量带有朱、墨书写镇墓文字的陶罐、砖券、铅券之类的器物，有的上面还带有神符，很早以来就有人指出它们和早期的道教、巫术有关。1949 年以后，考古发掘出土材料日益增多，进一步引起学界人士注意，众说纷纭，先后发表了不少文章，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看法。

解注器镇墓文材料最早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在清末的光绪年间。民国初年武树善著《陕西金石志》卷四记载说：“瓦罇二，存。按罇高一尺余，清光绪中于陇州城南五里之谭家沟出土。一有硃砂红字迹，但模糊难识。其一有‘熹平六年’四字尚明，全字不晰。现存村中。”^{〔1〕}旧陇州即今陕西宝鸡以北之陇县，熹平为东汉灵帝年号，六年即公元 177 年。虽然文字大部模糊莫辨，当时尚不知其用途，更不知与道教有关，以今日知识判断，当属解注镇墓瓶无疑，为迄今所知最早被人注意出土年代、地点明确之纪年陶瓶器物。陈直《汉张叔敬朱书陶瓶与张角黄巾教的关系》说：“扬州张丹斧在凤翔曾得熹平二年（公元 173 年）两陶瓶，印入《广仓学窘·艺术类征》中，是为

〔1〕《石刻史料新编》二十二册，16414 页。

朱书陶〔瓶〕著录之始。”〔1〕其后，日本学者编《书道全集》〔2〕，中村不折编《禹域墨宝书法源流考》〔3〕，皆见著录图版并附释文，但仅只着眼于书法艺术，未顾及其与道教之关系。1935年山西修筑同蒲铁路，出土朱书219字之熹平二年（173）张叔敬陶瓶，马敬清撰《汉张叔敬墓避殃瓦盆文》，考为与东汉末太平道张角兄弟黄巾起义有关遗物〔4〕。未注马文撰作年代，估计当在1935年之后不久，应属考证陶瓶与道教有关早期之作。

镇墓铅券之最早著录，则见于罗振玉的《贞松堂集古遗文》，亦同时指出其为与古代道教活动有关遗物。1980年以来，学界多笼统将此种材料称之为“镇墓文”，间有将其中少数带有“注”字的称为“解注文”加以研究者。首先是吴荣曾撰《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一文，收集大量不同类型的材料，综合分析考察，详细论述了它们与巫术、道教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见解，为学界广泛引用，将有关材料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5〕。其后论著渐多，如禚振西《曹氏朱书罐考释》〔6〕，蔡运章《东汉永寿二年镇墓瓶陶文考略》〔7〕，王德刚《汉代道教与“买地券”、“镇墓瓶”》〔8〕，刘昭瑞《谈考古发现的道教“解注文”》〔9〕、《〈太平经〉与考古发现的东汉镇墓文》〔10〕，万方《古代注（症）病及禳解治疗考述》〔11〕，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12〕、《南李王陶瓶朱书与相关宗教文化问题研究》〔13〕、《文物所见中国古代道符述论》〔14〕等，或为专文，或附带论及，皆属对某些个别材料或个别问题进行考察，间有发明，对“解注”的意义亦有所发挥。但总的说来，学界对于考古材料的研究，与历史相疏离的情况还相当严重，道教、道教史和考古

〔1〕 陈直：《文史考古论丛》，390页。

〔2〕 日本平凡社，1931年。

〔3〕 陈直：《文史考古论丛》，390～392页。

〔4〕 陈直：《文史考古论丛》，390～391页。

〔5〕 《文物》1981年3期。

〔6〕 《考古与文物》1982年2期。

〔7〕 《考古》1989年7期。

〔8〕 《文献》1991年2期。

〔9〕 《敦煌研究》1991年4期。

〔10〕 《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4期。

〔11〕 《敦煌研究》1992年4期。

〔12〕 《考古学报》1991年1期。

〔13〕 《考古与文物》1996年2期。

〔14〕 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学学科之间还存在很大的隔阂。除了部分论著之外,这些研究本身主要还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第一,大多只是就部分个件器物进行个案考察,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第二,将相关材料割裂开来,孤立地仅仅局限于文字和符箓部分内容的考察,对作为文字和符箓载体的器物本身则很少加以注意;第三,带文字器物以外的其他不同类型的相关器物,很少联系起来考虑;第四,即使仅就器物文字而言,由于考古工作者掌握有关文字学及宗教文化专门知识不足,释读错误者不少,理解不够准确、深入;第五,很少从通过考古材料复原古代历史的角度提出和解决古代道教史上的问题。

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影响深远的宗教,它的早期活动历史,文献缺乏,除了一部篇幅保存较多的《太平经》之外,记载至为简略,有的甚至相互矛盾,情况很不清楚。这些考古材料,需要我们从宗教学的角度加以解释,发挥他们在我国早期道教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帮助我们解决许多早期道教历史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天师道的起源和传播问题,尤具关键的意义。多年以来,我们广泛收集有关考古材料和以道书为主的文献记载,试作全面系统的考察,草成约二十万言之初稿。1995年,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哲学系、香港道教学院联合召开“道家与道教研究学术研讨会”,我们应邀以《东汉墓葬出土的解注器与天师道的起源》为题,将初稿摘要与会,其后发表于陈鼓应教授主编之《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上^{〔1〕}。文中提出:根据解注器材料的内容和时代、地域分布情况,证明天师道是在东汉和帝或稍前起源于以陕西西安、河南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然后有一支向西南经汉中传入四川西部发展为五斗米道的新说。今整理全文刊布,以供讨论。文中涉及的有关考古材料,除了已经发表者外,也包括一部分尚未公布的内容。

第一章 道教的注鬼论、解注术和解注器的定名

过去我国大陆学界在研究有关解注器材料时,有关器物命名,存在着两

〔1〕 陈鼓应教授主编之《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种是笼统地把它们叫作“镇墓器”，上面的文字叫作“镇墓文”，其中包括根据某些个件文字内容将之称作“救鬼文”者^{〔1〕}在内。另一种是只把器文中带“解注”或“注”字的叫作“解注器”和“解注文”，从而将解注器的范围限制得相当狭小。我们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妥当的。把解注器放在墓葬中，它的作用自然与镇墓有关，但镇墓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镇”的具体对象有所不同，有的是指墓主以外的妖邪精怪，有时是指（包括）墓主本身；达到目的的途径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属于与某种宗教理论思想相联系的特定仪式活动，有的则只是属于一般的巫术迷信性质的材料。将解注器笼统地叫作镇墓器（瓶、券等），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是含混其词，从而模糊了它的特定宗教性质意义。后面一种情况，直接牵涉到解注器的命名和内涵范围这样一个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

“解注器”这一名称在学界的最早使用，可以追溯到1954年。当时在河南洛阳西郊汉城遗址的东汉地层中发掘出土了一件卷唇小口宽腹大平底陶罐，腹部外壁有朱书神符和“解注瓶，百解去。如律令！”九字^{〔2〕}。器文“解注瓶”是为器之自名，应定名为“解注瓶”自无疑问，以至逐渐为学界所采用。到90年代初，有人进一步加以发挥指出：除此器而外，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著录东汉铅券和永建三年（128）陶瓶器文中有“魅鬼尸注”及“死人精注”语；40年代以来发掘晋墓出土陶罐、陶钵器文中也有几件带“解注”字样，因之把这种带有“解注类词句”或“解注类字样的这类墓中文字称之为解注文”。并说：“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这类解注文有10余件。除两件见于著录外，其他均为考古发掘所得。”^{〔3〕}“注”和“解注”是道教的两个特殊宗教概念，有它的固定含义。认为只有器文中带“解注”或“注”字才叫作“解注器”和“解注文”，则是对“注”和“解注”的特殊宗教含义认识不够全面，不仅将不带“解注”或“注”字样的器物排除在解注材料之外，大量没有文字的有关材料更是完全被忽视了。

我们认为，所谓的“解注器”，就是按照道教的注鬼学说理论行解除注鬼术所用的器物。将道书文献记载“注”和“解注”的意义和东汉墓葬出土的“镇墓文”内容特点相比较，无论其是否出现“注”字，也都属于解注文的性质，凡是带有这种“镇墓文”的器物，都应叫作解注器。不仅如此，另

〔1〕 蔡运章：《东汉永寿二年镇墓瓶陶文考略》，《考古》1989年7期。

〔2〕 郭宝钧等：《1954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2期。

〔3〕 刘昭瑞：《谈考古发现的道教解注文》，《敦煌研究》1991年4期。

外一些完全没有文字的墓葬出土器物，也应属于解注器的范畴。根据现在我们所掌握的材料，东汉解注器的数量不下二百余件之多，大大超出过去了解的数字。

要认识到底什么是“解注器”，必须弄清“注”和“解注”的具体内容和含义。因此，我们在对考古材料进行正式讨论之前，首先对道书及其他相关文献记载“注”和“解注”的宗教内涵、重要意义及其在道教中的教派关系加以考察，以此为基础，将判别什么是解注器的标准确定下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很好结合起来，对考古发现的解注文作出正确的释读和理解，认识铭文和相关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把那些没有文字的解注器物材料识别出来，纳入我们的研究对象范围，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

第一节 道书文献记载的注鬼论和解注术

东汉墓葬出土解注文中“注”字的含义，最初有人认为“注可能即症。症，病也。解注即解除疾病。”^{〔1〕}后来又有人在此基础上根据早期医学文献记载有关注病的材料，进一步具体说明注病“大多为风寒暑湿所引起的周身疼痛”，或谓“‘注病’本为传染疾病之意”。同时还指出，“敦煌所出解注文中的所谓天注、地注、岁注、月注、日注、时注等，把注病之源放大而及于自然之物，已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了。”^{〔2〕}而王育成则另外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说所谓的“解注”，“‘解’的意思是解除或解脱，即通过对鬼神祭祀而除去凶灾邪气。”“‘注’的意思是裁除或裁削。《史记·春申君列传》云：‘王壹善楚，而关内两万乘之主，注地于齐，齐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索引》云：‘注，谓以兵裁之。’（河南）洛阳解注瓶之注也当为此种用法，指裁除百邪。”^{〔3〕}在上述两类意见中，以“注”作削除、裁除解，与“解”字亦为

〔1〕 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文物》1981年3期。《考古学报》1956年2期所刊郭宝钧等：《1954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指出解注瓶“是汉人以符驱病习俗的实物遗存”，已开此说之先河。

〔2〕 刘昭瑞：《谈考古发现的道教解注文》，《敦煌研究》1991年4期；万方：《古代注（症）病及禳解治疗考述》，《敦煌研究》1992年4期。

〔3〕 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年1期，51页。

解除解脱的文意相重复，所谓解除百邪的“邪”字内容变得不见了着落，显然是讲不通的。说“注”是传染疾病和由此向自然物的扩展，这是不错的。刘昭瑞已正确指出，早在至迟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就出现了“鬼注”的名称^{〔1〕}。东汉郑玄注《周礼·疡医》讲到“注病之注”。刘熙《释名·释疾病》更明确讲道：“注病，一人死，一人复得气相灌注也。”^{〔2〕}后来的一些中国医学著作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材料。但是如果仅仅从医学的角度来理解东汉墓葬出土的解注文材料，还没有真正抓住问题的关键，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我们认为，说东汉墓葬的解注文本身和传染疾病有关，或者说所解之“注”最初就是指的传染疾病，那是事实，但在此它已经不是一种医学概念，而是在过去那种医学概念的基础上发展演变成了一种与“鬼祟”相连的宗教学理论观念，是“注鬼”、“注祟”的简称。《庄子·人间世》：“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斫之，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斫之，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禅傍者斫之。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之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谓大祥也。”宋碧虚子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卷三引司马彪释之云：“棺之全一边者，谓之‘禅傍’。‘故解’……祓除也，祭鬼也……‘适河’……谓沉人于河祭也。”^{〔3〕}武林道士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卷九解此经文，引吕惠卿说：“‘高明之丽’，高显之屋也。‘禅傍’，棺材也……‘解’，祭祀解赛也。白颡、亢鼻、痔疾此三者，解赛灵河不可用之，彼视以为不祥。神人贵无用之用，则所以为大祥也。”又引赵以夫注说：“‘解’，古巫祝者书名。解之中有曰，牛白额者，豚鼻高者，皆不可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如西门豹之事，故添‘痔病’一句。此三者巫祝以为不祥。唯其不祥，所以免杀身之祸，以神人观之，则大祥也。”^{〔4〕}《史记·封禅书》：汉武帝好神仙方术，亳人缪忌奏祠太一方，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索隐》释之云：解祠，“谓祠祭以解殃咎

〔1〕（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41页。

〔2〕《太平御览》卷七四三（3296页）引此，“注病”作“疰”。

〔3〕《道藏》十五册，904页。

〔4〕《道藏》十五册，245～246页。

求福祥也”。东汉王充《论衡》，有《解除》之专篇，谓：“解除，谓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礼，先设祭祀……驱以刀杖……盛解除，驱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笃，见鬼之至……夫解除所驱逐鬼，与病人所见鬼无以殊也。其驱逐之……”“祭祀之礼，解除之法众多……世间缮治宅舍，凿地掘土，功成作毕，解谢土神，名曰解土。为土偶人，以像鬼形。今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后，心快意喜，谓鬼神解谢，殃祸除去。”“解注”的“解”字，与上诸家之解义同，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解除、解脱，而是一种沿用古代巫术宗教性质的专用词。我们只有主要从上述宗教学的角度来加以认识，才能真正把问题弄清楚。

道书文献中有关“注”、“注鬼”、“解注”的记载很多。有关的基本含义，《金锁流珠引》卷二十四《考召法师及志道之人等家每年正月一日早朝人未起前自发牒符保护身家令平安无疾疫法》解释说：

灾厄者，有十种之灾：一，天行瘟疫……；二，时行……；三，官中非横事；四，火；五，水；六，兵图；七，被鬼注祟；八，穷困；九，聋盲；十，内鬼等也。^{〔1〕}

“被鬼注祟”是人生最主要的灾祸之一。又同书卷二十五《为官人百姓断瘟疫法》说：“因某人染得瘟鬼气病，至重或死，今更连注某人。”^{〔2〕}《为官人百姓断内外注祟鬼贼妄为虫蛊杀人不止法》言之最为明晰。云：

太上老君曰：世人不论贵贱，皆有注祟。内外死亡，为鬼入人宅，妄求生人魂魄代死，遂作注祟。祟家中生人，以兄弟或父子相注，如此者往往有之（世人呼为墓[注]。李尊师《慧举口诀》云，即今祟家疾也。[引者按：原注“墓”字下脱一“注”字，今补]）不绝。（可以求生替死者，为此鬼被蛀虫咬死，魂魄亦被虫蛀所侵食。如人被虫蟥等所咬，不安凄惶至甚，所以求替代。道士若有法术断得此疾，其功甚大，天地为之欢心，令子得道。救得一家，获一百功。功，谓之阳人得不病不死，阴魂得离此虫食人苦切痛毒之难，托生为人身，便无怨注之气也）道士可与救断禁之止，令断生

〔1〕《道藏》二十册，463页。

〔2〕《道藏》二十册，470～471页。

死，得恩闻天地，道功也。^{〔1〕}

按照以太上老君为代表的道教的说法，但凡生存于世之人，不论身份高低贵贱如何不同，也都存在一种所谓注鬼注祟的潜在祸殃威胁。这种注鬼注祟，就是家内家外有人死亡变成的鬼，跑到家里来行祸，夺取包括具有父子、兄弟等亲密关系的活人性命。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注鬼自身系“被虫蝥等所咬”致死，死后魂魄仍在继续遭受蛀虫侵咬的折磨，不堪其苦，所以要变成注鬼害人，取生人魂魄作为他的替身，从而求得自身的解脱。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死去的人找替死鬼。道士“有法术断得此疾”，主要是用祈禳之类的道教法术“令断生死”，断绝生人和死者鬼魂的接触以解除这种祟家疾，也就是所谓的“解注”或“断注”，为道教中极为重要的功德之事。实际上，这里所说的“祟家疾”就是传染病，“蛀虫”就是传染病菌。《北极天心正法·除解伏连》：“凡世人多被冤债相缠，伏连执对，以致生民受灾，冥司所责，疾病无由痊愈。及被自缢、落水伏连，一切冤魂，常生现形，递相残害，求相替者。法官变神步罡……朱书符于木板，钉之伏连处，或埋于地下，如此则宁。如或为伏连重病，即朱书于黄纸，令其吞服，数日即解断伏连，疾缠自然安愈。”^{〔2〕}所说也是同样的意思，只是范围更加广泛。复连注鬼不限于本家先亡，也包括生前无亲属关系的人在内，除疾病之外，还有因落水而死和生前冤仇等形成的注鬼复连。《金锁流珠引》“说锁魂练魄，求生去死之法”者^{〔3〕}，与《北极天心正法》成书时代虽然较晚，但其说则由来已久，只是各种文献记载详略有所不同罢了，有的还掺杂了一些后起的佛教思想成分。

当然，后面我们还要详细论述，注鬼的内容概念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一直都是传染病致死者，但主要是前死者祟害生人以为替代谓之注鬼，则始终都是一样的。《真诰》卷八《甄命授第四》录“八月十九日夜保命君密语许长史”之言，谓“郗相今为大曹吏所逮，其妇形婴桃，受事未了，方索代人于此家”^{〔4〕}，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是后来的人为注鬼所害，完全按照注鬼身死时相同的方式致死，看起来是一种前后相连的重复行为，故又有“复

〔1〕《道藏》二十册，469页。

〔2〕《道藏》十册，633页。

〔3〕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753～754页。

〔4〕《道藏》二十册，534页。

注”、“注复”、“连注”、“注连”、“引注”、“注引”、“注逮”、“传注”、“延注”、“衅注”、“重复”、“复连”等别称，“复连”又以音同别写作“伏连”。以注鬼形成多由前死者感到冤屈，心有不服，死后在冥世兴讼，企图嫁祸生人所致，所以又称为“注讼”或“讼注”。除上述引文所及者外，他如《登真隐诀》卷下：“人家亟有父母、兄弟、夫妇亡后，还注复生人”^{〔1〕}，此称“注复”者。《赤松子章历》卷二《请官》：“疾病注连”^{〔2〕}，此称“注连”者。又卷四《断亡人复连章》：“某今月某日，染疾困重……云亡某为祸，更相复连，致令此病连绵不止，恐死亡不绝，注复不断”^{〔3〕}，此称“复连”、“注复”者。同书卷五《又大冢讼章》：“家门先后亡死，有相注逮者”；“某家复注之鬼”，“更相注逮”^{〔4〕}，此称“注逮”、“复注”者。杜光庭《黄箓斋仪》卷四十八《解考忤方》：“延注子孙，流殃未已”^{〔5〕}，此称“延注”者。又卷四十《解考三时行道》：“衅注生人，灾缠后嗣”^{〔6〕}，此称“衅注”者。《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五十三，齐同慈爱品：“九炷乱神……传炷败真”^{〔7〕}，此称“传炷（注）”者。又因与患传染病死者之尸体接触传染受注而有“尸注”、“传尸鬼注”、“传尸复连”等之称。《道法会元》卷二〇一引宋人书《神霄金火天丁大法》有“断尸炷符”^{〔8〕}。《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五十五有“传尸鬼注”之语^{〔9〕}。《无上三天玉堂大法》卷三十三，断除尸瘵品有多种“传尸炷（注）鬼”符^{〔10〕}。或因空气传染而受注，故常以带传染病菌之鬼气称“注气”、“复注之气”。《赤松子章历》卷六《新亡迁达开道路收除土殃断绝复连章》：“某死时雌雄殃杀、魁罡之鬼，复注之气”^{〔11〕}；《金锁流珠引》卷二十三：“注气不散”^{〔12〕}；《登真隐诀》卷下：“家中多死丧

〔1〕《道藏》六册，623页。

〔2〕《道藏》六册，188页。

〔3〕《道藏》六册，208页。

〔4〕《道藏》六册，218、222页。

〔5〕《道藏》九册，322页。

〔6〕《道藏》九册，297页。

〔7〕《道藏》三册，912页。

〔8〕《道藏》三十册，278页。

〔9〕《道藏》三册，929页。

〔10〕《道藏》四册，84页。

〔11〕《道藏》十一册，228页。

〔12〕《道藏》二十册，459页。

逆注气”^{〔1〕}，是为其例。

有关不同的注鬼名称内容，他如《正一法文经章官品》、《老君音诵诫经》、《洞渊神咒治病口章》^{〔2〕}、《抱朴子内篇》^{〔3〕}等东汉、魏、晋、南北朝道书，都有大量的记载。残存之今本《正一法文经章官品》，有关注祟复连内容的条文甚多，今略举数条为例以明之。卷一《收死人耗害》，载云：

无上天君兵士十万人，收某家中水、火、汤注，乙石二十刑杀之鬼，却死来生。伏连殃注之气，消灭之。

又：

石仙君将一百二十人，治天下万民家中外亡强殄之鬼，厌（压）绝注鬼为人精祟者，转相注易后生人，疾病者死，主断绝之。^{〔4〕}

卷二更有《治劫杀注》专章云：

无上化不君兵士十万人，收一百二斗（十）注鬼杀气，却死来生，主之。

无上万官君兵士十万人，收地上逆淫，注气消灭。

无上平天君兵士十万人，主收天下一百二十人（此字系衍文——引者）殃注鬼杀，在人身中者，消灭之。

部吏赤天道室考骑老逆将军二人，太君二人，都官从事老对杀君，各有种数千人，不营守某家，保护男女，若牙（？）身中，除去死籍，更迎生名，捕死者某死生注清浊之气，破杀尸殃之恩，得老稚正法，髡答五百，斩杀有罪死，合平复连更相牵引。^{〔5〕}

涉及墓注伏连条文，于后再引，暂不赘录。《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学界多以为东汉张陵时书，而《赤松子章历》和《登真隐诀》所记材料，多明注出自

〔1〕《道藏》六册，623页。

〔2〕《道藏》三十二册，272页。

〔3〕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79页。

〔4〕《道藏》二十八册，539页。

〔5〕《道藏》二十八册，544页。

张陵《千二百官章仪》。是注鬼说和解注术为东汉以来道教之重要内容，这是毋庸置疑的。根据这些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全面了解到注鬼注祟的不同种类、名称、来源（形成的原因）和解注的方法。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致死而成的注鬼，种类很多，其中不少与疾病有关，有的则出自疾病范围以外的其他各种不同情况。《登真隐诀》卷下《请官》章^{〔1〕}、《赤松子章历》卷三《收除虎灾章》多次提到“百二十殃注鬼”、“百二十殃注杀害刑杀之鬼”^{〔2〕}。《赤松子章历》卷五《大冢讼章》更言及有“百万种种之考注”，其材料多注明出自《千二百官仪》^{〔3〕}。卷六《为亡人首悔赎罪解谪章》云：

某……以顽愚，修奉多违，以招考罚，顷来轹（坎）轲，凡百无善。某身疾病从来……。伏自考思，精祟所由，恐亡人某生时犯罪，不忠不孝，不仁不慈，淫情忌妒，骂詈咒诅，牵天引地，叫唤神灵，或贪财盗窃，枉克非礼，改动所作，凡百无善，致收大考，系身后土。恐亡歿之后，被受重谪，魂魄考对，结在三官，徒刑作役，楚毒备至，不堪困苦，连累生人，致令某家基（墓）考复注，殃祸不绝，生死困辱，不自解免。^{〔4〕}

北魏寇谦之《老君音诵诫经》云：

老君曰：道官道民，其先亡祖、曾祖、父母，幽谪不解，复注子孙。^{〔5〕}

所谓“幽谪”，就是“亡歿之后，被受重谪，魂魄考对，结在三官，徒刑作役”。由于死者生前为恶或其他原因，死后在幽冥世界遭到惩罚，受到各种不同的折磨。前死者因不能忍受幽谪之苦，回到阳世取生人魂魄以为替代，遂成注鬼。“幽谪”、“墓谪”、“墓考”，成为注鬼形成的主要原因，解决“幽谪”、“墓谪”问题，是道士功德活动中一项很重要内容。前引《正一法文经章官品》所说的“水、火、汤注，乙石二十刑杀之鬼”，则是指生前因为被

〔1〕《道藏》六册，623～624页。

〔2〕《道藏》十一册，194页。

〔3〕《道藏》十一册，218页。

〔4〕《道藏》十一册，226页。

〔5〕《道藏》十八册，217页。

水淹死、被火烧死、被沸水烫死和犯了各种不同死罪判处死刑致死而成之注鬼。《登真隐诀》卷下《请官》章有“若家中水、火复注者”语，陶弘景注云：“人家有水、火之官，使相复注，其病致死者，皆源类是同，互相染逮，世世不绝者。”^{〔1〕}则水注、火注有时又是指与水火有关的疾病致死而成之注鬼而言。《女青鬼律》卷六所说的“火逆恶注鬼”^{〔2〕}，其义与上述者同。“二十刑杀之鬼”，《赤松子章历》卷三《收魘魅章》称“十二刑注梦寤之鬼”^{〔3〕}，则是注鬼可通过生人梦中与之相接触而为祟害。记载种类数量最多者，莫过于《赤松子章历》一书。卷一《章信》所列章名，如《断子注章》、《夫妻离别断注消怪章》、《虚耗光怪断绝殃注章》、《数梦亡人混涉消墓注章》、《新亡洒宅逐注却杀章》^{〔4〕}，卷四之《断亡人复连章》^{〔5〕}，卷五之《却杀收注鬼章》、《分解先亡大注八十一章》^{〔6〕}，卷六之《新亡迁达开通道路收除土殃断绝复连章》^{〔7〕}等，单从章名上看，也就可以知道为解注而设。他如卷三之《禳灾却祸延年拔命却杀都章》^{〔8〕}、《断瘟毒疫章》^{〔9〕}，卷四之《解五墓章》^{〔10〕}，卷六之《久病大厄金紫代形章》、《解谪章》^{〔11〕}、《收魘魅章》^{〔12〕}、《为亡人首悔赎罪解谪章》^{〔13〕}、《灭度三涂五苦炼尸受度适意更生章》^{〔14〕}等，实际也是讲解注方面的内容。以上诸章之有章文者，又多见于唐人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章信科仪》，《解五墓章》作《官私咎谪死病相连断五墓殃注章》，另有《释三曾五祖注讼章》为《赤松子章历》所无^{〔15〕}，当同为源出《千二百官仪》而所据引书不同所致。解注在道教中

〔1〕《道藏》六册，624页。

〔2〕《道藏》十八册，252页。

〔3〕《道藏》十一册，225页。

〔4〕《道藏》十一册，175~178页。

〔5〕《道藏》十一册，208页。

〔6〕《道藏》十一册，187页。

〔7〕《道藏》十一册，228~229页。

〔8〕《道藏》十一册，196页。

〔9〕《道藏》十一册，202页。

〔10〕《道藏》十一册，205页。

〔11〕《道藏》十一册，223页。

〔12〕《道藏》十一册，225页。

〔13〕《道藏》十一册，226页。

〔14〕《道藏》十一册，227页。

〔15〕《道藏》六册，974页。

的重要性，由此可见。有关具体内容，尤以卷五《又大冢讼章》最为集中，是研究早期注鬼论和解注问题极为重要的材料。今摘录于下，以便考析。载云：

实唯上世以来，先亡后死，墓谪不解，冢讼相逮……而当年在世，莫不罪多福少。罪事既多，则久婴苦切。福业既少，故理无所有。是乃缠绵累业，殃注不已。今虑某家先亡后死眷属名状，冥府自然未皆放纵，或有拘执谪罚，便生讼引……恐某家七祖以来，过去既往，今于三官九府之中，或有溺死之讼，烧死之讼，伤死之讼，绞死之讼，狱死之讼，囚死之讼，填迕死之讼，堕坠死之讼，跽蹴死之讼，打扑死之讼，毒药死之讼，毒虫死之讼，产乳死之讼，饥饿死之讼，寒冻死之讼，热渴死之讼，魔忤死之讼，瘟疫死之讼，中恶死之讼，霍乱死之讼，痈疽死之讼，肿注死之讼，症瘕死之讼，千疹百病以致于死，皆各兴讼。又有老死之讼，少死之讼，孤死之讼，独死之讼……鰥死之讼，寡死之讼，客死之讼，寄死之讼，裸死之讼，暴露死之讼，无棺槨死之讼，有棺无槨之讼，棺槨穿败之讼，尸体不埋之讼，骸骨不全之讼，鸟兽残啄之讼，火烧骨之讼，水渍骨之讼，车马践蹠之讼，凿掘污泥之讼，已葬之讼，未葬之讼，墓非本墓之讼，葬犯禁忌之讼，葬不安稳之讼，葬高下东西南北之讼，祖尊父母、妻妾娣姒、中外儿孙、兄弟姊妹、伯叔姑侄更互相讼。育子不养之讼，有儿不举没为奴婢之讼，同姓之讼，异姓之讼，无宅之讼，无后之讼，愤慨之讼，责怒之讼，悲伤之讼，奄忽之讼。又生时与人有宠爱之讼，有讎怨之讼，有争诉之讼，有杀活之讼，有枉滥之讼，及死后受谪对之讼，有惭负之讼，有违约之讼，有咒诅之讼，受考罚之讼，受徒系之讼，受谪役之讼，受二十四狱罪报之讼，受恶姻缘牵引之讼，次求恩赦之讼，求还家之讼，求人代之讼，求迴逌之讼。如此等讼，各有条领。若溺死之讼，诉其沉沦水府，衣形沾湿。烧死之讼，诉其发肤焦灼，皮肉剥烂。伤死之讼，诉其身形残毁，流连疮血。绞死之讼，诉其绳索绞结，气息壅闭。狱死之讼，诉其锁械拳挛，不得解脱。囚死之讼，诉其圜圉幽严，道理不畅。徒配系死之讼，诉其赭钳在身，谪役苦剧。填迕之讼，诉其肢体屈压，不得伸展……又生时所与人仇讎，事各有讼诉，并是怨结莫伸，追想引逮。其亡后所兴诸讼，

皆由不能自忍，求对生人，大略虽合八十一讼，其中枝叶散蔓，变成百千万种。又有生为愆罪，死受谪罚，汤煮火灼，风刀电解，负石凿山，漕江壅海，如此之目，复百千万条，悉皆讼引子孙，更相摄对。又有阴伏匿怨，内疽隐恨，发念出言，起讼幽显（冥）。或值时世不理，患难逼身，不胜哀忧，心悲口毒，剧言怨语，呼天唤地，辱詈光景，秽触神祇，事彻晓冥，皆成讼考。又恐立行丑逆，构业无良，犯诸科律禁戒，悉入考目，百年、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五年、三年、二年、一月、一日、一时，积考相加，众考集并。命没以后，余考不息，缠绵累积，世世不穷。不知某家七世以来，先亡后死，于此诸条，并何犯坐。或舍命之日，不自甘分，怨天咎地，呼引鬼神，遗殃相连，终不解释。或有临民理务，枉刻无辜，杀人取财，囚人受货，因公行私，狼戾暴虐。或妻妾闺闱，照察不明，信用偏邪，宠重残贼，持上逼下，怨结丛生，祝祷鬼巫，连年延命。使取魂魄，杀以偿咎。因是相讼，亦无穷极。又恐某家，七世以来，复有阴罪阴过，阳罪阳过，无罪死过，表里沉衅，内外怨秽，无德无恩，不仁不孝，欺妄狡诈，违常悖理，塞源拔本，指是作非，天地所不容，人伦（神）所共弃。殁命三官，皆婴对罚，罪相及世，结固督切考课，终无止息。魂爽艰急，日就难忍，不堪荼毒，辞诉鬼官，求引生人，代其剧苦。幽司虽明，亦有曲妄，或能听理鬼言，移檄召对。致某家累年疾厄，频岁灾衰，光怪梦寐，钱财耗减，无可禳厌，告乞玄师。臣某复览诰传，唯应分解冢讼墓注为急……谨为伏地拜章一通……为某家分解先亡后死冢讼诉注之气，令复注绝灭，逮害潜消，人鬼异路，生死乖隔。^{〔1〕}

吕元素《道门定制》卷一《分解冢讼章》文字与此基本相同，间有增损，亦有《章历》误而应据吕书以校正者^{〔2〕}。盖《赤松子章历》卷一序文，明言该书系据太上所授鹤鸣山张天师《千二百官仪三百大章法文秘要》残本材料编成，本书章文又另有“辄按《千二百官章仪》”为术以解冢讼墓注之语。而吕书亦自云其所据为《千二百官章》，“并依古仪本，并取《千二百官号

〔1〕《道藏》十一册，219～222页。

〔2〕《道藏》三十一册，663～664页。

经》契勘”^{〔1〕}，来源与《赤松子章历》相同。文中虽然讲了各种不同注鬼的名称和形成的原因，但又概括言之说：“臣某复览诰传，唯应分解冢讼墓注为急”^{〔2〕}；“求乞分解冢讼墓注”，也都最后统统归之为“实唯上世以来，先亡后死，墓谪不解，冢讼相逮。”而章名亦称《又大冢讼章》，同卷并另有内容大体相同而文字稍简之《大冢讼章》。实际上是将文中叙述的数十百种不同的讼注之鬼，也都纳入了“冢讼墓注”的范畴。“冢讼”与“墓注”相连而称“冢讼墓注”，章名往往言“讼”不言“注”，“冢讼”实际上也就是“墓注”。

何以将由于各种原因形成不同名称的注鬼注气，也都统统归之为“墓注”呢？分析起来，所谓的“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注”是指死者鬼魂直接回到阳世为害生人，取生人魂魄以为替代。广义的“注（复连）”，除了包含狭义之注的内容而外，还包括因墓主之死发生冥讼，以生人为冥讼对象而牵连生人，由其他冥界鬼神对有关生人进行传呼拘执，使家中生人受害等其他方面的内容。除上引《赤松子章历》之文而外，同书卷六《为亡人首悔赎罪解谪章》云：“某……伏自思考，精崇所由，恐亡人某生时犯罪，……致收大考，系身后土。恐亡歿之后，被受重谪，魂魄考对，结在三官，徒刑作役，楚毒备至，不堪痛苦，逮累生人，致令某家，基（墓）考复注，殃祸不绝，生死困辱……某今备条某生时罪状，首列诣治，并赍某物，以立心信，拔赎某生时所犯百万之罪……为某家亡人某随事和释，解散考谪……放某等魂魄，使还附尸骨，免离囚徒困苦之中，得上属天曹和乐之地，断绝殃注，灭除死籍……某家从今以去，令生死安稳，门户隆利，疾病除差。”^{〔3〕}王契真纂《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四：“师曰：世有冢讼缠身，乃先亡讼于阴司，逮及生人，计运不利，乃考后裔。”^{〔4〕}冢讼则成墓注，所以冢讼即墓注。问题发生在死者魂魄被冥官鬼神拘执考对，谪罚劳役，离开了尸体，解决的办法就是最后“放某等魂魄，使还附尸骨”。按照道教的观点，无论生死，身魂不离，魂灵有时离开肉体，那只是一种暂时的或非正常的情况，人死之后，除少数无人收葬者外，一般都将尸体葬入墓中，墓为藏尸之所，亦即栖魂之地，墓中死者鬼魂处境如何，是死者是否会形成注鬼牵

〔1〕《道藏》三十一册，666页。

〔2〕“唯应分解冢讼墓注为急”之语亦见于《真诰》，《赤松子章历》所言“复览诰传”，或即出于此。

〔3〕《道藏》十一册，226页。

〔4〕《道藏》三十册，870页。

连注祟生人的根源，把各种不同的注鬼注气都叫作“墓注”，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这种“墓注”，可以看作是广义的鬼注，既包括死者成为注鬼直接回到阳世注害生人，也包括死者兴冥讼牵引其他鬼神传呼拘执生人考对，从而使生人遭受殃祸的内容。广义注鬼的形成是在狭义注鬼概念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有的恶性传染病人死后，传染病菌随尸体带入墓中，仍能继续存活若干年，若系多次合葬之砖室或石室墓，子孙家人重新打开前葬者之墓室安置放入后死者之尸体，往往会遭到前葬者所带人的传染病菌之侵袭染上前疾，重者至死。后来人们认识到传染病传染人，除了与死者生前死后身体发生接触之外，还可以经过所用的衣物用品、吃剩的食物之类的带菌东西甚至空气传染，也就是道书中屡见的所谓“尸传”、“尸注”、“衣传”、“食传”、“气传”。这是狭义的“墓注”。刘宋时人刘义庆《幽冥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东魏徐，忘名，还作本郡卒，墓在东安灵山。墓先为人所发，棺槨已毁。谢玄在彭城，将有彭城司马隆、弟进及东安王箱等，共取坏棺，分以作车。少时，三人俱见患，更相注连，凶祸不已。箱母灵语子孙云：箱昔与司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为车，隆等死亡伤破，皆由此也。^{〔1〕}

文中叙述东晋时有东安（今浙江富春）人徐姓官吏，在家乡做官而死，葬于东安。后来墓葬被人挖开，谢玄部将司马隆、司马进和王箱等三人将其棺木取出，作为造车材料使用，随即三人也都受注而死，子孙家属也继续不断受到注害。显然，这是由于最初徐府君是患的肺癆之类恶性传染病身亡，埋葬时将传染病菌随尸带入墓中，附于棺槨之上，后来司马隆等三人用棺槨木材作车使用，不时与棺木发生身体接触，很自然地受到沾附病菌侵袭而死，又复辗转相传不止，使家中其他的人亦受其害。这完全是一个纪实的故事，也是狭义墓注最典型的例子。《急救仙方》卷十《上清紫庭仙方论法·苏游论》曰：

夫骨蒸、殄殍、复连、尸注、癆注、虫注、毒注、热注、冷注、食注、鬼注等皆曰传尸者，以注者注也，病身上注也，与人相

〔1〕 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三十一编，七册，4062～4063页。

似，故曰疰。其变有二十二种，或三十六种，或九十九种，大略令人寒热盗汗，梦与鬼交，遣精白浊，发干而竿，或腹内有块，或脑后两边有小结，复连数个，或聚或散，沉沉默默，咳嗽痰涎。或略（喀）浓血，如肺痿肺痛状。或复下痢，羸瘦困乏，不自胜持，积月累年，以至于死。死复传疰，易传亲人，乃至灭门者，是也。更有蜚虫、遁尸、寒尸、丧尸、尸疰等，谓之五尸。及大小附疰等症，不的知其所苦，无处不恶，乃挟诸鬼神而害人，其证多端，传变推迁，难以推测。故自古及今，愈此病者，十不一得。^{〔1〕}

又《医传尸方越王文》曰：

湖南长老，法名清，于南岳天福二年（937）八月十二日，收得越王时古方，前越王说文，后有方及符法。自后医救万余人，于淳化九年传于丁相公。后至祥符七年，雷使得此方，后救百余人。越王留文曰：“駙马刘志，家三百余口，因买一婢，姓冯名捧书，一日忽患，寒热不定，服药无效。约得一百余日，其瘦弱，忽然而死。不经五日，有子刘祥，年二十岁，忽然得疾如前婢，服药医救，又百余日，忽然而死。自后如此病者，死百余人，皆为此疾。又駙马忽然有此寒疾，服药无效。越王遂大张于朝门，诏名医。十日，茅山道士姓李名同，因入越王城问天使。天使曰：“并未有识此证，先生莫能治此疾。”先生曰：“此疾多证，或死不明，或梦中得物，梦中见虫，梦中同行，或同酒食语话，出入恶风。又有令人寒热有嗽者，有或传染前患者，衣服家事，皆受此患也。其传气出尸虫，多飞入衣服卧具化卵，若得气血，立化为虫，自发尾毛孔，先食血脉，次食五脏，令人瘦弱。如食心脏后，其虫即化为鬼，其药不能医治。若未食心脏，下药投符取虫，虫泻下，皆治。疾共八九传。只有尸气无虫，药下取恶物，青黄如胶，亦安也。立去身上衣服，如前死人等物，三日不得在家使用，患人收掌。如不信，依前受疾刘志。”^{〔2〕}

〔1〕《道藏》二十六册，648页。

〔2〕《道藏》二十六册，649～650页。

文献时代虽较晚，却是注鬼如何发生的最典型例子，所谓“越王”云云，或有早期材料之遗意。《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五十三，齐同慈爱品，度复连患疰亡魂真符，有告文云：“凡人在世间，或祖代相传，劳（癆）疰而丧；或祖墓生殃，或三或五，或至一门俱丧冥乡……死魂之对，家亲劳（癆）疾而传，或屋宇伏尸之染，或气传而夫妇俱死，或飞尸则亲姻皆亡，号曰复连。”〔1〕这里说的“祖墓生殃，或三或五，或至一门俱丧冥乡”，也是指狭义的墓注而言。《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卷四讲到的“古墓传疰”〔2〕，也是这种性质的内容。此种狭义的墓注，又或称为“传尸注鬼”、“尸劳（癆）鬼注”，有“九十种寒尸注”之称，都是直接间接与传染病人的尸体发生接触病注于人者。广义“墓注”的概念，显然是在这种狭义墓注基础上发展引申出来的。

上引《赤松子章历·又大冢讼章》文字虽然讲的是各种冢讼所致的墓注问题，说明墓注鬼在整个注鬼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但这些不同原因不同情况所形成的墓注鬼祟，实际上并非只局限于墓注鬼一种类型，同时也概括了冢讼墓注鬼以外其他的一些注鬼的不同种类和形成原因。一切注鬼的形成，都是因为前面有人死去，出于各种不同的缘故，魂魄在阴司受苦，不堪折磨，回到阳世取生人魂魄作为替代；或冥讼牵连，导致鬼神传呼拘执生人质对，以求得自身的解脱所致。注鬼行注必须通过死者与生人发生联系的环节，而尤以直接接触为主。这是了解道教注鬼说和解注术的关键和钥匙。

《太上洞神洞渊神咒治病口章》载：

某家七祖、父母、伯叔，先亡后死，生存之日，有犯五盟七诅，五逆大罪，不慈不孝，杀害贤良；或作劫贼，持夺人物；或偷牛盗马，诱人奴婢；或掩缚良善，度卖牲口；或杀人父母、夫妻、子女；或害人害主，灭人种族；或窃盗经书，毁辱真正，秽污圣神，叛道入邪，舍真就伪；或恶口咒诅，无端欺言妄语，轻忽神鬼；或于日月星辰之下，田野井灶之边，共相厌禱；或于道、佛治舍，烧香咒誓，牵引天地，论诉神祇，称怨理直，得恩忘义，不赛神祇。没命之后，沦坠三徒，受其考对。亡人苦涩，不能自拔，诉论天曹，引逮生人，将三案五案之鬼，咒诅众邪百神，共来侵入宅

〔1〕《道藏》三册，921页。

〔2〕《道藏》二十八册，593页。

中，妄作祸害不止者……一一解除消灭之，不得复令殃注之鬼与野道之神，妄作祸害。

又：

某疾病淹毒所苦……卜问龟《易》所推，唯言某家亲大祖父，三十六世以来，有犯天诅地诅，日月之诅，星辰之诅，五社之诅，水火之诅，五盟七祖之罪。先世所犯，谪在三官，来耗害生人，至令居生坎軻……某家七世父祖，昔日生在之时，违天负地，王（五）逆不孝，诛君截位，杀害帝主、方伯、二千石、令长、大臣、三公、九卿、尚书、仆射，星宿大臣；或欺神慢师，骂辱父母；或闲度圣闻，妄造自用；或损坏真官静治、神人鬼屋，偷人牛马、牲口、财帛，人所发觉，引天及地，欺神唤日，指点星辰，社祠庙下，更相咒诅，野道复连而死。死者相引，历劫不休，遂致弥灭，子孙相呼，展转不绝，地下不断，殃及后世……某家先世，七祖父母，依官仕宦，枉杀无辜，杀害良善，讼系贤人，嬖他奴婢牛马之属，枉绝人命，不以道理；或谋伯叔中外之亲，取其钱财，淫色内乱，非人所知；或杀人之夫，图人之妻，细作两头，交战二国……先世以来，亡人七祖，有如此罪，引逮及先亡者。某家先世，或有落水死者……以火烧死者……刀兵而死者……狱市死者……落崖石而死者……虎狼害死者……卧厌死者……病死者……哽死、缢死、绞死、刀兵斩死者……有如此死者，死日不吉，星宿不度，亡者谪作，在三官二十四地狱之中，或世人社庙，逋废昼夜，担沙负石，填江塞海，不得休息。亡人愁毒，诉讼天曹主者，求取生人自代，致令某疾病危厄，灾殃祸患。皆是亡人死日不吉，不利生人，与百鬼梯道来往，耗害生人。^{〔1〕}

又：

如此之鬼王，与五方之注鬼：东方青注，南方赤注，西方白注，北方黑注，中央黄注。朝死之注，暮死之注。一里之注，二里

〔1〕《道藏》三十二册，730、721页。

之注，三里之注，十里之注，二十里之注，三十里之注，四十里之注，五十里之注，百里之注，二百里之注，三百里之注，四百里之注，五百里之注，六百里之注，七百里之注，八百里之注，九百里之注，千里之注，万里之注。男注，女注，奴婢之注。近注，远注……五注将军。大注，小注，高注，卑注。六畜之注，鸟兽之注，草木之注，日月之注，星辰之注。戎羌之注，胡虏之注，吴蜀之注，夷狄之注，蛮獠之注。三万七千之注，凶殍之注，门户之注，日游之注，月行之注，大将军之注，太岁之注，太阴之注，五行之注，四时代谢之注，行年、本命、三刑、赤色之注，雄雌之注，姓名相收之注，目色相当之注，姓复相取之注。^{〔1〕}

与上引《赤松子章历》所载，可相互补充，对有关情况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了解。

注鬼说最初是由传染病发展而来，传染病是狭义的真正“注鬼”形成最初的源头，人们对肺癆之类的细菌传染疾病致人的真正原因缺乏科学的认识，看到前面有人得上这种疾病死去，后来和他生前死后有过各种形式的接触的人也同样染上此病而死，而且关系越是亲密，由于接触的机会越多，越容易受传染，染上同样的疾病以同样的方式死去的情况就越严重。对于这种看来似乎反常的重复死亡现象感到神奇，很自然地与宗教鬼神观念联系起来，认为是有一种找替代的注鬼作祟所致，凡是生人直接为注鬼所害，都是生人和死人魂魄发生接触的结果。与前死者接触最多的是家中亲人，关系越是亲密越容易受传染，自然夫妻、父母、子女、兄弟成为注鬼行注对象的机会越多，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在葬墓过程中也就特别需要行解注术预防注祟。后来从传染病死亡延伸到其他非传染性疾病，再由疾病延伸到其他火烧、水淹、坠崖、击杀等种种恶性事件造成的一切死亡和祸殃。有人被水淹死，便认为是因为前面有人淹死，其鬼魂在冥世不安，到阳世来使人水淹致死，让后死者的魂魄去作替死鬼，代他受害。有人死在牢狱之中，就认为是前面死在牢狱中人来找替死鬼作祟所致。余者莫不如此。但无论怎样，“生、老、病、死”，一个人一生造成灾难、死亡，机会最多的还是各种疾病，所以在众多不同种类的注鬼注祟中，病注始终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治病解决病注问题，成了道士们最重要的功德活动。在早期道经《洞真太上太霄琅书》

〔1〕《道藏》三十二册，727页。

卷六《斋戒要诀》说：“先亡后死，平素之时……不顺道教……被刑收考，殃逮后生。后死亡者，魂神考责，在天曹地狱、太山二十四狱，不堪苦怵，还引生人，求以补代，后世婴疾。”^{〔1〕}造成家中先亡后死种种注祟的原因之一，就在不信道教，这段话也是为了强调这点。宋徽宗时道士元妙宗编道书《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卷七《辅正除邪考召正法·考召六种功德》说：“后圣君告天师曰：此考召法通于人以成功德，有六种：第一，能与治邪注疾病，收捉诛斩祟妖。”^{〔2〕}将治邪注疾病列为道士功德之首。卷三《祛除癆瘵众病符诀并天建馘邪真法·治劳瘵说》谓：

夫尸虫传疰之患……而至丧逝，然虽早歿，其如天限未尽，而皆为枉夭，冥司未有拘管，未受轮回，是以魂爽滞留，无由超脱，遂化为阴邪之气，传染骨肉。大率无他，欲依托生气而已。其虫食人，精血枯瘁，以至于五脏传遍，而流疰不已，往往举族由此倾陷，益可伤痛。其病之重，药餌不能疗，针灸不能及，假使桑公在世，华佗（陀）再生，曷能起之矣。惜乎生民非辜，枉遭陷溺。由是上天哀悯，而道法出焉。^{〔3〕}

在此，编者甚至把道教的起源和传染病造成的注鬼问题联系起来，认为整个道教本身，最初就是为了解决传染病造成的注鬼问题而产生的。一般说来，一种道书虽然时代较晚，但其内容多系古今杂糅，往往包含了不少早期的传统思想认识材料在内，上述这种看法，特别值得注意。

关于注鬼形成的原因和类型，前面的引文已经讲了不少。下面我们还可以补录一部材料。东晋道书《女青鬼律》一书，除今本卷六提到“殃注之鬼”、“大逆恶注鬼”、“百二十殃注鬼”之名^{〔4〕}而外，《道法会元》卷二五一引《太上混洞赤文女青诏书天律·人死鬼》载云：

诸人死鬼，自非命死，注讼生人者。

〔1〕《道藏》三十三册，677页。

〔2〕《道藏》三十二册，90页。

〔3〕《道藏》三十二册，65页。

〔4〕《道藏》十八册，251～252页。

又：

诸人死鬼，生前非命死，后求生人替换者……伤人者。

又：

诸人死鬼，妄以生前讎隙，复连生人者……斩伤人者。

又：

诸人死鬼，前生造作冤债，后经历诸司，受其大苦楚，只得领受。若委有牵引生人，及未识为识，未亲为亲者，未有讎隙而妄以为有，如此之类……而处生人者。

又：

诸人死鬼，生前无知，妄祷邪神，以至枉死，枉死妄欲生人充替……及牵引生人，令邪鬼神追摄者。^{〔1〕}

有的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注”字，但由其内容可以确切判为注鬼无疑。

《赤松子章历》卷三《禳灾却祸延年拔命却杀都章》：

解除东方……青炷、青杀……南方……赤炷、赤杀……西方白炷、白杀……北方……黑炷、黑杀……中央……黄炷黄杀。^{〔2〕}

这是以方色定注名者。

有的注鬼还另有专门的姓名。《女青鬼律》卷一云：“五方违杀注鬼名，五方值符注鬼名，结天考。”^{〔3〕}《赤松子章历》卷三《断瘟毒疫章》云：“按天师《千二百官章》……东方生青瘟、青毒、青炷，鬼名高远。在南方

〔1〕《道藏》三十册，539～540页。

〔2〕《道藏》十一册，196页。

〔3〕《道藏》十八册，240页。

生赤瘟、赤毒、赤疰，鬼名土言。在西方生白瘟、白毒、白疰，鬼名白幸。在北方生黑瘟、黑毒、黑疰，鬼名大黄奴。父子七人，男女兄弟，各行恶毒疫气。”〔1〕

人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注鬼不易为患，如果自身作恶有难，出现其他问题，注鬼便会乘虚而入，受其祸害。《女青鬼律》说“百二十殃注鬼”之类的各种注鬼，“皆游行世间，乘人衰息，伺候有恶，助佐凶殃，造作祸害，改形易象，随便陵（凌）人。”〔2〕《登真隐诀》卷下《请官》章云：“人家亟有父母、兄弟、夫妇亡后，还注复生人，值其身有刑害，便为祸病，乃致死者。”〔3〕《赤松子章历》卷五《渐亡洒宅逐注却杀章》云：“人死之日……化成八杀雌雄咎注……缠绵宅内，伺候衰缺，复欲中伤，注害生人。”〔4〕都是同样的意思。

学界有人认为，镇墓文中的“重复”，就是《太平经》所说的“承负”，似与注祟无关。我们不同意这一看法，问题比较复杂，留待后面专节论述。

第二节 道书所载不同的解注法术

一、解注的名称和类型

前面已经讲到，注祟是人一生中最大威胁，解决注祟问题，是道士最重要的功德活动内容之一。道家解注之法，总曰祈禳，但它包含了若干复杂的具体内容，针对产生注祟的不同原因和注祟的不同种类，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方法。以方式而论，有以下 20 种不同的名称和类型。

1. “解注” 解注之称，以此数量最多。如《登真隐诀》卷下《章符》云：“禳厌，唯应分解冢讼墓注为急。不能解释，祸方未已。”〔5〕《赤松子章

〔1〕《道藏》十一册，201～202 页。

〔2〕《道藏》十八册，251～252 页。

〔3〕《道藏》六册，623 页。

〔4〕《道藏》十一册，229 页。

〔5〕《道藏》六册，621 页。

历》卷二《请官》：“分解先亡大注”^{〔1〕}；卷五《大冢讼章》称：“为某解除家中逆注”^{〔2〕}；《又大冢讼章》：“分解冢讼墓注……分解先亡后死冢讼注注之气……摄解冢墓殃注逮之鬼”^{〔3〕}。杜光庭《太上黄箓斋仪》卷二十五：“为某家解除……五行复注之气”^{〔4〕}；卷四十八：“解除殃注，迁拔魂神”^{〔5〕}。除此之外，尚有以下不同叫法。

2. “释注” 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一《章信科仪》有《释三曾五祖注讼章》^{〔6〕}。

3. “断注” 如《太上洞神洞渊治病口章》：“注从东方来者，以金断之。”^{〔7〕}《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一《章信科仪》有《夫妻离别断注消怪章》、《虚耗光怪断绝殃注章》^{〔8〕}。《金锁流珠引》卷二十五有《为官人百姓断内注祟鬼贼妄为虫蛊杀人不止法》^{〔9〕}，是也。

4. “厌注” 《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卷一《收死人耗害章》：“厌绝注鬼为人精害者”^{〔10〕}。

5. “去注” 《登真隐诀》卷下《请官》：“除殃去注”^{〔11〕}。

6. “收捉注” 《金锁流珠引》卷二十五《为官人百姓断内注祟鬼贼妄为虫蛊杀人不止法》：“入某乡里某人家收捉注祟鬼贼”^{〔12〕}。《登真隐诀》卷下《清官》：“收天下百二十殃注鬼在人身中者……收百二十殃注……之鬼。”^{〔13〕}《赤松子章历》卷五《渐亡洒宅逐注却杀章》：“收捕蜚尸注鬼”^{〔14〕}。

7. “逐注” 见上引《赤松子章历》卷五有《渐亡洒宅逐注却杀章》，

〔1〕《道藏》十一册，187页。

〔2〕《道藏》十一册，217页。

〔3〕《道藏》十一册，221页。

〔4〕《道藏》九册，251页。

〔5〕《道藏》九册，322页。

〔6〕《道藏》六册，974页。

〔7〕《道藏》三十二册，727页。

〔8〕《道藏》六册，973、974页。

〔9〕《道藏》二十册，496页。

〔10〕《道藏》二十八册，539页。

〔11〕《道藏》六册，623页。

〔12〕《道藏》二十册，496页。

〔13〕《道藏》六册，624页。

〔14〕《道藏》十一册，229页。

并有“逐注鬼禽奇君”专门逐注之神^{〔1〕}。

8. “驱注”、“遣注” 《正一醮宅仪》：“驱遣宅内雌雄注杀……远去千里。”^{〔2〕}

9. “食注” 《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阅箓醮仪》：“谨出太上正一诸部……收邪食邪吏各一百二十人，出为臣某收食天下凶注鬼气”^{〔3〕}。《太上正一阅箓仪》文并同^{〔4〕}。

10. “斩注” 《登真隐诀》卷下《请官》：“若家中水火复注者……请斩之。”^{〔5〕}

11. “杀注” 《金锁流珠引》卷二十五《为官人百姓断内注祟鬼贼妄为虫蛊杀人不止法》：“杀注鬼注虫……注鬼注虫总自死”^{〔6〕}。

12. “治注” 《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卷二：“治劫杀注”^{〔7〕}。《登真隐诀》卷下《请官》：“人家亟有父母、兄弟、夫妇亡后，还注复生人……当请治之。”^{〔8〕}《赤松子章历》卷二《请官》：“若家中多死伤注，身中刑害，请……治之。”^{〔9〕}

13. “却注” 《太上洞神洞渊治病口章》：“注从北方来者，以土却之”；“注从南方来者……消而却之”；“五方注杀之气，一切却之。”^{〔10〕}

14. “辟除注” 《洞真黄书》：“辟除故气尸注”。^{〔11〕}

15. “辟斥注” 《登真隐诀》卷下《请官》：“辟斥……百二十殃注鬼”。^{〔12〕}

16. “击注” 《登真隐诀》卷下《章符》：“若注气鬼病，当作击鬼章。”注云：“谓家有五墓考讼死伤逆注之鬼，宜攻击消散。”^{〔13〕}

〔1〕《道藏》十一册，229页。

〔2〕《道藏》十八册，299页。

〔3〕《道藏》十八册，284页。

〔4〕《道藏》十八册，289～290页。

〔5〕《道藏》六册，624页。

〔6〕《道藏》二十册，469页。

〔7〕《道藏》二十八册，544页。

〔8〕《道藏》六册，625页。

〔9〕《道藏》十一册，188页。

〔10〕《道藏》三十二册，727～730页。

〔11〕《道藏》三十三册，593页。

〔12〕《道藏》六册，623页。

〔13〕《道藏》六册，621页。

17. “消注” 《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一《章信科仪》有《数梦见亡人混淆消墓注章》^{〔1〕}。

18. “灭注” 《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卷十《压游尸破射符咒》：“飞尸鬼注，邪注灭亡。”^{〔2〕}

19. “禳注” 《太上洞神洞渊治病口章》：“注从北方来者……禳却之”；“注从中央来者，以木禳之”。^{〔3〕}

20. “禳注” 《无上三天玉堂大法》卷十《驱拔禳禳品》：“师曰：逐荡厉恶之谓驱，去除凶邪之谓拔，断妖绝注之谓禳，弥患消灾之谓禳。此四者，名虽不同，用之济世，其利一也。”^{〔4〕}

“禳注”、“禳注”，实际上可以视为解注之总名。

其实，根据我们前面引证材料的解释，“解注”的“解”字，本身就是通过祈禳消除祸殃的意思，以上种种不同的叫法，也都包括在“解注”之中，属于“解注”的范围，只是有的方式方法略有不同而已。如“斥注”、“逐注”、“断注”、“却注”，是将注鬼加以驱逐，使之不能与生人发生接触而为祟害，驱逐的过程中也可能加上击打，总的说来手段比较温和。而“杀注”、“斩注”、“食注”，则是将注鬼本身彻底加以毁灭，手段极为严厉。对付注鬼的办法，大体说来，实际上包含了斩杀和隔离两种方式。《无上三天玉堂大法》卷二十三《断除尸瘵品·治衣传符》咒云：“注鬼死，注鬼走，注鬼断，注鬼灭，注鬼去”，^{〔5〕}大致可以概括这样两种方式。无论怎样，都是以隔绝生死，避免死者鬼魂与生人发生联系原则，尤以避免直接接触最为重要。死者鬼魂是绝对不能与生人发生接触的，即使在梦境之中也是如此。《赤松子章历》卷四《断亡人复连章》云：

某今月某日，染病困重，梦想纷纭，所向非善。寻求算术，云亡某为祸，更相复连，致令此病，连绵不止。恐死亡不绝，注复不断，阖家惶怖，恐不生全……请……为某解除亡人复连之气，愿令断绝。生人魂神属生始，一元一始，相去万万九十（千）余里。生人上属皇天，死人下属黄泉，生死异路，不得扰乱某身……并乞迁

〔1〕《道藏》六册，974页。

〔2〕《道藏》二十八册，640页。

〔3〕《道藏》三十二册，727页。

〔4〕《道藏》四册，30页。

〔5〕《道藏》四册，84页。

达，令得……坟墓安稳，注讼消沉。某身中疾病，即令除愈，复连断绝。^{〔1〕}

卷五《又大冢讼章》云：

愿……为某家分解先亡后死冢讼注之气，令复注绝灭，逮害潜消，人鬼异路，生死乖（《道门定制》引此字作“永”）隔。^{〔2〕}

《大冢讼章》亦有“生死幽明，不相关涉”之语^{〔3〕}。卷六《新亡迁达开道路收除土殃断绝复连章》云：

亡过某……以某年某月日命谢三官。从此以来，宅舍不安，鬼气不绝……恐某属三涂，尸役地官，摇动驱逼，还逮生人。臣以师道，正一严明，生死异世，不得相干。某生死气逮，注复相延，如不散，则存没莫分。人命至重，枉滥难容。^{〔4〕}

卷一《章信》中列有《数梦亡人混淆消墓注章》^{〔5〕}；卷六《收魇梦章》云：

自近以来，寝卧不安，眠则魇魅。又梦寝参错，多见先亡后化往来，辄便惊魅，大小惶怖。依凭大道……乞大道哀悯肉人，解除殃害……谨请……为某却死来生，却祸来福，辟斥故气精祟注鬼……收某家中外强殄十二刑注梦寤之鬼……解决复连，不得为后生人作精祟……某身中所苦，悉令除差，卧得安贴，不复惊魇。^{〔6〕}

东晋释道安《二教论·服法非老第九》，谓三张之鬼法，以死者“或梦中作罪”。注云：“梦见先亡，辄云变怪，召食鬼神军将吏兵，奏章断之。”^{〔7〕}刘

〔1〕《道藏》十一册，207～208页。

〔2〕《道藏》十一册，221页。

〔3〕《道藏》十一册，218页。

〔4〕《道藏》十一册，228页。

〔5〕《道藏》十一册，176页。

〔6〕《道藏》十一册，225～226页。

〔7〕（唐）道宣：《广弘明集》卷八。

宋释玄光《辩惑论·梦中作罪顽痴之极》云：道者之言，“梦见先亡，辄云变怪。夫人鬼虽别，生灭固同，恩爱之情，时复影响。群邪无状，不识逆顺，召食鬼吏兵，奏章断之，割截幽灵。”^{〔1〕}《道法会元》卷二百百十一引《太上混洞赤文女青诏书天律》明确记载：“诸人死鬼，妄入生人梦寐见形作怪者，处斩。”“虽生前有夫妇之亲，死后求其妻，或妻求其夫，相形梦寐者准前律。”^{〔2〕}在佛教徒看来，生人与鬼虽然有区别，但都有生有灭，这点却是相同的。因为夫妻、父母子女之类的亲人之间，出于深厚的感情，生者和死者在梦中相见，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无可非议。而按照上述道教的观点，则认为生人与亡人在梦中相遇必会带来祸殃，大惊小怪，请来道士行法上章，奏请神祇把他们强行隔绝开来，那是一种非常愚蠢的很不正常行为。家中有亲人死去，便请来道士施行法术“拔送家鬼”以断注，也受到儒家人士的强烈反对，认为“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3〕}这些材料也都说明，道教的注鬼论观点认为，人鬼必须完全分离，死者鬼魂与生人即使在梦中接触，也会发生注祟。这是认识道教注鬼论和解注术应当首先明确的基本概念。

二、解注的法术

针对产生注祟的不同原因和注祟的不同种类，解注的方法——解注术，种类也很多。大体说来，可以分作以下 6 种不同的类型。

1. 章奏考召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篇》：“偏旁之书，死有归杀。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压胜。丧出之日，门前然（燃）火，户外列灰，拔送家鬼，章断注连。”这种活动，人死之后尚未入土，也就开始了，以后根据需要可以随时进行。道士作法考召上章，根据不同的注祟情况，奏请天帝委派相应主管天官道神，率领吏兵前来，采取上述不同方式，为乞法者解注。如前面多次提到的《正一法文结章官品》、《赤松子章历》之类专讲道士作法上章的道书，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方面的材料，引文中实际上已经包括了不少有关的内容。今再略举其例以明之。《赤松子章历》卷五《大冢讼

〔1〕《梁》僧祐：《弘明集》卷八，50页。

〔2〕《道藏》三十册，539页。

〔3〕《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篇》。

章》云：

具法位 上言：今有某州县乡里某甲，投辞列款称，门祚灾衰，家累疾病，所作不利，所居不安，求乞章奏，解除冢讼。今据其事状，粗可根寻。必恐其七祖九玄，周亲近属，生存之日，过犯既多，亡殁以来，被诸考谪。子孙未与拔赎，冥漠得以怨嗟……或伯叔兄弟，或姑侄姊妹，递相连染，以作祸殃……臣辄依《千二百官仪》，并正一真人三天法师所授南岳紫虚元君治病灭恶之法，谨上请……运气解厄君兵士一万人，为某家中逆注，某身中刑厄、十二刑杀、百二十殃考，皆令销散注滞，使制鬼灭祸……又请赤天食气君官将百二十人，为某驰斥亲属远近及有异姓之讼逮，诸凶恶怨诉，具相侵扰，不肯散退，所为祟害者，皆制绝消灭。又请收神上明君官将百二十人，为某身解除恶梦错乱，魂魄不守，精神杂越者，令得安善，使夙注销歇。又请太玄君官将百二十人、治无渠宫主，某家有凶注之气……使消灭贼害，永无殃患……又请无上天生君兵士一万人、无上方相君兵士一万人，并为某收家门先后死亡，有相注逮者，令消灭之。又请厄乡侯君官将百二十人、治太清宫章释君官将百二十人、治太清宫。又请祐护将军吏兵，赍太玄真符，摄下女青诏书，地下二千石，泰山二十四狱，为某收捕冢墓殃逮之鬼。告下地下官长，丘丞墓伯，苍林君，武夷君，左右冢侯，地中司激，墓卿右秩，蒿里父老，诸地域所典，并令断绝。考害复注之气，一切消灭。若某家祖曾以来，先亡后死，男女大小，凡葬埋所在，有犯十二月建破王耗，八将六对，伤绝禁忌……诸为刑祸，致不安稳，子孙疾病者，悉为解释和合，随源补复，反凶为吉，转祸为福。生死幽明，不相关涉。请都星君官将百二十人，治华盖宫；诛殃君官将百二十人，治仓明宫；太白中阵明君官将百二十人，并为某家七祖以来，先亡后化，男女大小，解星官复连……除灭死亡，断绝复注。若下官故气，假托形影，导从鬼兵，驱逼先亡，伤注之鬼，去来家门，迫胁生人，拘录魂魄，致为疾病者，一依鬼律收治，皆令消灭……凡上请二十四君官将吏兵，即日一合来下，各随本职，为某解散考谪，消除殃祟，和释诸所，断绝注气。先亡后死，及种族亲戚，有横暴枉滥、流亡客葬、无后之鬼；预是前八十一讼之事件，百万种种之考注，并各寢息，不得动作，一皆消荡

……不得与某有相关涉。存亡异境，祸福各对。……所请天官军将吏兵，文武职司，并立勋绩……请即为言功迁赏，加秩进爵，差次高下，如天曹常科，无使恚恨。某所赍交贐：紫纹四十尺，命米一石二斗，钱一千二百文……纸百二十张，墨两挺，笔两管，朱一两，书刀一口……即以酬官军将吏勤劳之效。恩惟太上，云云。臣谨为某身居疾病，解先亡后死者考气注逮，拜上太冢讼章一通。^{〔1〕}

此种章文内容格式虽然也有变化，但总的说来，相对比较固定。《章历》卷一有《章辞》专目论之云：“凡欲奏章，先具辞疏列乡贯、里号、官位、姓名、年几，并家口见存眷属，男女大小等。令依道科，赍某法信，于某处，诣某法师请求章奏。伏以慈悲，特为关启。辞中或说事意，须质而不文，拙而不工，朴而不华，真而不伪，直而不肆，辩而不烦，弱而不秽，清而不浊。简要输诚，则感天地，动鬼神，御上天曹，报应立至。如违，夺算一纪。”^{〔2〕}上章行符请官断注，神符或加章文之上，或单独行符。本章文言“赍太玄真符，摄下女青诏书”，加符于章文中者。书符方式也有一定的章法，《章历》卷二有《书符式》专文论叙。所请天官神吏，如章文所言“各随本职”，因注鬼不同、章文不同而异。《章历》卷二有《请官》专文言之云：“太真科曰：诸疾病，先上《首状章》。不愈，即上《解考章》。不愈，上《解先亡罪谪章》。不愈，上《迁达章》。若沉沉，上《却杀收注鬼章》……不差，上《解五墓谪章》……不愈，上《分解中外大考章》……大危笃，上……《独解复连》……又《分解先亡大注八十一章》。若无此灾疾，不得妄求此章。犯者，刑论。”“若欲斥逐故气，断绝鬼炷，却死来生，却祸来福，请益天将军十万人，令收捕之。”“若家中多死丧注，身中刑害，请运气解厄君兵七十万人，治之。”“若家中火复注者，请无上天君兵十万人，断绝之。”“若欲学神仙而轹轲，疾病炷连沉滞，请虚素天精君赤衣兵士十万人，在天社宫，以治鬼灭祸，却赤天之气。”^{〔3〕}今本《正一法文经章官品》有关注崇复连内容条文，除前已引者外，尚有许多。如卷一《收土公》章：“石安君、都星君、诛殃君各一人，官将一百二十人，断外家亡人复连。”^{〔4〕}

〔1〕《道藏》十一册，217～218页。

〔2〕《道藏》十一册，178～179页。

〔3〕《道藏》十一册，187～188页。

〔4〕《道藏》二十八册，535页。

《收死人耗害》章：“都星君一人，官将一百二十人，治青盖室，主解星死，断绝复连，治三杀灾，灭咎殃，不得复连生人。素车白马君兵士十万人，主收十二墓鬼来病生人者，断绝之。”“若故妇致来注病生人，请大皓大典者吏收摄故妇，致魂魄，捡押死人某，不得令还贼病生人。又请太白兵星、荧惑吏一合下，收死时煞气，消灭绝复连，葬死送，收冢讼。”^{〔1〕}卷四《主解系囚牢狱》章：“文书监察君官将一百二十人，治九天诸室，主天下狱注吏，诸狱属之。”^{〔2〕}《主行来出入》章：“道上三玄、四玄、四始、甲子诸官君，三十六官君，亭传客舍，莹（营）署注鬼，主行来出入。”^{〔3〕}《登真隐诀》卷下《请官》章云：“飞注入腹著人胸胁背，请南上君官将百二十人，治仓果宫，主开生门，益寿命，令（令）病者三日差，除殃去注。”“疾病转相注易，不可禁止者，请石仙君一人，官将百二十人，（一云治害宫），主治家中有强殍之鬼，厌绝注鬼气为精注者。”“若欲辟斥故气，断绝注鬼，却死来生，却祸来福，当请盖天大将军十万人，令收捕之。”“若家中多死后逆注气，身中刑害，当请运气解厄君兵十万人以治之。”^{〔4〕}“无上天君兵十万人，主收天下百二十殃注鬼在人身中者，却死来生。又云：无上天生人君兵士十万人，主收百二十殃注杀害刑杀之鬼。一云无上天士君。一云无上天平君。”^{〔5〕}涉及墓注伏连，也都属于同样的性质，同出于东汉《千二百官仪》之书。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四《天皇上品六合生算章》载奉大上考君律令所请天官，有“收断注祟君一人，官将百二十人”^{〔6〕}，也是如此。

请官名称，种类甚多，单以《赤松子章历·又大冢讼章》“按《千二百官仪章》并正一真人所授南岳魏夫人治病治鬼之法为某家上请”之“十五君官将吏”统计，便有：(1)“太玄君”；(2)“左右都侯”；(3)“祐护将军吏兵”、“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苍林君”、“武夷君”、“左右冢侯”、“地中司激”、“墓卿右秩”、“蒿里父老”、“地域主者”；(4)“太玄君”；(5)“九地君”；(6)“都星君”；(7)“太白中阵明星君”；(8)“赤天食气君”；(9)“无上高仓君”；(10)“四胡君”；(11)“收神上明君”；(12)“天昌君黄衣兵士”；(13)“盖天大将军”；(14)“太白君”；(15)“都官从事考对杀君”等。最后说明：“所请十

〔1〕《道藏》二十八册，539页。

〔2〕《道藏》二十八册，555页。

〔3〕《道藏》二十八册，554页。

〔4〕《道藏》六册，623页。

〔5〕《道藏》六册，624页。

〔6〕《道藏》十一册，328页。

五种官将吏兵等（引者按：所请 15 种官将吏兵中，有两种名称完全相同，故实际所请君官将吏为 14 种），愿一合来下，各随本职，为某解除亡人考谪，疗治众苦痛恼之疾，尽得平安，克使讼诉不生，殃注绝息；某家先亡后死中诸种族，异姓亲戚，周旋朋友，奴婢仆妾，横暴枉滥、流亡客葬无后之鬼，预是前八十一讼之事，及百千万种殃考注逮等，各皆潜宁休息，不得复动作为害。”〔1〕这 14 种神祇，也都各随本职，司解注之事。而“祐护将军吏兵”之下，包括了另外 10 种道神，实际上有 24 种不同的神祇。在《大冢讼章》所请神祇则称“凡上请二十四君官将吏兵”，除“祐护将军”之下仍包含十神之外，又另增了“石安君”、“石仙君”、“朔平君”、“万福君”、“制地君”、“无上天生君”、“无上方相君”、“厄乡侯君”、“章释君”、“赤砂君”、“运气解厄君”、“四相君”、“无上天玄君”、“诛殃君”等 14 种，实际上有 38 种神祇〔2〕。见于他处者，如《章历》卷六《收魔梦章》的“万神君”〔3〕；《新亡迁达开通道路收除土殃断绝复连章》之“仙官对气君”、“北辰司马都官从事君”〔4〕；《新亡洒宅逐注却杀章》之“天中敢健吏兵”、“逐注鬼禽奇君”、“水坦吏”、“安宅稳宅正宅清正吏”〔5〕等，名目尚多，不胜枚举。前录《太上洞神洞渊神咒治病口章》所列与解注有关神名，亦不在少数。他书所见之不同者，有的可能系后出，大抵时代愈晚，名目愈繁。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述与解注有关神祇事云：“又请东王父、西王母各一人，官将百二十人一合下，主为弟子拔赎神魂，增年益寿，禳灾却祸，收断家亲丈人、前亡后死注祟复连之气，悉使断绝。”〔6〕东王公、西王母，不知何时也加入了解注神的行列。《登真隐诀》卷下《请官》章云：如上解注上章所请“官将吏兵人数者，是道家三气应事所感化也，非天地之生人也。（此因气结变，托象成形，随感而应，无定质也，非胎诞世人学道所得矣）精诚发洞，因物致洞耳，所以化气而成此吏兵也。”〔7〕这些所谓的“君官将吏”，只不过是道士们的一种想像虚构。宗教之谈，随时随事增益，规律如此，不足为怪。

〔1〕《道藏》十一册，221～222 页。

〔2〕《道藏》十一册，217～218 页。

〔3〕《道藏》十一册，225 页。

〔4〕《道藏》十一册，228 页。

〔5〕《道藏》十一册，229 页。

〔6〕《道藏》十一册，330 页。

〔7〕《道藏》六册，624 页。

请祷之家，并得交纳一定数量的钱物，章文之末所列米、钱、纸、墨、笔等“章信”者是。《章历》卷一有《章信》专章，也就是记载上各种章奏时所应献纳的不同钱米物事品类名称和数量目录。

唯上章符咒，除写于简牍帛纸之书章外，尚有只诵读或心中默想而不书写文字之口章与心章，形式不同。《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一《杂犯科》云：“律曰：家有丧祸不绝，解凶墓谪等，可上木札。”^{〔1〕}早期书写文字无纸可用而用简牍，朱法满书虽成于唐代，杂钞之作，木札当属早期材料。又云：“律曰：道士、女官上章……若内官朝法得口章，外官不得口章。”^{〔2〕}但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一《南岳魏夫人生算度厄章》却说：梦先亡而成注害者，道士“依案天师千二百口章，考问精祟所由”^{〔3〕}。则又似凡可用作书章者，亦同时可用作口章。

2. 告移

告移与章奏不同，告即告命，是以天帝、太上老君向下属神祇或注鬼发布命令形式出现的一种文告。移是平级之间相互转告上级命令（告命）。从某种意义上讲，告命可以视为对道士所上章奏一种肯定性批示的回应材料。《赤松子章历》卷五《又大冢讼章》：“请祐护将军……加符告下某家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苍林君、武夷君、左右冢侯、地中司激、墓乡右秩、蒿里父老诸是地域所典主者，并严加断绝某家冢讼之气，复注之鬼。”^{〔4〕}这里的“加符告下”云云，就是指加上了神符的告命。特地指明文告“加符”，自然文告也可以不加符使用。如《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二九一，告命等级品有《解复连厄告命》云：

玄灵解厄符命告下解复连厄灵官五人、官将一百二十人，开九宫八卦系属之门，为弟子某解除复连之厄，疾速关告某本命元辰、本命真圣、本命神将、本宿星官，即与和合阴阳，调平经纬。其有生命运限，刑杀加临，注讼乘时，犯复连者，速令灾伤解释，考气消亡。即俾弟子某罪业消除，灾衰洗荡，福寿资命，善果臻身。一

〔1〕《道藏》六册，977页。

〔2〕《道藏》六册，977页。

〔3〕《道藏》十一册，313页。

〔4〕《道藏》十一册，221页。

如告命！^{〔1〕}

这里便没有提到加符的材料，当属单独使用之例。

3. 行符

道教解注的另一主要方法为行符。行符或书于奏章、告命，或单独使用，与断注有关行符材料，道书记载甚多。加于章文使用者，前引《赤松子章历》文字已有涉及。他如卷五《大冢讼章》云：“请祐护将军吏兵，赍太玄真符，摄下女青诏书”^{〔2〕}；《又大冢讼章》：“请祐护将军吏兵，太玄真符，摄解冢墓殃注之鬼并阴害；加符告下某家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苍林君、武夷君、左右冢侯、地中司激、墓卿右秩、蒿里父老诸是地域所典主者，并严加断绝某家冢讼之气，复注之鬼。”^{〔3〕}又《赍亡人衣物解罪谪迁达章》：“重请太玄真符，告下天、地、水三官……绝死注于六官”^{〔4〕}。《金锁流珠引》卷二十五《为官人百姓断内外注祟鬼贼妄为虫蛊杀人不止法》讲到“老君断注，有符五道”，并著符形两道于后。则属加咒语单独使用之例^{〔5〕}。时代愈晚，符形脱离书章、告文单独加上咒语使用者愈多，如《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卷十有“断注符”及咒语^{〔6〕}。《灵宝玉鉴》卷三十五有“度古疰复连亡魂符”和“救疗墓注癆瘵符”的符形和咒语^{〔7〕}。有的虽不以“注（疰）”名符，其咒语内容则往往表明其系用作断注者，不另赘举其例。

解注符之使用，除了一般的粘贴之外，有焚烧或吞食者。《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五十三“度复连患疰亡魂真符”，符后有文字说明云：

师曰：凡人在世间，或祖代相传，癆疰而丧；或祖墓生殃，或三或五，或至一门俱丧冥乡。何以追度？可书此符与之升迁，朱书烧之。^{〔8〕}

〔1〕《道藏》八册，565页。

〔2〕《道藏》十一册，218页。

〔3〕《道藏》十一册，221页。

〔4〕《道藏》十一册，226～227页。

〔5〕《道藏》二十册，469～470页。

〔6〕《道藏》二十八册，639页。

〔7〕《道藏》十册，379、382页。

〔8〕《道藏》三册，912页。

此属烧用之例。前及《金锁流珠引》卷二十五《为官人百姓断内外注祟鬼贼妄为虫蛊杀人不止法》，“老君断注，有符五道”，符形之后有文字说明云：

右符治病注人苦瘦甚困，吞之除差。每日一符。

右杀注鬼注虫符，用素净合（盒）盘盛水，安病人前毕，别一人把符投水中，七日符沉，注鬼注虫总自死，人病安……牒帖带符、门户上符，并具上引仪中。自意课出，得后圣君告天师曰：卿欲为万民治注疾者，可蹶地行三遍，散禹步九迹，配衣（著斗为衣，身如北斗斗君真也^{〔1〕}），转天关指之（病人所住之方也），即诵八卦咒一遍，即坐，与书符五道，与病人吞及佩带之。帖勒限若干日差。^{〔2〕}

此属吞服与佩带并用之例。此外，又有书刻埋于墓中者。如《无上三天玉堂大法》卷十“禁冢讼符”，五道符形分别称名曰“东方断注”、“南方炼尸”、“西方逐妖”、“北方却祸”、“中央绝尸”，其后总附告文云：“青玄太玄女青断注符告下东方九署灵官：开度某人，安镇身形，营卫抚恤，无令地官驱迫。一如女青告命！”并以布道道士口吻说明云：

师曰：冢讼则子孙家道不兴，患难数见，宜用此法，以超脱其先亡，庶可福及子孙，永无殃注之患矣。

师曰：细石长四尺二寸，阔一尺二寸，刻书五符埋冢中，约近冢二十步，深三尺，方三尺。每下符时，诵《灵书中篇》，禹步至坎埋之。此法可以超凌阴尸，可以福延后嗣，庆及家门，永无冢讼殃注之患矣。^{〔3〕}

4. 用法印

《正一法文修真旨要·行禁治病》记载：道士为人行法治病，“真官乘太阳赤气，禹步持印印病人心下一次，服下一次，印痛处一下。”然后“咒印曰：天帝神印……印邪邪亡，印痛痛止，印病病散，印鬼鬼走，破除症结，

〔1〕 此处句文有衍脱错乱，疑当作“身如北斗真君也”或“身如北斗君真形也”。

〔2〕 《道藏》二十册，470页。

〔3〕 《道藏》四册，30～31页。

流殃咎注，急自走去。正神安汝处。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又祝曰：

上请三部大将军、行印将军、治病将军、破邪将军、收魔将军，并请随印治病……吾今以黄神越章之印，印心从心出，印腹从腹出……速出！速出！急急如律令……

南方之鬼，北方之鬼，东方之鬼，西方之鬼，中央之鬼，天鬼、地鬼、神鬼、男鬼、女鬼、沉尸毒注之鬼，当印者死，值印者亡。速出！速出！

念咒之后，“下印，又诵两遍，然后举印印，令病人吞二三道符（男服三符，女服二符）。"^{〔1〕}又同书记载：“若人卒中蜚（飞）恶尸鬼疰，闷绝不止，心痛，印心上，立止。”^{〔2〕}未言及行符之事。是以法印解注治病，可配合行符，亦可单独使用，并无一定。

5. 用药物

解注之另一种方法为使用药物。前面已经提到，注鬼、注气之说起源于传染疾病，古代巫、医不分，故最早的解注自当首为药物疗治而结合巫术进行。以宗教观点视之，即所谓“厌（压）镇”者是。前引最早记载“鬼疰”一词的《神农本草经》说：

石龙刖，味苦微寒，主心腹邪气，小便不利，淋闭风湿，鬼疰恶毒。久服补虚羸，轻身，耳目聪明，延年。一名龙须，一名草续断，一名龙珠。^{〔3〕}

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篇》引《羡门子丹法》云：

以酒和丹一斤，用酒三升和，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则三虫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来传之，可役使致行厨。此丹可以厌百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

〔1〕《道藏》三十二册，578页。

〔2〕《道藏》三十二册，579页。

〔3〕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41页。

者。悬以向之，则无患矣。^{〔1〕}

又同书《仙药篇》云：

上党有赵瞿者，病癰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弃之。后子孙转相注易，其家乃齋粮，将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自怨不幸，昼夜悲叹，涕泣经月。有仙人行经过穴，见而哀之，具问讯之。瞿知其异人，乃叩头自陈乞哀。于是仙人以一囊药赐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许日，疮都愈，颜色丰悦，肌肤玉泽。仙人又过视之，瞿谢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汝炼之服，可以长生不死。瞿乃归家，家人初谓之鬼也，甚惊愕。瞿遂服松脂，身体转轻，气力百倍，登危越险，终日不极，年百七十岁，齿不堕，发不白。夜卧复见屋间有光，大如镜者，以问左右，皆云不见。久而渐大，一室尽明如昼日……在人间三百年许，色如小童。乃入抱犊山去，必地仙也。^{〔2〕}

《南史·徐文伯、嗣伯传》载：刘宋与陆修静同时人徐文伯，“濮阳太守熙曾孙也。熙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道士过求饮，留一瓠芦与之，曰：‘君子孙宜以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之，乃《扁鹊镜经》一卷。因精心学之，遂名震海内。生子秋夫，弥工其术，仕至射阳令。尝夜有鬼呻吟，声甚凄怆。秋夫问何须，答言姓某，家在东阳，患腰痛死。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请为刲人，案孔穴针之。秋夫如言，为灸四处，又针肩并三处，设祭埋之。明日见一人谢恩，忽然不见。当世伏其通灵。”秋夫子道度、叔嚮，道度子文伯，叔嚮子嗣伯，皆能精其业。“常有妇人患滞冷，积年不差。嗣伯为诊之曰：‘此尸注也，当取死人枕煮服之乃愈。’于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边腐败，服之即差……曰：‘尸注者，鬼气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滞。得死人枕投之，魂气飞越，不得复附体，故尸注可差。’”取古冢枕煮而服之可以解注病，实际上是随葬枕中预藏有石灰或含汞之朱砂一类杀灭传染病菌的“解注”药物所致，余皆纯系宗教之言而故神其说者。又《登真隐诀》卷下《章符》章云：

〔1〕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79页。

〔2〕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206～207页。

若注气鬼病，当作《击鬼章》。上章毕，用真朱二分，合以上之章于白中捣之，和以蜜成丸，分作细丸顿服之。用平旦时入静，北向再拜服之，垂死者皆活。勿令人知捣合之时也。使病者魂神正，鬼气不敢干。他病亦可为之也。若病者能自捣和为佳。不尔，即上章祭酒为捣之。先以蜜渍纸令软烂，乃捣为丸。

注谓：“此章不过两纸，所丸亦无多，必应一过顿服，以清水送之，不得分为两、三也。云余病亦可为者，不止于击鬼也。”^{〔1〕}此又服药与章奏配合使用者。以雄黄、丹砂等药物杀灭传染病菌治疗传染病与杀鬼解注之间的关系，在后来与道教有关的医学著作中还可看到不少材料。如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所著《千金备急要方》卷二十九记载的“雄黄圆”方，即配有雄黄、雌黄、丹砂、曾青等药物。“雄黄圆”方前记载说：“汉建炎（？）三年，太岁在酉，疫气流行，死者极重。即有书生丁季廻从蜀青城山来，东过南阳，从西市门入，见恶疫疠者甚多。遂于囊中出药，人各惠之一圆。灵药沾唇，疾无不瘥。市中疫鬼数百余，见书生施药，悉皆惊怖而走。乃有鬼王见书生，谓有道法，兼自施药感众，鬼等奔走若是。遂诣书生，欲求受其道法。书生曰：‘吾无道法。’乃囊中之药，呈于鬼王。鬼王睹药惊惶，叩头乞命而走。”^{〔2〕}他如“辟温（瘟）杀鬼圆薰百鬼恶气方”等用料，亦多此等药物。所谓的“恶疫疠”，乃是一种恶性传染病，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注病，只是这里没有使用“疰（注）”字一词罢了。

6. 假人代形

注鬼注害生人大多源出于死者受谪于阴司，欲取生人魂魄以为替代，故道家解注之一法，遂有假为死者之形代其至阴司承受谪罚，或假为之形代生人受注，以免生人遭受注鬼之害者。所谓“假人代形”，也就是在举行祈禳仪式的过程中，用模拟人形的东西来作为生人或某亡人魂魄的替身受祸，以求死者魂魄获得解脱而不再成为注鬼注祟生人，让生人逃避注鬼的注害。此种法术，《赤松子章历》一书记载最多。卷三《青丝拔余（命）章》章文云：

某素以胎生……顷者以来，身中坎軻……今谨齋……锡人五

〔1〕《道藏》六册，621页。

〔2〕《道藏》二十六册，209页。

身，请为某上诣五方，代形易名……拔赎生命。^{〔1〕}

卷四《解五墓章》章文云：

某……素以胎生，下官子孙。但某身中，今岁行年到某辰上入墓之年，或为五墓所缠，及三杀之下。夫人入墓之年，恐被墓神注连，鬼气缠绕，比者脚手沉重，衣食不佳，罔知拔赎五墓灾厄，扶护身命……今贵法信，锡人五躯……向臣求乞章奏，断绝亡人殃祸，令以锡人代形，分解灾厄，延年保命。谨以拜章一通上闻。愿天曹上官典者……原赦某身年七世以来所犯千罪万过，并赐除荡五墓五方之厄来临者，以锡人五形代之，令弟子无有错误之厄……上章之后，某身中年命延长，五墓殃注，并令断绝，五墓灾刑，返为恩福……谨为某上请天官，解除五墓殃注灾厄，锡人代形。^{〔2〕}

卷六《久病大厄金紫代形章》章文云：

某爰自幼小，以至于今，无德无功，叨荣重禄，岁月积久，罪咎弥深。又职在养人，政专抚俗，或缘情喜怒，傍公徇私；或率意刑罚，误犯真圣。失在毫末，衅重山岳。常惧冥责，唯无觉悟。某自某月以来灾疾……仅依仪式，贵金人一形……用为法信，上投大道，投乞章奏，削落死籍，注上生名。臣谨按师法，参详天图……真气上升，六天鼓行，千精万邪，枉害生民。致有理不扬，抱枉不彰，三尸枉魂，飞爽弥天。怨鬼号诉，移讼三官。天高地邈，幽冥不理，注连生人，致有先亡祖考，中外伤精，构合为凶……某本命某某命人，以某为鬼行年某，灾厄深重……乞垂大恩，特赐原赦，解某宿对之愆，千罪万过……以上官典者，垂神审理……为某上请三十二天帝君、长生司马、代形度命南昌元君……一合来下，贵某金人紫纹，上诣三十二天历星检宿宫曹之中，贸名易形……请下条星度算君、贸名易形君，贵某代形金人紫纹，上诣北斗太阴御女下一重冥宫，太阴典死籍库壁柜之中，贸某身名，易某身形，上名生

〔1〕《道藏》十一册，198页。

〔2〕《道藏》十一册，205页。

籍玉历之中，延命无极……请烦东极青华九玄上宫青帝、监生度命君、贸名易形君……一合来下，赍某代形金人紫纹，上诣长生宫中，为某贸名易形，更上生籍玉历之中，青帝冠带，延命无穷。重烦南极南昌宫中赤帝、监生度命君、贸名易形君……一合来下，赍某代形金人紫纹，上诣南极长生宫中，为某贸名易形，更上生籍玉历之中，赤帝冠带，延命无穷。重烦西极白素宫中白帝、监生度命君、贸名易形君……一合来下，赍某代形金人紫纹，上诣素云宫中，为某贸名易形，更上生籍玉历之中，白帝冠带，延命无穷。重烦北极玄斗太阴宫中黑帝、监生度命君、贸名易形君……一合来下，赍某代形金人紫纹，上诣太阳玉女下一重冥宫中，太阴典死籍库壁柜之中，为某贸名易形，更上生籍玉历之中，黑帝冠带，延命无穷。重烦中央高皇三十二天玄都紫微宫中黄帝、监生度命君、贸名易形君……一合来下，赍某代形金人紫纹，上诣三十二天始生元气宫中，为某贸名易形，更上生籍玉历之中，黄帝冠带，延命无穷。谨请某本命某，并从官某人，千乘万骑，为某保守禄命，拘制三魂，灭除九气，易形生神，安镇官府，长生无穷。^{〔1〕}

另卷一《章信》部分，仅列上某章所用信物名数，其中涉及代人材料者，有《青丝拔命章》：“锡人五身”；《驿马章》（亦称《开度章》）：“金人一身”；《解五墓章》：“锡人五形”；《病死不绝银人代形章》：“银箔人随家口多少，一人一形。银，无用锡人。”^{〔2〕}《久病大厄金紫代形章》：“金人一形，重一两二铢。”^{〔3〕}《正一法文法箓部仪》之《黄素中章》讲到奉道者请度宿命所献三十二种信物中，有“生口男女替代各一人”^{〔4〕}。《受箓次第法信仪·受上清信法》记载，所受信物中有“玉人四枚，金人四枚”^{〔5〕}。《洞真太上大霄瑯书》卷三引《九真明科旨决第四·下品赎罪篇》：“第一犯中品第一罪，自责年尽，赍金环九只，一两金人一形，投三河。第二，赍……一两金人一形，投三河。第三，金人一形……投之”^{〔6〕}，也都属于相同性质的东西。所

〔1〕《道藏》十一册，223～224页。

〔2〕《道藏》十一册，174页。

〔3〕《道藏》十一册，178页。

〔4〕《道藏》三十二册，199页。

〔5〕《道藏》三十二册，217页。

〔6〕《道藏》三十三册，656页。

谓的“贸名易形”，就是给代人器物换上所代死者或生人的姓名代其受谪、受注，从而让所代者真身真魂逃脱冥谪和注害。根据上述记载，解注所用的代人材料，有金有银，有“锡”有玉，部分当与求代人之身份地位或财产状况有关。《章历》卷一《论三等章》述及，求乞上举所用信物，质地和部分材料的数量，往往随人之身份地位不同而有所区别。如“缯采：天子用紫纹，疋数；王公用本命色，丈数；庶人用缯缯，尺数。镇钱：天子用金钱，王公用银钱，庶人用铜钱。”文献虽未明确讲到假人质地之等级标志，但从《久病大厄金紫代形章》“叨荣重禄”，“职在养人，政专抚俗”的文字看，显然用金人为代人者，是高层统治者的官宦人家。《病死不绝银人代形章》：“银箔人……一人一形。银，无用锡人。”用银人代人者，虽仍为统治阶级人士，级别当稍低。至于一般的庶民百姓，便只有用锡人了。《尚书·禹贡》：“〔青州〕厥贡铅”。疏谓：“铅，锡也。”古代铅、锡不分，上述诸引文中之“锡人”，同时也可指铅人而言。《颜氏家训·终制篇》载：之推遗命子孙，死后入葬，“锡人之属，并须停省。”与前引其指责人死之后，“画瓦书符”，“章断注连”的文字相合。由是观之，用铅人随葬的习俗，至南北朝时犹盛，其意乃在代人以解注，行道教葬仪或受其影响所致也。至代人用器数目，或随家人生者之数，一人一形；或按五方之数，一方一形；或以一形总代一家生口。根据乞代人姓名状况，为活人办理代人器物改易姓名以解注者，似乎还曾有“贸名易形君”之类的神祇专司其事。至如《道门定制》卷六《河头代命断除复连水醮》记载：“连年灾患，后嗣夭亡，鬼祟凭凌，先亡复连，先修章醮，保存拔亡。醮罢行此，以十四人代形，十物为誓。具舟舫于河边，遣送断除，故云‘河头’。”〔1〕此种解注代形器物之使用，情况比较特殊，一次用上了十四件之多，带有普解的性质。此种代人器物未言质地，根据后来的民俗资料看，很可能是先用竹片绑扎成人形骨架，然后在外面糊上纸帛之类的东西，再墨彩加画而成，放在明器性质的舟船模型上，置于河面任其随水飘流而去，以解水注。这可能是后起的一种大型醮仪，是早期代人解注术的一种发展形态。但无论怎样，正如《金锁流珠引》卷二十三所说，“世人死者，假易姓名，不上鬼录，合被诛刑。闻我符牒到，即变真形。”〔2〕用代人器物代名易形解注，必须通过道士行仪作法而后行之，不能由一般人或死者自行妄作，否则不仅无效，并且要遭到极为严厉的惩罚。这里虽然讲

〔1〕《道藏》三十一册，713页。

〔2〕《道藏》二十册，460页。



的是死者贸名代形，生者当亦不例外。

这里需要强调说明的是，这种解注代人，是在生人完全不能和死者鬼魂发生任何接触，一旦发生接触即将使生人受祸的思想观念基础之上产生出来的，和过去一般的所谓“代厄”型巫术虽然可能有一定的渊源，但至少有关阶段性的不同，具有更为高级的理论成分，不能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混为一谈。

总括以上论述言之，凡前面有人疾病或其他原因致死成鬼，在幽冥世界受到谪罚，再回到阳世索取生人魂魄作自己的替身代其受苦，从而造成生人的死亡伤害者，谓之曰“注”。用祈禳性质的各种方法隔绝死者鬼魂和生人之间的联系、接触，以消除和防止生人受到因死者鬼魂造成的伤害，谓之曰“解注”，这些方法本身则可称为“解注术”。“注”和“解注”、“解注术”，是由传染病发展出来的彼此相互联系的特定宗教概念。

第三节 注鬼论和解注术所属的教派问题

我们在前面提到，注鬼论和解注术是道教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但这只是针对某些教派而言，而且本身还有个教派之间的继承和相互影响的发展过程。大体说来，最初属于天师道的内容，后来随着从天师道分化发展出新的道派，或多或少地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注鬼论和解注术内容，有的在旧有的基础上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始终主要是以天师道（正一道）为载体。

前面引用或提及记载注鬼材料的道书文献不下三四十种。按《正统道藏》的分部，自《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太上洞神洞渊治病口章》、《正一法文修真旨要》、《洞真太上太霄瑯书》、《太上正一咒鬼经》、《正一醮宅仪》以至《洞真黄书》、《道要灵祇神鬼品经》、《太上助国救民总真秘要》、《高上神霄王清真王紫书大法》、《道门定制》、《道法会元》，直接归入正一部的有12种。另《登真隐诀》、《上清三真旨要玉诀》、《赤松子章历》、《要修科仪戒律钞》、《太上宣慈助化章》、《广成集》、《灵宝玉鉴》、《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入洞玄部者共9种。《无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入洞真部者2种。《太上正一阅箓仪》、《太清金液神气经》、《三洞机枢杂说》、《女青鬼律》、《老君音诵戒经》、《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阅箓醮仪》，入洞神部者6种。《抱朴子内篇》1种，入太清部。《三洞珠

囊》1种，入太平部。《真诰》、《金锁流珠引》2种，入太玄部。在七部之中，直属正一部的比例最大，足足占了整个数量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正统道藏》的分部并不十分完善和准确，除了上述十二种书被归入正一部之外，他如入洞神部之《太上正一阅箓仪》与《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阅箓醮仪》，从书名上看就显然也是正一部文献。而入洞玄部之书，记载解注材料最多的《赤松子章历》，开篇即云：“谨按《太真科》及《赤松子历》，汉代人鬼交杂，精邪遍行，太上垂慈，下降鹤鸣山，授张天师正一盟威符箓一百二十阶，及《千二百官仪》、《三百大章法文秘要》，救治人物。天师遂迁二十四治，敷行正一章符，领户化民，广行阴德。尔后年代绵远，宝章缺失，今之所存，十得一二。”〔1〕卷一《论三等章》又云：“《千二百官仪》、《三百大章》，章中虽各具质信，然教迹未久，行之多有增减。”〔2〕其内容亦主要来自天师道之《千二百官仪》与《三百大官章》。《登真隐诀》有关注鬼条文多与《正一法文经章官品》相同，均源出于早期天师道文献《千二百官仪》。《上清三真旨要玉诀》一书时代虽在《登真隐诀》之后，然“本书体制与《真诰》、《登真隐诀》相类”，故刘师培疑其即《登真隐诀》之缺卷。《要修科仪戒律钞》乃道教科仪戒律之类钞，录入正一派的解注内容，不难理解。《太上宣慈助化章》乃杜光庭集先代文献编成，正如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所说，“其中大章，如救急解济章、元皇上品六合生算章、三官请命章，则列具章信与操章官吏官号，与《赤松子章历》中之大章如大冢讼章、久病大厄金紫代形章等相同……章文中有‘籍系玄都，仰崇三天正法’字样，可知本书与《赤松子章历》同为正一章法。”〔3〕《广成集》与《黄箓大斋立成仪》同为杜光庭之作，情况与《太上宣慈助化章》大致相同。《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所据以张万福、杜光庭为主。《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南宋宁全真传授、宋末元初林灵真编辑，后经元明间人陆续增补，书前所附《嗣教录·水南林先生》传文称，林氏之编是书也，“尽三洞领教诸科，及历代祖师内文秘典，准绳正一教法，撰集为篇”〔4〕。二书中注鬼材料与正一道之渊源关系，自不待言。太平部之《三洞珠囊》本为类书，书中出现注鬼材料，与《要修科仪戒律钞》情形颇有相类之处。上清派《抱朴子内篇》其时代也远在《千二百

〔1〕《道藏》十一册，173页。

〔2〕《道藏》十一册，178页。

〔3〕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445页。

〔4〕《道藏》七册，19页。

官仪》、《三百大官章》之后，书中注鬼材料仅有2条，保留天师道的解注内容较少。

总而言之，记载有关注鬼材料的道书，从东汉张陵的《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到宋代的《灵宝玉鉴》，宋元年间的《灵宝领教济度金书》，不论时代早晚，也都直接间接地源于东汉天师道的《千二百官仪》与《三百大官章》，这是比较清楚的。

如果说以后灵宝、上清之类一些晚出的道派文献中也有注鬼学说的材料出现，还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接受了天师道的影响。按照我们的观点，在晋代灵宝、上清诸派出现之前，道教只有天师道和太平道两大系统，太平道在汉末因与张角等农民起义相结合遭到镇压以后，已经基本被消灭，除了它的经典内容有时还被吸收加以利用之外，不再作为一个教派发生影响，只有属天师道系统的五斗米道等道派继续发展流传。后来晚出的灵宝、上清等道派，都应该是从天师道系统的道派分化出来，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一部分旧天师道的成分，另一方面吸取其他不同宗教文化因素，按保留和吸纳（其他文化）的成分多少组合不同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构成新的不同教派。在这些新出现的道派中往往包含有注鬼学说的内容，实际上都是属于旧天师道的成分，至其所占地位轻重有所不同，只是保留有关内容的多少差异罢了。灵宝派最早是在东晋开始出现的一个新的道派，本是从南方天师道（包括正一道）分化出来，它是在保留一部分天师道内容的基础上，去掉一部分天师道的内容，吸收一些佛教和其他地方宗教文化的内容加以融合形成的，在灵宝派中出现有关注鬼的材料是不难理解之事，如像在“灵宝大法，总括三洞”以后出现的《灵宝玉鉴》之类的灵宝派道书中出现注鬼材料，更是不足为奇，但无论如何，注鬼论和解注术材料远远不如在属天师道传统的正一道中那样流行。因此，《金锁流珠引》在卷二十五《为官人百姓断内外注祟鬼神妄为虫蛊杀人不止法》又特别指出说：“太上老君断注符……多在正一三部中，非灵宝三部中。”〔1〕也就是这个意思。其他一些教派的情形，亦大抵如此，在葛洪、陶弘景等人的书中出现注鬼学说的材料，亦相类似。当然，亦间有完全废去注鬼学说部分而不言者，如洞玄部早期经典《太上洞渊神咒经》即为一例。该书二十卷，学界以为“本经前十卷为原始部分，乃晋末至刘宋时写成”。“后十卷盖成于中唐以后至唐末”〔2〕。此书篇幅不小，专言各

〔1〕《道藏》二十册，469页。

〔2〕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253页。

种鬼名，所列害人之鬼最多，兵、刀、水、火以及包括传染性瘟疫在内的各种疾病致死所成之鬼，不下数百千种，而注鬼之词绝不一见。虽间有言及生人疾病灾祸与先祖亲人有关，亦系一般道教承负学说之言，与注鬼学说无涉。是江东李家道，已尽废天师道注鬼学说矣。

前面已经论述过，“注”即传染病疟病和由此延伸的一切疾病祸殃，“注鬼论”是对传染病为患于人之原因的宗教性理论阐释，“解注术”则是针对解决这一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宗教性对策措施，一种宗教行为。根据文献记载，最初的天师道虽然也具有神仙思想的成分，但实际上是以宗教法术禳解断绝生人与死鬼接触以除注害为主要活动内容，这是天师道最大的显著特点，东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记载也都是很清楚的。注鬼论是一种与旧的儒家传统生死灵魂观念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系统而复杂的宗教理论学说；解注术是根据注鬼理论思想发展出来的一套内容十分丰富的宗教科仪法术，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道教“经乃法之本，法乃经之用”的宗教原则。注鬼论和解注术是天师道纵贯古今的一部分核心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最初的天师道是在注鬼论和解注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初期天师道的核心内容就是解决如何治鬼（以注鬼为主）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直到后来“张陵”在蜀中建立五斗米道，人们还把它叫作“鬼道”，这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关键。我们只有将注鬼论和解注术放到这种应有的高度上来加以认识，以天师道为主的中国道教史上的许多问题（包括形成起源问题在内）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五代刘松年《仙苑编珠》卷中引早期天师道经典《正一经》说：

张天师讳道陵，学道于蜀鹤鸣山，时蜀中人鬼不分，灾疾竞起，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盟威法以分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民受其福。有戒鬼坛，见在。^{〔1〕}

刘宋陆修静《陆先生道门科略》云：

太上老君以下古委愆，淳消朴散，三五失统，人鬼错乱，六天故气，称官上号。构合百精及五伤之鬼，败军死将，乱军死兵，男称将军，女称夫人，导从鬼兵，军行师止，游放天地，扞行威福。

〔1〕《道藏》十一册，32页。

责人庙舍，求人飧祠，扰乱人民，宰杀三牲，费用万计。倾财竭产，不蒙其佑，反受其祸，枉死横夭，不可称数。太上患其若此，故授天师正一盟威之道，禁戒科律，检示万民逆顺，祸福功过，令知好恶。置二十四治，三十六靖庐，内外道士二千四百人。下《千二百官章文》万通，诛符伐庙，杀鬼生人，荡涤宇宙，明正三五，周天匝地，不得复有淫邪之鬼……唯天子祭天，三公祭五岳，诸侯祭山川，民人五腊吉日祭先人，二月八日祭社灶。自此以外，不得有所祭。若非五腊吉日而祠先人，非春秋社日而祭社灶，皆犯淫祠。^{〔1〕}

刘宋徐氏《三天内解经》卷上云：

自从光武之后，世俗渐衰，人鬼交错……以汉安元年壬午岁五月一日，老君于蜀郡渠亭山石室中，与道士张道陵将诣昆仑大治新出太上。太上谓世人不畏真正，而畏邪鬼，因自号为新出老君。即拜张为太玄都正一平炁三天之师，付张正一盟威之道，新出老君之制，罢废六天三道……民不妄祀他鬼神……民人唯五腊吉日，祠家亲宗祖父母，二月八月祠社灶。自非三天正法，皆为故气。疾病者，但令从七岁有识以来，首谢所犯罪过，主诸醮仪章符，救疗久病困疾。医所不能治者，归首即差……制作科条，章文万通，付子孙传，世为国师。法事悉定，人鬼安帖。^{〔2〕}

前引六朝道书《赤松子章历》序云：

谨案《太真科》及《赤松子历》，汉代人鬼交杂，精邪遍行，太上垂慈，下降鹤鸣山，授张天师正一盟威符箓一百二十阶，及《千二百官仪》、《三百大章法文秘要》，救治人物。^{〔3〕}

《登真隐诀》卷中云：“人之死也，皆为诸鬼神所杀耳。”^{〔4〕}从道教的观点看

〔1〕《道藏》二十四册，779页。

〔2〕《道藏》二十八册，414～415页。

〔3〕《道藏》十一册，173页。

〔4〕《道藏》六册，613页。

来，一切人的死亡都是鬼神祟害所造成的。这些时代较早的道书，也都说明东汉人之创立天师道，主要是为了解决由于人鬼随意接触，混淆不分，为祸生人，致使疾病流行的问题。所有的符篆、科仪、章文材料，也都是在杀鬼、隔离人鬼，人死鬼除了在少数规定的时间、地点享受祭飨之外，其余一律不准来到阳世活动与生人发生接触，殃祟疾病生人。即使是家亲宗祖父母之类有血亲关系的家鬼，也不能例外。

《后汉书·刘焉传》载：“（张）鲁字公祺。初，祖父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故谓之米贼。陵传子衡，衡传于鲁，鲁遂自号师君。其来学者，初名为鬼卒，后号祭酒……有病，但令首过而已。诸祭酒各起义舍于路，同之亭传，县置米肉，以给行旅，食者量腹取足，过多则鬼能病之。”李贤注引魏文帝《典略》称：“初，熹平中妖贼大起，汉中有张修，为太平道，张角为五斗米道。太平道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病或自愈者，则云其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净室，使病人处其中思过。又为奸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字，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五斗米师也。实无益于疗病，小人昏愚，竞共事之。”〔1〕《三国志·张鲁传》刘宋裴松之注引魏鱼豢《典略》曰：“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甸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净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流移寄在其地，不敢不奉。”〔2〕；刘宋释玄光《辩惑论·解厨纂（除墓）门》：“昔张子鲁汉中解福，大集祭酒及诸鬼卒。”自注云：“鬼卒、鬼民、鬼吏、鬼道，此是子鲁轻于民夷，作此名也。又天师、系师、嗣师，此是张鲁自称美也……又米民、米姓、都功、祭酒，

〔1〕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853页。

〔2〕 卢弼：《三国志集解》，267～268页。

此是荒时抚化民也……又道士、蚁贼、制酒、米贼，此是世人之所目也。”〔1〕都说五斗米道称为“鬼道”，用符水请祷之法治病，请祷之三官手书，“又使人为奸令祭酒”；“号为奸令，为鬼吏”，是其首领自称曰“祭酒”，人蔑称之曰“奸令”或“鬼吏”者。奸为贬义词，无论如何，道教徒不会对本教首领以“奸”字加之的。人之以“鬼道”、“鬼吏”称之，当与其道专以与人治鬼去病除殃为事有关。“张子鲁汉中解福”，“解福”二字，过去向无明释，按“解”即解除，其义甚明。“福”乃“福”字之形近而误，皆当为“复”字之同音别写，“解福”即“解福”，亦即“解复”，就是以上所论解除重复之鬼、注鬼。这和上引诸文所云天师道以解注治鬼去病为主要内容的特点，颇相吻合，可为上述结论另一方面的证据。唯云“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盖张修所在之“汉中”，其地即今陕西南部与四川接壤之汉中者固极明确。而张角所在的“东方”，具体范围则颇含糊，若以汉中为准，河南、河北均可为东方。若从“熹平中妖贼大起，汉中有张修，为太平道，张角为五斗米道”的文意论之，则与上文完全相反，上文所言太平道的张角，在此不为太平道而为五斗米道；上文所言为五斗米道的张修，在此不为五斗米道而为太平道。再者，无论张修的太平道或张角的五斗米道，均在汉中之地，其实未闻汉中有太平道活动的事实。清人曾指出说：《隋书·地理志上》记载，“汉中之人……好祀鬼神，尤多忌讳，家人有死，辄离其故宅。崇重道教，犹有张鲁之风焉。”断绝生人与死者鬼魂相互接触以防注害，这也是属天师道系统的五斗米道（正一道）的习俗，清人杭世骏已经注意到了〔2〕。总而言之，《魏略》所载，实有将太平道与五斗米道相混淆的错误。

道书记载张陵和早期天师道的历史，由于不了解早在张陵之前北方中原地区即已形成的情况，不了解张陵在蜀所创五斗米道与北方中原地区初期天师道之间的关系，从而将张陵以前北方中原地区初期天师道的材料统统都归到了张陵名下，在他们的记载中既保留了不少信史，也有不少矛盾和错误之处，在使用时应当很好通过分析比较加以鉴别，去伪存真，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如说张陵顺帝永寿二年（156）于阆中云台山白日升天，在叙述张陵身世时又说他生于光武十年（34），计算下来应该整整活了一百二十三岁，这样长寿的人在历史上是极难找到的。早期文献对张陵在世年数大都含糊其

〔1〕（梁）僧祐：《弘明集》卷八，50页。

〔2〕卢弼：《三国志·张鲁传集解》引。

辞，更无明确讲到其长寿过人的文字，有者均属晚出之书，如果上述生卒年材料无误，人们（特别是道士们）又怎么会不将此“长寿过人”之事作为道法无边的实证大加宣扬呢？说张陵生于光武十年（34），显然不是事实。这一说法的出现，却是顺帝汉安元年（142）张陵在蜀创五斗米道（正一盟威之道）之前早有道教存在的一佐证。

第四节 “注祟”、“重复”与“承负”

早期讲述“承负”学说的道书文献，主要是《太平经》一书。《太平经·解师策书决第五十》说：“承者为前，负者为后。承者乃谓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决之，不自知，用日积久，相聚为多，今后生人反无辜登其过谪，连传被其灾，故前为承，后为负也。负者，流灾亦不由一人之治，比连不平，前后更相负，故名负。负者，乃先人负于后生者也。”^{〔1〕} 学界有人根据这一记载认为：“镇墓文中的‘重复’，与《太平经》中的‘承负’相当。”也就是说，镇墓文中的“重复”即“承负”^{〔2〕}。《太平经·解承负诀》说：“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力行善反得恶者，是承负先人之过，流灾前后积来害此人也。其行恶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积蓄大功，来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虽有余殃，不能及此人也。因复过去，流其后世，成承五祖。一小周十世，而一反初。或有小行善不能厌，图图其先人流恶承负之灾，中世灭绝无后，诚冤哉……胞胎及未成人而死者，谓之无辜承负先人之过。”^{〔3〕} 《太平经·有过使谪作河梁诫》所说：“太阴法曹，计所承负，除算减年，算尽之后，召地阴阳，并召土府，收取形骸，考其魂神”，“有过高至死，上下谪作河梁山海，各随法轻重，勿有失脱。”实际上，讲“承负”有祸有福，无论祸、福，承负都是“后人”对“先人”而言，“先人”是指父祖以上先世、先代、先辈之人，“后人”即“后生者”，是指子孙后世、后代、后辈之人，承负观念虽然也是死者对生者

〔1〕 王明：《太平经合校》，70页。

〔2〕 刘昭瑞：《〈太平经〉与考古发现的东汉镇墓文》，《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4期。

〔3〕 王明：《太平经合校》，22～23页。

而言，但它的核心是人的世、代、辈份先后。而“注”和“重复”讲死者和生者的关系，则是只管死亡时间的先后而不论世代、辈份的先后，两者有所不同。“承负”论祸，是先人有过应受罪债未偿或未偿清，让子孙来代其偿还罪债，使子孙蒙受其殃，如果先人有过完全未受罪责而由子孙承负代偿，移殃子孙，子孙所受祸殃的形式根本就不存在必与先人相同重复的问题。如果属于先人有过应受罪责没有满数，由子孙承负将之补足而发生祸殃，其祸殃的种类、形式也并不一定与先人所曾受过的重复相同，即使有时相同，也只能说是一种“继续”，并非一种固定的重复现象。而“注”与“重复”的情形则不一样，最初是自身患传染病致死，然后又把同样的病症再传给他人，使之或死或病，看起来完全是一种前死者向后死者寻求替死（代人）的重复现象，所以解注器文中的“重复”也就是“注”，“注”也就是“重复”，统称之为曰“复注”、“复连”。从生死辈份先后和家亲内外关系考察，夫妇、兄弟、姊妹等平辈之间的问题姑置勿论，至少“白发人送黑发人”，儿子、孙子等晚辈之人先患传染疾病死亡，让活着的父母乃至祖父、祖母受其传染，患上同样的疾病以同样的方式死去，这就只能说是注鬼、复鬼为患，让生者遭受“注”或“重复”之殃，而不能说是子孙罪恶，由父祖长辈来承负余殃。后文将论及，东汉墓出土解注器文有“重复之鬼”，“父不得复，母亦不得复，兄亦不得复，弟亦不得复，子亦不得复，孙亦不得复”之语。“重复之鬼”即为重复之祸的注鬼，亦简称“复鬼”。“复”即“重复”，即注鬼重复为害于生人，或父祖之鬼重复其子孙，或子孙之鬼重复其父祖，或兄弟之鬼相复重、或夫妻之鬼相复重。承负是指先人有罪而遗殃子孙，若以“重复”为承负，子女罪恶得由父母承负，那是讲不通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完全没有亲属关系的人身上，因患传染疾病而死者将传染疾病传染给家亲以外的生人造成重复死亡，那就更是只能被认为是注鬼、复鬼为祟，让生者受“注”或“重复”，而不能说是“承负”了。《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卷一《收土公》：“若家故敛不宁，梦恶错乱，魂魄不守，请收神土明君官将一百二十人治之；三气慰愈君五人，官将一百二十人、都星君官将一百二十人，断家鬼伏连。石安君、都星君、诛殃君各一人，官将一百二十人，断外家亡人复连。”〔1〕“复连”、“伏连”即“重复”之注，除“家鬼伏连”之外，尚有“外家亡人复连”，非只家亲之间祖先亡鬼复连子孙，这也是不可以承负解“重复”的最好证据。“复重之鬼”行注害人，是按照注鬼自己同样的死亡方

〔1〕《道藏》二十八册，535页。

式崇害生人以作替身，并不都是因为祖先死后由冥司将未满足之罪计算在子孙身上，从而减少子孙的年寿。解除“重复”和解“注”，有时虽然也采用“为死者解谪，为生人除祸殃”的办法，但那是为了避免死者在阴司不堪痛苦变成注鬼而回到阳世寻求替身，或兴冥讼让其他鬼神拘执考对生人魂魄，使生人以与自身死亡的同样方式受害。解“注”和解除“重复”最终都是隔绝生死，避免二者发生接触，和将死去的祖先未尽的罪过“依法”移算给子孙的承负之说完全不同。“重复”害人，完全是由死者采取主动的个人行为，而“承负”使子孙受祸，则是由冥司采取主动的官方行为，解“重复”为承负，这是不恰当的。当然，“注”或“重复”之与“承负”，有时可能发生交叉混淆，承负也可以前后重复的形式出现。由于传染疾病死亡，主要是通过与患者身体、用具、饮食接触起作用，与之接触机会越多的人越容易受害，在一般情况下，大多是父祖长辈与外界频繁接触首先染上疾病死亡，把病菌带给家中与之接触最多的亲人，除妻子、丈夫之外，儿子、孙子晚辈是首当其冲的重复受害者，让他们重复出现同样的病症以同样的方式死去，这样造成的复注，从承负的宗教观点出发，也可以被看作是先辈作恶，余殃未尽，移祸后人，子孙“无辜承负先人之过”所致。因此，后来“承负”观念的产生也许与“注”字意义的“重复”有某种渊源关系，“承负”的概念是在“重复”基础上产生，最初也可能是由复注发展演变而来，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后来的“承负”和“注”或“重复”完全等同起来。“注”或“重复”和“承负”，是由传染疾病现象演变出的两种不同宗教概念，后来为道教所汲取，随着不同教派的分化和相互影响，不同的教派采用不同的观点而又相互影响。在《太平经》一书中，如《解承负诀》^{〔1〕}、《五事解承负法》^{〔2〕}和上面引到的几篇专讲“承负”的文字，都既没有出现“重复”之词，也没有出现“注”字，这也是“重复”（注）与“承负”概念不同的最好说明。弄清二者之间的区别，对我们研究早期道教的历史和本文涉及的有关考古材料，都是极为重要的。

《太平经》和天师道之间的关系，学界的认识很不一致，有人以为它们有许多内容是一致的。如饶宗颐在讨论张鲁所作《老子想尔注》时所指出的那样：“《想尔》此注，其义实多因《太平经》之说，故屡提及‘太平’字眼，而《太平经》与天师道相同之点，若禁酒、顺时令、义舍、忏悔等，近

〔1〕 王明：《太平经合校》，22～24页。

〔2〕 王明：《太平经合校》，57～61页。

人已论之^{〔1〕}。今《太平经》亦见‘天师’、‘天师道’诸名，足见《太平经》与天师道关系之深切。”^{〔2〕}但学界也有人以太平道张角等对汉王朝的反叛行为与《太平经》主张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不合，认为二者之间并无关系^{〔3〕}。我们认为，虽然《太平经》的一些思想与天师道（后来的五斗米道即正一道属之）有共同之处，但也有许多观念与天师道（五斗米道即正一道属之）明显不同。既然都是道教，必有共同之处，这是不奇怪的，但在共同性之外又各有重大的差异，则应当与大的不同教派系统有关。建立在不同的人鬼对立隔离灵魂观念基础上的注鬼论和解注术，是天师道和《太平经》二者之间一个最大的不一致之处，也是天师道最显著的一个特点。而《太平经》保存篇幅虽多，但只讲“承负”，完全不讲“注”或“重复”，书中绝无与注鬼有关材料。《太平经·葬宅诀》说：“葬者，本先人丘陵居处也，名为初置根种。宅地也，魂神复当得还，养其子孙，善地则魂神还养也，恶地则魂神还为害也。五祖气终，复返为人。天道法气，周复返其始。”^{〔4〕}按照《太平经》的观点，人死之后，其魂神还要再回到阳世与家中生人接触，福养其子孙，只是被葬在条件恶劣的地方，才会在与生人发生接触时引起祸殃。死者与活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和生人与生人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居住的地方有所不同罢了，并不存在完全不能发生接触的绝对隔离观念。这和它所主张的祖先积德，子孙可享余庆，祖先积恶，死后方得遗祸子孙的承负学说是是一致的，而与天师道严格禁止人鬼相互接触的观念完全不同。在《正一法文经章官品》等早期天师道文献中，虽然有时也讲“承负”，但却远不如讲“注”或“重复”之多，这种显著的区别，过去似乎很少有人注意。除此之外，《太平经》的复文符书神符和由图象与变体汉字混合组成的天师道神符相比较，无论内容结构画法风格也都迥然有别，也是它们所属教派不同的主要标志。

东汉时期的道教，迄今所知不外天师（五斗米道即正一道属之）、太平二派，《太平经》既不属天师道派，则非太平道经典莫属，也许这正是说明《太平经》应属太平道经典的一个证据。至于太平道对汉王朝统治的反叛之与《太平经》对封建政权的态度不合，只不过是农民起义在利用太平道为自

〔1〕 傅勤家：《道教史》，72～74页。

〔2〕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89页。

〔3〕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修订本），35页。

〔4〕 王明：《太平经合校》，182页。

身斗争服务的过程中,采取了以乱治乱求太平的实用主义方针,对其内容的具体解释不同,有所取舍而已。同一种宗教,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只需适当改变某些内容,可以为不同的阶级服务,这本来就是一种规律,长期存在的天师道本身的情况也不例外。就以东汉后期作为天师道支派之一的五斗米道而论,一方面在平民百姓中得到广泛的信奉,另一方面也是为张鲁政教合一割据政权统治服务的工具,对刘汉政权而言,它又是一种反叛,因此才会有《樊敏碑》所载“米巫凶虐”的说法出现。这种矛盾的对立统一,正是作为一种宗教的道教具有复杂多面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太平经》无严格的人鬼隔绝观念,恰恰说明了注鬼学说(注鬼论与解注术)具有鲜明的道派特点,初为天师道所独创,以后一直主要是天师道系统教派的内容之一。天师道与太平道皆同属道教,二者之间有某些共同之处,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而对彼之间的巨大差异估计不足。这一结论,也是对上一节内容的补充。

第二章 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

第一节 解注器的确定和种类、器型

前面我们用了较多的篇幅对道教注鬼论和解注术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不仅为我们判断那些地下出土具有解注性质、属于解注器范畴的器物找到了标准,同时也为我们正确理解考古发现“解注文”(“镇墓文”)的内容,认识各种不同解注器材料的真实意义提供了依据。结合文献记载和墓葬出土的“镇墓文”材料考察,我们认为凡是在墓中发现用于隔绝生死、人鬼,为死人解谪、生人除殃的器物,不论其器文中是否出现“注”字,有无文字,质地和形状如何,也都属于解注器的范畴。按其器形、作用,东汉墓葬出土的解注器,主要可以分作以瓶为主的陶容器,以铅、铁金属为主的券版,圆雕石羊,以矿物为主的药物,以铅质为主的金属模拟人形,和印章(封泥)等六大类。

上述六类器物，每类数量多少悬殊，以陶容器所占比例最大。药物一类，有关文字不著于药物本身而仅附见于药物盛器；代人器物形体不大，有文字的原本极少，有者亦仅存朱迹而无字形可见。这两类器物基本上可归入无文字之列。其余四类器物，也都可分为有文字和无文字两种。除印章而外，有铭文可见的只占少数，有的原来有铭文后来腐蚀脱落无存，更多的是原来就没有文字。前面已经提到，过去对于解注器、文的研究，把原本属一个整体的两个不同部分割裂开来，几乎都只注意了文字一个方面，忽略了作为文字载体的器物的考察，大量本来没有文字的解注器材料，更是完全被排斥在外，不仅影响到器文内容的正确认识理解，也给整个考古发现的解注材料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局限。这种状况，必须加以改变。但器文材料，一方面是器物本身的年代、器主、名称、用途、性质、作用、意义以及与其他部分共存器物之间关系的直接解说，另一方面又是当时举行有关宗教法术仪式最原始的文字记录，是我们准确联结以道书为主的文献记载和有关考古材料的纽带，对研究整个解注器及其所反映的宗教历史情况，具有极为关键的作用。我们将许多没有文字的器物纳入解注器的范畴来加以考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器文内容作出的判断。因此，器物文字本身的研究，仍然是我们研究的重点，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已经公布的东汉墓葬出土的解注文材料，有的有释文而无摹本，有的有摹本而无释文，有的既有摹本又有释文，有的还有不少人作过考释研究。无论哪种情况，也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研究者本人的主观认识成分在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不尽相同，很少完全正确。这种情况，包括摹本材料在内也不例外，明显漏误者亦复不少。往往一字、两字辨识之差，句读之误，都会影响到整个文意理解的正确与否，均需重行加以校读考释。以下，我们按不同器类分别进行论述，涉及器文部分，有纪年者以年代先后为序，无纪年者列于有纪年者之后。

第二节 陶容器

一、东汉解注陶容器的类型和材料

东汉墓葬出土包括带符形之解注文陶容器，自名为“解注瓶”、“神瓶”或“魂瓶”，我们统称之曰“解注瓶”。虽然只有陶瓶一种，但器形不尽相

同。同时,根据器文内容分析发现,有的陶瓶虽然本身不带文字,但它的器形却和带有文字的完全相同,共同伴出,有的器内还盛有瓶文所说的铅人之类的其他解注用品,由此可以判定它们也应属于解注陶瓶的性质。也就是说,解注陶瓶本身有带文字的和不带文字的两种类型,但具有和其他随葬陶器不同的独特的固定器形,并有一定的地域分布范围。

根据笔者所作的初步统计,目前已经正式刊布的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解注陶瓶材料 212 件,传世品 18 件,两者合计数量达 230 件。这 230 件解注陶瓶中,有文字者 91 件,无文字者 139 件,年代最早者为东汉明帝永平三年(60),最晚者为汉献帝初平四年(193)。这些材料,绝大部分均出自墓葬,只有极个别器物可能出自其他性质的遗址。

这 230 件解注陶瓶,以地域分布状况而论,涉及中原北方地区之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 5 省 20 余个县(市)。

我们以有文字的器形作为标准,将解注陶瓶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其中 D 型瓶作小口瓶形状,其余三型实为小口罐。三种小口罐,在一般考古报告中也都称为“罐”,亦有个别称为“缶”者,而缶也就是小口罐,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有器文自名为“解注瓶”,故本文一律以“解注瓶”称之。

(表一)

“东汉解注陶瓶分型分式图表”资料来源说明

A 型

1. 明帝永平三年(60 年),陕西咸阳出土。《文物考古论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230 页,图三,7。

2. 灵帝建宁元年(168 年),陕西潼关出土。《文物》1961 年 1 期,60 页,图 12。

3. 安帝延光元年(122 年),河南洛阳出土。《考古学集刊》7,59 页,图八,10。

4. 顺帝阳嘉二年(133 年),陕西户县出土。《考古与文物》1980 年创刊号,45 页,图四,2。

5. 顺帝阳嘉四年(135 年),河南陕县出土。《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122 页,图十三,3。

6. 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陕西西安出土。《考古与文物》1989 年 2 期,45 页,图四,1。

7. 东汉中期,河南洛阳出土。《洛阳烧沟汉墓》,98 页,图四九,12。

8. 东汉中晚期,陕西西安出土。《考古与文物》1990 年 6 期,49 页,图六,9。

9. 东汉中晚期,陕西汉中出土。《考古与文物》1989 年 6 期,39 页,图九,4。

10. 东汉晚期,河南洛阳出土。《文物》1992 年 9 期,40 页,图五,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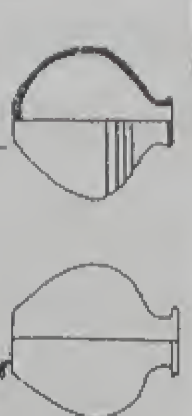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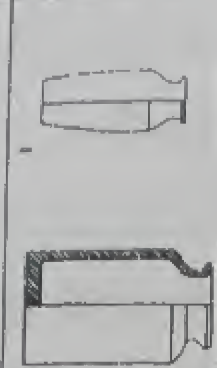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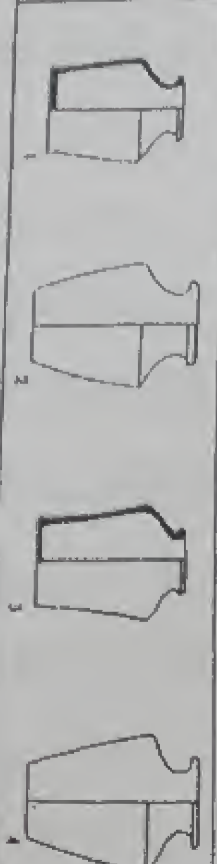
11. 东汉晚期,陕西华阴出土。《考古与文物》1986 年 5 期,47 页,图二,8。

12. 东汉晚期,陕西户县出土。《考古与文物》1980 年创刊号,45 页,图四,17。

B 型 I 式

1. 东汉前期,河南陕县出土。《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122 页,图十三,4。

2. 桓帝延熹九年(166 年),陕西西安出土。《考古与文物》1989 年 2 期,44 页,图二,2。

A型												
B型	I式											
	II式											
C型												
D型	I式											
	II式											
	III式											

表一 东汉解注陶瓶分型分式图表

3. 和帝永元四年 (92 年), 陕西宝鸡出土。《文物》1981 年 3 期, 55 页, 图七。
4. 东汉中期, 河南洛阳出土。《洛阳烧沟汉墓》, 98 页, 图四九, 13。
5. 东汉中期, 陕西西安出土。《考古学报》1991 年 2 期, 244 页, 图七, 13。
6. 东汉后期, 河南陕县出土。《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 122 页, 图十三, 4。
7. 东汉后期, 河南灵宝出土。《文物》1975 年 11 期, 92 页, 图五六, 右。

B 型 II 式

1. 顺帝阳嘉二年 (133 年), 陕西户县出土。《考古与文物》1980 年创刊号, 45 页, 图四, 3。
2. 桓帝元嘉二年 (152 年), 河南洛阳出土。《考古与文物》1997 年 2 期, 3 页, 图二, 9。
3. 灵帝光和二年 (179 年), 河南洛阳出土。《文物》1980 年 6 期, 53 页, 图二, 10。
4. 献帝初平元年 (190 年), 河南洛阳出土。《洛阳烧沟汉墓》, 98 页, 图四九, 14。
5. 东汉晚期, 河南洛阳出土。《文物》1992 年 9 期, 40 页, 图五, 5。
6. 东汉晚期, 河南密县出土。《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 117 页, 图一五, 2。
7. 东汉晚期, 山东济宁出土。《考古》1994 年 2 期, 131 页, 图七, 1。
8. 东汉晚期, 陕西长安出土。《考古与文物》1989 年 5 期, 39 页, 图一, 1。

C 型

1. 桓帝永康元年 (167 年), 河南洛阳出土。《中原文物》1984 年 3 期, 118 页, 图版二, 5。
2. 献帝初平四年 (193 年), 陕西西安出土。《文物》1980 年 1 期。图版九, 1。

D 型 I 式

1. 明帝永平三年 (60 年), 陕西咸阳出土。《文物考古论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 23 页, 图四, 3。
2. 和帝永元十六年至桓帝建和元年 (104~147 年), 陕西长安县出土。《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 7 期, 63 页, 图二, 左。
3. 桓帝延熹九年 (166 年), 陕西西安出土。《考古与文物》1989 年 2 期, 44 页, 图二, 5。
4. 灵帝光和年间 (178~183 年), 陕西宝鸡出土。《文物》1981 年 3 期, 50 页, 图一二。
5. 献帝初平元年 (190 年), 陕西西安出土。《文物》1987 年 6 期, 72 页, 图一。
6. 东汉中晚期, 陕西西安出土。《考古与文物》1990 年 6 期, 49 页, 图六, 10。
7. 东汉中晚期, 陕西长安出土。《考古与文物》1989 年 5 期, 39 页, 图一, 3。
8. 东汉, 陕西长安出土。《考古与文物》1990 年 4 期, 66 页, 图二, 5。
9. 东汉, 陕西户县出土。《考古与文物》1980 年创刊号, 45 页, 图四, 16。

D 型 II 式

1. 献帝初平元年 (190 年), 陕西临潼出土。《文博》1989 年 1 期, 40 页, 图九, 14。
2. 东汉晚期, 陕西勉县出土。《考古与文物》1982 年 2 期, 28 页, 图四, 5。

D 型 III 式

1. 顺帝阳嘉四年 (135 年), 河南陕县出土。《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 122 页, 图一三, 2。
2. 桓帝延熹九年 (166 年), 山西临猗出土。《中国文物报》1993 年 11 月 7 日第 3 版。
3. 东汉中晚期, 陕西长安出土。《考古与文物》1989 年 5 期, 39 页, 图一, 4。
4. 东汉晚期, 陕西眉县出土。《考古与文物》1997 年 5 期, 10 页, 图三, 右。

A型：小口，外折沿，大短颈，肩与腹的分界比较明显，腹近圆而高，大平底。根据发表大小尺寸数字的材料统计，除了高仅5.5厘米一器未注明腹底口径之外，其余诸器高度一般15~26厘米左右，最大34厘米，最低14；腹径一般18厘米左右，最大30厘米，最小厘米；口径一般11厘米左右，最大15厘米，最小7.9厘米；底径一般12厘米左右，最大18.7厘米，最小8.1厘米。

属于此一类型的解注陶瓶共有60件。

1. 1999年陕西咸阳教育学院1号、2号东汉墓各出土本型无字解注陶瓶1件^{〔1〕}。原报告称为“Ⅱ型罐”（简报未注明二墓各出器数），“侈口，宽斜沿，方唇，细颈，圆肩，腹微鼓，平底微凹。标本M2：21，口径12、腹径18、底径10.8、高21.3厘米”。在这两件解注陶瓶中，至少有1件与M2：20号朱书永平三年（60年）D型Ⅰ式纪年瓶同出。M2由前室、后室、侧室和耳室四部分组成。带墓道、甬道。前室长2.65、宽2.80米；后室长3.68、宽1.62~1.80米；侧室长3.50、宽1.80~1.90米。后室与侧室各有木棺二具。M2：21号瓶放在侧室棺木北端靠近北壁处，M2：20号瓶出在前室与侧室交汇处，即由前室进入侧室的前端。看来这种以M2：21号瓶为代表的A型器至少有一部分的年代应与M2：20号瓶系同时入葬，其年代不晚于明帝永平三年（60）。此器是本型解注陶瓶中年代最早的一件。

2. 1959年陕西潼关吊桥东汉后期杨震家族墓群M4号、M5号墓各出本型无字器1件（原报告称“小口大腹罐”）M5号器高20厘米，M4号器较小，高仅5.5厘米^{〔2〕}。（图见表一“东汉墓葬出土解注陶瓶分型分式表”）

3. 1954年河南洛阳汉城遗址出土WWT16：1号本型解注陶瓶（原报告称“朱书陶罐”）1件，发掘报告附有图版（图版壹：1）^{〔3〕}及线图、摹本，未注大小尺寸。陶瓶上有朱书符篆及“解注瓶，百解去。如律令！”的字样，自名为“解注瓶”，这是我们将此种镇墓性质的罐形陶器定名为“解

〔1〕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教育学院汉墓清理简报》，《文物考古论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230页，图三，7。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

〔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潼关吊桥东汉杨氏墓群发掘简记》，《文物》1961年1期。60页，图12。

〔3〕 郭宝钧等：《1954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2期，24页，图21、图版柒，5。



图版壹：1

注瓶”的主要依据。WNT6 号城基下的 3 号小型砖石墓 (1.90 米×0.7 米×0.8 米) 出土 WNM3: 1 号陶瓶, 亦属此型, 附有图版^{〔1〕}, 未注大小尺寸。

4. 1957 年陕西长安县三里村一座规模较大的东汉砖墓, 由墓道、墓道北耳室、甬道、室门、前室、前室北耳室、前室南耳室和后室八个部分组成。墓道长 36.4 米, 宽 1.05 米。墓道耳室长 3.04 米, 宽 2.94 米。甬道和室门长 0.60 米, 宽 1.05 米。前室长 4.1 米, 宽 4.25 米。前室北耳室长 0.9 米, 宽 2.1 米。前室南耳室长 3 米, 宽 1.82 米。后室长 3.13 米, 宽 2.23 米。墓道耳室出土本型无字陶瓶 5 件 (原报告称“陶罐第二种”), 其中一瓶高 20、口径 11、腹径 18 厘米 (图版壹: 2)^{〔2〕}, 内盛铅人 2 枚。同室另有 6 个朱书 D 型 I 式瓶伴出, 有纪年可见者为桓帝建和元年 (147)。墓室出土朱书 D 型 I 式瓶 1 枚, 有永元十六年 (104) 文字可见。此墓当经多次合葬。

5. 1984~1986 年河南洛阳市区 24 号汉墓出土本型解注陶瓶 3 件; M51 (东汉早期)、M40 (东汉中期) 各出有 1 件 (原报告称“B 型 II 式罐”)^{〔3〕}。其中 M24: 145 号瓶 (图见表一“东汉墓葬出土解注陶瓶分型分式表”) 高 15、口径 7.9、底径 8.1 厘米, 有安帝延光元年 (122) 纪年, 其余 4 件无字。

6. 1972 年陕西户县朱家堡东汉阳嘉二年 (133) 墓出土本型无字解注陶瓶 (原报告称“I 式罐”) 8 件, 高 18~20、口径 11~12、肩宽 20、底径 10 厘米 (图见表一“东汉墓葬出土解注陶瓶分型分式表”)^{〔4〕}。

7. 1955 年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本型解注陶瓶 12 件 (原报告称“II 型卷唇罐”)^{〔5〕}。其中 M158 号墓出土 2 件, 1 件 (M158: 22) 朱书顺帝阳嘉四年 (135) 纪年; M30 出土 3 件, M11 (东汉后期)、M23 (东汉前期)、M102 各出土 2 件, M14 (东汉后期) 出土 1 件, 均无文字。

〔1〕 郭宝钧等:《1954 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 年 2 期,图版拾,13。

〔2〕 陕西省文管会:《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 7 期,63 页,图六。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1984 至 1986 年洛阳市区汉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七辑 (1991 年),60 文、76~77 页《汉代墓葬表》;图见 59 页,图八,10。

〔4〕 嵯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 年创刊号,45 页,图四,2。

〔5〕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123~124、165~167 页。



图版壹：2

8. 1953年河南洛阳烧沟4座汉墓出土本型解注陶瓶4件（原报告称“三型一式罐”）^{〔1〕}。M19（东汉中期）、M146（东汉中期）、M1007、M1019各出土1件，均无文字。M146：16号瓶高27、腹径28.5厘米。

9. 1972年陕西户县县医院东汉墓出土本型无字解注陶瓶3件（原报告称“I式罐”），大小相同，高22、口径13、最大腹径19、底径14厘米，器形较其他墓葬所出同型器腹径略小（图见表一“东汉墓葬出土解注陶瓶分型分式表”）^{〔2〕}。

10. 1991年发掘河南偃师蔡庄乡东汉后期许氏家族多室合葬砖墓，出土无字解注陶瓶1件（原报告称“罐”），高30.2厘米，口径14.5厘米，最大腹径30厘米（图版壹：3）^{〔3〕}。该墓为东西向十字形多室砖墓，本瓶出自东侧室南角，有B型Ⅱ式瓶及道人肥致碑同出。

11. 1979年陕西宝鸡铲车厂东汉晚期墓出土无字解注陶瓶1件（原报告称“Ⅱ型罐”）^{〔4〕}。

12. 1982年陕西华阴县原岳庙公社油巷大队M5号东汉晚期司徒刘崎家族墓出土本型（原简报称为“Ⅲ式罐”）解注陶瓶2件^{〔5〕}。其中M5：6号器高17、口径11.4、底径18.7厘米，朱书。M5：33号器高16.4、口径11.4、腹径25.2底径18.7厘米，无字。

13. 1963年河南密县后土郭M1号东汉晚期双十字形大型多室画像石墓后室出土M1：113号本型墨书瓶（原报告将之统归入“I式罐”而与本文所分B型Ⅰ式瓶相混）1件（图版壹：4）^{〔6〕}，高14、腹径18、底径15.5厘米，墨书脱落，有“老”字可见^{〔7〕}。

14. 1987年陕西西安南郊净水厂32座东汉中期墓出土本型陶瓶（原

〔1〕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97～99页。

〔2〕 嵇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45页，图四，17。

〔3〕 河南偃师县文管会：《偃师县南蔡庄乡汉肥致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年9期，41页，图八。

〔4〕 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市铲车厂汉墓》，《文物》1981年3期，有图。

〔5〕 杜葆仁：《东汉司徒刘崎及其家族墓的清理》，《考古与文物》1986年5期，有器图及摹字。

〔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土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2期，118页，图一七，3。

〔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土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2期，119页。



图版壹：3



图版壹：4

报告称“罐”)若干件,但简报未言具体器数及有无文字,唯云其中之M19:11号瓶之墓为与上述司徒刘崎家族墓相同的大墓^{〔1〕}。

15. 1987年陕西西安昆仑机械厂东汉三室砖墓出土本型无字解注陶瓶5件(原报告称“Ⅱ式罐”),其中M:9号器通高26、口径15、腹径23.5、肩宽7.5、底径12厘米^{〔2〕}。共同伴出之D型Ⅰ式瓶有朱书桓帝延熹九年(166)纪年者。未注明诸器在墓中的位置,墓葬平面图主室(前室)四角皆各有一陶罐(瓶),亦未标注器号,不知是否即解注瓶。

16. 1985年陕西汉中市铺镇M4号东汉中晚期券顶砖墓,坐西向东,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墓道长1.8米,墓室长4.9米,宽1.5米。墓中出土本型无文字青灰陶瓶3件(原报告称“V式罐”)。其中M4:18号器通高15.5、口径11、腹径17、底径10.5厘米。M4:19号器通高21、口径12.7、腹径21、底径12.6厘米,内盛铅人10枚,发现在墓室前部偏北靠近棺床处,简报编者推测“似为魂瓶”^{〔3〕},是完全正确的。所谓“魂瓶”,实际上也就是解注瓶。另一器未注明器号,出土位置不详。

17. 1987年陕西长安韦曲镇3号东汉墓出土本型解注陶瓶(原报告称“Ⅰ式罐”)1件,高24.4、最大腹径23.2厘米,简报未言有无文字^{〔4〕}。

18. 1981年河南洛阳西工区CIM120东汉晚期壁画墓出土本型解注陶瓶(原报告称“Ⅳ式罐”)1件^{〔5〕},无文字,简报未著大小尺寸。有B型Ⅱ式瓶同出。

19. 1981年陕西韩城市北关姚庄坡晨钟村东汉墓出土本型朱书陶瓶1件,通高34、最大腹径24、口径7.2厘米,腹部朱书14行^{〔6〕}。

以上19批、约60件材料中,有字者6件,无字者约54件。6件有文字的材料中,有纪年者2件,安帝延光元年(122年)和顺帝阳嘉四年

〔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发掘队:《西安净水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6期。

〔2〕 王育龙:《西安昆仑厂东汉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9年2期,45页,图四,1。

〔3〕 何新成:《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39页,图九,4。

〔4〕 负安志、马志军:《长安县南李王村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4期,66页。

〔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工东汉壁画墓》,《中原文物》1982年3期,17页,图三,4;18页,图四,1。

〔6〕 贾麦明:《韩城市汉墓出土阎氏朱书陶瓶考释》,《东南文化》1993年3期。

(135) 各 1 件，以河南洛阳市区 24 号汉墓出土朱书安帝延光元年（122 年）一器为最早。无字者则可早至明帝永平三年（60）。从地域分布上看，该型解注陶瓶只见于陕西、河南 2 省。60 件解注陶器中，陕西出土者数量稍多（35 件），时代稍早者之解注陶瓶均集中在陕西地区，地域分布也较广，涉及咸阳、宝鸡、户县、西安、长安、汉中、潼关、韩城、华阴 9 县、市；而河南出土者不仅数量不及陕西（25 件），时代亦较晚，材料集中分布于河南之陕县、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其他则仅在河南密县有零星发现。

B 型：卷唇，细短颈，圆肩，短身，大平底。按底、腹直径大小比例之不同，可分为 2 式：

I 式：短身，腹之最大径在器身中部，少数在肩部，肩以下微向内收，底径较腹之最大径略小。根据发表大小尺寸数字的材料统计，高度一般 12~18 厘米，最大 36.5 厘米，最低 4.5 厘米；腹径一般 20 厘米左右，最大 46 厘米，最小厘米；口径一般 13 厘米左右，最大 15 厘米，最小 8.9 厘米；底径一般 14 厘米左右，最大 18 厘米，最小 9.8 厘米。

属于此一类型的解注陶器共有 50 件。

1. 1973 年陕西宝鸡斗鸡台汉墓出土朱书和帝永元四年（92 年）纪年瓶 1 件。高 16、口径 8.3、最大腹径 29.5 厘米（图版壹：5）^{〔1〕}。

2. 1955 河南陕县刘家渠 14 座东汉墓中共出土此型器 21 件（原报告称“Ⅲ型卷唇罐”）^{〔2〕}。其中，M102 出土 5 件，M87（东汉晚期）出土 3 件，M3（东汉晚期）、M158 各出土 2 件，东汉早期之 M23、M24，东汉晚期之 M2、M8、M11、M21、M29、M50、M80 各出土 1 件。21 件材料中，大部无字，大小不一，一般高 14.3~24.2 厘米，最小之 M158：16 号瓶，高仅 4.5 厘米；M2：2 号“黄神越章”朱书瓶，高 14、腹径 17.5 厘米（图版壹：6）^{〔3〕}。M158 号顺帝阳嘉四年（135）墓所出 2 件系与 2 件 A 型器、2 件 D 型Ⅲ式器共同伴出。

3. 1975~1989 年发掘陕西西安北郊 M1 号东汉中期墓，出土 M1：9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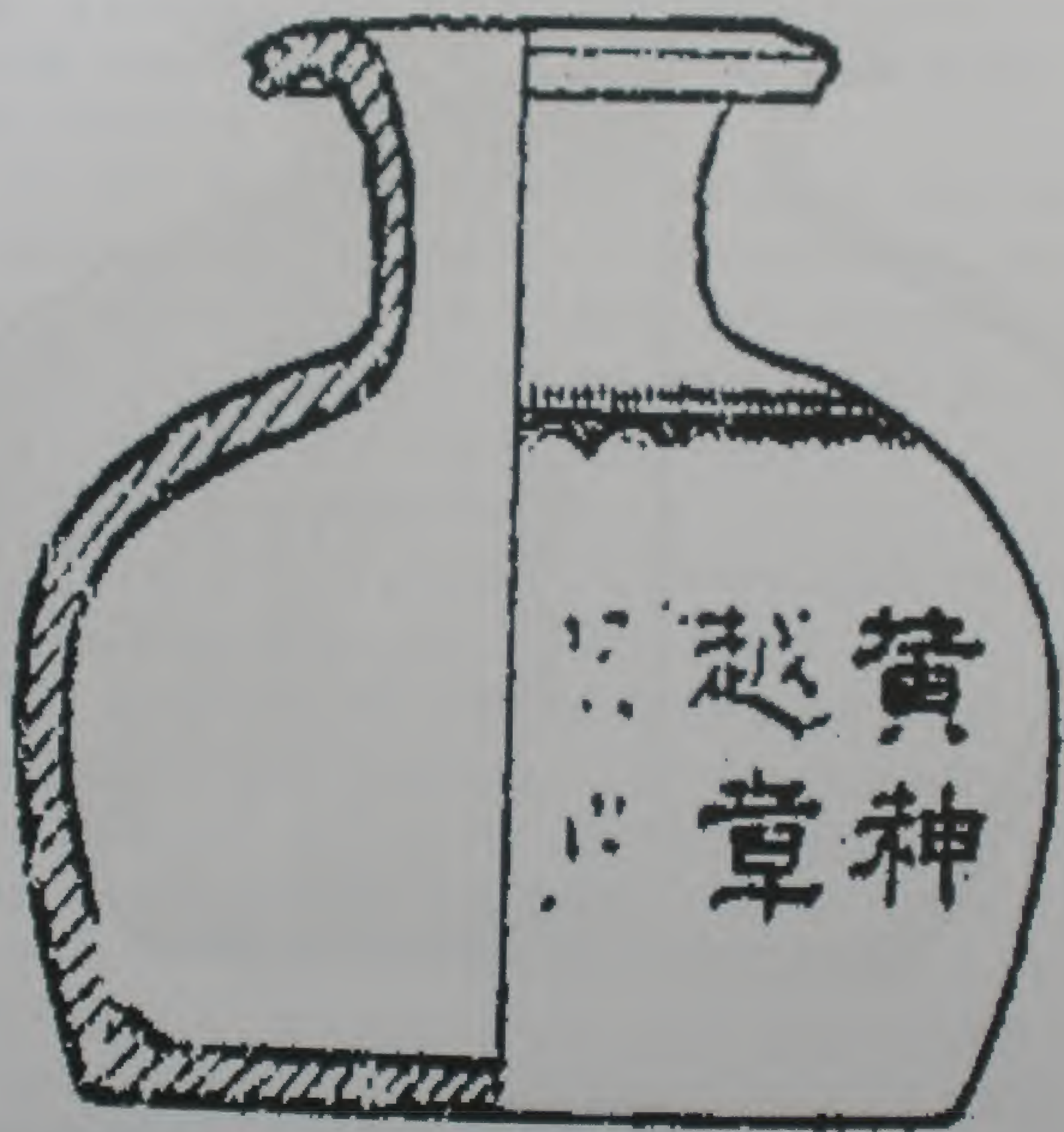
〔1〕 王光永：《宝鸡市发现光和与永元年间朱书陶瓶》，《文物》1981 年 3 期，55 页，图七。

〔2〕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122、165~166 页，图一三，4。（见分型分式图表）

〔3〕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122 页，图一三，4。



图版壹：5



图版壹：6

本式解注陶器 1 件（原报告称“V 型罐”）^{〔1〕}，高 12.2、口径 8.9、最大腹径 14.8、底径 9.8 厘米。

4. 1972 年发掘河南灵宝张湾 M5 号东汉晚期墓，出土本式朱书瓶（原简报称“II 型罐”）5 件，有“铅人”、“瓶到之后”等语。其中 M5：1 号器内盛铅人 2 枚。M4 号东汉后期墓，出土本式无字器（“原报告称“II 型罐”）2 件。M5：35、34 号瓶如图（图版壹：7）^{〔2〕}。7 件陶瓶，高 15~17、口径 9~11 厘米。二墓皆属平面呈中字型之大型多室砖墓。

5. 1953 年河南洛阳烧沟 7 座东汉墓出土本式解注陶器 10 件（原报告称“三型二式罐”）^{〔3〕}。东汉中期之 M1008 出土 3 件，M30 出土 2 件，M117、M1009B、M160、M20、M1037 各出 1 件。M1008：34 号瓶高 36.5、腹径 46 厘米。其余诸器，大小多与此相类。M1037 所出者有 B 型 II 式 3 件伴出，而 3 件 B 型 II 式解注器中，有 1 件带有灵帝建宁三年（170）的纪年。

6. 1963 年河南密县后士郭东汉晚期 M1 号双十字形多室画像石墓，出土本式瓶 4 件（原报告称“I 式罐”），腹部均有朱书或墨书文字。M1：122 号瓶出于南耳室，高 18.8、口径 13.6、腹径 19.5、底径 14.4 厘米（图版壹：8）^{〔4〕}。M1：67 号瓶出于中室，高 18.8、口径 13.4、腹径 20、底径 14 厘米^{〔5〕}。M1：123 号瓶出于南耳室，高 19、口径 12.8、腹径 20、底径 13.8 厘米，残存朱书有“日女”二字可见^{〔6〕}。M1：156 号瓶出于封门砖东侧，高 18、口径 13.2、腹径 18、底径 14 厘米，朱书大部残去，存者尚有

〔1〕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1 年 2 期。有图。

〔2〕 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 年 11 期。92 页，图五六。

〔3〕 《洛阳烧沟汉墓》97 页文，98 页图。

〔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117 页，图一六，1（线图）、118 页，图 2（照片）。

〔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117 页，图一六，2（线图）。

〔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119 页。



图版壹： 7



图版壹：8

“北方”、“于未土”等字可见^{〔1〕}。(另出 M1: 66 号陶瓮一件^{〔2〕}, 高 40.7、口径 20.5、腹径 45.5、底径 24 厘米, 从照片图版 70 看, 器形与此式陶瓶相同, 但器体较其他解注陶瓶为大, 不知是否属解注用品, 暂不列入) 墓中有 A 型瓶同出。

7. 1959 年发掘陕西潼关吊桥杨氏家族墓, 4、5 两墓各出无字瓶一件, 墓 4 一件高 5.5 厘米, 墓 5 一件高 20 厘米^{〔3〕}。墓 5 有 4 件 D 型 II 式解注瓶同出。

8. 1987 年陕西西安昆仑机械厂东汉三室砖墓出土无字器 1 件 (原报告称“V 式罐”), 通高 19.5、口径 13、肩宽 6.5、底径 18 厘米^{〔4〕}。有 5 件 A 型器及 3 件 D 型 I 式器同出, D 型 I 式瓶有桓帝延熹九年 (166) 纪年。

9. 日本学者中村不折旧藏出自陕西长安之灵帝光和二年 (179) 朱书瓶 1 件, 出土时间及伴出情况不详^{〔5〕}。

以上 9 批、50 件材料中, 有字者 13 件, 无字者 37 件。此式解注瓶有明确纪年者较少, 除陕西宝鸡斗鸡台汉墓出和帝永元四年 (92 年) 瓶而外, 仅传世灵帝光和二年 (179) 瓶 1 件。从地域分布上看, B 型 I 式解注瓶只见于河南、陕西 2 省。50 件解注瓶中, 42 件分布在河南, 只有 8 件分布于陕西。而河南所出者, 又集中分布在陕县 (21 件)、洛阳 (10 件)、灵宝 (7 件)、密县 (4 件) 四地; 陕西所出者, 仅见于西安、长安、宝鸡、潼关四地。

II 式: 小口, 宽平唇, 细颈, 圆肩, 腹半圆, 腹与底呈覆碗状, 最大径在底部, 底略内凹。根据发表大小尺寸数字的材料统计, 高度一般 14 厘米左右, 最大 18 厘米, 最低 11 厘米; 腹径一般 15~18 厘米; 口径一般 11 厘米左右, 最大 14.8 厘米, 最小 7 厘米; 底径一般 22 厘米左右, 最大 28.5 厘米, 最小 12.9 厘米。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 119 页。

〔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 125 页, 图二一, 8。

〔3〕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潼关吊桥杨氏墓群发掘简记》,《文物》1961 年 1 期, 60 页, 图 12。

〔4〕 王育龙:《西安昆仑厂东汉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9 年 2 期, 44 页, 图二, 2。

〔5〕 日人编《书道全集》卷三, 11 页。

属于此一类型的解注陶器共 60 件。

1. 1972 年, 陕西户县朱家堡东汉墓出土朱书顺帝阳嘉二年 (133) 曹伯鲁瓶 1 件 (原报告称“Ⅱ式罐”), 高 18、口径 9.5、口沿宽 2、底径 22 厘米 (图见《东汉墓解注陶瓶分型分式表》)^{〔1〕}。

2. 1974 年河南洛阳李屯 M1 号墓出土解注陶器 4 件 (原报告称“陶神瓶”), 其中 M1: 3 号苏阿瓶高 16、口径 5、肩宽 17、底径 18 厘米, 带有桓帝元嘉二年 (152) 纪年^{〔2〕}, 另 3 件无文字。

3. 1980 年发掘河南洛阳东郊史家湾东汉墓, 出土朱书桓帝永寿二年 (156) 纪年瓶 1 件 (原报告称“镇墓瓶”), 高 24.4、口径 9.1、底径 23.5 厘米^{〔3〕}, 瓶内盛大量药丸。该瓶放在墓门口的东南角。

4. 1970 年, 河南洛阳唐寺门 M1 号一干字形东汉大型多室多棺砖墓出土 M1: 64 号筒瓦, 瓦面先用白粉涂抹, 然后墨书文字五行, 文首“永康元年 (167) 十月”纪年尚清晰可见。该墓共出土本式陶瓶 (原简报陶罐共分五式而未分型, 称本式瓶为“Ⅱ式陶罐”) 3 件, 其中 2 件有粉、朱书符、文, 1 件无字。有字之 M1: 65 号瓶, 高 14.5、口径 8、底径 16 厘米; M1: 66 号瓶, 高 14、口径 8、底径 17、厘米^{〔4〕}。以上两器, 不仅器形相同, 大小也基本一致, 出自右前室靠右上角双棺之右侧。无字一器未著明器号、大小和在墓中的位置。另有 2 件 C 型瓶同出。

5. 1953 年河南洛阳烧沟 8 座东汉墓出土解注陶瓶 14 件 (原报告称“三型三式罐”)^{〔5〕}。其中 M1037 号出土 3 件, 1 件有粉朱书灵帝建宁三年 (170) 纪年, 2 件无文字; M147 号墓出土 2 件, 其中 1 件有朱书灵帝初平元年 (190) 纪年, 另 1 件无文字; 东汉晚期之 M16185 出土 3 件; 东汉晚期之 M1038 出土 2 件; 东汉晚期之 M143、M144、M1035、M1039 分别出土 1 件。M147: 13 号瓶高 16.8、腹径 20.8 厘米。其余诸器, 大小多与此

〔1〕 嵯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 年创刊号, 45 页, 图四, 3。

〔2〕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李屯东汉元嘉二年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 年 2 期, 3 页, 图二, 9; 4 页, 图三, 13。

〔3〕 蔡运章:《东汉永寿二年镇墓瓶陶文考略》,《考古》1989 年 7 期, 17 页, 图三, 5。

〔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寺门两座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 年 3 期, 图版二, 3。

〔5〕 《洛阳烧沟汉墓》, 97~99 页。

相类。

6. 1981年河南洛阳西工区塘沽路 CIM120 号东汉晚期壁画砖墓出土本式朱书残瓶 1 件（原报告称“V 式罐”），简报除发表器形图^{〔1〕}外，未著大小尺寸。云“腹部朱书文字残片，清晰可见”，未附有关器文摹本和释文，内容不得而详。有无字 A 型瓶同出。

7. 1963 年河南密县后士郭 M1 号东汉晚期大型画像石墓出土 3 件（原称“II 式罐”）。M1：114 号器出在北耳室，高 14.2、口径 8.5、腹径 15、底径 15 厘米，肩以下先涂白粉后再朱书，尚残存“万二百”等字可见（图版壹：9）^{〔2〕}。M1：81 号出于中室，高 17.5、口径 9.8、腹径 18、底径 20 厘米（图版壹：10）^{〔3〕}，腹部两侧朱书，文字甚长，可惜残失极为严重，存字不能成句。另 M1：89 号器未作具体文字说明，仅附线图^{〔4〕}。有 1 件 A 型瓶（原称“III 式罐”）和 4 件 B 型 I 式瓶同出。M2 出土本式带字器 7 件 M2：114 号瓶（图版壹：11）^{〔5〕} 高 14.5、口径 7、底径 16 厘米。其他有关具体情况，报告未另作说明。

8. 1991 年发掘河南偃师县南蔡庄乡东汉后期许氏家族墓，出土 M3：2 号本式无字器 1 件（原报告称“罐”），高 23.4、口径 14.8、底径 28.5 厘米，其上带有类似符篆的符号^{〔6〕}。该墓为东西向十字形多室砖墓，本瓶出自东侧室南角，有无字 A 型解注瓶及道人肥致碑同出。

9. 1974 年，河南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四十分厂 1 号东汉土圹前堂横列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耳室五部分组成）出土本式无字解注陶瓶（原简报称“小口罐”）5 件（编号 M1：31~35 号），高 11.5、口径 7、底径

〔1〕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工东汉壁画墓》，《中原文物》1982 年 3 期。有图。

〔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118 页，图一七，1。

〔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118 页，图一七，6。

〔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117 页，图一五，2。

〔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148 页，图四一，2。

〔6〕 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偃师县南蔡庄乡汉肥致墓发掘简报》，《文物》1992 年 9 期，40 页，图五，5；41 页，图九。



图版壹：9



图版壹：10



图版壹：11

14 厘米^{〔1〕}。简报未说明在墓中安放位置。

10. 1991 年发掘山东济宁市区东汉晚期石室墓，出土本式无字瓶 4 件（原报告称“罐”），大小相同，高 14.9、口径 12.5、底径 22.5 厘米。其中 1 件朱砂彩绘，内盛朱砂^{〔2〕}。该墓东西向，平面近“凸”字形，东西长 6.18 米，南北宽 8.80 米，由前室、后室、回廊、耳室四部分组成，后室为棺室。回廊成“门”形，环绕后室。解注瓶在南廊西侧（报告称“南西廊”）出土。

11. 20 世纪 50 年代，河南洛阳汉城遗址 WWT5、洛阳建校区汉墓、洛阳汉城 1 号汉墓分别各出土陶瓶 1 件。其中，WWT5 所出 WWT5: 1 号陶瓶“小口，外折沿，细颈。肩与腹无分界，腹壁直，下微大，底部最大，形成了小口大底身高若半截壘的器形。器表涂白衣一层，白衣之上复有朱绘痕，因白衣多已脱落，故朱绘不能看出。高 11.4、外口径 7.8、底径 13 厘米。这种类型的瓶，在北城第一号汉墓中也出土 1 件，形状全同。1953 年在建校区发掘的汉墓中所出的一件，上有朱书‘初平元年’等字样”^{〔3〕}。另一压在 WNT5 号城基上的 WNM1 东汉小型男女合葬砖墓（2.14 米×2.14 米×0.82 米），出土 NM1: 2 号陶罐 1 件，亦属此式^{〔4〕}。

12. 1996 年笔者在河南偃师县文化馆得见本式瓶约 10 件，其中有符者一件，有文者 2 件，无文者 7 件，有的 2 器同出于一墓。包括偃师蔺窑砖厂东汉墓出土本式朱书建宁四年（171）陶瓶及仅朱绘四道神符者在内^{〔5〕}。

13. 1985 年陕西长安县韦曲北原 M13 号东汉晚期墓，出土无字瓶 2 件（原报告称“II 式罐”）^{〔6〕}。

14. 50 年代河南洛阳中州路 M813 号东汉墓，出土献帝初平二年

〔1〕 洛阳博物馆：《洛阳光和二年（179）王当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 年 6 期。

〔2〕 济宁市博物馆：《山东济宁发现一座东汉墓》，《考古》1994 年 2 期，131 页，图七，1；图版叁，2。

〔3〕 郭宝钧等：《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 年 2 期，24 页。

〔4〕 郭宝钧等：《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 年 2 期，29 页、图版拾，12。

〔5〕 现藏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发掘队：《陕西长安县 206 基建工地汉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 年 5 期。

(191) 解注朱白粉底朱书陶瓶 1 件。该陶瓶高 11 厘米，底径 12.9 厘米^{〔1〕}。

以上出土的 14 批、60 件材料中，有字（含带符篆）者 21 件，无字者 39 件。此式解注陶器有纪年者共 8 件，其中顺帝阳嘉二年（133）、桓帝元嘉二年（152）、永寿二年（156）、灵帝建宁三年（170）、建宁四年（171）、献帝初平二年（191）各 1 件，献帝初平元年（190）者 2 件，以陕西户县朱家堡出土朱书顺帝阳嘉二年（133）曹伯鲁瓶一器为最早。从地域分布上看，B 型 II 式解注瓶主要集中分布于河南，陕西、山东仅有零星分布。60 件材料中，河南就占了 53 件，山东 4 件，陕西仅有 3 件。而河南所出者，主要集中在洛阳（32 件）、偃师（11 件）、密县（10 件）三地。

C 型：小口，卷沿，宽圆肩，小平底，最大径在器身中部。根据发表大小尺寸数字的材料统计，高度一般 16 厘米左右，最大可达 24.8 厘米；腹径一般 16 厘米左右，最大可达 24.2 厘米；口径一般 5 厘米左右，最大可达 12.4 厘米；底径一般 7 厘米左右。

属于此一类型的解注瓶数量不多，迄今为止只发现 4 件。

1. 1957 年陕西西安和平门汉墓出土献帝初平四年（193）王氏朱书陶瓶 1 件。陶瓶高 17.7、口径 5、腹径 16.1、底径 6.8 厘米（图版壹：12），小汉白玉石一块^{〔2〕}。

2. 1955 年河北望都 2 号灵帝光和五年（182）刘公大型多室砖墓出土无字灰陶瓶 1 枚^{〔3〕}。陶瓶通高 24.8、口径 12.4、腹径 24.2 厘米，报告未说明在墓中的位置。

3. 1970 年，河南洛阳唐寺门墨书东汉桓帝永康元年（167）纪年瓦之 M1 号汉墓出土本式陶瓶 2 枚（原简报称“Ⅳ式陶罐”）。其中 M1：89 号瓶高 15.5、口径 5.4、肩宽 17、底径 7 厘米，腹部粉涂无字^{〔4〕}；M1：106 号瓶高 13.5、口径 4.8、肩宽 12.8、底径 6.2 厘米，腹部有朱书文字^{〔5〕}，出自左前室下中部靠近双棺下侧及另一棺之头端。该墓另有 3 枚 B 型 II 式器同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134 页文；133 页，图 4；图版捌，1、2。

〔2〕 唐金裕：《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文物》1980 年 1 期，图版玖，1。

〔3〕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望都二号汉墓》图九一。

〔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寺门两座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 年 3 期，图版二，5。

〔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寺门两座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 年 3 期，38 页，图六。



图版壹：12

出，2枚有字，1枚无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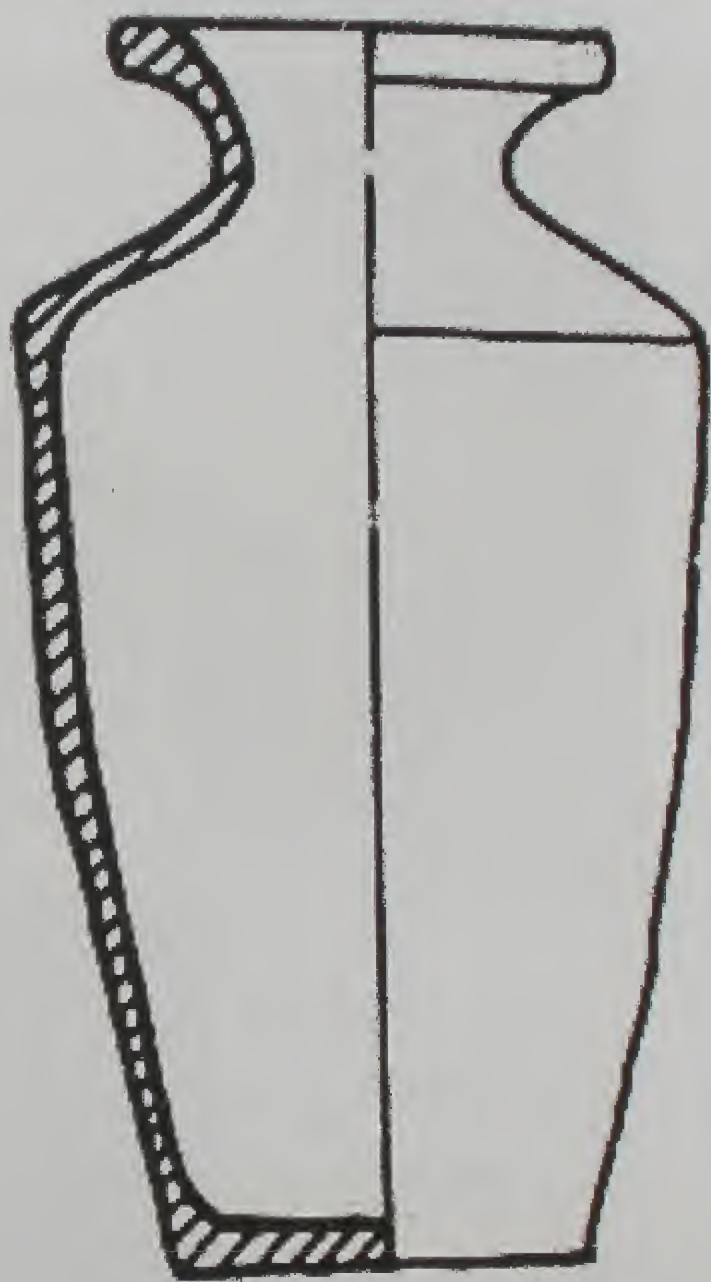
以上3批、4件材料中，有字者2件，无字者2件。陕西、河北各出1件，河南2件。有纪年者仅陕西西安和平门汉墓献帝初平四年（193）王氏瓶1件。

D型：卷口或平口，大短颈，斜圆肩或折肩，直腹，平底。按器身之细长或粗短比例不同，可分为3式：

I式：以器身略大而成中长比例为特点，肩部直径明显大于底部。根据发表大小尺寸数字的材料统计，高度一般25厘米左右，最大27厘米，最低14.8厘米；肩宽一般12厘米左右；口径一般8厘米左右；底径一般8厘米左右。

属于此一型式的解注瓶共32件。

1. 1999年陕西咸阳教育学院M2号东汉墓出土M2：20号本式朱书解注瓶1件^{〔1〕}。如前所述，该墓由前室、后室、侧室和耳室四部分组成，朱书陶瓶出在前室与侧室交汇处。陶瓶侈口，平沿，圆唇，束颈，斜折肩，腹斜收稍鼓，平底。口径10、肩径14、底径8.5、高25.2厘米。（插图壹：1）瓶内盛一4厘米长的白石条，一长2厘米的黄色石块，和三颗蓝色、青灰色小颗粒。外腹有永平三年（60）纪年。在甬道进入前室处出土铅人8枚。该器物不仅是本式陶瓶最早的一件，也是迄今为止整个东汉墓葬中出土纪年解注陶瓶年代最早的一件。



插图壹：1

2. 1957年发掘陕西长安三里村东汉多室砖墓，形制结构已于前述，出土本式朱书陶瓶7件（图版壹：13）^{〔2〕}。其中6件出自墓道耳室，1件出自主室（未云为前室或后室）。7件朱书陶瓶，入葬时间前后不一，主室出土1

〔1〕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教育学院汉墓清理简报》，《文物考古论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231页，图四，3。

〔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7期，63页，图二、三。



图版壹：13

件，通高 18、口径 7、腹径 12 厘米，有和帝永元十六年（104）纪年，墓道耳室出土者，有桓帝“建和元年（147）”纪年和“以自代铅人”之语。另有五 5 件无字 A 型器伴出，其中 1 件内盛铅人 2 枚^{〔1〕}，前文已有说明。

3. 1959 年陕西潼关吊桥杨震家族墓 M2、M5 号出土本式朱书陶瓶 9 件，高约 20 厘米（未注口径腹径）^{〔2〕}。其中 M2 号墓出土 5 件，有书“中央雄黄利子孙”者；M5 号墓出土 4 件，有书灵帝建宁元年（168）纪年者。

4. 罗振玉《古明器图录》卷二著录本式朱书顺帝永和五年（140）瓶纪年残器 1 件，出土地点、时间及伴出器物不明^{〔3〕}。

5. 日人中村不折旧藏 1914 年陕西西安郊区出土本式朱漆书顺帝永和六年（141）瓶 1 件^{〔4〕}。

6. 日人中村不折旧藏 1914 年陕西西安郊区出土本式朱书桓帝永寿二年（156）成桃推纪年瓶 1 件^{〔5〕}。

7. 日人中村不折旧藏 1914 年陕西西安郊区出土本式永寿二年（156）孟陵纪年瓶 1 件^{〔6〕}。

8. 1987 年陕西西安昆仑机械厂东汉墓出土本式陶瓶 3 件，大小成序，1 件无字，另 2 件泥水书，一符一文^{〔7〕}。M：33 通高 24、有朱书桓帝延熹九年（166）纪年^{〔8〕}。M：35 号瓶，有泥水隶书文字（图版壹：14）^{〔9〕}。另有 2 件 A 型解注陶瓶（原报告称“II 式罐”）及 4 件 B 型 I 式解注陶瓶（原报告称“IV 式罐”）共出。诸瓶在墓中的具体位置，简报未作说明。

9. 日人中村不折旧藏 1914 年陕西西安出土灵帝建宁四年（171）纪年

〔1〕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 7 期。

〔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记》，《文物》1961 年 1 期。

〔3〕 《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七册，2479 页。

〔4〕 《书道全集》第三册，10 页。

〔5〕 《书道全集》第三册，4～5 页。

〔6〕 《书道全集》第三册，6～9 页。

〔7〕 王育龙：《西安昆仑厂东汉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9 年 2 期。有图。

〔8〕 王育龙：《西安昆仑厂东汉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9 年 2 期，46 页，图五，2、47 页，图九。

〔9〕 王育龙：《西安昆仑厂东汉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9 年 2 期，46 页，图五，1、48 页，图十。



图版壹：14

瓶 1 件^{〔1〕}。

10. 原西安市肆出售相传出自陕西凤翔之本式灵帝熹平元年（172）纪年瓶 1 件^{〔2〕}。

11. 1970 年发掘陕西宝鸡五里庙 M1 号汉墓，出土本式朱书灵帝光和四年（181）王氏纪年瓶 1 件，口、颈部已残^{〔3〕}。该墓墓道长 8.05 米，墓室长 3.09 米（原简报误作 30.9 米），宽 2.80 米，发现时斜倒在墓室门内。

12. 武树善《陕西金石志》卷四记载，清末光绪年间陕西陇州（今陕西陇县）城南出土朱书“瓦罇”2 件，一件有灵帝熹平六年（177）纪年。汉代之“罇”，器身皆作直筒形，故二器均应属本式。

13. 中村不折旧藏陕西西安郊区出土粉底朱书中平四年（187）五月二十五日瓶（与熹平四年瓶形同）1 件，高“7 寸”，口径“3 寸 9 分”，底径“7 寸 9 分”^{〔4〕}。

14. 1987 年陕西西安南郊净水厂东汉中期墓出土解注瓶若干件，但具体数量、有无文字，发掘简报未作交代^{〔5〕}。

15. 1985 年陕西长安县韦曲村 M15 号东汉中期墓出土 M15：8 号无字解注瓶 1 件^{〔6〕}。该瓶高 14.8、口径 4 厘米，腹部直径较大，唇、颈及整个器身亦较其他本式器为短。

16. 1972 年陕西户县县医院汉墓出土朱书灵帝年间陶瓶 1 件^{〔7〕}。

17. 西北大学藏陕西西安汉城出土朱书献帝初平元年（190）本式朱书符、文解注陶瓶 1 件，通高 27、肩宽 12、底径 7 厘米^{〔8〕}。

18. 1987 年陕西长安县韦曲镇东北少陵原 M5 号汉墓出土朱书陶瓶 1

〔1〕《书道全集》第三册，11 页。

〔2〕邹安：《艺术丛编·艺术类征》；陈彬和：《中国文字与书法》，42 页。

〔3〕王光永：《宝鸡市汉墓发现光和与永元年间朱书陶瓶》，《文物》1981 年 3 期 53 页，图三、四。

〔4〕（日）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40 页。

〔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发掘队：《西安净水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 年 5 期。

〔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发掘队：《陕西长安县 206 基建工地汉、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 年 5 期。

〔7〕杨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 年创刊号。有图。

〔8〕高大伦等：《汉初平元年朱书陶瓶》，《文物》1987 年 6 期。有图。

件^{〔1〕}。

19. 1979年陕西宝鸡铲车厂 M1 号东汉晚期墓出土朱书陶瓶 2 件，其中 M1: 11 号瓶内盛“五铢”钱 8 枚^{〔2〕}。

20. 1997 年陕西西安雁塔区长延堡街道办事处瓦胡同村 M33 号东汉晚期砖室墓出土朱书陶瓶 1 件^{〔3〕}。该瓶高 21、口径 8、底径 9 厘米。有铅人 1 件伴出，至于陶瓶及铅人在墓中出土位置，原发掘报告未作进一步交代。

21. 日人中村不折旧藏朱泥书无纪年瓶 1 件，出土地不明^{〔4〕}。

22.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1957 年陕西长安县三里村出土朱书陶瓶 1 件^{〔5〕}。该瓶“小口卷沿、折肩、斜折腹、小平底，通高 20.5 厘米，口径 6.5 厘米，底径 7.5 厘米。”据描述，与前述 1987 年陕西长安县韦曲镇东北少陵原 M5 号东汉晚期墓出土朱书陶瓶形制相同，应归入此式。

23. 1993 年陕西眉县白家村东汉末期十字形砖墓，出土解注瓶 1 件^{〔6〕}。口径 6、高 21 厘米，无文字。

24. 台湾国立中央研究院藏传世陕西蓝田县出土朱书符文瓶 1 件^{〔7〕}。口径 8.5、肩径 7、高 23 厘米，字迹大部模糊不能识读。

以上 24 批、42 件材料中，有字者 38 件，无字者 4 件。有纪年者数量最多，共 14 件，其中明帝永平三年（60）、和帝永元十六年（104）、顺帝永和五年（140）、永和六年（141）、桓帝建和元年（147）各 1 件，桓帝永寿二年（156）2 件，桓帝延熹九年（166）、灵帝建宁元年（168）、建宁四年（171）、灵帝熹平元年（172）、熹平六年（177）、光和四年（181）、中平四年（187）、献帝初平元年（190）各 1 件，以陕西咸阳教育学院 1 号东汉墓出土明帝永平三年（60）一件年代最早。从地域分布上看，此一类型的解注瓶除 2 件传世品出土地点不明外，2 件出自陇州（今陕西陇县），其余 38 件

〔1〕 负安志等：《长安县南李王村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 年 4 期。有图。

〔2〕 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市铲车厂汉墓》，《文物》1981 年 3 期。有图。

〔3〕 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汉、后赵墓发掘简报》，《文博》1997 年 6 期。

〔4〕 日人编印《书道全集》卷三，12 页。

〔5〕 王育成：《南李王陶瓶朱书与相关宗教文化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1996 年 2 期。

〔6〕 尔雅：《陕西眉县白家村东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 年 5 期。

〔7〕 谭旦同：《陶瓷彙录》，14 页。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1 年。据渡步武等《镇墓文衣物疏资料篇·镇墓文、衣物疏集成》（初编）14 页转引。

均出自陕西中部，陕西以外的其他地方没有这一类型的解注瓶发现或出土。而陕西所出者，又以西安及其附近的郊县居多（20件），咸阳、凤翔、宝鸡、眉县、户县、蓝田分布较为零星。

Ⅱ式：以直长腹，底径与肩径大略相等或稍小，器身几成直筒形为特点，可称为此型之直长筒式。根据发表大小尺寸数字的两件材料统计，高度一件23.9厘米，一件14.5厘米；口径一件7厘米。底径8~9厘米。肩径一件11厘米。

属于此一型式的解注瓶材料最少，目前仅见2件。

1. 1987年，陕西临潼县斜口乡高沟村砖厂一前、后、侧三室之东汉砖墓，出土G：31号朱书献帝初平元年（190）纪年符、文瓶1件（图版壹：15）^{〔1〕}、（线图插图壹：2）^{〔2〕}。该瓶通高23.9，肩径11、底径8厘米。

2. 1978年陕西勉县老道寺M4号东汉晚期墓出土无字瓶1件，高14.5、口径7、底径9厘米，有摇钱树残片同出（图见附表）^{〔3〕}。

以上2批、2件材料中，有文字者1件，无文字者1件。有纪年者1件为献帝初平元年（190）。从地域分布来看，此一型式的解注瓶只见于陕西地区。

Ⅲ式：以口、颈较大，器身粗短为特点。根据发表大小尺寸数字的三件材料统计，高度16.8~17厘米；腹径12.8~20厘米；口径6~9厘米。

属于此一型式的解注瓶数量亦不多，只有6件。

1. 1993年山西临猗东汉墓出土朱书桓帝延熹九年（166）瓶1件^{〔4〕}。



插图壹：2

〔1〕 林泊等：《临潼县发现汉初平元年墓》，《文博》1989年1期，图版壹，4。

〔2〕 林泊等：《临潼县发现汉初平元年墓》，《文博》1989年1期，40页，图九，14。

〔3〕 郭清华：《陕西勉县老道寺四号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2期，28页，图四，5。

〔4〕 王泽庆：《东汉延熹九年朱书陶瓶》，《中国文物报》1993年11月7日第3版。



图版壹：15

该瓶通高 17、口径 9、上腹围 42、下腹围 32、腹高 11、底径 9.5 厘米（图版壹：16）。

2. 1955 年河南陕县刘家渠 M158 号东汉墓出土本式朱书陶瓶 2 件，M158：21 号瓶高 16.8、腹径 12.8 厘米（图版壹：17）^{〔1〕}。该瓶与顺帝阳嘉四年（135）纪年朱书 A 型瓶同出。据报告编写者称，“此类瓶在关中东汉中晚期墓中常有发现，尤其在晚期盛行。腹壁都有朱书文字，某些并具纪年。其性质与卷唇罐Ⅱ、Ⅲ型朱书镇墓文者相同。”^{〔2〕}

3. 1985 年陕西长安县韦曲东汉中晚期墓出土本式陶瓶（简报称Ⅰ式瓶）2 件，简报未著明尺寸大小及在墓中的位置。其中 M15：15 号瓶附有线图^{〔3〕}，朱书，仅少数字迹可见。另外 1 件无文。

4. 1993 年陕西眉县白家村东汉末期十字形砖墓，出土陶瓶 1 件^{〔4〕}。高 17、口径 6 厘米。无文字。

以上 4 批、6 件材料，有字者 4 件，无字者 2 件。有纪年者 2 件，顺帝阳嘉四年（135）、桓帝延熹九年（166）各 1 件，以河南陕县刘家渠墓 158 号汉墓出土顺帝阳嘉四年（135）一器为最早。

在 D 型解注陶瓶中，有字者所占比例很大，接近 90%。

东汉解注陶器除了上述 4 个不同的类型外，尚有 6 件带字传世品，分别为顺帝永建三年（128）、灵帝熹平四年（175）朱书瓶各 1 件；残失纪年朱、墨书瓶各 1 件^{〔5〕}；日人中村不折旧藏山西某地出土朱书陶瓶 1 枚，有录文^{〔6〕}；1935 年修筑同蒲铁路工程出土灵帝熹平二年（173）张叔敬纪年镇墓器 1 件，说者或称为盆，或称为缶，或称为瓶^{〔7〕}。虽大抵可判称瓶者为可信，器型则无从确指。以上 6 件传世品，文字内容皆极有价值，但由于发表材料时未附图版，我们无法作出准确的型式划分。

〔1〕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122 页，图一三，2；图版贰叁，5。

〔2〕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

〔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考古队：《陕西长安县 206 基建工地汉、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 年 5 期，39 页图一，4。

〔4〕 尔雅：《陕西眉县白家村东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 年 5 期。

〔5〕 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镇墓文》，《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七册，2886～2888 页。

〔6〕 中村不折：《三代秦汉遗物的文字》，105 页。

〔7〕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94 页；陈直：《汉张叔敬朱书陶瓶与张角黄巾教的关系》，《文史考古论丛》，390 页。



图版壹：16



图版壹：17

上述解注陶瓶材料共计 230 件, 包括有文字者 91 件, 无文字者 139 件。分计 A 型 60 件, 有文字者 6 件, 无文字者 54 件, 有纪年者 3 件, 以和帝永元四年 (92) 者为最早; 无纪年者则以永平三年 (60) 墓所出者为最早。B 型 110 件, 有文字者 34 件, 无文字者 76 件。有纪年之 9 件材料中, 以陕西户县朱家堡出土顺帝阳嘉二年 (133) 曹伯鲁瓶一器为最早。其中 B 型 I 式 50 件, 有文字者 13 件, 无文字者 37 件, 有纪年者仅灵帝光和二年 (179) 1 件, 但无纪年者则或可早至顺帝阳嘉四年 (135); B 型 II 式 60 件, 有文字者 21 件, 无字者 39 件, 有纪年者 8 件, 以顺帝阳嘉二年 (133) 为最早。C 型 4 件, 有文字者 2 件, 无文字者 2 件, 有纪年者仅献帝初平四年 (193) 1 件。D 型 50 件, 有文字者 43 件, 无文字者 7 件。其中 I 式 42 件, 有文字者 38 件, 无文字者 4 件, 该式解注瓶中, 有纪年者共 14 件, 以陕西咸阳教育学院 1 号东汉墓出土明帝永平三年 (60) 一件为最早; II 式 2 件, 有文字者 1 件, 无文字者 1 件, 有文字 1 件纪年为灵帝建宁元年 (168); III 式 6 件, 有文字者 4 件, 无文字者 2 件, 1 件有纪年者为桓帝延熹九年 (166)。另有文字而器型不明者 6 件。

(附表二“东汉解注陶瓶一览表”)^{〔1〕}

表二 考古出土(含传世)东汉解注陶器一览表

编号	出土时间	出土地点	时代	解注器类型及数量	资料出处	备 注
1	1999 年	陕西咸阳教育学院	明帝永平三年(公元 60)	无字 A 型陶瓶(原称“II 型罐”)2 件、D 型 I 式纪年陶瓶 1 件	咸阳考古研究所编《文物考古论集》231 页, 图 3.7; 图四.3	有铅人 8 枚与解注陶瓶同出
2	1973 年	陕西宝鸡斗鸡台	和帝永元四年(92)	A 型 18 件(原称“朱书陶罐”, B 型 I 式 1 件(原称“朱书陶罐”))	《文物》1981 年 3 期, 55 页, 图七	
3	1957 年	陕西长安三里村东汉多室砖墓		A 型 5 件(原称“陶罐第二种”, 其中 1 件内盛铅人 2 枚), D 型 I 式 7 件(原称“陶瓶”)	《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 7 期, 62~64 页	多次合葬墓, 出土纪年器物有永元 16 年(104)和桓帝建和元年(147)

〔1〕 有的解注瓶材料, 虽然已经刊布, 但原发掘报告或简报并未具体交代其确切数量、组合情况以及是否有文字, 这部分材料, 没有计算在上述统计数字之中, 特此说明。

编号	出土时间	出土地点	时代	解注器类型及数量	资料出处	备注
4	1984 — 1986 年	河南洛阳市区 M24	安帝延光元年(122)	A 型 3 件(原报告称“B 型 II 式罐”,其中 M24: 145 号器带有纪年)	《考古学集刊》7,60、76 页	有纪年者仅 1 件
5			顺帝永建三年(128)	朱书瓶 1 件	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镇墓文》	
6	1972 年	陕西户县朱家堡汉墓	顺帝阳嘉二年(133)	A 型 8 件(原称“I 式罐”),B 型 II 式 1 件(原称“II 式罐”)	《考古与文物》1980 年 1 期,45、47 页	
7	1955 年	河南陕县刘家渠 M158	顺帝阳嘉四年(135)	A 型 2 件(原称“II 型卷唇罐”,其中 1 件带有纪年),B 型 I 式 2 件(原称“III 型卷唇罐”),D 型 III 式 2 件(原称“瓶”)	《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123、124 页	
8			顺帝永和五年(140)	D 型 I 式 1 件	《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第七册 2479 页	纪年瓶(残)
9		陕西西安郊区	顺帝永和六年(141)	D 型 I 式 1 件(原称“永和六年甕”)	《书道全集》第三册,10 页	
10	1974 年	河南洛阳李屯 M1	桓帝元嘉二年(152)	B 型 II 式 4 件(原称“陶神瓶”,其中 M1: 3 号瓶带有纪年)	《考古与文物》1997 年 2 期,3 页	
11	1980 年	河南洛阳东郊史家湾	桓帝永寿二年(156)	B 型 II 式 1 件(原称“镇墓瓶”)	《考古》1989 年 7 期,649 页	内盛大量药丸
12		陕西西安	桓帝永寿二年(156)	D 型 I 式 1 件(原称“永寿二年二月甕”)	《书道全集》第三册,4、5 页	
13		陕西西安	桓帝永寿二年(156)	D 型 I 式 1 件(原称“永寿二年三月甕”)	《书道全集》第三册,6—9 页	
14	1987 年	陕西西安昆仑机械厂	桓帝延熹九年(166)	A 型 5 件(原称“II 式罐”),B 型 I 式 1 件(原称“V 式罐”),D 型 I 式 3 件(原称“陶瓶”,其中 1 件带有纪年)	《考古与文物》1989 年 2 期,44、45 页	其中 1 件带有符篆
15	1993 年	山西临猗	桓帝延熹九年(166)	D 型 III 式 1 件(原文称“朱书陶瓶”)	《中国文物报》1993 年 11 月 7 日第 3 版	内盛羊角形器
16	1970 年	河南洛阳唐寺门 M1		B 型 II 式 3 件(原称“III 式罐”),C 型 2 件(原称“IV 式罐”)	《中原文物》1984 年 3 期,38 页及图版二,3—5	其中 2 件带有符篆。出土纪年器物带有桓帝永康元年(167)之纪年
17	1959 年	陕西潼关吊桥 M5	灵帝建宁元年(168)	B 型 I 式 1 件(原称“小口大腹罐”),D 型 II 式 4 件(原称“瓶”,其中 1 件带有纪年)	《文物》1961 年 1 期,59、60 页	出自杨震家族墓群

编号	出土时间	出土地点	时代	解注器类型及数量	资料出处	备 注
18	1953 年	河 南 洛 阳 M1037	灵帝建宁三年(170)	B 型 I 式 1 件(原称“三型二式罐”), B 型 II 式 3 件(原称“三型三式罐”, 其中 1 件带有纪年)	《洛阳烧沟汉墓》, 97~99 页	
19		陕西西安	灵帝建宁四年(171)	D 型 I 式 1 件(原称“建宁四年甕”)	《书道全集》第三册, 11 页	
20		河南偃师	灵帝建宁四年(171)	B 型 II 式 10 件, 其中有字者 3 件(1 件带有纪年), 无字者 7 件	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藏品	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樊有升先生所寄摹本
21		陕西凤翔?	灵帝熹平元年(172)	D 型 I 式 1 件	《艺术丛编艺术类征》	
22		山西同蒲铁路	灵帝熹平二年(173)	张叔敬纪年盆(缶)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 94 页	
23			灵帝熹平四年(175)	朱书瓶 1 件	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镇墓文》	
24		陕西陇州	灵帝熹平六年(177)	D 型 I 式 2 件(原书称朱书“瓦罇”, 其中 1 件带有纪年)	武树善《陕西金石志》卷四	
25		陕西长安县	灵帝光和二年(179)	B 型 I 式 1 件(原称“光和二年甕”)	《书道全集》第三册, 11 页	
26	1974 年	河南洛阳王当墓		B 型 II 式 5 件(原称“小口罐”)	《文物》1980 年 6 期, 53 页	出有灵帝光和二年(179)铅券
27		河北望都		C 型 1 件(原称“压纹灰陶罐”)	《望都二号汉墓》图九一	出有灵帝光和五年(182)刘氏买地券。
28	1970 年	陕西宝鸡五里庙 M1	灵帝光和四年(181)	D 型 I 式 1 件(原报告称“陶瓶”)	《文物》1981 年 3 期, 53 页	
29		陕西西安	灵帝中平四年(187)	D 型 I 式 1 件	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40 页	
30	1953 年	河南洛阳建校区汉墓	献帝初平元年(190)	B 型 II 式 1 件(原称“瓶”)	《考古学报》1956 年 2 期, 24 页	
31	1953 年	河南洛阳烧沟 M147	献帝初平元年(190)	B 型 II 式 2 件(原报告称“三型三式罐”, 其中 1 件带有纪年)	《洛阳烧沟汉墓》, 97~99 页	
32	1987 年	陕西临潼斜口乡汉墓	献帝初平元年(190)	D 型 II 式 1 件(原报告称“朱书镇墓瓶”、“朱书陶瓶”)	《文博》1989 年 1 期, 40、41 页	带符篆
33		陕西西安汉城旧址出土	献帝初平元年(190)	D 型 I 式 1 件(原报告称“朱书镇墓陶瓶”)	《文物》1987 年 6 期	带符篆
34	1950 年代	河南洛阳中州路 M813	献帝初平二年(191 年)	B 型 II 式 1 件(原报告称“朱书陶瓶”)	《洛阳中州路》133~134 页	

编号	出土时间	出土地点	时代	解注器类型及数量	资料出处	备注
35	1957年	陕西西安和平门4号汉墓	献帝初平四年(193)	C型1件(原报告称“朱书陶瓶”)	《文物》1980年1期	内盛小汉白玉1块
36	1955年	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	M23	东汉前期	A型2件(原称“II型卷唇罐”), B型I式1件(原称“III型卷唇罐”)	《考古学报》1965年1期, 123、166页
37			M24	东汉前期	B型I式1件(原报告称“III型卷唇罐”)	《考古学报》1965年1期, 166页
38			M30	东汉前期—后期	A型3件(原称“II型卷唇罐”)	《考古学报》1965年1期, 166页
39	1984—1986年	河南洛阳市区	M51	东汉早期	A型1件(原报告称“B型II式罐”)	《考古学集刊》7, 60、77页
40			M40	东汉中期	A型1件(同上)	《考古学集刊》7, 60、76页
41	1953年	河南洛阳烧沟汉墓	M19	东汉中期	A型1件(原报告称“三型一式罐”)	《洛阳烧沟汉墓》, 97~99页, 97~99页
42			M117	东汉中期	B型I式1件(原报告称“三型二式罐”)	同上, 97~99页
43			M146	东汉中期	A型1件(原报告称“三型一式罐”)	同上, 97~99页
44			M1008	东汉中期	B型I式3件(原报告称“三型二式罐”)	同上, 97~99页
45			M1009B	东汉中期	B型I式1件(同上)	同上, 97—99页
46	1975—1989年	陕西西安北郊M1	东汉中期	B型I式1件(原报告称“V型罐”)	《考古学报》1991年2期, 244、245页	M1: 9号罐
47	1987年	陕西西安净水厂	M6	东汉中晚期	D型I式若干件(原报告称“瓶”)	《考古与文物》1990年6期, 49、51页
48			M19	东汉中晚期	A型若干件(原报告称“罐”)	《考古与文物》1990年6期, 49、51页
49	1985年	陕西长安韦曲村M15	东汉中晚期	D型I式1件(原称“II式瓶”), D型III式2件(原称“I式瓶”)	《考古与文物》1989年5期, 39页	
50	1985年	陕西汉中市铺镇M4	东汉中晚期	A型(无字)3件(原称“V式罐”)	《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 39页	M4: 19内盛铅人10枚
51		河南洛阳西工区	东汉晚期	A型2式1件(原称“IV式”), B型II式1件	《中原文物》1982年3期, 17页	C1M120号壁画墓

编号	出土时间	出土地点		时代	解注器类型及数量	资料出处	备 注
52		河南偃师道人肥致碑墓		东汉后期	A型1件(原称 M3: 1号罐), B型 II式1件(原称 M3: 2号罐)	《文物》1992年9期, 40、41页	多室合葬墓
53	1963年	河南密县后土郭	M1	东汉晚期	A型1件(原称“III式罐”), B型 I式4件(原称“II式罐”), B型 II式3件(原称“ I式罐”)	《华夏考古》1987年2期, 117~119页	石羊5枚
54			M2	东汉晚期	B型 II式7件(原称“II式罐”)	《华夏考古》1987年2期, 148—149页	石羊5枚
55	1953年	河南洛阳烧沟汉墓	M143	东汉晚期	B型 II式1件(原报告称“三型三式罐”)	《洛阳烧沟汉墓》, 97~99页	
56			M144	东汉晚期	B型 II式1件(同上)	同上, 97—99页	
57			M160	东汉晚期	B型 I式1件(原报告称“三型二式罐”)	同上, 97~99页	
58			M161	东汉晚期	B型 II式3件(原报告称“三型三式罐”)	同上, 97~99页	
59			M1035	东汉晚期	B型 II式1件(同上)	同上, 97~99页	
60			M1038	东汉晚期	B型 II式2件(同上)	同上, 97~99页	
61			M1039	东汉晚期	B型 II式1件(同上)	同上, 97~99页	
62	1972年	河南灵宝张湾 M4		东汉后期	B型 I式2件(原称“II式罐”)	《文物》1975年11期, 79页	
63	1972年	河南灵宝张湾 M5		东汉后期	B型 I式5件(原称“II式罐”)	《文物》1975年11期, 79页	其中 M5:1号罐内盛铅人2件
64	1955年	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	M2	东汉后期	B型 I式1件(原报告称“III型卷唇罐”)	《考古学报》1965年1期, 165页	
65			M3	东汉后期	B型 I式2件(同上)	同上, 165页	同上
66			M8	东汉后期	B型 I式1件(同上)	同上, 165页	同上
67			M11	东汉后期	A型2件(原称“II型卷唇罐”), B型 I式1件(原称“III型卷唇罐”)	《考古学报》1965年1期, 165页	
68			M14	东汉后期	A型1件(原称“II型卷唇罐”)	同上, 165页	
69			M21	东汉后期	B型 I式1件(原称“III型卷唇罐”)	同上, 165页	
70			M29	东汉后期	B型 I式1件(同上)	同上, 166页	

编号	出土时间	出土地点		时代	解注器类型及数量	资料出处	备注
71	1955 年	河南陕 县刘家 渠汉墓	M50	东汉后期	B 型 I 式 1 件(同上)	同上,166 页	
72			M80	东汉后期	B 型 I 式 1 件(同上)	同上,166 页	
73			M87	东汉后期	B 型 I 式 3 件(同上)	同上,167 页	一器内盛铅人 3 枚
74	1979 年	陕西宝鸡铲车 厂 M1		东汉晚期	A 型 1 件(原称“II 型罐”),D 型 I 式 2 件(原称“陶瓶”)	《文物》1981 年 3 期,47~51 页	M1:11 号器内盛五铢 钱 8 枚
75	1982 年	陕西华阴岳庙 M5		东汉晚期	A 型 2 件(原报告称 “III 式罐”)	《考古与文物》 1986 年 5 期, 47、48 页	刘崎家族墓
76	1993 年	陕西眉县白家 村东汉墓		东汉末期	D 型 I 式 1 件,D 型 III 式 1 件(原报告称 “瓶”)	《考古与文物》 1997 年 5 期,10 页	
77	1978 年	陕西勉县老道 寺 M4		东汉晚期	D 型 II 式 1 件(原报 告称“灰陶瓶”)	《考古与文物》 1982 年 2 期,28 页	
78	1997 年	陕西西安长延 堡 M33		东汉晚期	D 型 I 式 1 件(原称 “朱书陶瓶”)	《文博》1997 年 6 期	铅人 1 件
79	1991 年	山东济宁东汉 石室墓		东汉晚期	B 型 II 式 4 件(原报 告称“罐”)	《考古》1994 年 2 期,130、131 页	其中 1 件内盛朱砂
80	1959 年	陕西潼 关吊桥	M2	东汉后期	D 型 II 式 5 件(原称 “瓶”)	《文物》1961 年 1 期,59 页	出自杨震家族墓群
81			M4	东汉后期	B 型 I 式 1 件(原称 “小口大腹罐”)	同上	同上
82	1985 年	陕西长 安韦曲 镇	M13	东汉晚期	B 型 II 式 2 件(原报 告称“II 式罐”)	《考古与文物》 1989 年 5 期, 38、39 页	
83	1987 年		M5		D 型 I 式 1 件(原报 告称“朱书瓶”)	《考古与文物》 1990 年 4 期, 66、68 页	带符篆
84			M3	东汉晚期	A 型 件(原称“I 式 罐”)	同上,66 页	
85	1953 年			M20		B 型 I 式 1 件 (原报告称“三 型二式罐”)	《洛阳烧沟汉墓》,97 ~99 页
86	1953 年	河南洛 阳烧沟 汉墓	M30		B 型 I 式 2 件(同上)	《洛阳烧沟汉 墓》,97~99 页	
87			M1007		A 型 1 件(原报告称 “三型一式罐”)	同上,97~99 页	
88			M1019		A 型 1 件(同上)	同上,97~99 页	
89		河南洛阳		B 型 II 式 2 件(原称“陶 瓶”)		《考古学报》 1956 年 2 期,24 页	出自洛阳汉城遗址 WWT5
90		河南洛阳北城 1 号汉墓			B 型 II 式 1 件(原称 “陶瓶”)	《考古学报》 1956 年 2 期,24 页、图版拾,12。	

编号	出土时间	出土地点	时代	解注器类型及数量	资料出处	备注
91	1950 年代	河南洛阳汉城遗址(墓葬?)		A 型 1 件自名为“解注瓶”。		带符篆
92	1972 年	陕西户县县医院		A 型 3 件(原报告称“陶罐”),D 型 I 式 1 件(原报告称“陶瓶”)	《考古与文物》1980 年 1 期,45~47 页	
93	1957 年	陕西长安三里村		D 型 I 式 1 件(原报告称“朱书陶瓶”)	《考古与文物》1996 年 2 期,62 页	
94		陕西蓝田		D 型 I 式 1 件(原称“朱书符文瓶”)	台湾国立中央研究院藏	
95	1955 年	河南陕县刘家渠 M102		A 型 2 件(原报告称“II 型卷唇罐”),B 型 I 式 5 件(原报告称“III 型卷唇罐”)	《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167 页	
96		山西		朱书陶瓶 1 件	中村不折《三代秦汉的遗物》,105 页。	
97				D 型 I 式 1 件(原称“无年号甕”)	《书道全集》第三册,12 页	
98				佚失纪年墨书瓶 1 件	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 镇墓文》	
99		陕西韩城北关		A 型 1 件(原报告称“朱书陶瓶”)	《东南文化》1993 年 3 期,60 页	

以上所列,系以所见材料作粗略之统计,虽不甚精确,大体情况则可概见。

二、地域分布、年代与组合

这 230 件解注陶瓶材料,出土地点为较明确的有:河南洛阳 12 处、偃师 2 处,陕县、密县、灵宝各 1 处。陕西西安 8 处^{〔1〕},长安 4 处,宝鸡 3 处,户县 2 处,蓝田、咸阳、凤翔、汉中、华阴、临潼、潼关、韩城、眉县、勉县、陇县各 1 处。山西临猗及出土地点不确知者共 3 处。河北的望都 1 处。山东的济宁 1 处。出土地点不明者 6 件,按一器一处计,凡 6 处。换言之,这 230 件材料分布于河南、陕西、河北、山东、山西 5 省 23 个县市 56 个不同的地点,而以陕西、河南为最多,河南凡 6 县市 19 处,陕西凡 15

〔1〕《书道全集》所录,以每件 1 处计算。

县市 28 处。除西南面延及陕西汉中、东面延及山东济宁而外，这 200 余件解注瓶基本上是以陕西西安、河南洛阳为中心，沿今陇海铁路两侧及邻近县市分布。

（参见“东汉解注器分布图”）

按器型之地域分布统计，A 型分布于陕西境内者，户县 11 件，长安 6 件，西安 5 件，汉中 3 件，咸阳 2 件，皆无文字；宝鸡 1 件，无文字；华阴 2 件，有文字与无文字者各 1 件；韩城 1 件，有文字。河南境内者，洛阳 12 件，有文字者 2 件，无文字者 8 件；陕县 12 件，有文字者 1 件，无文字者 11 件；偃师 1 件，无文字；密县 1 件，有文字。

B 型 I 式，除 2 件无文字者出自陕西西安、2 件无文字者出自陕西潼关、1 件有文字者出自陕西长安外，余皆出自河南境内。计洛阳 10 件，皆无文字；陕县 21 件，有文字者 1 件，无文字者 20 件；密县 3 件，皆有文字；灵宝 7 件，有文字者 5 件，无文字者 2 件。

B 型 II 式，陕西境内出土者，长安 2 件，无文字；户县 1 件，有文字。山东境内者，济宁 4 件，均无文字。河南境内出土者，洛阳 32 件，有文字者 9 件，无文字者 23 件；偃师 11 件，有文字者 3 件，无文字者 8 件；密县 10 件，皆有文字。

C 型，出土于陕西境内者，西安 1 件，有文字。出土于河南境内者，洛阳 2 件，有、无文字各 1。出土于河北境内者，望都 1 件，无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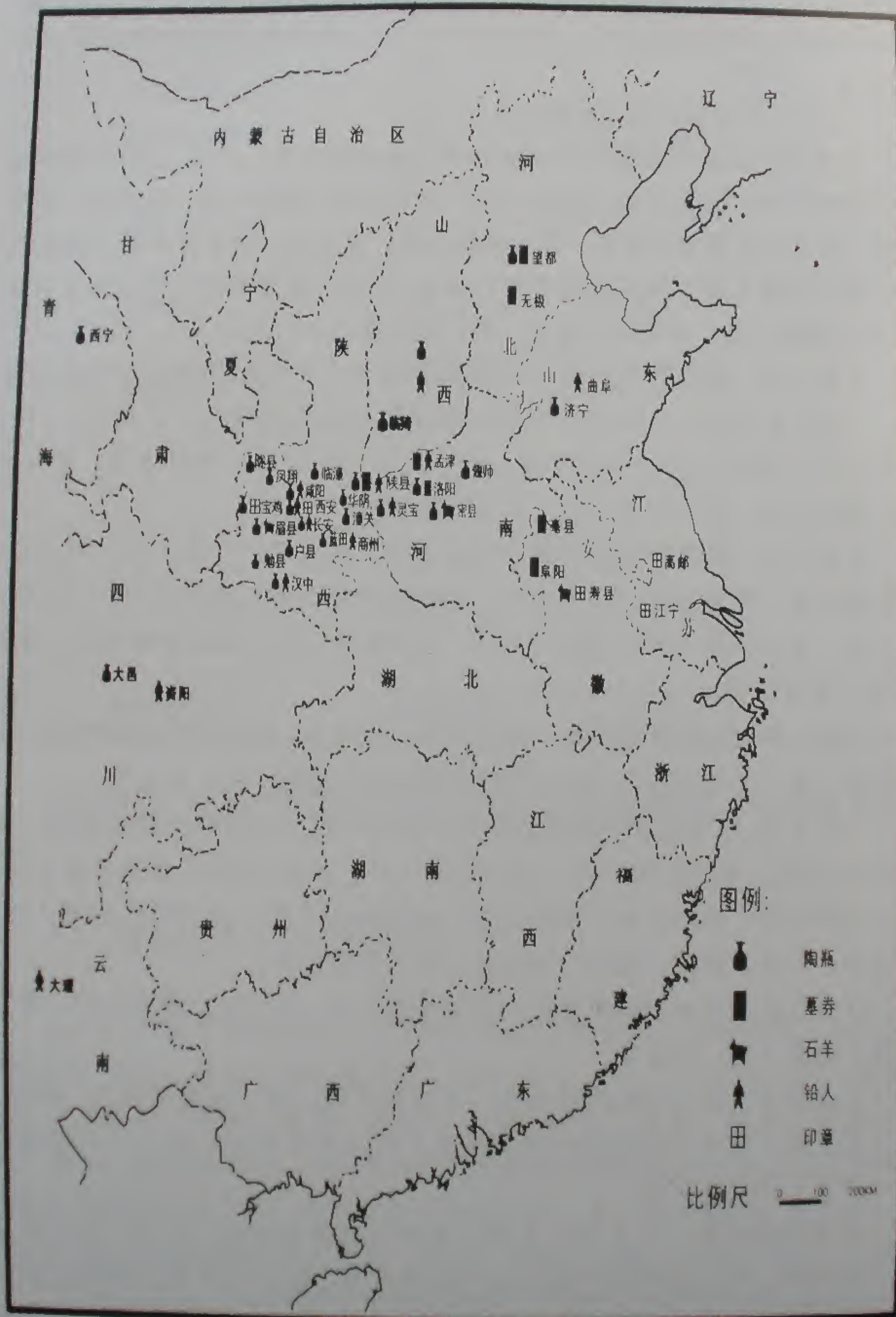
D 型 I 式，2 件有文字的传世品出土地点不明，余皆出自陕西境内，其中西安 10 件，有文字者 9 件，无文字者 1 件；长安 10 件，有文字者 9 件，无文字者 1 件；宝鸡 3 件，皆有文字；陕西陇县 2 件，有文字；眉县 1 件，无文字；户县、咸阳、蓝田、凤翔各 1 件，皆有文字。

D 型 II 式，亦出自陕西境内，其中临潼 1 件，有文字；潼关 9 枚，皆有文字；勉县 1 件，无文字。

D 型 III 式，出土于陕西境内者，长安县 2 件，有、无文字各 1；眉县 1 件，无文字。出土于河南境内者，陕县 2 件，皆有文字。出土于山西境内者，临猗 1 件，有文字。

从总的情况看，以 A 型与 D 型之地域分布最具特点。A 型广泛分布于豫、陕诸地。而 D 型则绝大部分出在陕西境内，我们可以把 D 型称作陕西型，至于此型中之 III 式有少数出自山西西南部的临猗，也和陕西接壤，实际上属于这一分布范围的边缘地带，或者说是受到陕西地区影响的结果。

（参见表三“东汉解注器型式分布表”）



东汉解注器分布图

表三 东汉解注器型式分布表

数量 型 式		河 南										陕 西															
		洛 阳		陕 县		偃 师		密 县		灵 宝		陇 县		西 安		长 安		宝 鸡		户 县		华 阴		临 潼		潼 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 型		2	8	1	11		1							5			5	1	1	11			1	1			
B 型	I 式		10	1	20				3		5	2			2	1											2
	II 式	9	23			3	8	11								2				1							
C 型			2											1													
D 型	I 式													9	1	9	1	3		1							
	II 式																							1		9	
	III 式															1	1										
型式不明者																											
小 计		11	43	4	31	3	9	15		5	2	2	2	10	8	11	9	4	1	2	11	1	1	1	1	9	2
总 计		54	35	35	12	15	7	2	18	20	5	13	2	11	2	1	11	9	1	13	2	1	1	1	11	11	

注：▲表示带有铭刻者，△表示无文字者

陕 西										河 北		山 东		山 西				出土地点 不详者		总 计				
咸 阳		蓝 田		汉 中		眉 县		勉 县		凤 翔		望 都		济 宁		临 猗						同 蒲 铁 路		其 他 地 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3																		6	48	
																							10	36
																4							24	37
												1											1	3
1		1					1				1											2	29	3
									1														10	1
							1							1									4	2
																				1			5	
1	2	1			3		2		1				1		4		1			1		5	89	130
3		1		3		2		1		1		4		1			1			1		5	219	

以器型组合关系看,除各型各式均有单独出土者外,不同的型式在一墓中同时伴出的交叉组合情况,有以下 10 种类型:

- 1、A 型与 B 型 I 式;
- 2、A 型与 B 型 II 式;
- 3、A 型与 B 型 I、II 式;
- 4、A 型与 D 型 I 式;
- 5、A 型与 B 型 I 式、D 型 I 式;
- 6、A 型与 B 型 I 式、D 型 III 式;
- 7、B 型 I 式与 B 型 II 式;
- 8、B 型 I 式与 D 型 II 式;
- 9、B 型 II 式与 C 型;
- 10、D 型 I 式与 D 型 III 式

表四 东汉解注陶瓶的纪年、型式与组合表

组合 型式	纪年	共存型式	内盛器物
A 型	1. 和帝永元四年(92)——陕西宝鸡斗鸡台;2. 安帝延光元年(122)——河南洛阳市区;3. 顺帝阳嘉二年(133)——户县朱家堡;4. 顺帝阳嘉四年(135)——河南陕县	① B 型 I 式——陕县刘家渠 11、102、23 号墓;② B 型 II 式——户县朱家堡阳嘉二年墓、偃师蔡庄肥致墓、洛阳西工区汉墓;③ D 型 I 式——咸阳教育学院汉墓、户县县医院、宝鸡铲车厂、长安三里村(D 型 I 式 7 件与 A 型 5 件同出);④ B 型 I、II 式——密县后士郭 1 号墓;⑤ B 型 I 式、D 型 I 式——西安昆仑厂延熹九年墓;⑥ B 型 I 式、D 型 III 式——陕县刘家渠 M158(阳嘉四年)汉墓	① 铅人——长安三里村(2 枚);② 石羊 5 枚——密县后士郭;③ 汉中市铺镇东汉晚期无字器 1 件(10 枚)
B 型	I 式	① A 型——陕县刘家渠 11、23、102 号墓;② B 型 II 式——河南洛阳 M1037;③ D 型 II 式——潼关吊桥杨震族墓;④ A 型、B 型 II 式——密县后士郭 1 号墓;⑤ A 型、D 型 I 式——西安昆仑厂延熹九年墓⑥ A 型、D 型 III 式——陕县刘家渠阳嘉四年墓	铅人——灵宝张湾(2 枚);陕县刘家渠 87 号墓(3 枚)
	II 式	1. 顺帝阳嘉二年(133)——陕西户县朱家堡;2. 桓帝永寿二年(156)——河南洛阳史家湾 ① A 型——户县朱家堡汉墓、洛阳西工区汉墓、偃师蔡庄肥致墓; ② B 型 I 式——河南洛阳 M1037;③ C 型——洛阳唐寺门; ④ A 型、B 型 I 式——密县后士郭 1 号墓	① 丹砂——济宁 3 器; ② 大量药丸——洛阳东汉史家湾永寿二年器

组合 型式	纪年	共存型式	内盛器物
C 型	献帝初平四年(193)——陕西西安和平门(无纪年器可早至东汉晚期)	B 型 II 式——洛阳唐寺门	汉白玉石——西安和平门初平元年王氏瓶(1 块)
D 型	I 式 1. 和帝永元 16 年(104)——陕西长安三里村; 2. 顺帝永和六年(141)——陕西西安; 3. 桓帝永寿二年(156)——陕西西安; 4. 灵帝建宁四年(171)——陕西西安; 5. 灵帝熹平元年(172)——陕西凤翔	① A 型——咸阳教育学院 1 号汉墓、长安三里村永元至建和合葬墓、宝鸡铲车厂 1 号墓、户县县医院; ② D 型 III 式——长安韦曲村 M15、眉县白家村东汉墓; ③ A 型、B 型 I 式——西安昆仑厂延熹九年墓	瓶内虽未发现铅人, 但长安韦曲李玉村符文瓶文却明确提到“铅人”
	II 式 灵帝建宁元年(168)——陕西潼关吊桥	B 型 I 式——潼关吊桥杨震家族墓	
	III 式 1. 顺帝阳嘉四年(135)——河南陕县刘家渠(但本器纪年文字不存); 2. 桓帝延熹九年(166)——山西临猗	① D 型 I 式——长安韦曲村 M15、眉县白家村东汉墓; ② A 型、B 型 I 式——陕县刘家渠阳嘉四年 158 号墓	羊角形器——临猗熹平九年瓶
型式不明者	顺帝永建三年(128)——《古器物识小录》		

此外, 在前面提到陕西西安昆仑机械厂延熹九年(166)墓与 A 型和 B 型 I 式瓶同出之 3 件解注瓶, 编者将之视为同一类型之器物而“大小成序”, 我们在统计时亦按编者意见同时归入 D 型 I 式。但从发表线图情况看, 此三器实际上似应分别归入 D 型之 I、II、III 式, 大小居中之 II 式瓶无文, 而最大的 I 式瓶与最小的 III 式瓶两器文字合为一篇完整的解注文字, 这种情况比较特殊, 似可单独另列一类。河南洛阳唐寺门 M1 号大型多室多棺砖墓(筒瓦有“永康元年(167)十月”纪年)该墓共出土带解注符、文陶瓶 3 件, M1: 65 号器与 M1: 66 号器两器同属 B 型 II 式, 大小也基本一致, M1: 65 号器墨书繁复之符形, M1: 66 号器腹部朱书文字。一墓同室出两器形制相同, 一符一文配套使用, 亦应归入这一类型。

整个 230 件解注陶瓶的年代情况, 从 33 件自身带有纪年文字材料考察, 计有明帝的永平三年(60); 和帝的永元四年(92)、永元十六年(104); 安帝的延光元年(122); 顺帝的永建三年(128)、阳嘉二年(133)、阳嘉四年(135)、永和五年(140)、永和六年(141); 桓帝的建和元年(147)、元嘉二年(152)、永寿二年(156——3 件)、延熹九年(166——2 件); 灵帝的建宁元年(168)、建宁三年(170)、建宁四年(171——2 件)、熹平元年(172)、熹平二年(173)、熹平四年(175)、熹平六年(177)、光和二年

(179)、光和四年(181)、中平四年(187); 献帝的初平元年(190——4件)、初平二年(191)、初平四年(193)等东汉7代皇帝15个年号的26个年份, 纵跨151年。在A、B、C、D四种不同器型的解注瓶中, 只有B型Ⅱ式瓶迄今未见有纪年文字发现。

在上述纪年材料中, 属A型者有陕西咸阳出土明帝之永平三年(60)、河南洛阳之安帝延光元年(122)、顺帝阳嘉二年(133), 陕西户县、河南陕县之顺帝阳嘉四年(135); 属B型Ⅰ式者有陕西宝鸡之和帝永元四年(92); 属D型Ⅰ式者有陕西长安之和帝永元十六年(104)、顺帝之永和六年(141); 属B型Ⅱ式者有陕西户县之顺帝阳嘉二年(133)等, 都是年代较早的。也就是说, 属顺帝以前者, 不同类型解注陶瓶最早出现的年代, 当按D型Ⅰ式、A型、B型Ⅰ式、B型Ⅱ式为序排列。虽然根据无纪年器与纪年器的共存关系考察, 可能某些部分不尽完全吻合, 出入也不会太大。总之, 公元1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明帝初年, 应当是解注器开始出现的最早年代。

如果我们再把后面将要讨论的14件解注券中之6件有纪年的桓帝元嘉元年(151)、延熹四年(161)和灵帝光和元年(178)、光和二年(179)、光和五年(182)、光和六年(183)六个年份也统计在内, 则有纪年的解注器总数可以增加至39件。

三、东汉解注陶容器在墓中放置情况的考察

解注陶瓶, 除了器形、文字和器内所盛物品之外, 它们在墓葬中的位置, 也是我们认识了解有关遗物遗迹作用意义的重要根据, 有必要在上述综合介绍材料的基础上提出来作专门的考察。不过, 有关考古报导材料往往对此并未引起注意, 多数未作交待, 我们只能根据有所介绍的这一部分材料来进行分析, 这是需要说明的。

根据前面述及的有关部分材料看, 解注陶瓶绝大多数都在墓门以内。如偃师县南蔡庄乡东汉后期东西向十字形多室砖墓许氏家族墓, 出土A型和B型Ⅱ式无字解注瓶, 出自东侧室南角, 有附置的道人肥致碑同出。山东济宁东汉晚期大型多室石室墓, 4件无字解注瓶, 放在环绕棺室(后室)回廊的南廊西侧。洛阳唐寺门“永康元年(167)十月”干字形东汉大型多室多棺砖墓出土2件B型Ⅱ式朱书符、文解注瓶, 一件出自右前室靠右上角双棺之右侧, 另一件C型瓶出自左前室下中部靠近双棺下侧及另一棺之头端。

密县后士郭 1 号东汉晚期双十字形大型多室画像石墓 A 型瓶出土后室。另有 B 型 I 式朱书或墨书解注瓶出于南耳室和中室。长安县三里村一座规模较大的东汉砖墓，由墓道、墓道北耳室、甬道、室门、前室、前室北耳室、前室南耳室和后室八个部分组成。墓道耳室出土 A 型无字陶瓶 5 件内盛铅人 2 枚；另有 6 个朱书 D 型 I 式瓶伴出，有纪年可见者为桓帝建和元年（147）。有 D 型 I 式朱书陶瓶 7 件，其中 6 件出自墓道耳室，1 件出自主室（未云为前室或后室）。7 件朱书陶瓶，入葬时间前后不一，主室出土 1 件，有和帝永元十六年（104）纪年，墓道耳室出土者，有桓帝“建和元年（147）”纪年和“以自代铅人”之语。另有 5 件无字 A 型器伴出，其中 1 件内盛铅人 2 枚。此墓亦经多次合葬。总的说来，放在墓门内入口处的情况比较最为普遍。前面提到的陕西咸阳教育学院 2 号东汉墓，由前室、后室、侧室和耳室四部分组成。带墓道、甬道。后室与侧室各有木棺二具。内置双棺之北侧室除一件 A 型无字解注瓶放在棺木北端靠近北壁处之外，另有朱书永平三年（60 年）D 型 I 式纪年瓶和一件 A 型无字解注陶瓶出在侧室与中室交汇处，即由前室进入该侧室的前端。洛阳东郊史家湾东汉墓内盛大量药丸的朱书桓帝永寿二年（156）B 型 II 式瓶，放在墓门口的东南角。宝鸡五里庙 M1 号汉墓，出土 D 型 I 式朱书灵帝光和四年（181）王氏纪年瓶发现时斜倒在墓室门内。潼关吊桥杨震家族墓群，M5 号墓出土 4 件 D 型 I 式朱书解注瓶，放在甬道封门砖内，东西排列。从东数第二瓶上，有朱书灵帝建宁元年（168）纪年。这种情况，与有的瓶文本身的记载相合。陕西西安和平门外汉墓出土献帝初平四年（193）纪年 C 型瓶一件，有“故以神瓶震（镇）郭（椁）门”之语。（唐金裕：《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文物》1980 年 1 期，95 页，图一）“神瓶”即解注瓶，“椁门”即墓内棺室之门，说明解注瓶是放在棺室门内或门外的位置。当然，这个“椁门”，既可以指整个墓葬的大门（包括甬道内），也可以指墓内某一棺室的入口处。

潼关吊桥杨震家族墓群 2 号墓的 5 件 D 型 I 式朱书陶瓶，出土在前室券顶之上，分上下两层放置，间距约 50 厘米，东西并列，上层 2 个，间距约 2 米；下层 3 个，间距约 40 厘米。瓶内装雄黄，有书“中央雄黄利子孙”者^{〔1〕}。该墓解注瓶的位置都未经扰动，完全保持了当年的原状，安放位置特殊。

〔1〕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记》，《文物》1961 年 1 期。

有关材料表明，解注陶瓶在墓葬中的位置，或靠近墓门，或在墓道耳室，或在棺室之内，无论怎样不同，但都是放在墓门之内，如经多次开启墓门合葬，则解注陶瓶亦随之前后数次增放，这是很清楚的。至于潼关吊桥杨震家族墓群 2 号墓有解注瓶被放在墓门外券顶之上，为目前所知的唯一例外材料，或可视为一种蜕变形态。在此，解注瓶虽未放入墓门，但也是在埋葬尸体过程中放入封土之中，如果把封土和墓室也都看成是一个墓葬整体的构成部分，它的位置仍然是在墓内。

上述这一情况的含义，我们留待后文再作讨论。

四、器铭校读与考释

解注陶瓶器文，文字或墨或朱，朱书者最多，亦有用泥浆作颜料书写者，多在书写前先涂抹一层石灰浆作底。字迹一般皆在器之腹部，间有少数书于外底。个别两器配套使用，其文字一器不能尽，续书于另器，或一器著文，另器书符。为了便于观察，我们分成带符形的和不带符形的两类进行考述。

（一）带符形者

1. 1984 至 1986 年间，河南洛阳市区东汉墓出土 A 型瓶 5 件，其中左右各带耳室之 M24 砖墓出土 M24: 145 号瓶朱书解注瓶，“外腹有朱书文字，已漫漶不清，经仔细辨认为：‘延光元年（下水滴形符号未填月份）十四日，生人之死，易解……如律令。’共 7 行 47 字，律令后面还有几个类似道教符咒的符号。”该墓器物分布图及文字叙述均未说明该器在墓中之出土位置，唯发表材料时附有符、书摹本（图版壹：18）^{〔1〕}。器文未全释，仅释其中之 16 字。摹本各行首尾文意多不连属，行末之字当有不同数量的泐脱。从摹本前后文字及他器文例看，报告撰写人所谓之“易解”系“别解”之误释甚明，“别解”乃分别生死以解注的意思，是全文之主题词。又“元年”后之水滴形符号，本应为书写月份预留之空白，因面积太小或其他某种原因，最后未能如实填写而以朱涂填充所致。其余摹字笔画亦尚有未确者。大致可释为：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城发掘队：《1984 至 1986 年洛阳市区汉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七辑，60 页，图九。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 年。

迴光元事 十目
主人三死 易解主
由 属其故家人白展
父正器汝正干日
主人画三鼓 无入
主主上主天梁
自研如得今
崇 崇 崇 崇
崇 崇 崇 崇

图版壹：18

延光元年（符号）十四日（下缺）生人之（？）死，别解。生
[人]自属长安，死人自属丘丞（此或为误摹之衍文）墓，汝□千
日（下缺）；生人食三（五？）谷，死人（下缺）□□□□□□（下
缺）自□。如律令！

全文大概的意思是：东汉安帝延光元年（122）某月十四日，某人死亡下葬，举行解注仪式，从此之后，断绝与生人的接触，生人入生籍，属长安管辖，死人入死籍，归于丘墓之中。生人食五谷粮食，死人食别的什么东西。其后文字残缺，部分笔画脱落不全、模糊不清者，似尚有“生人上高台，死人深自埋”之句。也都是说死者与生人界限分明，不可相犯以为祸殃。上述规定内容，自当严格遵守，有如人间之法律命令。“三谷”疑为“五谷”之误摹或误书。

2. 1972年，陕西户县朱家堡东汉前后室小型券顶砖墓出土阳嘉二年（133）B型Ⅱ式瓶一件，腹部画符，符前朱书，原发掘报告云“十一行，行1~8字不等，共97个字，除五字剥脱不清外，大部清晰。朱书之后，还有画符两道。”（图版壹：19）附摹本图版^{〔1〕}之外，另有释文作：

阳嘉二年八月

己巳朔六日甲戌，徐。

天帝使者，谨为

曹伯鲁之家移

央（殃去咎），远之千里。

咎□大桃不得留

□□至之鬼所，徐

□□。生人得九，死人

得五，生死异路，相

去万里。从今以长

保孙子，寿如金

石，终无凶。何以为信？神葬厌（压）坟，封黄

神地章之印。如

〔1〕 嵇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47页，图六。

陽嘉二年六月
天師使者護
曹伯昌之家
其去者達之
苦者大挑不
得之鬼所
生人得九死
得五生果
去萬里延年
保孫子壽
終無凶何
神爽嚴填封
神聖重之而和律

曹伯昌
天師教書
能

图版壹：19

律令！

其后作者对器文又另撰专文作了考释，个别单字的释文和句读也都有所改变。如改“神葬厌（压）坟”作“神药压镇”，这是正确的。另“阳嘉二年八月己巳朔六月甲戌，徐”去掉逗号，改读作“阳嘉二年八月己巳朔六月甲戌徐”，谓“徐者，缓也。作迟缓解，表明其时是甲戌时辰较晚一些时候。”“咎□大桃不得留”，改释为“咎印大桃不得留”，谓“咎印大桃”乃“桃印止邪”之意^{〔1〕}。细审摹本材料，这些释文便大有可商之处了。今改释为：

阳嘉二年八月己巳朔，六月甲戌，[直]除。天帝使者谨为曹伯鲁之家移殃去咎，远之千里。咎(?)□大桃不得留，□复重之鬼，不得□□。生人得九，死人得五，生死异路，相去万里。从今以长，保孙子寿如金石，终无凶。何以为信？神药压镇，封黄神越章之印。如律令！

古代建除家将一月之三十日分属建、除、满、平、定、直、破、危、成、收、开、闭十二日值，定行事吉凶以供选择，后来为道教所汲收，道书多有记载。《赤松子章历》卷一《五音呈章利用》篇即有记载云：“建日可呈章九通，除日可呈章十二通，满日可呈章六通，平日可呈章十七通，定日可呈章十七通，执日可呈章五通，破日可呈章七通，危日可呈章十二通，成日可呈章十八通，收日可呈章百二十通，开日可呈章百二十通，闭日可呈章五通。”^{〔2〕}发表该墓出土材料时，释“除”为“徐”，显误。又“□□至之鬼”，审摹本当释为“□复重之鬼”，复重之鬼即注鬼。“复重”即“重复”。对于汉晋墓解注器文中的“重复”二字，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界认为“最难解释”，“历来无解”^{〔3〕}。后来有人引《太平经》之文，以道教“承负”解之^{〔4〕}；有人“以为这是指生人与死者的某种相同或联系，古人以为

〔1〕 糕振西：《曹氏朱书罐考释》，《考古与文物》1982年2期。

〔2〕 《道藏》十一册，179页

〔3〕 连劭名：《建兴二十八年“松人”解除简考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3期。

〔4〕 刘昭瑞：《〈太平经〉与考古发现的东汉镇墓文》，《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4期。

这种联系会给生人带来不幸，故为解除。”^{〔1〕} 承负之说不能成立，已于前论。“重复”指生人与死者的某种相同或联系，大方向是不错的，但具体所指为何，并不明确。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论，实际上“重复”就是前面的死者感到冤屈，或在冥世不堪折磨，回到阳世以自身受害同样的方式祟害生人，或兴冥讼牵引，把自己的灾难转嫁他人，使生人重复受害。“天帝”，是古代人们思想观念中上天的最高尊神，将在后面解注器文所反映的神系问题部分详论，暂不赘言。“神药压镇”，是用药物制服死鬼以解墓注，与前据文献考论相吻合。原释“神葬压坟”，不唯文意无解，“葬”、“坟”二字之释，与字形笔画亦不相符。“封黄神地章之印”乃“封黄神越章之印”的误释，作者另文已加更正。“黄神越章之印”，传世古印谱多见著录，学界多有考说，天师道实多用之，容后详论。此文述隔绝生死以解注，至为明白。唯言以“神药压镇，封黄神越章之印”，是瓶中盛有解注之药物，再以黄神越章印泥封瓶口，为极珍贵之解注术实证材料。

3. 1987年，陕西临潼斜口乡东沟村一前、后、侧三室东汉砖墓，出土的一件D型Ⅱ式解注陶瓶，“腹部朱书十一行约一百二十余字。朱书开头有道家符箓。文字部分脱落，残缺不全。”简报附有朱书摹本（图版壹：20）^{〔2〕}及释文。原释文未加标点，过录如下：

初平元年七月□□初□□

田□支奉谨为刘氏之冢□

去皇男字阿属解诸句□□

诸句校岁月日句校天地句校□

校解时日复重句校解死□□

□□□死人佼随地下拾□□

□□□□□□阳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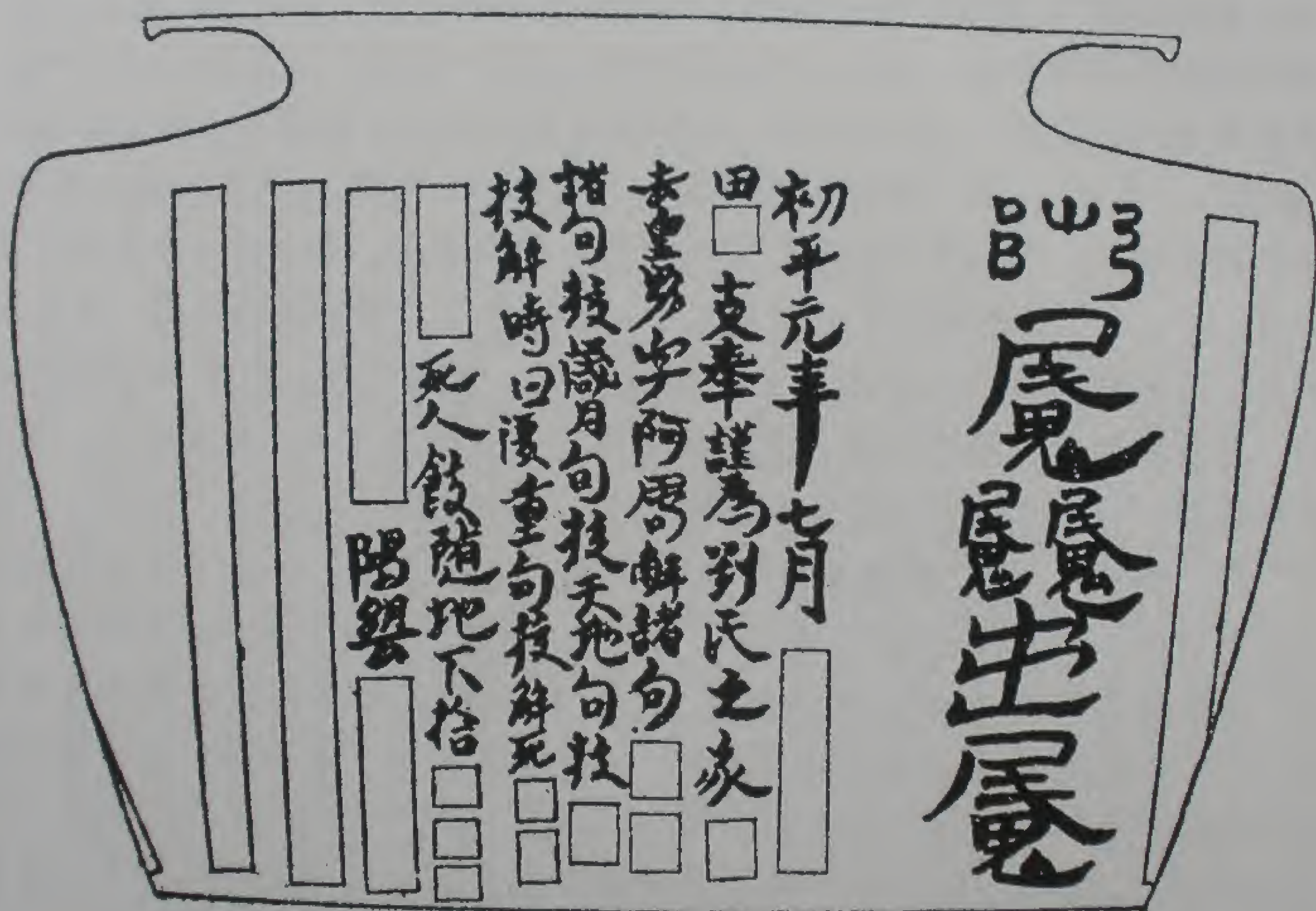
（以下二行注蚀文二十四字不录）^{〔3〕}

据摹本参考他器材料，当释读如下：

〔1〕 王育成：《南李王陶瓶朱书与相关宗教文化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1996年2期。

〔2〕 林泊等：《临潼发现汉初平元年墓》，《文博》1989年1期，41页，图十。

〔3〕 林泊等：《临潼发现汉初平元年墓》，《文博》1989年1期。



图版壹：20

初平元年七月□□初□□男□支奉，谨为刘氏之家□（死？）
 去皇男字阿属解诸句（钩）校（？）。解诸句（钩）校：岁、月、日
 句校，天、地句校，□校（？）。解时日复重句校，解死□□□□□
 死人□食（？）随地下拾□□□□□□□□阳□□□□□……

“句校”一词，亦见于其他解注器，或作“钩校”、“枸校”、“拘校”，如后录洛阳唐寺门桓帝永康元年（167）墓出土瓶文云：“雄黄神药，绝钩注重复咎殃，便死利生”；长安三里村墓出土桓帝建和元年（147）加氏瓶文云：“或同岁月重复钩校日死，或同日鸣重复钩校日死”；南李王村墓瓶文“别解张氏后死者句注重复”，皆属其例。古代解注瓶文中之“钩校”一词，或写作“句校”、“拘校”。盖“钩校”、“枸校”、“句校”、“拘校”，实皆一词之异写。如果脱离瓶文，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引出异议。有人引《太平经》卷一百一十：“天遣神往记之，过无大小，天皆知之。簿书善恶之籍，岁日月拘校，前后除算减年；其恶不止，便见鬼门。地神召问，其所为词语同不同，复苦思治之，治后乃服。上名命曹上对，算尽当入土，愆流后生，是非恶所致邪？”^{〔1〕}以其文与出土东汉镇墓文“句式相同”，认为“句校”、“钩校”即“拘校”，乃“搜集考校”之意，指“人死之后，在地下所要受到的阴间官吏的一种盘问过程”。解除“句校”，就是“免去了阴间官吏的钩求考校，也就免去了人生在世时的承负之厄，所以镇墓文要替死者禳解各种拘校。”^{〔2〕}东汉许慎《说文》卷十四下：“戊，中宫也，象六甲、五龙相拘绞也。”段注云：“六甲者，《汉书》‘日有六甲’是也。五龙者，五行也。《水经注》引《遁甲开山图》曰：‘五龙见教，天皇被迹。’荣氏注云：‘五龙治在五方，为五行神。’鬼谷子盛神法‘五龙’，陶注曰：‘五龙，五行之龙也。’许谓戊字之形，象六甲五行相拘绞也。”饶宗颐有《记建兴二十八年“松人”解除简——汉“五龙相拘校”说》之文，据此以为说^{〔3〕}。我们认为，瓶文“解诸句（钩）校：岁、月、日句校，天、地句校”，“解时日复重句校”，“绝钩注重复咎殃”，“同岁月重复钩校日死”，“同日鸣重复钩校日死”，此中之“钩校”、“句校”、“拘校”，确与阴司拘检有关。但理解解注器

〔1〕 王明：《太平经合校》，526页。

〔2〕 刘昭瑞：《〈太平经〉与考古发现的东汉镇墓文》，《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4期。

〔3〕 饶宗颐：《记建兴二十八年“松人”解除简——汉“五龙相拘校”说》，《简帛研究》第二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

文之“句校”一词，必须考虑到它是在墓葬出土解注器文这一特定场合中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经常和“重复”连在一起出现，或将“句”字与“注”字联称“句注”。“雄黄神药，绝钩注重复咎殃”，还把断绝钩注咎殃和使用药物之事扯上了关系。陕西长安县韦曲镇少陵原南李王村东汉墓出土朱书神符瓶文又曰“别解张氏后死者句注重复”。^{〔1〕}凡此等等，无论用星名还是用一般意义上的阴间官吏钩求考校或五行之龙来解释，也都很难相吻合。它们和墓主葬埋“重复”的事连在一起，是直接从生人与死者的关系角度来考虑问题，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拘检，而应与复连（钩连）相注的意思有关。又道书文献的“拘校”虽多与拘禁考校之义有关，但有时将之写作“句（钩）绞”，或当更有其他含意。如《赤松子章历》卷五《大醮宅章》：动土兴工，惊动宅上诸神等，“奏请宅中四面八方、内外十二时辰，二十四禁忌，土公、太岁大将军，太阴天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句绞岁月，大小二耗……即日应章上达……并请安稳，无合触犯。”^{〔2〕}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二《南岳魏夫人生算虞厄章》：“或有年穷算尽之厄，魁纲加临之厄，元辰句绞之厄，五行相剋之厄”^{〔3〕}。将“句绞”与“岁月”、“元辰”连在一起，将“元辰句绞之厄”与“五行相剋之厄”区别开来，皆与器文应有之义相吻合。本器文“句校□校”，后面的“□校”，审其意，当指因与天、地、岁、月、日相关之凶事牵连受害，“校”字作“绞”，应取本字牵连缠绞之义解之。此器当为献帝初平元年（190）七月某日，男姓死者刘阿奉下葬时，其家男子刘支奉为之举行解除天、地、月、日、时重复祸殃的宗教仪式所为。考虑到墓主阿奉可能是因为触犯天、地、日、月、时刻之凶忌而死，不甘其祸，欲另取生人魂魄作为替代，或在冥世兴讼让鬼神前来纠缠生人，或自己变成注鬼直接回到阳世以同样的方式注害家中生人。针对这种情况，在下葬时举行解除墓注的宗教仪式，预防墓主刘家生人遭其注祟。符、文相连环器腹书写，按照其他此种器物 and 买地券材料看，除少数仅作一圆饼形之简单符形置于文前而外，凡内容繁复者皆置于行文之后，简报编者不谙其例，以为符在文前者误。又符中有四符书，颇似尾、鬼二字相连之形，他器神符亦多见其例，此“尾”上部有尸字头，当为尸鬼之意。盖此符置于墓中

〔1〕 王育成：《南李王陶瓶朱书与相关宗教文化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1996年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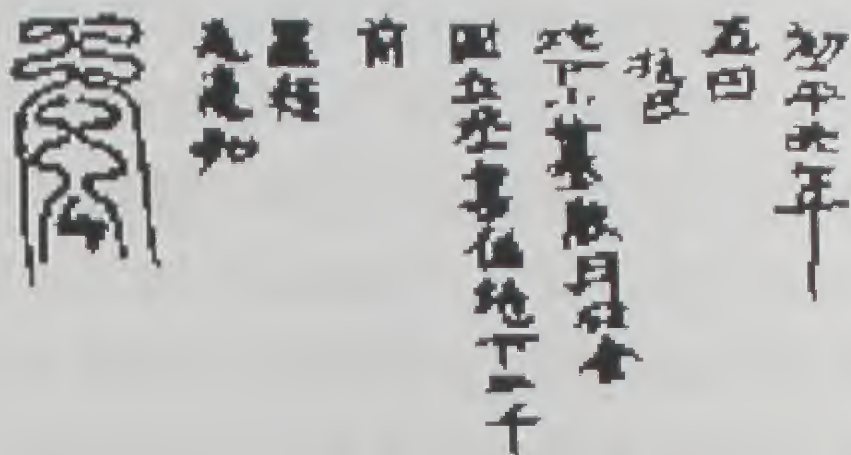
〔2〕 《道藏》十一册，215页。

〔3〕 《道藏》十一册，314页。

随葬之器物以解除尸鬼注，应是一道解“尸注”符。

4. 西北大学藏西安汉城东汉墓出土初平元年（190）D型Ⅰ式朱书解注瓶一件，腹部朱书九行约八十字，残脱严重，末尾画有道家符箓。发表材料时附录摹本及释文（图版壹：21 器形）^{〔1〕}、（插图壹：3 符文本摹本）^{〔2〕}。

过录原释文如下：



插图壹：3

初平元年□□

五日□□□□□□□

□孙氏□□□□□□□

地下小墓岁月破仓□□

固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

前〔亚〕□□□□□□□□

星经□□□□□□□□

□□□□□□□□□□

急急如〔律〕令

发表材料时考释指出，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亦见于其他东汉墓出土地券及镇墓陶瓶，“固”当作“告”，器文与符箓皆具道家性质；“星经”“可能是道家所说的星象或记星象之书”，这些都是正确的。唯文末意补“律”字之后应尚有一“令”字。又释“岁月破仓”，云：“岁月犹言年月”，“破仓”二字含义未作解释。实际上，“仓”字笔画本不完整清晰，此释未确，以存疑为是。王充曰：“俗人险心，好信禁忌……《移徙法》曰：‘徙抵太岁凶，负太岁亦凶。’抵太岁名曰‘岁下’，负太岁名曰‘岁破’。”“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为岁在子位，子者破午，南北徙者，抵触其冲，故谓之凶。夫破者，须有以椎破之也。”“如以太岁神，其冲独凶，神莫大于天地，天地相奥

〔1〕 高大伦、贾麦明：《初平元年朱书镇墓陶瓶》，《文物》1987年6期，71页，图一。

〔2〕 高大伦、贾麦明：《初平元年朱书镇墓陶瓶》，《文物》1987年6期，71页，图三。



图版壹：21

为冲……或上十二神，登明、从魁之辈，工伎家皆谓之天神也，常立子丑之位，皆有冲抵之气。神虽不若太岁，宜有征败。移徙者虽避太岁之凶，犹触十二神之害。”^{〔1〕}所谓“十二神，登明、从魁之辈”，即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之神。“岁月破”连字成词，当读为“岁、月破”，指干支之岁破与月破而言，谓墓主（可能即文中所说的“孙”氏）死亡的年份与月份，按《星经》之说，与本命相冲破，犯忌不吉。恐因此而发生注祟，故为解除。文中提到的《星经》，为他器材料所未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纬书《易乾凿度》卷下：“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郑玄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往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游，息于紫宫之内，其星因以为名焉。故《星经》曰：‘天一、太一，主气之神。’行，犹待也。四正四维，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宫。天一下行，犹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卒则复。天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谓之九宫。”^{〔2〕}器文所说的《星经》，当即郑玄所引者，星辰属天神范畴，故与解注发生联系。钱宝琮《太一考》以为《星经》系“东汉时晚出”之书^{〔3〕}，与器文年代亦相合。

5. 1970年，河南洛阳唐寺门出土 M1：64 号“永康元年（167）十月”纪年简瓦之 M1 号一干字形东汉大型多室多棺砖墓，共出土带字和无字 B 型 II 式和 C 型陶瓶 5 件。出自右前室靠右上角双棺右侧属 B 型 II 式的三器，按其大小形制和在墓室中的位置，明显分为两组，其中带字的 M1：65 和 M1：66 为一组，不带字的 M1：106 另属一组。两组器物随葬的墓主和入葬的年代应有早晚之别。M1：65 号器，“腹和底用白粉书写文字，有的字已模糊不能辨认”，附有摹本图版（图版壹：22 腹）^{〔4〕}、（图版壹：23 底）^{〔5〕}。实际上，此器墨书全为繁复之符形而非一般汉字，是 M1：66 号器汉字的附属部分，两器配合成套使用。M1：66 号器腹部朱书文字十四行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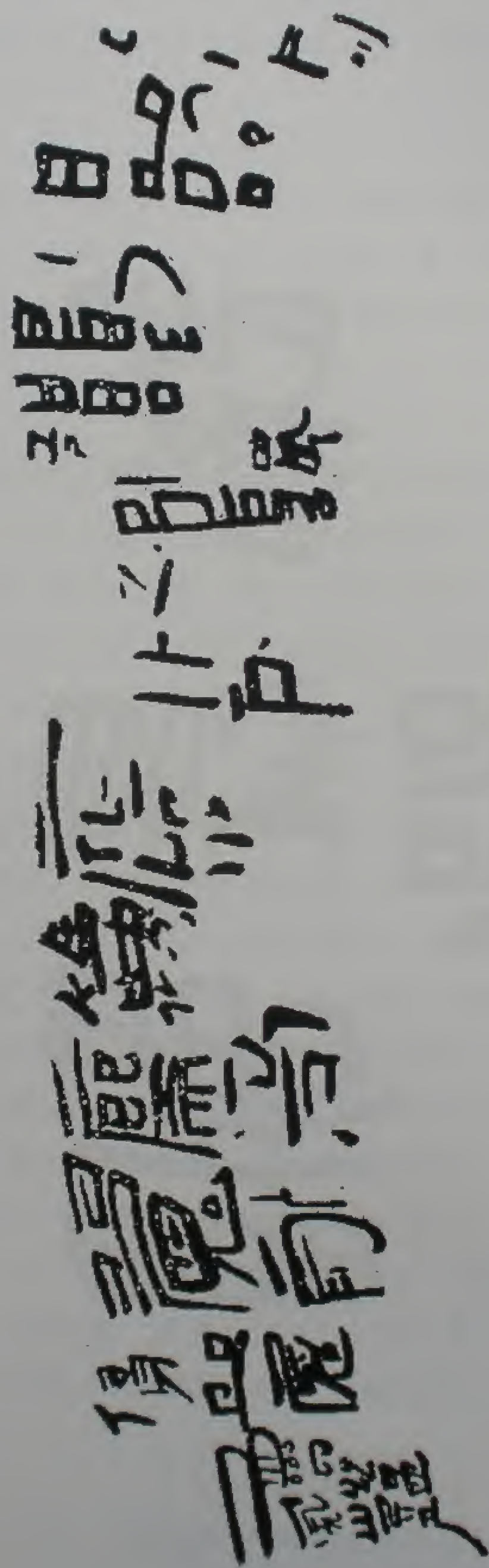
〔1〕（汉）王充：《论衡·难岁篇》。

〔2〕（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32 页。（《四库全书》收有此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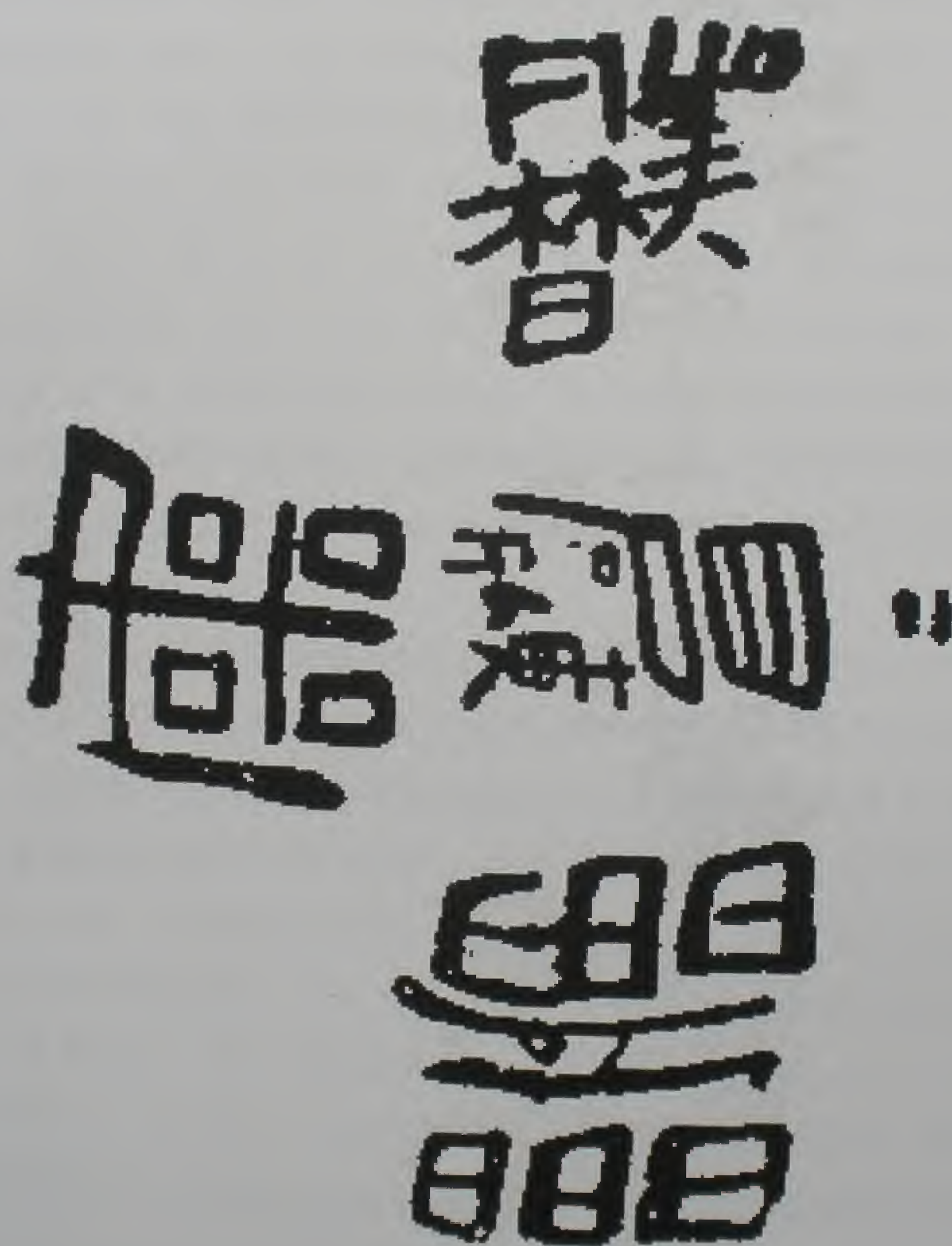
〔3〕《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202～230 页。又载钱宝琮：《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231 页。

〔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寺门两座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 年 3 期，38 页，图五，2。

〔5〕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寺门两座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 年 3 期，38 页，图五，1。



图版壹:22



图版壹：23

六十字，简报未作释文，仅附摹本图版（图版壹：24）^{〔1〕}，因文字环绕器腹书写，摹写者不解文意，不识首尾，误以第二行“告天上使”为第一行，而将仅一“者”字之第三行列于全文之最末一行，颠倒错乱，至为严重。今据摹本字迹，释读如下：

天帝□□告天上使者、凶之吏：今有小杜（社？）里□氏后死
子凡□十一算，建解。众（家）为距（具）五石瓶十八物，雄
[黄]神药，绝钩注重复咎殃（殃），便死利生，不得相防（妨）。
如律令！

“天上使者”即他器所称之为“天帝使者”或“天帝神师”。“凶之吏”为专司与人除凶殃之神吏。“十一算”，谓墓主死时年龄。“算”为道家计寿命之单位，或十二年为一算，或三年为一算，各家说法不一。若以三年为一算计之，则死者□氏逝年为33岁。咸阳东汉墓出土永平三年解注瓶有“建立大镇”之语，此处文中“建解”的“建”字，当作建立解，“建解”是指下葬时举行解墓注仪式的意思。“五石”写作五、石合文。五石，乃古之所谓仙药。《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十一《炼药使不散法》：“五石者，丹砂太阳之精也，磁石太阴之精也，曾青少阳之精也，雄黄石上之精也。感阴阳之正气，配五方之正位，能相制伏，无所发动，调炼去毒，故能令人不死者。”^{〔2〕}《抱朴子内篇·金丹篇》云：“五石者，丹砂、雄黄、白晷、曾青、慈（磁）石也。”^{〔3〕}吴荣曾文已略提及而言之未详。何以将五石置于墓中以为压镇神药，前引道书记载有关药物解注术已有论述，后面我们还将作更进一步的说明。五石在此，与雄[黄]等十八种材料，皆为盛于瓶中“绝钩注重重复咎殃”之“神药”。雄黄，《神农本草经》卷三：“雄黄……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4〕}；《图经衍义本草》卷三：“雄黄……有毒，主……癖气中恶，腹痛鬼疟，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胜鬼神”。又引《太上八帝玄变经》：“小丹法，用雄黄、柏子拘魂制魄方……服……百日之后，

〔1〕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寺门两座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年3期，38页，图四。

〔2〕 《道藏》十八册，826页。

〔3〕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注》，78页。

〔4〕 （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21页。

者
四世玄台
曹小姑王女
比陵死子男
三十二天童
并来居此
要根子(功)
雌神藥
純金注玉
漢君央使
死利主
相防池如
天帝白止
若天上使

图版壹：24

与神人交见。”^{〔1〕}“家为具五石瓶十八物，雄〔黄〕神药，绝钩注重复咎殃”，是说墓主某氏的家人，备办了盛入由雄黄之类的十八种药物构成的五石神药陶瓶，以作解除复注祸殃之用。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熹平四年（175）胥台陶瓶有“天帝日止镇律令”语，亦在文首，其“日止”二字写法应与此器相同。然“日止”之释与字形不合，宜作存疑处之，审其义，大抵与告、命一类之词有关。由此文首内容看，系以天帝的口吻向道士和神吏发布的命令告文，与他器文之以“天帝使者”、“天地神师”开头者有所不同。此器有文无符，而 M1：65 号器有符无文，符形满布器腹器底。二瓶不仅器形、大小相同，同室出土，位置亦极接近，显系 M1：66 号瓶书文之后更无空白可容符形，故另以 M1：65 号瓶书符续之者。两瓶成对配套使用，颇具特点。王育成《文物所见中国古代道符论述》于 M1：65 号瓶符形材料曾有论说，但有关 M1：66 号器文则未涉及，未明二器配套使用之关系，许多问题无从深入。

6. 1972 年，陕西户县城区医院一大约为东汉灵帝年间的小型土洞墓，出土解注陶器四件，其中 D 型 I 式解注瓶一件，高 20、口径 7、唇宽 3、底径 7 厘米，瓶身朱书四行十八字，文之右上方朱绘一大圆饼（图版壹：25），文字保存完好，字迹清晰。^{〔2〕}文曰：

太阳之精，随日为德，利以丹砂，百福得。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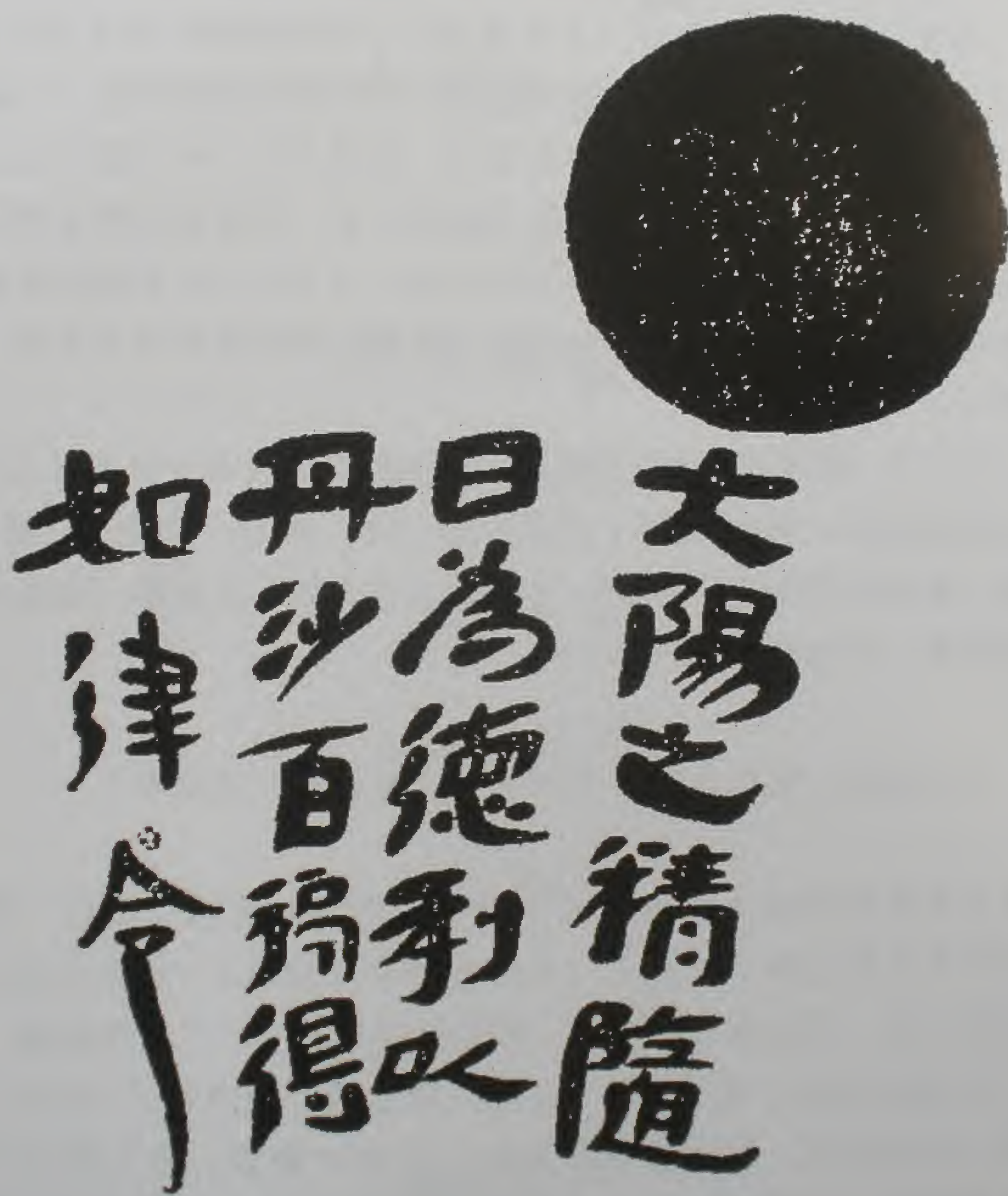
报告作者以为朱绘圆饼为太阳，结合器文内容看，可信，实为一简单的符形。以丹砂为太阳之精，见前引《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丹砂太阳之精也”。丹砂为太阳之精，其说源于纬书。《河图汗光篇》云：“日为阳精，始日实也。”^{〔3〕}《上清道宝经》卷二云：“日者，阳之精，德之长。”注曰：“德者，万物归焉。日出东方，万物亦出于东方；日盛于南方，日入西方，藏于北方，万物皆随之。日家在南，位在午，五月阴气起于内，小杀也。”“日精赤，丹炉丹气”。^{〔4〕}此即瓶文“太阳之精，随日为德”之义。丹砂本为道家服饵之仙药，《抱朴子内篇》卷十一《仙药篇·饵丹砂法》：“丹砂……服之

〔1〕《道藏》十七册，298、299 页。

〔2〕 嵯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 年创刊号，47 页，图七。

〔3〕（隋）肖吉：《五行太义》第十六《论七政》篇引。

〔4〕《道藏》三十三册，711 页。



图版壹：25

千日，司命削死籍，与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变化无常。”〔1〕但在此随葬于墓中，则非用于服饵，而为与上述瓶文中之雄黄五石同为压镇解墓注之“神药”。《神农本草经》卷一：“丹砂……养精神，安魂魄，……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能化为汞。”〔2〕《图经衍义本草》卷一：“丹砂……无毒主……养精神安魂魄……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轻身，神仙。能化为汞。”〔3〕墓鬼尸注被解除镇伏，不为人崇害，故言“百福得”也。此墓共仅出器物四件，除此瓶而外，其余三件为形制大小相同之A型解注瓶，虽无符、文，可能当初瓶中也盛有丹砂或其他解注药物，与此器配合使用，也是值得注意的。

7. 1987年，陕西长安县韦曲镇东北少陵原南李王村M5号东汉晚期十字形大型多室砖墓（有前、后室和两侧耳室）出土M5：5号D型I式瓶一件，高20.8、口径6.2厘米，器腹有朱书文字七行，文后画两行大神符〔4〕。器铭简报未作释文，附有摹本图版（图版壹：26）。王育成释读其文作：

游光、地柱、南组、北斗、三
 稻、七星，主别解张氏
 后死者白伍重复。
 □攷持铅人、人参、雄黄，
 解住襄草别羈，以
 代生人之名。急如律令！〔5〕

我们认为，根据摹本字形，参考他器材料当释读如下：

游光、地柱：南极（？）、北斗、三稻（台）六星，主别解张氏
 后死者句注（或伍即忤？）重复。□持铅（铅）人、人参、雄黄，
 解住（注）襄（襁？）草（？），别羈以代生人之名。急如律令！

〔1〕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210页。

〔2〕（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24页。

〔3〕《道藏》十七册，274页。

〔4〕负志安等：《长安县南李王村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4期，69页，图五。

〔5〕王育成：《南李王陶瓶朱书与相关宗教文化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1996年2期。

唱

三毛

氏生人之名急如律令
解佳章
張精到人病重
張死者的伍重
張生別解
張氏三

由于原器字迹模糊，笔画脱落，摹写颇有不够准确之处，“六星”之“六”字，摹本右旁最后尚有一点画，略似“女”字残缺之形，当释六而不应释七。吕、台二字字形本极相近，书写人妄加禾字旁，遂成今形。三台星座共六星，正相吻合。释六为七，不唯与字形笔画不符，北斗始为七星，在“北斗”之后又另外来上一个“△△七星”，显然是讲不通的。又南极、北斗、△△六星，相连三事，所列皆属星官之名，谓“南组”系南极老人星与南斗的合称，“三稻”是指三种嘉禾。把“三稻”释成三种嘉禾，令人更难理解。“组”字笔画摹写当有讹误。全文意为警告以游光、地柱为代表的厉鬼：有南极、北斗，三台等星官，为墓主张氏家人主分别死生，解除“句伍（忤）重复”注殃之事，用铅人和人参、雄黄作为代人和辟鬼的神药，以免死者变成注鬼或兴冥讼按姓名注祟、纠缠生人，羁系其魂魄代其受害。同时用上了铅人与人参，根据另器“人参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的说法，这里的铅人是用来代替墓主死魂以免幽谪，绝注鬼之源，人参则是代替家中生人，以防一旦注鬼出现代其受注的。“白伍重复”，于义无解。细审摹本材料，所谓的“白”字，原写作勺字下一倒三角形▽，当释为“句”字甚明，即“钩”字之省写。所谓的“伍”字，左旁笔画本来略有残缺，不能肯定作人，“五”字虽似清晰，从文意考虑，摹写或有失真之处。洛阳唐寺门 M1：66 号瓶有“绝钩注重重复咎央（殃）”之语，“伍”字当释为“注”。盖“注”字与“伍”，从左旁之三点水与人旁，右旁之“五”与“主”，到整个字形，二者都极相近，若字迹稍有模糊，极易误摹误释。又文献多见“注忤生人”之语，若“伍”字之释不误，则当为“忤”字之同音别写。隋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卷二十三《中恶病诸候》：“卒忤候：卒忤者，亦名客忤，谓邪客之气卒犯忤人精神也。此是鬼厉之毒气中恶之类。人有魂魄衰弱者，则为鬼气所犯忤，喜于道间门外得之。其状心腹绞痛胀满，气冲心胸，或即闷绝，不复识人，肉色变异，府藏虚竭者。不即治，乃至于死。然其毒气有轻重，轻者微治而瘥，重者侵克府藏，虽当时救疗，余气停滞，久后犹发，乃变成注。”〔1〕古代医家所称之“忤”病与“注”病虽似有别，但实际上似亦为传染病之一。忤病亦“为鬼气所犯忤”，无论忤病还是注病，都同样是鬼气为祟所致。“虽当时救疗，余气停滞，久后犹发，乃变成注”，还可由忤病转变为注病，至少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参考上述洛阳唐寺门汉墓器文“绝钩注重重复咎殃”之例，“钩伍”当释作“钩注”或“钩伍（忤）”。无论释“钩注”

〔1〕《巢氏诸病源候总论》卷二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734 册，719 页。

或“钩伍（忤）”，也都是指墓注而言。器文称“主别解张氏后死者句注重复”，此瓶为后来再次葬入之人而设，与墓制为多室合葬者相合。如此者，前述已见数例。

8. 1954年，河南洛阳西郊汉河南县城遗址出土朱书A型瓶一件，符形之后有文四行九字（图版壹：27）^{〔1〕}，文曰：

解注瓶，百解去。如律令！

此器材料早已为学界所熟知，字迹保存完好，文义甚明，无用赘释。只是原报告说是在遗址地层中出土，最近有人说是出自墓葬。无论怎样，其形制与墓葬所出者完全一样，这是很清楚的，所以放在这里一起讨论。

9.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1957年陕西长安三里村出土东汉D型I式陶瓶一件，外腹朱书符、文，符上文下，符作柄右魁左之北斗星形，星间有短弧线相连，斗勺中书“北斗君”三字。符下四行文字（图版壹：28）^{〔2〕}。发表材料时未说明出土情况，似应为墓葬所出者。文字部分，原释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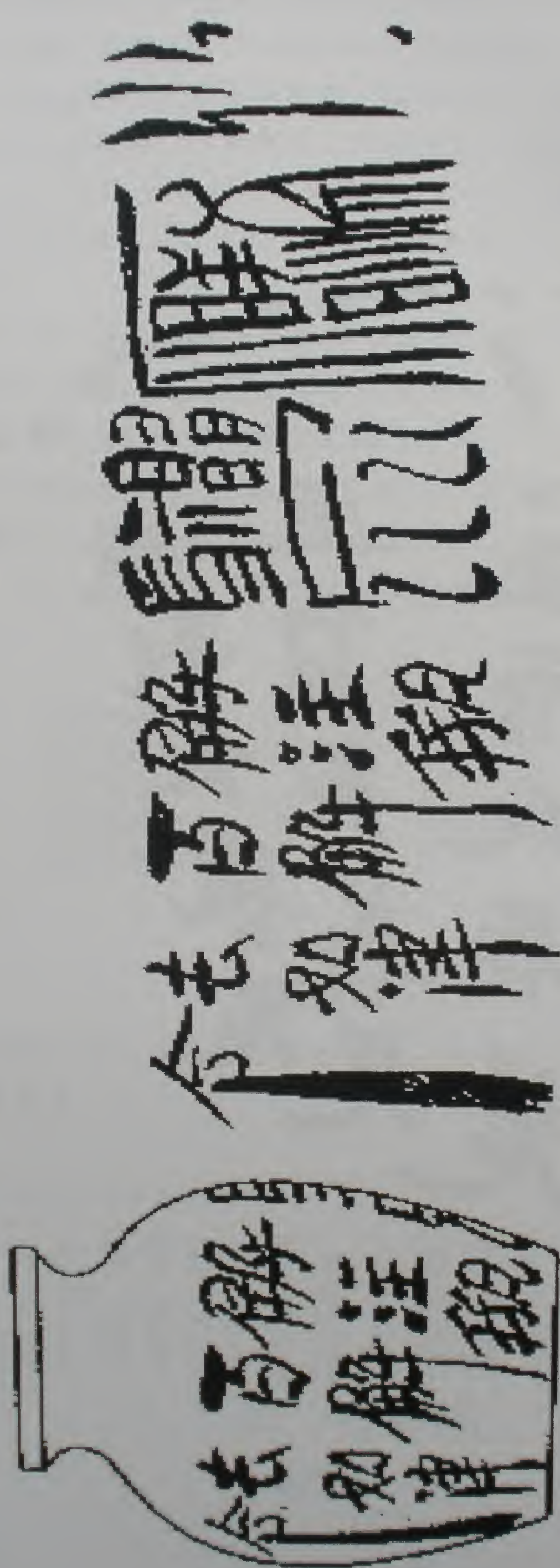
主皇（星）死荅（咎）鬼
主帀（师）死荅（咎）鬼
主白（自）死荅（咎）鬼
主乳死荅（咎）鬼

王育成释“乳死”为天死，“自死”为自杀死，“师死”为战争中被杀而死，都是正确的。但说：“‘星死’，星当是刑字的同音假借，指受过肉刑、形体亏损者”，以为“星死”即“刑死”，这便值得商榷了。我们认为，“星死”乃犯灾星而死者。《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卷一《收死人耗害章》云：“都星君一人，官将一百二十人，治青盖室，主解星死，断绝复连”；“都宫君官将……主收某家中星死血亲之鬼……断绝之”^{〔3〕}，皆可为“星死”即犯灾星而死者之证。他器常见墓主死日不吉，“适值八魁九坎”之语，八魁、九坎皆

〔1〕 郭宝钧等：《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2期。

〔2〕 王育成：《南李王陶瓶朱书及相关宗教文化问题研究》，《考古与文物》1996年2期，62页，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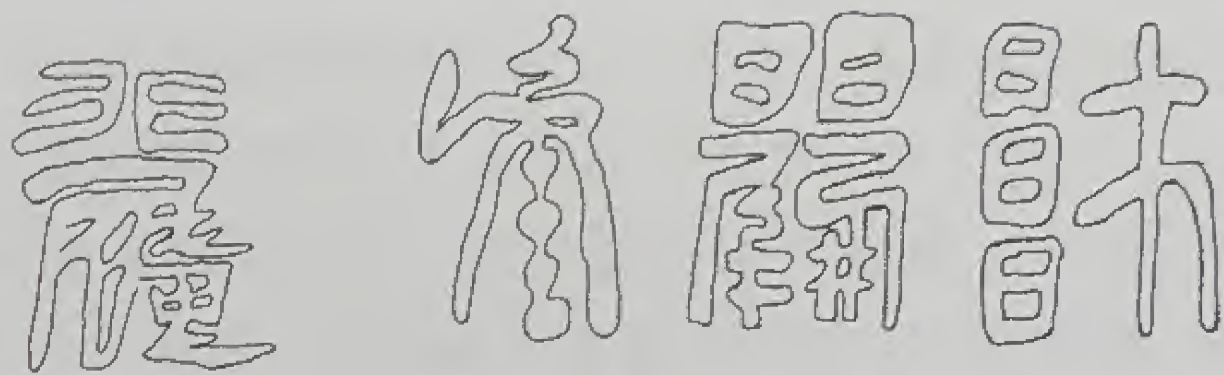
〔3〕 《道藏》二十八册，539页。



图版壹：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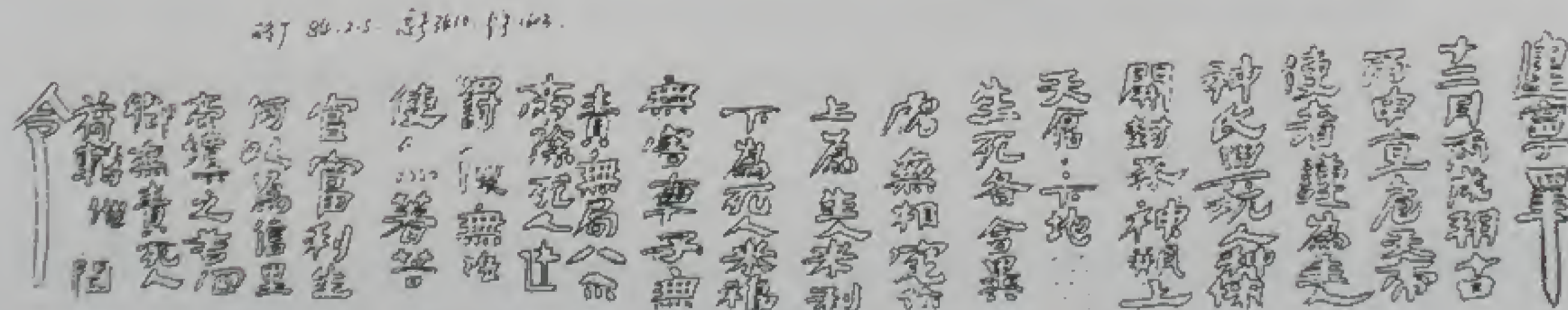
为星名。与前录西北大学藏器文言及之《星经》，皆同属与星死鬼有关的材料。东汉人行事，忌避极多，动辄忤犯，疾病死亡。如王充说：“世俗信祸福，以为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戳辱欢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丧葬，行作入宫嫁娶，不择吉日，不避岁月，触鬼逢神，忌时相害，故发病生祸，絪法入罪，至于死亡，殫家灭门，皆不重慎，犯触忌讳之所致也。”〔1〕汉代因犯触星忌，灾星为祟而“至于死亡”造成星死鬼的说法，本来是很流行的。

10. 1995年，我们到河南洛阳为洛阳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讲课，到河南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参观，得见所藏1994年河南偃师县沟头六队砖厂1号东汉墓出土M1：1号B型Ⅱ式解注瓶一件，外腹取对称位置朱绘神符四道，符形较大，笔画较粗。符中含有日、月、解、尸、鬼等字，但与他器所见神符内容不同，当为解墓注符之另外一种符形（插图壹：4）。神符之外，别无其他普通汉字，可能与上述洛阳唐寺门汉



插图壹：4

墓M1：66号器与M1：65号器情形相同，系与另一专门书写解注文的瓶器配套使用（插图壹：5）。



插图壹：5

〔1〕（汉）王充：《论衡·辩崇篇》。

11.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传世陕西蓝田县出土 D 型 I 式朱书符文瓶 1 枚, 高 23、口径 8.5、肩径 7 厘米, 惜字、符笔画大部模糊不能辨识^{〔1〕}。

以上 11 件带神符之解注瓶, 计 A 型 2 件, B 型 II 式 2 件, C 型 1 件, D 型 I 式 5 件, D 型 II 式 1 件, 目前只有 B 型 I 式和 D 型 III 式两种未发现带有神符。以地域分布而论, 这 11 件带神符的解注瓶分布以汉代两京地区为中心, 包括了河南的洛阳 (共 3 件两个地点)、偃师, 陕西的西安、长安、蓝田、临潼、户县 (2 件两个地点) 等两省七县市地区, 而以陕西所占数量最多。以时代而言, 有纪年的仅 4 件, 包括了安帝、顺帝和献帝三代皇帝统治的延光、阳嘉和初平三个年号, 最早的是河南洛阳市区的安帝延光元年 (122), 其次是陕西户县的阳嘉二年 (133), 最晚的是献帝初平元年 (190)。1980 年代初, 吴荣曾曾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材料指出说: “符的出现最迟不能晚于桓帝元嘉元年 (151)”^{〔2〕}, 新的考古发掘材料, 已将道符实物的年代提前了四代皇帝整整 30 年!

(二) 不带符形者

不带神符的解注文陶瓶, 根据正式发表的准确纪年材料, 最早的是明帝永平三年 (60)。除此之外, 年代较早的尚有陕西宝鸡斗鸡台采集汉墓出土和帝永元四年 (92) A 型瓶^{〔3〕}和陕西长安三里村汉墓出土和帝永元十六年 (104) 朱书瓶。陕西长安三里村汉墓系“由前室、后室、左右耳室、甬道及墓道组合而成”的多室砖墓, 曾经多次合葬, 共出土 D 型 I 式瓶 7 件及无字 A 型瓶 5 件 (其中一件内盛铅人)。其中, 和帝永元十六年 (104) 朱书瓶者文字大部脱落或模糊不清, “仅能看到‘永元十六年十二月庚戌……死者, 死者壹去……不返□皇……’等字。”而另瓶则有桓帝建和元年 (147) 纪年及“以铅人自代”字迹可见。简报发表, 皆未附文字摹本材料^{〔4〕}。前者云死者一去不返, 谓死生永隔; 后者言死者以铅人作替代, 皆东汉墓解注器文习见之语, 瓶中 (或另瓶) 原当盛有铅人, 年久腐蚀无存。保存器文较多者, 所见有以下若干器:

〔1〕 谭旦同:《陶瓷汇录》, 14 页原器照片图版。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1991 年。据渡步武等《镇墓文衣物疏·资料篇·镇墓文、衣物疏集成 (初编)》14 页转引。

〔2〕 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文物》1981 年 3 期。

〔3〕 王光永:《宝鸡市发现光和与永元年间朱书陶瓶》,《文物》1981 年 3 期, 56 页, 图六、七。

〔4〕 陕西省文管会:《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 7 期。

1. 陕西咸阳教育学院 M2 号东汉砖墓在前室与侧室交会处出土 M2: 20 号永平初三年 (60) D 型 I 式陶瓶一件, 内盛一 4 厘米长的白石条, 一长 2 厘米的黄色石块, 和三颗蓝色、青灰色小颗粒。在甬道进入前室处出土 M2: 26 号铅人 9 枚。陶瓶外腹朱书八行 (插图壹: 6)^{〔1〕}, 刘卫鹏释其文曰:

插图壹: 6

永平初三年十月
九日丙申黄神使者□地置
根为人立先除央去咎利后
子孙令死人无适生人无患
建立大镇慈举雄黄曾青
丹砂五石会精宸药辅神
冢墓安宁解菰□草
为盟如律令^{〔2〕}

发表瓶文材料无原器照片, 仅具双钩摹本, 有者文义难通, 可能出土时个别单字笔画不甚清晰, 颇疑摹写隶定有不够准确者。今试作校读如下:

永平初三年十月九日丙申, 黄神使者买地置根, 为人立先, 除央 (殃) 去咎, 利后子孙。令死人无适 (谪), 生人无患。建立大镇, 慈、举、雄黄、曾青、丹砂, 五石会精, 宸 (?) 药神, 冢墓安宁。解菰□草为盟。如律令!

关于瓶文含义的解释, 刘卫鹏《汉永平三年朱书陶瓶考释》所论多有可从之处, 如以为“□地置根”应补作“买地置根”, 是完全正确的。唯涉及道教

〔1〕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教育学院汉墓清理简报》,《文物考古论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233页,图六。

〔2〕 刘卫鹏:《汉永平三年朱书陶瓶考释》,《文物考古论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

活动内容，尚有待深入。刘氏以“买地置根”，意谓“冢地须向冥府登记并且购买才能‘置根’成为私有。”“先指先人，祖先。”“买地置根，为人立先。”“此句意即：黄神使者划出一块地作为死人的住所，为生人建立他们先人（祖先）的坟墓。”按其他东汉墓解注瓶文亦有言及“冢墓之根”者，如后面将要讲到的邹安旧藏陕西凤翔某地出土灵帝熹平元年（172）D型Ⅰ式陶瓶墨书，也是一开头就说“熹平元年，十二月四日甲申，为陈初敬等立冢墓之根，为生人除殃，为死人解适（谪）。”“立冢墓之根”，与后来道书文献中所谓的“斩绝地根”之说有关。“为人立先”，“立先”一词，未见他例，如“先”字隶定无误，我们认为也不应当把他简单地解释为祖先，而是指葬入墓中的先死之人，系就家中生人而言，先死者除了父祖长辈之外，也包括夫妻、兄弟、姐妹、子女、侄媳等同辈或晚辈之人在内，意指不让墓中先死者成为注鬼注害家中生人，他器文中屡见“冢中前死安”，“先”即前死之意。

如何正确理解“建立大镇，慈、馨、雄黄、曾青、丹砂，五石会精”的意义，是认识整个器文性质极为重要的部分，应当很好加以研究。刘卫鹏将之读作“建立大镇、慈、馨、雄黄、曾青、丹砂，五石会精”。谓“镇指压物之器……镇在道教中是一种神物，用来镇压地下的魑魅，有填石之意，如‘建立大镇’就指此；镇又是一种手段，有镇压之意”。我们认为，在此“建立”是动词，“镇”是名词，“大”是名词“镇”的副词，“镇”是指道教镇压鬼魅的醮仪，后来的道书中记载请道士为人举行斋醮仪式要求对方捐献所需钱物称为“镇钱”、“镇物”、“镇信”，也就是从这里来的。六朝道书《赤松子章历》卷一“论三等章”条：“《千二百官仪》、《三百大章》虽各具质信，然教迹来久，行之者多有增减……今抄出三等，约为准的……镇钱，天子用金钱，王公用银钱，庶人用铜钱……镇油，天子一石二斗，王公六斗四升，庶人二斗二升”〔1〕。同书卷六《久病大厄金柴代形章》：“仅依仪式，赍……镇钱千二百文，油一斗二升……用为法信。”〔2〕后来的《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券七十一列有专门的“镇信威仪品”，其下列述“镇采”、“镇十方笔墨纸硯”、“镇十方香”、“镇坛钱”、“镇米”、“镇油”、“镇炭”、“镇十方玉璧”诸条〔3〕。又有《镇皇人坛仪范》章云：“凡建斋坛，当供设十方天

〔1〕《道藏》十一册，178页。

〔2〕《道藏》十一册，223页。

〔3〕《道藏》三册，1050～1056页。

尊，五岳三光，水府经宝，随方各以纹缯之采，玉壁金龙以镇之”^{〔1〕}。《正一醮墓仪》：“于墓近道左，治地为坛，方三丈六尺，四角立标，坛中央设五方神座次，外设二十四神座次，外方设阡陌座；墓前左设亭长座，右设丈人座。座设细席一领，饮食一盘。所用镇币钱物，并随时丰俭，但令合五行、四维干支数。”^{〔2〕}《正一醮墓仪》成书时代虽较晚（唐宋或更后），但仍用“凡平、收日不用醮墓”之类的汉以来道教所吸收的建除之说，知其中尚保存有部分早期道教墓仪材料，“镇币”、“镇钱”、“镇物”亦属其例。由此可证东汉墓葬解注器文中“建立大镇”的“大镇”，应是道教葬墓过程中举行的一种包括多种法术活动在内的大型醮仪。墓中放置慈石、礬石、雄黄、曾青、丹砂五种矿石，会合五石之精华而成神药，是组成这种醮仪的部分内容，是在大型醮仪中才使用，一般规模较小的有关醮仪是没有这些内容的，所以特别以“大”字加之，称为“大镇”。如果“镇”只是单纯指的五石神药，以“建立”之词和“大”字加之，显然是讲不通的。

论者又注意到，该墓（M2）出土“陶瓶中还装有半块鸡蛋壳，类似的情况在以往的考古工作中也有发现，1999年5月，陕西咸阳市考古所配合铁二局安居小区工程清理了一批墓葬，于其中M10墓室上部的汉唐文化层中发现2件陶瓶，瓶上上各盖有青砖一块，瓶内均装有一鸡蛋壳，十分完整，配合鸡蛋壳同出的还有部分小石块及若干蓝黑色小颗粒，当属‘五石’一类石头”，当与镇墓有关。并引证了洛阳汉墓出土王当铅券“各令死者无适负。即欲有所为，待焦大豆生，铅券华荣，鸡子之鸣，乃与□神相听。”说明“‘鸡子’指鸡卵，即鸡蛋，由其中的‘五石’属于镇压之用，与其同出的鸡蛋壳的作用可能和五石一样，属于压镇之物。也可能同铅人、五谷等作用相同，是来‘用赎生人’的，而后者的可能性较大一些。”总的说来，认为鸡蛋壳的用途与镇墓有关，这是不错的。但就具体的用途而言，与五石、铅人、五谷则各不相同。此墓中的鸡蛋壳，应系“即欲有所为，待焦大豆生，铅券华荣，鸡子之鸣，乃与神相听。”中的“鸡子”，但“鸡子之鸣”是说让鸡蛋能够啼鸣发出声音。让鸡蛋啼鸣发声，和让烧焦了的大豆发芽生长，让铅券变成植物发叶开花，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它的意思是说墓主人葬之后，即生死永隔，不再与生人接触以行注祟，如果想要再与生人接触注祟生人，除非让鸡蛋能够鸣叫发出声音。蛋壳应与瓶文“解菰□草为盟”有

〔1〕《道藏》三册，1056页。

〔2〕《道藏》十八册，299页。

关，也是黄神使者在墓主下葬时举行“大镇”醮仪，除殃（殃）去咎，令死人无适（谪），生人无患，利后子孙，与鬼神为盟所用的一种信物。

至于五石、铅人、五谷的不同用途，另有考释，这里不作讨论。

本器是迄今为止整个东汉墓葬出土解注陶瓶材料中年代最早的一件，且为科学发掘所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 陕西宝鸡斗鸡台采集汉墓出土和帝永元四年（92）A型瓶一件。该器原朱书十九行约一百七十余字，唯脱落过甚，发表简报附有器文摹本照片（图版壹：29）^{〔1〕}及释文。虽残缺严重，因有明确纪年，时代较早，仍过录简报所作释文，并对照摹本作部分校读。简报释文原作：

永元四年十二月□□五日〔己〕〔未〕□□〔陈〕□□□□□
□□〔鄙〕火□□□□□□□□□□□□八〔魁〕九□〔天〕门□□
□□□□□□□□之□□□□□□□□斗□□□〔日〕□□□□□
□□□□□〔天〕〔地〕□□□□〔敢〕言之□〔大〕□去□□□
□□赐□〔家〕室生人赐卢〔舍〕□□□□之〔真〕〔公〕欲〔去〕
北斗□〔公〕□□□□□□□〔天〕门□□去□□□□□生人入比
死人入〔指〕〔生〕人□行死人（？）落徙〔令〕〔以〕〔行〕九十九
〔岁〕不□〔祁〕〔请〕天帝为之〔者〕□□□□□如律令

以上〔〕释著之字，恐有未确。少数可连为句者，亦或参考他器文字可补其缺。如“八〔魁〕九□”，可释作“八魁九坎”。“生人人比死人人〔指〕〔生〕人□行死人（？）落”，可释作“生人人北，死人人南；生人前行，死人却路”。摹本“死人（？）落”在人字后尚有一却字，原释漏录该字，以至义不可解。盖他器文中有“生人南，死人北”及“生人前行，死人却步”之语，可以为证。“却路”与“却步”，词异义同，这是很清楚的。此器残存文字，除天帝与强调生死异路等属东汉解注瓶文常见的基本内容而外，两处提到“天门”，这一材料，与本书另文所考汉代“天门”系天帝所居紫微宫门之专称正相吻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3. 1956年，河南陕县刘家渠M158号多室砖墓出土M158：22号顺帝

〔1〕 王光永：《宝鸡市发现光和与永元年间朱书陶瓶》，《文物》1981年3期，55页，图八。

低化目年 十月 □ □ □
□ □ 五日 巳 亥 □ □ 未
□ □ □ □ □ □ □ 未 火 □
□ □ □ □ □ □ □ □ □ □
一 更 九 □ 戌 申 □ □ □ □
□ □ □ □ □ □ 丑 □ □
□ □ □ □ □ □ 午 □ □ □
日 □ □ □ □ □ □ □ □ □
□ 戌 酉 □ □ □ □ 未 方 之
□ 天 □ 酉 □ □ □ □ □ 辰
□ 酉 酉 生 人 辰 辰 石
□ □ □ □ 亥 酉 酉 亥 酉 北
午 □ 酉 □ □ □ □ □ □ □
天 酉 □ □ 酉 □ □ □ □ □
生 人 比 死 人 指 生 人 □
行 死 人 命 落 注 今 天 行
九 十 九 岁 不 □ 丑 丑 天
帝 真 之 神 □ □ □ □ □
如 律 今 —

图版壹:29

阳嘉四年（135）A型朱书陶瓶一件。发表材料时，除附著器形图（图版壹：30）^{〔1〕}及器文摹本图版（图版壹：31）^{〔2〕}之外，并作释文。原释文曰：

阳嘉四年戊子朔升一戊申天帝神师臣□，谨为唐氏合众□□四
……东……前……主□子……律令

今据摹本重为校读如下：

阳嘉四年七月戊子朔，升一〔日〕戊申，天帝神师臣□，谨
为唐氏合家厌（压）……前死……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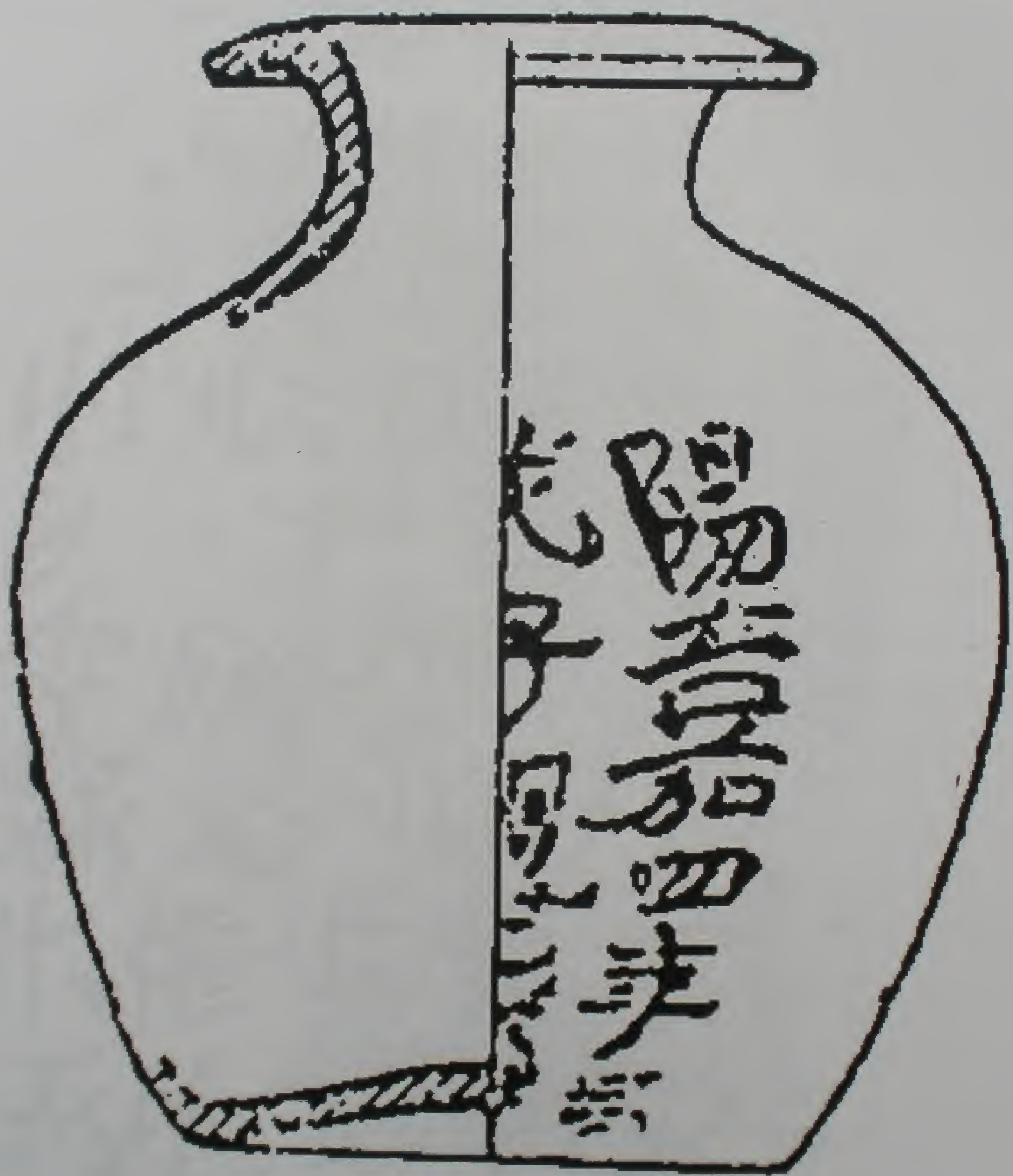
文中之“七月戊子朔”与“厌”字，原报告未释。又释“合家”为“合众”，更是明显错误。“天帝神师臣”五字，笔画特别清晰，其后脱蚀一字当为某姓。以“天帝神师”而称“臣”，其后并具姓氏，证明天帝神师乃行术者之称，自命为沟通天帝与凡人联系的具有神术之师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于后详论。

4. 日人中村不折旧藏 1914 年陕西西安郊区出土顺帝永和六年（141）D型Ⅰ式朱漆书瓶（图版壹：32），原器图版文字显露不全，除著录释文而外，未附文字摹本材料。（本书所著诸器材料情况皆同，下引诸器文不另分别作说明）今据发表释文校录，文曰：

永和六年，田国壬子朔，升一日壬申，直（值）□。天帝神师
使者为□□□之坟墓东□□□□□□□□□□墓□□墓伯、墓丞
相、墓□史楮（使者）□□□□□所□者市曹主人□□□，今日吉
日，解五□□□杀，及与中央□□□□。天帝使者告□□□□墓门

〔1〕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122 页，图一三，3。

〔2〕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123 页，图一四。



图版壹：30

[illegible]

图版壹: 31



图版壹：32

亭长，主□□□□到丞召作行差□□□^{〔1〕}

田田田三字，原器已剥脱，发表材料时亦未释，据朔闰干支参考其他器文补订。文中同时出现“天帝神师使者”与“天帝使者”之称，说明“天帝神师”与“天帝使者”属同义词，“天帝神师”即“天帝使者”，皆为此种葬仪之主持人，既可称“天帝神师”，亦可称“天帝使者”。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材料。

5. 前述陕西长安县三里村永元十六年（104）前后多次合葬墓，于墓道及耳室出土朱书 D 型 I 式瓶共 7 件，4 件字迹已模糊难辨，另 3 件较清晰者，据介绍内容基本相同，唯器主名字有别。桓帝建和元年（147）一瓶，发掘简报未附器文摹本图版，仅有未加标点之释文。今据简报释文校读如下：

建和元年十一月丁未朔，十四日解。天帝使者谨为加氏之家别解。地下后死妇（其中另器作女）加，亡方年二十四，等汝名借（籍），或同岁月重复钩校日死，或同日鸣钩校日死，告上司命、下司禄，子孙所属；告墓皇使者：转相告语。故以自代铅人，铅人池池，能舂能炊，上车能御，把笔能书。告于中（嵩）高长、伯（陌）上游微：千秋万岁，永无相坠，物与生人食，与九（死）人□。如律令！^{〔2〕}

括弧文字，皆系我们所加。死字作“九”，当为原器书写之误。这是一篇以天帝名义发出的告文，桓帝建和元年（147）十一月十四日入葬加家后死妇人于墓，举行解注仪式，告诉主管家中子孙生人命运的司命、司禄之神，告诉墓皇使者神祇，告诉嵩高长、陌上游微等神祇，并要他们转告其他相关神祇：恐其死亡因与前面先死的人年、月、日干支或其他方面相同而发生复连注害所致，所以用铅人作为她的替身放入墓中。作为替身的铅人是很能干

〔1〕（日）《书道全集》卷三，14 页。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镇墓文》著录一器文，朱书十二行，缺字多不可识，其释文作：“永和六年（缺）墓（缺）市（缺）吉日（缺）煞及（缺）天帝（下缺）”（《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七册 2886 页），不知是否与此同为—器。

〔2〕陕西省文管会：《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 7 期。

的，既会舂米、做饭、驾车，又会写字，能文能武，完全可以代替死者在地下服各种劳役。这样，就可以让死者在地下世界过上安定的生活，从此完全和生人隔绝起来，永不为祟，保证生人长寿平安。有人句读作：“天帝使者谨为加氏之家别解地下后死，妇加亡方年二十四”。谓“此句意思是为后死者（即生者）禳解（灾殃）”。^{〔1〕}其实是为在建和元年（147）十一月十四日为二十四岁即死去的加家妇人下葬时行禳解之术，以防其后成为注鬼回到家中注害生人。因此墓为多室多次合葬墓，在建和元年（147）十一月十四日她入葬之前早已有人葬入，对先葬者而言，她当然只能称“加氏之家”的“后死妇”了。后面将述及他墓在为新入合葬者之器文中，尝见“冢中前死安”，“冢中先人，无惊无恐”等语，即是针对合葬墓中早年已先入葬者而言，意思是很清楚的，可供正确理解本器文意之参考。

6. 1974年，河南洛阳李屯 M1 号东汉凸字形多室砖墓出土 B 型Ⅱ式陶瓶 4 件。发掘简报刊布墓葬平面图仅标出其中 M1: 1、M1: 2、M1: 3 号瓶 3 件，分别出自后室和前室。后室并列二棺，M1: 1、M1: 2 号瓶放置在棺北之东角和西角，M1: 3 号元嘉二年（152）瓶置于前室之西南角。标本 M1: 3，口径 5、肩宽 17、底径 18、高 16 厘米，肩腹朱书十二行，行十至十二字不等。简报除发表器形（图版壹：33）^{〔2〕}和文字摹本图版（图版壹：34）^{〔3〕}之外，并附标点释文和考释，唯因有者字迹模糊，编者对此种器文内容不熟悉，摹本字形有者失真，考释亦多讹误。原释文曰：

元嘉二年十二月丁未朔十四日圜

申，黄帝与河南缙氏 中

华里许苏阿铜 刑宪女

合会神药，义镇 冢宅，

七神定冢阴阳，死人无，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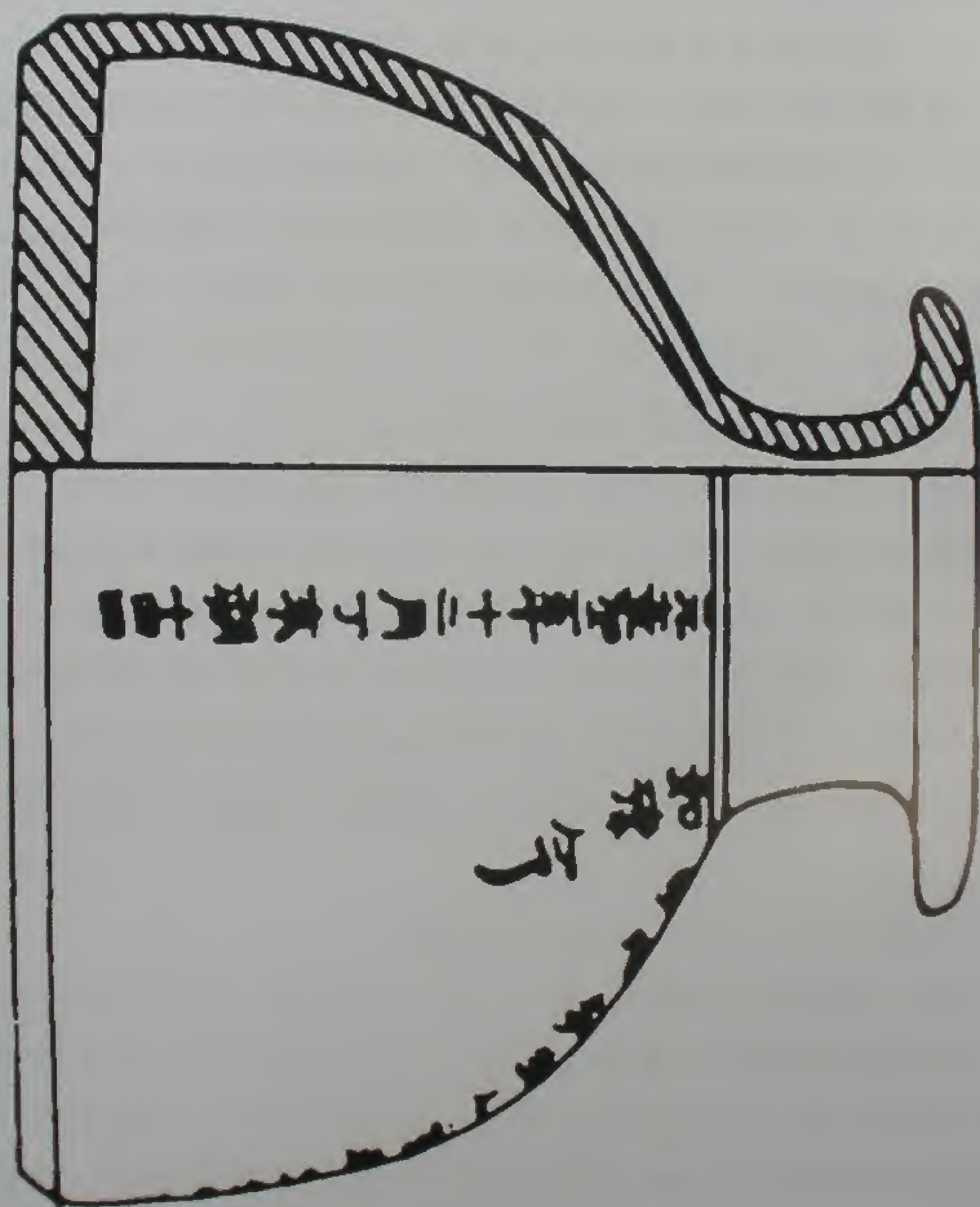
人无过。苏寤之后，生

人阿铜宪女适过，

〔1〕 刘昭瑞：《〈太平经〉与考古发现的东汉镇墓文》，《世界宗教研究》1992 年 4 期。

〔2〕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李屯东汉元嘉二年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 年 2 期，4 页，图三，12。

〔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李屯东汉元嘉二年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 年 2 期，5 页，图四。



图版壹：33

元嘉三年十二月丁未朔十四日甲
 申黃帝與河南綏民侯□中
 華里許無阿□□刑寃女
 合會神藥之墳 承也□□
 七神定家陰陽死人無□生
 人無是無寃之後生
 人阿銅寃女空區
 為設五石人衆解□□□
 安我祇神明利家
 蘇氏各生人官利從合日始
 如律令

許

图版壹:34

为 歌（治）五石人参，解
安井（注）瓶，神明利家 许
苏氏生人富利，从合日始。
如律令！

简报编写人还进一步解释说：瓶文“记载了墓主人苏寤的阿铜宪女，为了解除凶灾邪气并使活着的家人平安富贵，便求助于主宰阴阳的七神和天帝使者黄神，以五种矿物质和人参合会神药，用以镇墓。”^{〔1〕}细审摹本字形，“黄帝与河南缙氏……许苏阿铜 刑宪女合会神药，父镇 冢宅，”其中“与”字字迹模糊，今释文义难通，亦与他器文例不合，实应是一“为”字。又应于“会”字处读断，前面的“许苏阿……刑宪女”，应为包括置本瓶于墓之墓主在内的先后不同年代入葬的两人，谓后死者来与先死人葬者合葬，“会合”即指合葬之事。后述河北望都 M2 号汉代刘公大型多室砖墓出土砖券，有“今日合墓”之文可证。“神药，父镇”应释读为“神药厌（压）镇”，上述陕西户县朱家堡汉墓阳嘉二年（152）瓶文即有此语。又山西临猗延熹九年（166）韩祔兴瓶文云：“镇冢雄黄，四时五行，可除咎去殃。”中村不折旧藏汉张氏瓶文“奉（压）胜神药，主辟不祥”，皆与此瓶文“神药”同例。故本瓶文“神药父镇”之“父”，若非当时误书，则为出土后字迹不清造成的误识，即使释“厌（压）”不确，亦当为与之相关的同义字。又此句之释读，与后文“为歌（治）五石人参，解……诸罔罔”有关。按“哥”字右旁一“女”之字当释为“设”甚明，当句读为“为设五石、人参，解……诸罔罔”。后将述及同蒲路工程出土熹平二年（173）张叔敬瓶文之“今故上复除之药，欲后世无有死者。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他器复多见丹砂、雄黄、曾青、磁石、五石、人参之名，五石为矿物杀虫辟祟神药。人参原是有生命的植物，出现在墓中是因其具生物性质而像人形，所以将之作为生人替身以防注，与五石之为神药以压镇者不同。文末“许苏氏生人富利，从合日始。”意谓自苏氏家最近这次行合葬即先亡者与后死者相会合之日开始，不再因死者之故发生祸殃，影响生人富贵吉利。文中的两个“许”字为动词，都是许诺的意思。编者的理解，与文意不符。又“七神定冢阴阳，死人无，生人无过。”细审摹本图

〔1〕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李屯东汉元嘉二年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2期。

版,“死人无”后尚有剥蚀之字,准他器文例,当为“适(滴)”字,句当读如“……七神,定冢阴阳,死人无适(滴),生人无过。”邹安旧藏陕西凤翔出土熹平元年(172)瓶,文曰“生人上就阳,死人下归阴”之语。河南密县后土郭东汉晚期墓出土瓶文,有“死人行阴,生人行阳,各自有分画(划),不得复交通,莫复来归地上”之语。这里所说的“定冢阴阳”,亦同其例,谓生人存于阳世,死者入墓归阴,从此确定下来,死人不得再回到阳间注祟生人。说“求助于主宰阴阳的七神和天帝使者黄神”,把“天帝使者”和“黄神”视为同一神祇,也是有问题的。“黄神”是神灵,而“天帝使者”即“天帝神师”,为术者自命为天帝的代表者。根据上述考释,可校读器文如下:

元嘉二年,十二月丁未朔,十四日甲申,黄帝为河南缙氏(下缺)中(下缺)华里,许苏阿铜(下缺)刑宪女(下缺)合会,神药厌镇,冢宅(下缺)七神,定冢阴阳,死人无适(滴),生人无过。苏寤之后,生(下缺)人阿铜宪女适(滴)过,(下缺)为□五石、人参,解……𠙴𠙴𠙴。安井(神)瓶,神明利家(下缺),许苏氏生人富利,从合日始。如律令!

“许苏阿铜(下缺)刑宪女(下缺)合会”,与后文“从合日始”,是指准许许苏阿铜与其女(宪女)合葬。此瓶文字虽有残缺,然述合葬墓后死者入葬时设神瓶为用之意甚明,有的内容为他器所无,在汉代解注瓶文中比较特殊,且年代较早,具有重要价值。惜未能得原器仔细审视揣摩,隶定其文字。

7. 日人中村不折旧藏陕西西安市郊出土桓帝永寿二年(156)二月成桃推D型I式朱书解注瓶,文曰:

永寿二年,二月己未朔,升七日乙酉,天帝使者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今成氏之家死者字桃推,死日时重复,年命与家中生人相拘(钩)。籍到复其年命,削重复之文,解拘(钩)伍(忤)之籍。死生异簿,千秋万岁,不得复相求索。急急如律令!^{〔1〕}

“今成氏之家死者字桃推,死日时重复,年命与家中生人相拘(钩)。籍到复

〔1〕 日人编印《书道全集》卷三,13页。

其年命，削重复之文，解拘（钩）伍之籍。”有人句读作“今成氏之家，死者字桃推，死日时重复年命，与家中生人相拘籍，到，复其年命。削重复之文，解拘伍之籍”。又不知何以将“永寿二年”释作“永寿三年”。〔1〕“钩伍”原释写作“拘伍”，细审原器照片图版，其“拘”字实写作“枸”当为“钩”字之误写，上述陕西长安县李王村 M5 出土解注瓶文文，有“主别解张氏后死者句伍重复”之语，可以为证。“死日时重复”，谓成桃推死于与家中前死者相同的日、时干支，即受日、时重复之注而死。“年命与家中生人相拘”，“拘”字亦当为“钩”字，即钩连重复之意。“年命与家中生人相钩”，谓家中生人有与成桃推的生辰干支（年命）相同（钩连忤犯重复）者。本器文述成桃推于永寿二年（156）二月二十七日下葬，恐后有生辰干支（年命）与之相同，或在同样的死期干支日辰前来注害家人，术者假天帝名义告命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等地祇冥吏，“籍到复其年命”，家中生人年命（所活的岁数和生死之年、月、日干支）有与相同者，希望将成桃推在死簿上的生死之年、月、日干支加以更改，使家人免遭因年命干支重复形成之注害祸殃，也不要让成桃推在干支相同的时日重复注害家人，永远不得索取生人魂魄以为替代。以上内容，必须严格执行，否则必将按律令规定治罪。此文字数不多，简洁明快，措辞准确，是一篇相当标准的解注文，其他器文之字迹剥缺或行文冗脱含混者，多可据以校订。

8. 日人中村不折旧藏 1914 年购得陕西西安市郊出土桓帝永寿二年（156）三月 D 型 I 式朱书孟陵解注瓶，原释文作：

永 寿 二 年 三 月 己 未
 朔 廿 二 日 己 酉 直 执 谨 为
 对 孟 陵 填 厌 县 官 敢 告 东 方 吏
 事 生 于 甲 乙 谋 议 欲 来 暴 病
 足 膝 书 且 啼 哭 夜 不 得 卧 便
 休 不 来 会 事 □ □ □ 敢 告 南
 方 吏 事 生 于 丙 丁 谋 议 欲 来
 返 还 𠙴 𠙴 敢 告 西 方 吏 事
 生 于 庚 申 谋 议 欲 来

〔1〕 刘昭瑞：《〈太平经〉与考古发现的东汉镇墓文》，《世界宗教研究》1992 年 4 期。

暴病腹□□敢告北方吏事生于
 壬癸谋议欲来暴病欲
 □无□思□□□□不得履
 □□中央吏事生于戊
 己某义谷（谋议欲）□暴病不起
 □□□□□□□□皆不
 得来会□□□□苦以不
 □□□□□□□□门□
 服口不能言□□□□□□□
 前事以决襄门无辟四
 方吏事及土功急如律令^{〔1〕}

细审原器照片图版可见之部分字迹，斟酌前后文意，以上释文，颇有讹误不当者。今校读如下：

永寿二年，三月己未朔，二十二日己酉，直执。谨为刘孟陵填
 （镇）厌（压）。县官敢告东方吏：事生于甲乙，谋议欲来暴病足
 膝，昼旦啼哭，夜不得卧，便休，不来会，事□。𡇗𡇗敢告南方
 吏：事生于丙丁，谋议欲来返还。𡇗𡇗敢告西方吏：事生于庚申，
 谋议欲来暴病腹。𡇗𡇗敢告北方吏：事生于壬癸，谋议欲来暴病，
 欲□无□思□□□□不得履。敢告中央吏：事生于戊己，某义谷
 （谋议欲）来暴病不起□□□□□□□□皆不得来会。□□□□
 苦以不□□□□□□□□门□服口不能言□□□□□□□前事，
 以决襄（襁）门，无辟（避）四方吏，事及土功。急如律令！

文中原释“对孟陵”，于义无解，细审“对”乃“刘”字的误释，原器照片
 字迹甚明，盖死者姓刘名孟陵也。“□□敢告西方吏”，原补释作“𡇗𡇗敢告
 西方吏”，文义不通，当补作“𡇗𡇗敢告西方吏”，参考前面“县官敢告东方
 吏”文例酌定。一准此例，“□□敢告南方吏”、“□□敢告北方吏”，可分别
 补释为“𡇗𡇗敢告南方吏”、“𡇗𡇗敢告北方吏”。至于“𡇗𡇗𡇗𡇗中央吏”，
 按原释文“𡇗𡇗”之前未标示脱文符号，“县官”二字若非书器时有意省去，

〔1〕 日人编印《书道全集》卷三，13～14页。

则当为出自粗疏漏写。又原释“书且啼哭，夜不得卧”，义不能解，“书且”与“昼旦”字形相近，当作“昼旦”者甚明，谓白日啼哭，晚上不能入睡，痛苦不堪。东汉王充《论衡·订死篇》：“一曰鬼者甲乙之神也。甲乙者，天之别（一本作刚）气也。其形象人。人病且死，甲乙之神至矣。假令甲乙之日病，则死见庚辛之神也。何以效之？其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论者所以为实也。天道难知，鬼神暗昧，具载列，令世察之也。”是器文之甲乙、庚申、壬癸，皆时人所谓值某日病、死之鬼也。“县官”一词，通常是指朝廷，此为道教性质文字，当指诸天官地吏神祇而言。东汉正一道文献《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卷一有《县官口舌》章云：“天曹省念分别，愿请东方青帝丈人君吏五十人，又请南方赤帝大夫君吏五十人，又请西方白帝大夫君吏五十人，又请北方黑帝大夫君吏五十人，又请中央黄帝大夫君吏五十人……一合来下，主为回化官事。若有逆吏梦人县官口舌，所见增疾者，启所在监察……为某收捕魂，令文墨不举，口舌不起。四方县官众崇，伏恩主治。”〔1〕同书卷四又另有《主县官口舌》章，文共两条，有“南鍾天星君五人，官将各一百二十人，治石仙室，主收摄百姓县官口舌，吏民恶逆之者。”〔2〕又卷一《收官事》章云：“北一宫左童君官将二百二十人，又请收刑检刑逆吏一百一十人，主为某断绝县官恶人谋议，口舌牢狱，当为平集消灭之。”“察恶君官将一百二十人，治高平室，收捕郡府某忌妬谗人、毁伤不止者，破诸谋议，众心休息。”〔3〕本器文所称“县官”告五方之“吏”事，“县官”“谋议”云云，措词用意，与文献记载均相吻合，只是具体言事内容有所不同而已。此文内容比较特殊，乃家中人感不安，测算有若干先值某日病死的鬼魅聚谋祟害生人，将使人足、膝、腹等处暴病，天帝因告五方所属冥官地吏神祇，令为禳解，为断绝注祟，使这些鬼魅“皆不得来会”。有人将“县官敢告东方吏：事生于甲乙”读作“县官敢告东方吏事，生于甲乙”，其余南、西、北中四方并同，不知“吏事”当作何解？又改原文“县官敢告北方吏：事生于……”作“县官敢告北方执事，生于……”，不知何据？

9. 河南洛阳东郊史家湾汉墓出土桓帝永寿二年（156）B型Ⅱ式解注瓶，外腹朱书十三行，发表材料时并附摹本图版（图版壹：35）及部分文字

〔1〕《道藏》二十八册，537页。

〔2〕《道藏》二十八册，555页。

〔3〕《道藏》二十八册，536页。

永壽五年五月 ☐ ☐ ☐ ☐
 之宜天帝使者旦 ☐ ☐ ☐
 之永其度者 ☐ ☐ ☐ ☐
 移文黃印章寶使時
 五行更取天下捕取五 ☐
 或之符書制目夜 ☐ ☐
 乘傳居署去度閼梁 ☐
 莫攝錄百鬼名字無令
 傷地之宜留行束以生 ☐
 吳山王後致榮之生 ☐ ☐ ☐
 曰父嬰執父之妻燒汝骨
 風伯爾降汝父汝 ☐ ☐
 者使汝葬汝垣五有 ☐ ☐
 伐其上汝伐其主養其 ☐
 汝黃帝王下急 ☐ ☐ ☐
 神衣其物主者懸他 ☐ 達 ☐

图版壹:35

考释^{〔1〕}。由于未作全文通释句读，考释虽多有可取，亦颇有失实未当之处。今为释读全文曰：

永寿二年五月□□□□，直（值）直。天帝使者旦（谨？）为□氏之家填（镇）寒暑□□□□移大黄印章（“迫”）佼四时五行，追逐天下，捕取五疠（？）豕（？）之符，昼制日，夜□（制？）□，乘传居署，赳（越）度閼梁，□董（谨）摄录百鬼名字，无合得桃（逃）亡，近留行远，□生□侯山主获（原写作𡗗即“濩”字，与“获”通）致荣□□□□旦女婴，执火大夫烧汝骨，风伯、雨师扬汝灰。没□□者，使汝筑灰垣五百□，没戍其上，没戍其下，秦其□汝黄帝呈下，急□舟（？）□□神药，其物主者慈石。如建（律）令！

蔡氏考释多有可取，但如“永寿二年五月□□□□之直”，其“之”字摹本作亡，与后文中“□□□（氏）之家填（镇）寒暑”的“之”字笔画不合，当系“直（值）”字之缺画误摹。“直（值）直”如前所论，乃按建除家十二日名中之“直日”。“豕之符昼（咒），制日夜”，应释为“豕（？）之符，昼制日，夜制……”者甚明。另“□戍其上，没戍其下”，因未释前面“使汝筑灰垣五百□”之文，遂以为“这两句的大意是让大风吹削它的上面，让雨水冲削它的下面”，这是靠不住的。前引诸道书文载，阴司幽谪，多徒刑劳苦，担沙负石，填江塞海等苦役。此处所言，即谓惩罚为祟害之鬼，重则烧骨弃灰，轻则处以劳役，使筑城墙长度若干，并戍守其上下。王充《论衡·祀义篇》：“风伯、雨师、雷公，是群神也。”又《祭意篇》：“群神者，谓风伯、雨师、雷公之属。”风伯、雨师具体所指为何神，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汉书·郊祀志》：“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百有余庙”。颜师古注曰：“风伯，飞廉也；雨师，屏翳也，一曰屏号。而说者乃谓风伯，箕星也，雨师，毕星也。此志既言二十八宿，又有风伯、雨师，则知非箕、毕也。”东汉应劭《风俗通·祀典》从《周礼·大宗伯》“以柳燎祀风师，以栖燎祀雨师”郑注之说，主风

〔1〕 蔡运章：《东汉永寿二年镇墓瓶文考略》，《考古》1989年7期，650页，图二。

伯乃箕星，戌之神；雨师乃毕星，丑之神。^{〔1〕}又“□□神药，其物主者慈石”，原释为“神玄武，其物主者慈石”，其义无解。“□□神药，其物主者慈石”，即他器常见之以五石等神药压镇之意。“慈石”即磁石，《抱朴子内篇·金丹篇》及《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云，磁石为合成五石药物的一种矿物原料，已见前录，在此强调磁石为所用合成药物的主要成分。

10. 陕西西安昆仑机械厂东汉墓出土 D 型 I 式解注瓶 3 件，“形制相同，大小成序”。其中延熹九年（166）M33（图版壹：36）^{〔2〕}和 M35（图版壹：37）^{〔3〕}二瓶皆泥浆隶书，原简报附有器文双钩摹本图版，未作释读。今释之于下。M33 出土瓶文：

延熹九年，九月丁亥朔……平……死……复重……九……重余
……大豆，长相亡（忘）……兄（凶），去咎除央（殃），复重不生
……伯娜……使……子孙，转

M35 出土瓶文：

回死处，不（下）属……父不得复，母亦不得复，兄不得复，
弟亦不得复，子亦不得复，孙亦不得复者（？），身□……天……复
岁重……复，日重时复……地……日、月、星……无复……妨……
弟……明妨□子孙……复……□去无复……二升（？）……父老，
将取重复之鬼……复来……吉阳……如律令！

细审以上二器文字，M33 出土者无尾，M35 出土者无首，若以 M33 出土瓶末尾之“子孙，转”与 M35 出土瓶首之“回死处”相接，正好连成一篇完整的文字，与前述河南洛阳唐寺门墓 M1：65 号、M1：66 号二瓶之间的关系颇相类似，只是此墓二瓶没有神符部分罢了。虽二器文字均严重残缺，但

〔1〕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364、366 页。

〔2〕 王育龙：《西安昆仑厂东汉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9 年 2 期，47 页，图九。

〔3〕 王育龙：《西安昆仑厂东汉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9 年 2 期，48 页，图十。

長相亡
兄
陳氏須重不
孫伯卿
子孫
續
大豆
靈餘
九
平
死
須
靈
延壽九年九月丁亥朔

图版壹：36

回死電不屬
不得復母前不
萬病不得復子前不得復孫
婦前不得復世不得復孫
看身山 天 復威重
月星 復曰重時復 地 妙
明姑一子孫 无復 弟曰
不去无復
三平
父老歿既重復之鬼
復我
吉陽
如津
像

图版壹：37

让死者入墓之后，即断绝与家中生人的关系，不得再回到原来死亡的地方，复连注祟父母、兄弟、子孙。若有自身因为年岁、月、日干支、所值星辰相同和住地相同等各种可能相犯重复致死而形成的各种注鬼，前来注祟生人，则“将取重复之鬼”消灭之，去除葬家一切祸殃，意思是比较清楚的，详细列出了家中各种避注人的不同身份名目，为他器所罕见。又“长相亡（忘）”一语，是说为了隔绝生死，避免发生注祟，死者与家中生人要相互忘记对方，连感情上的联系也要彻底断绝，与前面讲到《赤松子章历》断梦寐复连的内容正相吻合。此语其他汉代解注器文中虽不多见，在后来甘肃地区有关晋墓材料中却极为普遍，也是本器特别值得注意的内容。

11、山西临猗东汉墓出土桓帝延熹九年（166）朱书 D 型Ⅲ式解注瓶一件，器腹十三行文字，发表材料时并附释文和摹本图版（图版壹：38）^{〔1〕}，各行下端长短不一，除一行较长外，其余十二行皆较短，看起来似有残脱。因不闾内容性质，摹本除个别字画失真之外，于短行行末误增一蚀文符号，致使最为完整之一器文字严重错乱，不堪卒读。今校读如下：

延熹九年，十月丁巳朔，五日辛酉，直开。移五部中都二千石、丘丞、墓伯、冢侯、司马：地下牴羊令韩祔兴、冢中前死安，千秋万岁，物（勿）复相求动伯（迫）。生人自有宅舍，死人自有棺槨，生死异处，无与生人相索。填（镇）冢雄黄，四时五行，可除咎去央（殃），富贵毋极。如律令！

“除咎去央”，误摹“咎”、“央”二字，误释为“若吉”，遂致义不可通。移文转告五部中都二千石、丘丞、墓伯、冢侯、司马诸司冢墓事地祇，务令生前居官牴羊令的韩祔兴和在韩祔兴之前入葬者神魂安稳，不要让他们受到勒索迫害。活人应当居住在房屋宅舍之中，死人应当居住在坟墓里，两者有着严格的界限，不相关涉，死者绝不能到阳世来索取生人性命以为替代。用雄黄作为镇墓神药放入墓中，让生死相安，无灾无祸，子孙后代，长享富贵。瓶中当年应盛有雄黄实物，年久已不可见。据报道，瓶中发现一件类似羊角的东西，我们推测可能是相当于铅人性质的代人器物，或因韩祔兴生前作过管理养羊事务的官吏，与羊有特殊的关系，所以用羊角来作代人用品。

12、陕西潼关东汉杨震家族墓群之 M5 出土的一件灵帝建宁元年（168）

〔1〕 王泽庆：《东汉延熹九年魂瓶》，《中国文物报》1993 年 11 月 7 日，第 3 版。

冥冥之中
日月辛酉
開移五部
石父平墓
司馬地下
第前興塚
死安千秋
勿復相求
生之自有
死之自有
生死果實
生之相索
確黃四時
除名吉矣
如律

图版壹:38

D型Ⅱ式陶瓶，朱书十三行近百字，残缺严重，可识读者如下：

建宁元年，十一月乙巳朔，九日癸丑，直除。皇（黄）帝使者
谨为场（杨）氏之家……〔1〕

除了可以补充此种器物的纪年材料之外，“黄帝”写作“皇帝”，而“黄帝使者”未见他例，是值得注意的材料。他器文字，此处除写作“天帝”、“天帝使者”、“天帝神师”之外，亦有作“黄神”者。“天帝使者”、“天帝神师”是“天帝”的代表人，若此器“皇（黄）帝使者”不误，则应是术者自称为黄帝的代表人。“天帝”与“黄帝”所指是否相同？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杨氏之家”原释作“杨氏之文”，显然是错误的。

13. 20世纪50年代，河南洛阳烧沟M1073出土M1073：11号B型Ⅱ式建宁三年（170）解注瓶一件，腹部粉涂朱书十六行，发表材料时仅具释文，未附摹本图版。释文如下：

建宁三年九月□日，黄帝青鸟□□曾孙赵□□□造新冢，恐犯
先□，岁月破煞□□□葬者得适，□□□以曾青□木之精，置中入
厌除四方土，害气消也，佑利死者。丘丞、墓伯（下剥脱九字）建
除□□（下剥脱三行约二十一字）内。如律令！〔2〕

“厌（压）”原释文作厭，未识，今补释，即他器所见之“厌（压）镇”。古葬墓者所宗，有善地理堪輿之神仙号曰青乌子，敦煌晋墓解注器文多有“青乌子告北辰诏令”之语，颇疑“青鸟□□”当释为“青乌田昭”。若此释不误，则青乌之说已滥觞于此矣。“葬者得适”，“适”与“谪”通，谓死者地下得幽谪，幽谪不解，则将为注殃也。“曾青□木之精”，曾青与雄黄等，同为汉代常用以镇墓解墓注之神药，亦他器文所常见。以五方五色配五行，东方青色属木，故称“曾青□木之精”也。

14. 日人中村不折旧藏陕西西安出土灵帝建宁四年（171）D型Ⅰ式朱漆书陶瓶，文字残缺严重，可识读者如下：

〔1〕 陕西省文管会：《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记》，《文物》1961年1期。

〔2〕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154页。

南方 建宁四年，十月己卯朔……帝……母……神……不起。

如律令！〔1〕

除了可以补充此种器物的纪年材料之外，文首冠以“南方”二字，表明此器与陕西潼关吊桥 M2 号东汉杨震墓瓶同例，系与另外四器配成五方成套使用者。

15. 1995 年到河南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参观，得见所藏河南偃师蔺窑砖厂东汉墓出土 B 型 II 式建宁四年（171）朱书陶瓶一件。经仔细审察，其文断续可读如下：

建宁四年，十二月丙戌朔，十日丙申，直危。天帝使者谨为生人种氏……封冢神瓶。上天苍苍，下地茫茫，生死各合异处，无相害忤。上为生人来利，下为死人来福。无害妻子，无责无□人。天帝除死人适（谪）罚……无责死人。符转他。𠄎𠄎𠄎！

由于字迹缺脱不全，识读或有未确，内容大体可以明了。器文系种氏男子入墓中时，以天帝口吻发布的告命，为死者解除谪罚，隔绝生死，死者不复注忤以妻子为主的家中生人，生死皆得其利。本器无符形，“符转他”一语，似在说明符形转书于另器，亦一文一符，两瓶配套使用者，可惜出土该器墓葬其他随葬品情况不详，不可确知。文中无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等冢墓神内容，“天帝除死人谪罚”，宣布直接由天帝为死者解除谪罚，与他器文所言有所不同，是其特点。又“封冢神瓶”，是此器自名“神瓶”，也是值得注意的。

16. 邹安旧藏陕西凤翔某地出土灵帝熹平元年（172）D 型 I 式墨书瓶一件，发表材料时仅附摹本图版，未作释文。今据摹本材料释读如下：

熹平元年，十二月四日甲申，为陈初敬等立冢墓之根，为生人除殃，为死人解适（谪）。告西冢公伯、地下二千石、仓林君、武夷王：生人上就阳，死人下归阴；生人上就高台，死人深自藏；生人南，死人北。生死各自异路。急急如律令！善者陈氏吉昌，恶者

〔1〕 日人编《书道全集》卷三，14～15 页。

五精自受其殃。急！^{〔1〕}

文中省略主持者“天帝”或“天帝使者”之词。在有关主管冢墓神祇中，除地下二千石之外，多出了西冢公、西冢伯和仓林君、武夷王，对“生死各自异路”各自不同的去处，也讲得更加详尽具体。“恶者五精自受其殃”，“五精”在后来的镇墓文石刻中称为“五土之精”，即土中地下东、南、西、北、中五方之精魅，为汉墓出土他器所罕见。这些是本器文比较显著的特点。

17. 1935年修建同蒲路工程中，山西某地出土灵帝熹平二年（173）朱书陶瓶，文曰：

熹平二年，十二月乙酉朔，十六日庚申。天帝使者告张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冢丞、冢令、主冢司令、魂门亭长、冢中游击等；敢告移丘丞、墓伯^{〔2〕}、地下二千石、东冢侯、西冢伯、地下击犢卿、耗（蒿）里伍长等：今日吉良，非因他故，但以死人张叔敬，薄命蚤（早）死，当来下归丘墓。黄神生五岳，主生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生人筑高台，死人归深自埋。眉须以（已）落，下为土灰。今故上复除之药，欲后世无有死者。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立制牡厉，辟除土咎，欲令祸殃不行。传到，约勒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急急如律令！^{〔3〕}

此器器形不明，郭沫若云为“瓦盆”，丹书二百一十九字在“盆内四周”。陈直教授撰文提及早年马镜清曾著《汉张叔敬墓避殃瓦盆文》以考其器，在过录张氏释文所加标题又作《汉张叔敬朱书陶缶原文》。缶、盆同器异称，此或为郭说之所本。两家所载，皆以器为陶盆。然陈直自著考文却冠以《汉张叔敬朱书陶瓶》标题，则原器仍应为瓶。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汉墓出土解注文陶容器，除瓶形而外别无他例，我们认为当以陈先生之说为确。

〔1〕 a. 邹安：《艺术丛编》五，《艺术类征》；b. 陈彬和：《中国文字与书法》，42页，有摹本图版。

〔2〕 “墓伯”，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释作“榭柏”，陈直引马镜清释文作“墓柏”。

〔3〕 a.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94页；《兰亭论辩》32页；b. 陈直：《汉张叔敬朱书陶瓶与张角黄巾教的关系》，《文史考古论丛》，390～392页。

若此判断不误，以出土地域范围论之，则本器属 D 型 III 式瓶的可能性很大。器文未见摹本图版，诸家释文，识读颇有出入，今重为斟酌校订如上。唯陈直录马镜清释文“告张氏之家”作“告张氏之冢”，释家为冢；陈直又改释为“告张氏之众”，都不仅与他器文例不符，前后文字文意相悖，显系误释。陈直又释“辟除土咎”作“辟涂各”，“传到”作“虫到”，“约勒地吏”作“约令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作“勿复烦扰张氏之众”，也是靠不住的。“三丘、五墓”，即后面熹平四年胥氏瓶文中所说的“胥氏家冢中三曾、五祖”，指张家三曾、五祖之藏，或同葬一墓，或同塋域而异冢。《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卷一《收先祖病子孙章》云：“无上方苍兵士十万人，主收却先祖五墓之鬼未（来）病子孙者，分别生死之气，断绝耗害”〔1〕。《赤松子章历》卷四有专门的《谢五墓章》和《解五墓章》章文。《解五墓章》云：

具法位上言：臣谨按玄科律令，据乡贯某叩头自列，素以胎生下官子孙，但某身中，今岁行年到某辰上入墓之年，或为五墓所缠及三杀之下。夫人入墓之年，恐被墓神注连，鬼气缠绕，比者脚手沉重，饮食不加，罔知拔赎五墓灾厄，扶护身命。唯以一心上凭大道，仰希鉴照，特垂救护。今贵法信锡人五躯，命米一石二斗，命钱一千二百文，命素一匹……求乞章奏，断绝亡人殃祸。令以锡人代形，分解灾厄，延年保命……愿天曹上官典者，垂恩照省，原赦某身七世已来，所犯千罪万过，并赐除荡。五墓五方之厄来临者，以锡人五形代之。令弟子……上章之后，某身中年命延长，五墓殃注，并令断绝，五墓灾刑，返为恩福……太上众真……谨为某上请天官，解除五墓殃注灾厄，锡人代形……〔2〕

“五墓五方之厄来临者，以锡人五形代之”，以锡人五形解五墓殃注灾厄，则五墓又指分布于五方之冢墓殃注，与汉墓铅人代形亦相吻合。《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一《章信科仪》，有专门的《官私咎谪死病相连断五墓殃注章》〔3〕。从器文看，下葬时瓶中当盛有黄豆、瓜子、人参、铅人、牡蛎和其

〔1〕《道藏》二十八册，539页。

〔2〕《道藏》十一册，205页。

〔3〕《道藏》六册，974页。

他药物。人参，用来代替家中生人以防受注，随家口之数，一人一参，人参九枚，尚存九口之家也。铅人，用来作为人葬之死者的替身，代受幽谪，免其沦为注鬼。黄豆、瓜子，不是供墓主享用的食物，而是用来作为死者在冥世交纳赋税的物品，也是让死者免受幽谪的一种措施，与铅人的用途不同，最后达到的目的却没有两样。“立制”即他器所著之“礬石”。《神农本草经》卷四：“礬石……癖（辟）邪气，一名青分石，一名立制石”〔1〕。《图经衍义本草》卷五“礬石”条：“礬石……有毒……不炼服，则杀人及百兽……一名立制石”〔2〕。“牡厉”当是蚌壳一类的东西。《神农本草经》卷二：“牡蛎……杀邪鬼，延年。一名蛎蛤。”〔3〕《图经衍义本草》卷三十一“牡蛎”条云：“牡蛎……杀邪鬼，延年。一名蛎蛤，一名牡蛤。”并引陶隐居云：“道家方以左顾者是雄，故名牡蛎，右顾则牝蛎尔。”〔4〕“故上复除之药”，“辟除土咎，欲令祸殃不行”。立制（礬石）用来“辟邪气”，牡蛎用来“杀邪鬼”，立制和牡蛎，都是器文前面所说的“上复除之药”。“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他器文所罕见，从中透露出当时人按生人社会生活设想幽冥世界意识形态的一些情况，是很有意义的材料。“黄神生五岳，主生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黄神越章印材料亦见于其他解注器文，并有实物出土，旧金石学文献著录尤多，由此器文可知，黄神既管生人名簿，又管死人名籍，掌握人之生死大权，是汉代极为重要的一位神祇，而且和五岳有联系。如果把“黄神生五岳”理解为五岳是黄神所创造，则黄神和天帝的地位应大体相当，黄神（黄帝）也就是天帝。“五岳”一词在此出现，又特别说明墓主张叔敬系“薄命早死”，也都是很值得注意的。

18. 日人中村不折旧藏大概是在陕西出土的灵帝熹平四年（175）墨书瓶，高七寸半，底径八寸，文 223 字，仅发表未注行数、未加标点之释文，无摹本材料。原释文云：

熹平四年十二月^①三月丙申天帝止封镇定邑里死人^②台
冢墓移丘函墓伯地下二千石墓上墓下中央大^③墓左墓右云门蔡酒蒿
里父老令胥文台冢子孙^④世无^⑤复有死者上天仓仓地下芒芒死人归

〔1〕（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80 页。

〔2〕《道藏》十七册，323 页。

〔3〕（清）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51 页。

〔4〕《道藏》十七册，659 页。

阴生人归阳生人有里死人有乡生人属西长安死人东属大山乐无相念
苦无相思大山将阅人参应□地下有适蜜人代行□作千秋万岁不得复
□生人相胥氏家生人子孙富贵豪彊訾财千亿万子孙番息谨奉金银□深
以谢墓主封填到收□□胥氏家冢中三曾五及皇□父母离丘别墓后葬
之殍勿令伐作各安其所旷户以闭累君后世令无死丧他如天帝日止镇
令^{〔1〕}

今作校读如下：

熹平四年十二月甲子朔，三日丙申，天帝止(?)封，镇定邑
里死人胥氏台冢墓。移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墓上、墓下、中
央、大□墓左、墓右、云(魂)门蔡(祭)酒、蒿里父老：令胥文
台冢子孙，后世无□复有死者。上天仓仓(苍苍)，地下芒芒(茫
茫)，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生人有里，死人有乡。生人属西长安，
死人东属大(太)山。乐无相念，苦无相思。大(太)山将阅，人
参应□。地下有适(谪)，蜜人代行□作。千秋万岁，不得复生
人。相胥氏家生人子孙，富贵豪彊，訾(貲即资)财千亿万，子孙番
(蕃)息。谨奉金银□深以谢墓主，封填到收(?)□□胥氏家冢中
三曾五[祖]，及皇□父母，离丘别墓，后葬之殍，勿令伐作，各
安其所。旷(圻)户以闭，累名后世，令无死丧。他如天帝日(?)
止(主?)镇令！

“天帝日止镇令”之“日止”二字，亦见罗振玉释他器文，然文义无解，亦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考古发掘出土器文字形不合，当作存疑为是。原释“累君后世，令无死丧”，文义相悖。“累”与“垒”古音、义相通，当从他器文释作“累名后世，令无死丧”，即胥家后累世诸不同名字的后代子孙，都不再有死者之意。此器文多别写，“旷”与“圻”同音，“旷户”当即“圻户”之别，指墓门，意谓死者葬毕，墓门掩闭之后，家中生人平安长寿，不再有死者葬入。“云门蔡酒”，无论“云门”或“蔡酒”，义均无解。他器文有称墓门为“魂门”者，解注器文冥官有“魂门亭长”与“墓门亭长”之异称，其实同为一官。盖墓门为死者魂灵出入之所，故有此称。“魂”字从云，

〔1〕《日》中村不折：《三代秦汉遗物的文字》，104页。

鬼旁或在其右或在其下，此处“云”当为“魂”字脱其鬼旁，或当时之省写、误书，或出土时脱去这部分笔画，以至如此。“蔡”字与“祭”字形相近，以“祭酒”为“蔡酒”，或出土时器文漫漶误识，也可能是原器书者误增草头所致。70年代，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西汉景帝四年（前153）墓出土4号木牍文云：“四年后九月辛亥，平里五大夫伧（张）偃敢告地下主：偃衣器物所以蔡（祭）具器物，各令会以律令从事。”文中“祭”字亦写作“蔡”^{〔1〕}，可为例证。“魂门祭酒”，当为山西某地出土熹平二年（173）瓶文之“魂门亭长”一类的冥祇。天师道道官多借世俗官名，汉代本有“祭酒”之官，此或亦与之有关，实为一值得注意的重要材料。

19. 日人中村不折旧藏灵帝光和二年（179）B型I式朱漆书瓶，据公布之释文，作校读如下：

光和二年，二月乙亥朔，十一月乙酉，直破，厌。天帝神师，黄〔神〕越章，谨为殷氏甲之家通东、南、西、西土圉困王，四方当生者，死者直□□□□□□□土□道神□：东方起土，太白□之；南方起土，辰星威之；西方起土，营惑□之；北方起土，填（镇）星□□之。甲乙庭坐，冥收左旁。趣召□己，辰先恐□。丑未对状，急还中央。殷氏移央（殃）去咎，远行千里，移咎去央（殃），更到他乡。故礬石厌（压）直□，曾青厌（压）东南，人辰上（辟？）土气，辟祸达志，远行千里。如律令！^{〔2〕}

发表材料时，附有释文与原器照片图版，但照片字迹晦暗，多模糊难辨，唯“殷氏移殃去咎”，原误释作“段氏移殃去咎”，字迹可见。前文原释“谨为殷氏甲之家”，据此推改。此瓶乃为殷氏甲入葬而设者。“礬石”、“曾青”，已见前解。“人辰上土气”一语，其义无解，辰、参二字音同，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人辰”可能是“人参”的误写。但考虑到器文并列之礬石、曾青及他器所见压镇解注所用之“神药”皆为矿物药材，从不用植物药材，人参见于解墓注文，除作生者之代人而外，亦无用于镇压者。故“人辰”亦当是辰砂之类的一种矿物药，不知写读是否有误字。又“上土气”，参照前面“礬

〔1〕 据俞伟超释文，见《关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座谈纪要》，《文物》1975年9期，13页。

〔2〕 日人编《书道全集》卷三，15页。

石厌（压）直□，曾青厌（压）东南”的文意，当系“厌（压）土气”之误书或误识。以药物、星官、方位王气及其他神祇压镇四面八方邪气，移殃远咎，以除注祟，本器文颇具特色。

20. 1975年，陕西宝鸡市五里庙东汉墓出土灵帝光和四年（181）D型Ⅰ式陶瓶一件，朱书十五行，约230字，据简报发表摹本（图版壹：39）及释文^{〔1〕}。其释文未加句读，作：

光〔和〕□〔年〕〔十〕〔二〕月八日〔丙〕
 □黄神北斗谨为杨氏之家后□之
 人世王等□□□□□□□之人〔家〕□□
 □□□□□□□□
 □死□不〔葬〕者□死□□□□□□□
 □□〔居〕冢〔地〕〔不〕得〔其〕□□〔月〕
 日〔时〕不□□□〔政〕钧厌刑□所〔在〕
 大□小□〔三〕□四□〔常〕一人三禁忌
 四时五行三丘五阜□重之
 〔朕〕八魁九□天〔赫〕〔四〕〔所〕天奥廿
 八宿五行□五□
 □□空指神凶怨□□祀复□□□解之
 □□五谷黄豆□〔酒〕〔马〕〔贿〕□□□
 □□□□□□□□□解去□□氏〔山〕
 〔到〕□阴□□□□□□□名〔罪〕□
 □□□□天下
 □□□□□小等〔得〕〔恩〕〔所〕□□□
 □生人□□□□□□□生人〔黄〕□神药
 〔王〕〔等〕□□□□□□□□

今校读如下：

光和四年十二月八日丙申，黄神北斗谨为杨氏之家后阨之人世

〔1〕 王光永：《宝鸡市汉墓发现光和与永元年间朱书陶器》，《文物》1981年3期，54页，图五。

王等……死□不葬者□死……居冢地不得其□□日时不……政钩
 (镇?) 厌刑□所困大□小□三□四□常一人三禁忌，四时五行，三
 丘五阜重之□(?)，八魁九坎，天赫四所，天奠(?) 廿八宿，
 五行□五□……诸神凶怨□□祀复□□□解之□□五谷黄豆……解
 去……名罪……生人，黄□神药……如律令!

文首“光和□[年][十][二]月八日[丙]□”之文，当释作“光和四年十二月八日丙申”，盖灵帝以桓帝熹平七年三月辛丑改元光和。在光和所跨七个年度中，十二月朔日及当日之干支，元年为丙午，八日为癸丑；二年为庚午，八日为丁丑；三年为乙丑，八日为壬申；四年为己丑，八日为丙申；五年为癸未，八日为庚寅；六年为丁丑，八日为甲申；七年为辛丑，八日为戊申。光和七年中十二月干支仅四年带丙干，故此器纪年应为光和四年十二月八日。文中“后死之人世王等”的“死”字，“复重之朕”的“复”字，皆为笔者参考其他器文补释。又“重之[朕]”的“朕”字，和“政钩厌刑”的“政”、“钩”二字之释，似亦未确。“朕”应系“鬼”或祸、殃(殃)、咎一类意义的字。颇疑“钩”当释“镇”，“镇厌刑□”乃镇压刑害之意。“三丘、五阜”，与山西出土熹平二年(173)张叔敬瓶文之“天帝使者告张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意同，是指主管坟墓事宜的两种神祇。“八魁九坎”、“廿八宿”皆星名，乃术者所信奉之星神，顺之者吉，犯之者凶，在此当为解死犯星咎之文。《通占大象历星经》(即汉甘公石申著《星经》)卷下载有八魁、九坎星象图及文字说明。八魁呈菱形(略似田字)排列之九星图，文曰：“八魁九星，在北落东南，主兽之官，五星及客守之，兵起，金、火星守之，尤凶甚。”九坎九星呈𠂔形，文曰：“九坎九星在牛南，主沟渠水泉流通，明灾起，暗吉。五星守，及犯之，水泛滥。西入斗四度，去北辰一百二十六度。”^{〔1〕}《后汉书·苏竟传》：“夫仲夏甲申为八魁。八魁，上帝开塞之将也。”李贤注：“《历法》：春三月己巳、丁丑，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甲辰、寅戌，为八魁。”王先谦《集解》谓：“王会汾曰：监本‘壬戌’作‘壬寅’。按上文言‘春三月己巳、丁丑，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甲辰、寅戌’，则十二支中皆越四位取之，独除去子、午、卯、酉不用也。冬甲寅当配以壬戌，作‘壬寅’者非是。定从宋本。惠栋曰：案《元珠密语·八魁》云：‘春己巳、丁巳，夏甲子、壬

〔1〕《道藏》五册，21、17页。

戊，秋己亥、丁未，冬甲午、壬辰’，与此异也。”但居延汉简和帝永元八年（96）历谱记载，是年十二月二日甲寅与十七日己巳，皆值八魁，与李贤注相合^{〔1〕}。甘肃敦煌石室出土后晋天福四年（939）《历书》残本记载，是年正月八日“岁位九坎”，十七日“岁对九坎”。^{〔2〕}又北宋《雍熙三年（986）具注历日并序》记载：“凡人年内造作举动，百事需先看太岁以下诸神将并魁罡，犯之凶，避之吉。今年……八魁日不开墓，复日不为凶事，九焦、九坎日不种蒔及开墓。”是年正月八日“岁对归忌血、八魁”，十一日“岁位九焦、九坎”；二月三日“往亡，岁前九焦、九坎”；十五日“岁前九焦、九坎”；二十四日“岁前九焦、九坎”。清人编《协纪辨方书》卷五，义例，“九坎”条：“《广圣历》曰：九坎者，月中杀神也。其日忌乘船、渡水、修堤防、筑墙垣、苫盖屋舍。《历例》曰：九坎者，正月在辰，逆行四季；五月在卯，逆行四仲；九月在寅，逆行四孟。曹振圭曰：坎者，陷也，险也，不平也，义与九焦同。”^{〔3〕}八魁、九坎值临之日多凶忌，故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三《生算度厄章》有“解……八魁临年之厄”之文；卷四《元皇上品六合生算章》有“或临八难之忧，或当七伤之忌，或临九坎之祸”之语^{〔4〕}。宋人《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上：“凡作丹忌日……八魁、往亡日，皆凶不成。”^{〔5〕}“圜□神药”，当即他器所见以为压镇的“雄黄神药”一类材料。“五谷、黄豆”，与他器所见“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者意义相同。“黄神北斗谨为王氏之家后死之人世王等……”，是术者以黄神北斗的名义，为王家后死之人开启先已有人葬入的墓室合葬行解复注之仪，与陕西宝鸡市铲车厂 M1 号东汉晚期多室砖墓出土二瓶文“黄神北斗主为葬者睢方（阿丘）镇解诸咎殃，葬犯墓神墓伯，不利生人者，今日移别，墓家无殃”同例。此瓶文虽残缺严重，内容却相当丰富。

21. 日人中村不折旧藏陕西西安郊区出土灵帝中平四年（187）D 型 I 式瓶（与熹平四年瓶形同）一件，高 7 寸，口径 3 寸 9 分，底径 7 寸 9 分，粉底朱书八行，仅发表残存释文，今转录如下：

中平四年五月乙酉朔二十五日己□□□谨告墓上墓下墓左墓右

〔1〕 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汉简缀述》，238 页。

〔2〕 《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六册，2367 页。

〔3〕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八八一册，293 页。

〔4〕 《道藏》十一册，326、327 页。

〔5〕 《道藏》十八册，748 页。

侠(?)墓□□□□□之家谨□□□□□□□别……门塞墓……千秋万岁……如……令^{〔1〕}

器文残缺过甚，无特殊内容，但有纪年，可补充器物年份分布方面的内容。

22. 20 世纪 50 年代，河南洛阳烧沟 M147 出土 M147: 13 号献帝初平元年（190）B 型 II 式解注陶瓶，器腹朱书十九行，全文器腹不能容，末二字书于器底外部。发表材料时未附摹本图版，仅著未加标点之释文，细审文意，当有误释。今据原释校读如下：

初平元年□□□□□□□□死者河南□□□郭□□□汝命薄蚤（早）死，不□西(?)天地久相视。汝自当下属棺槨，五谷万石，勿□□□□中□□勿来相求索。今托丹书，西□□另，生人前圉，死圉却略（路）；生人入成（城），死人出郭；生人在宅舍，死人在丘墓。各□千秋万岁，长圉圉，如律令!^{〔2〕}

“生人入成（城），死人出郭”，郭谓城郭，生人入城，死人出城，生死、出入相对，合生死异路之义。原释“生人入成（城），死人生郭”，文意相悖，若以“郭”为棺槨，则“生”字又当何解？生、出二字形近，故“生郭”当为“出郭”之误书或误释。“生人在宅舍，死人在□□”，参考前文“汝自当下属棺槨”，及上述山西临猗延熹九年（166）韩祔兴瓶文“生人自有宅舍，死人自有棺槨，生死异处，无与生人相索”之语，剥蚀二字，当属“棺槨”、“丘墓”一类之词。“长圉圉”，脱蚀二字，据前录陕西西安昆仑机械厂延熹九年（166）瓶“长相亡（忘）”之文，以意补之。“命薄蚤（早）死”云云，则与上述熹平二年（174）张叔敬瓶文之“死人张叔敬，薄命蚤（早）死”同例。“勿来相求索”，则又与上述中村不折旧藏永寿二年（156）瓶文“死生异簿，千秋万岁，不得复相求索”同例。“生人前□，□卸略”，颇疑当作“生人前行，死人却路（步）”。“今托丹书”，明确讲到了此种器文用朱书写，自有特殊取义。

23. 20 世纪 50 年代，河南洛阳中州路 M813 出土 M813: 6 号献帝初平二年（191）B 型 II 式解注陶瓶一件，底径 12.9、高 11 厘米，外腹白粉底

〔1〕（日）中村不折：《禹域出土墨宝书法源流考》，40 页。

〔2〕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154 页。

朱书。文曰：

初平二年三月乙未朔，二日丙申……□□草□□□□防己
□□□所诛害□□重行告丘丞、墓伯，移置他乡，为人立□□□立
□□□立，当便（使）家中及□□，转其央（殃）咎。付与道行人。如律令！^{〔1〕}

器文残缺过甚，未发表摹本材料。存字释文虽多不连属，文意大致可知。文末“付与道行人”一语，与后文所述另器之“转要道中人”，皆为研究有关宗教组织情况极为重要的材料。

24. 陕西西安和平门外 M4 出土献帝初平四年（193）C 型瓶一件，内盛类似汉白玉之石料一块，朱书十八行，凡 138 字。发表材料时并著摹本图版（图版壹：40）^{〔2〕} 及释文。诸家识读多有出入，今校读如下：

初平四年，十二月己卯朔，十八日丙申，直危。天帝使者谨为王氏之家后死黄母，当归旧闾（？），慈（兹）告丘丞、莫（墓）伯、地下二千石、蒿里君、莫（墓）黄（皇）、莫（墓）主、莫（墓）故夫人、决曹尚书：令王氏冢中先人，无惊无恐，安隐（稳）如故。令后曾（增）财益口，千秋万岁，无有央（殃）咎。谨奉黄金千斤两，用填（镇）冢门，地下死籍削除，文（无）他央（殃）咎。转要道中人，和以五石之精，安冢莫（墓），利子孙。故以神瓶震（镇）郭（槿）门。如律令！

陈直《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考释》^{〔3〕}，释读“王氏之家”为“王氏之冢”；“无他央（殃）咎”作“文他央（殃）咎”；“丘丞、莫（墓）伯、地下二千石、蒿里君、莫（墓）黄（皇）、莫（墓）主、莫（墓）故夫人、决曹尚书：令王氏冢中先人，无惊无恐”为“丘丞墓柏地下二千石，蒿里君墓，黄墓主墓，故夫人决曹尚书令王氏冢中。先人无惊无恐”。“王氏之冢”，“冢”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134 页文；133 页图 4 图；图版捌，1、2。

〔2〕 唐金裕：《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文物》1980 年 1 期，95 页，图一。

〔3〕 陈直：《文史考古论丛》，393～39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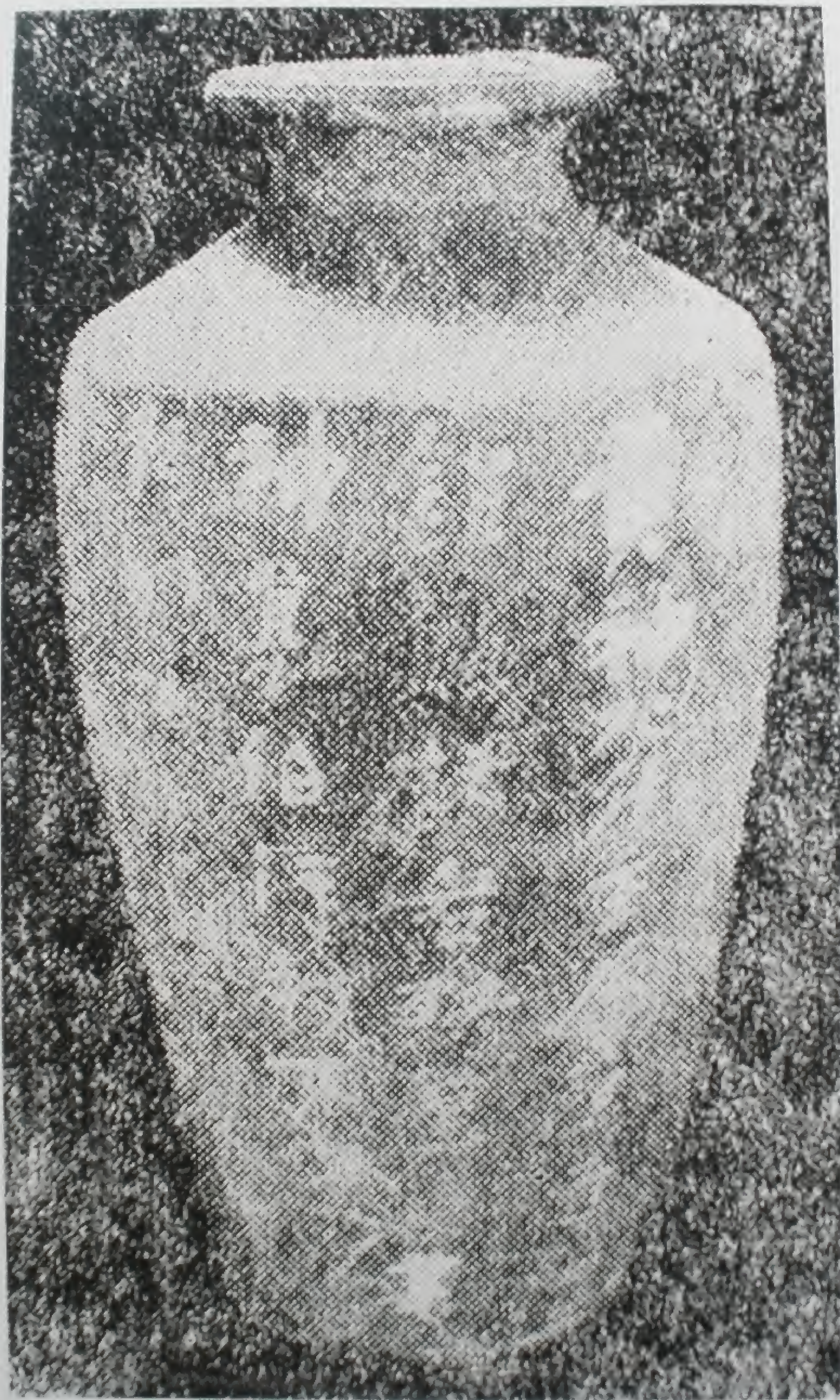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为“家”之误释，无用多论。“文他央（殃）咎”，其义无解，此中之“文”字当释为“无”，不仅据文意可定，其字形笔画亦与前文“无惊无恐”之二“无”字相同，摹本可证。“莫黄”即“墓皇”，亦属下文丘丞、墓伯一类的冢墓之神。前述陕西长安三里村永元十六年（104）纪年墓出土加氏瓶文有“告墓皇使者”一语；后述河南洛阳汉墓出土灵帝光和二年（179）王当铅券有“敢告墓伯、魂门亭长、墓皇”之文，均可为证。“莫主”即“墓主”，即前述山西出土熹平二年（173）瓶文“天帝使者告张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冢丞、冢令、主冢司令、魂门亭长、冢中游击等”中之“墓主”，亦系主管丘墓之一种神祇，而非一般所说墓内所葬死者意义上的墓主，已见前论。结合前引诸道书记载考察，无论从本器和其他整个器文考察，不妥之处是很明显的。它是以行术人天帝使者的口吻，为王家黄姓妇人择日葬尸墓室，向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蒿里君、墓皇、墓主、墓故夫人、决曹尚书等主管坟墓事宜的神祇传达天帝的命令，要他们保证先已葬入墓中的王家祖先保持安定，不要因为重行开启墓室入葬王黄氏一事而引起惊恐，从而让王家子孙后代无灾无祸，人丁兴旺，家道富昌。此墓为多次合葬多室砖墓，在初平四年（193）王黄氏入葬之先，早已不只一次葬入死者，故王黄氏称为“王氏之家后死黄母”，并有“令王氏冢中先人，无惊无恐，安穩如故”之说。“谨奉黄金千斤两，用填（镇）冢门，地下死籍削除，文（无）他央（殃）咎。”埋入黄金，大概是用来奉献冢墓诸神，买通关系的，数量如此之大，不太可能是实物，应是一种明器。“以神瓶震（镇）郭（槿）门”，与上述河南偃师建宁四年（171）瓶有“封冢神瓶”文字，均为此种解注瓶亦称“神瓶”之证。结合前面“和以五石之精”的文字看，瓶中应当盛有雄黄、丹砂、礬石等合成的五石神药。“转要道中人，和以五石之精，安冢墓，利子孙。”是说在葬墓过程中主持经办这种解注仪式的是“道中人”，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天帝使者”之类的人士。这一材料的重要意义，前面已曾提及，以后将更有详论。

以下校录考释，属无纪年而器文保存较多者。

25. 陕西宝鸡市铲车厂 M1 号东汉晚期十字形多室砖墓出土 D 型 I 式朱书陶瓶两件，发表材料时附有原器照片（图版壹：41）^{〔1〕}及摹本图版，未作

〔1〕 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市铲车厂汉墓》，《文物》1981年3期，50页，图十三（M1：21号瓶）。



图版壹：41

释读。今据摹本分别加以释读。M1: 21 号瓶文（图版壹：42）^{〔1〕}，可释作：

黄神北斗主为葬者阿丘镇解诸咎殃，葬犯墓神墓伯，不利不便，今日移别，殃害需除。死者阿丘等，无责妻子、子孙、侄弟、冥昏（婚），因累大神。如律令！

26. 陕西宝鸡市铲车厂 M1 出土 M1: 11 号瓶，有摹本图版（图版壹：43）^{〔2〕}，可释读作：

黄神北斗主为葬者睢方镇解诸咎殃，葬犯墓神墓伯，不利生人者，今日移别，墓家无殃。睢方等，无责妻子、孙子、□妇□，因累大神。利后世生人子孙。如律令！

此器文字与上器基本相同，文义明晰程度，似更甚于前者。术者在为死者阿丘举行入葬仪式时，直接以黄神北斗神的名义，一方面告诉墓伯及其他主管墓葬事宜的墓神，如果墓葬过程中对他们有所冒犯，给他们带来了麻烦，应予谅解，下葬之后，免除其一切罪责殃祸。同时也警告入葬的阿丘本人，从此不要再来牵缠家中妻子、子孙、兄弟、侄辈和其他有亲属关系的生人，以免因生人受到注害而累及主管墓葬事宜的神祇遭到追究。既云“无责妻子”，则阿丘当为男性死者。“黄神北斗主为葬者阿丘镇解诸咎殃”，《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西汉末年纬书《河图握拒》也讲到“黄帝名轩，北斗黄神之精”。^{〔3〕}黄神和北斗，到底是不同的两个概念还是同指一事，它们的关系值得研究，但黄神即黄帝是比较明确的。《道法会元》卷二一六引《九天玄女召告秘法》云：“北斗居天中，斡玄元化。故经曰：‘为造化之枢机，作人神之主宰，是以人之一身吉凶祸福，莫不系焉。’”^{〔4〕}黄神、北斗材料，均分别屡见于其他东汉墓出土镇墓解注器物，与此相合。

27. 河南密县后士郭两座东汉晚期大型多室画像石墓，出土朱书解注陶瓶多件，可惜字迹大部脱蚀，仅 M1: 122 号 B 型 I 式瓶保存文字稍多，发

〔1〕 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市铲车厂汉墓》，《文物》1981 年 3 期，48 页，图六。

〔2〕 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市铲车厂汉墓》，《文物》1981 年 3 期，48 页，图五。

〔3〕 《太平御览》，368 页。

〔4〕 《道藏》三十册，339 页。

黃神北斗主為墓者阿立
 鎮解諸君殃墓犯墓
 神墓伯河利不便今日
 移別殃害須陳死者阿
 立等黑責妻子；孩姪
 弟家昏因累大神如律序

黃，上外王局養者睢方鎮
解，石殃養犯墓神墓伯
不為生人者片日務別墓
家無殃睢方等無責人子孫
子燔婦弟因累十神為生
人後世子孫如津片

表材料时附有照片图版（图版壹：44）^{〔1〕}、七行四十七字之摹本（图版壹：45）^{〔2〕}及释文。唯释文有误字，今据摹本图版校读如下：

黄帝填（镇）冢中□臧（藏）尸，死人行阴，生人行阳，各自有分画（划），不得复交通，莫复来归地上。□亡人参解离（？）
（下缺）

此器文虽仅存前面部分，但以黄帝的名义行镇解之术，强调死者入葬之后，阴阳有别，各自有各自的不同活动范围，死者长居地下幽冥世界，永远不得再回到地上与生人接触，解注的意思讲得特别清楚。由“人参”之文可知，当年瓶中曾放入人参实物作防避生人受注的代人用品。原发表释文，“镇”、“解”二字未释；特别是将“莫复来归地上”释作“其复来归地上”，是说希望死者再回到地上，两者含义完全不同。如此释读，不仅与前文之“不得复交通”语意相悖，也和整个这种器文的主题思想相悖，错误是很明显的。若不加矫正，径为引用，势必造成混乱。另 M1：67 号同式瓶文字残缺尤甚，发表有器图及照片图版可供参考（图版壹：46）^{〔3〕}。

28. 日人中村不折旧藏 B 型 I 式朱泥书陶瓶一件，据发表释文校读如下：

天帝使者，黄神越章，为天解仇，为地除殃（殃），主为张氏家镇利（刑？）害宅，襄（禳）四方诸凶殃（殃）。奉胜神药，主辟不详（祥），百祸皆自肖（消）亡，张氏之家大富昌。如律令！^{〔4〕}

括弧内文字为引者所加，原释“镇利害宅”，颇疑“利”乃“刑”之误识，意谓压镇邪鬼精怪刑害墓主张氏家宅。若谓压镇“利害宅”，则文义难通。本器文意易明，无需多论，唯以天帝使者与黄神越章同时列于文首，为墓主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土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2期，118页，图一七，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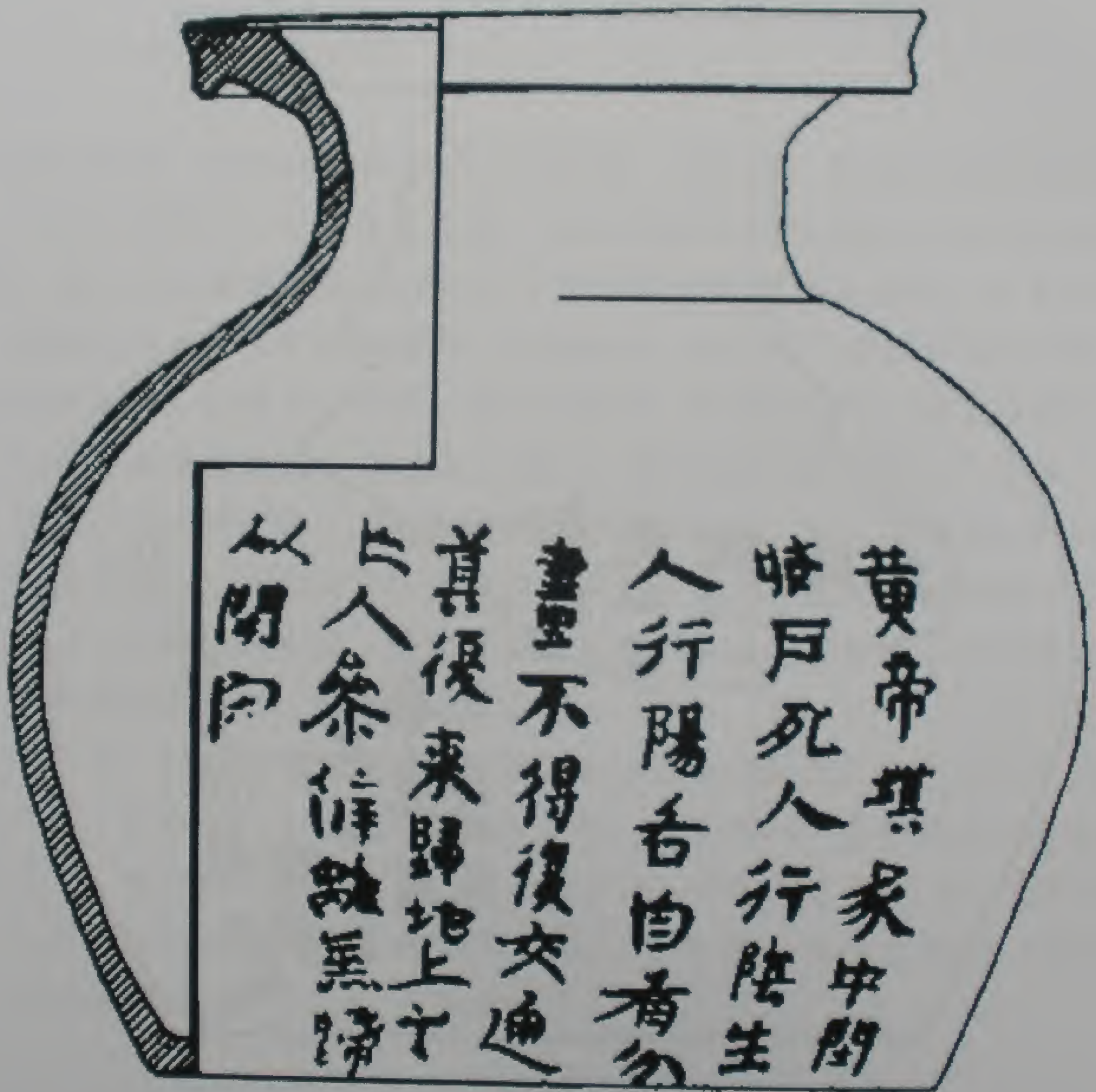
〔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土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2期，117页，图一。

〔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土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2期，117页，图一六，2。

〔4〕 日人编印《书道全集》卷三，15页。



图版壹：44



图版壹：45



图版壹：46

张氏之家禳解祸殃，应理解为行葬术者天帝使者，假黄神越章之名代天帝行事，不是说天帝使者即黄神越章神，这是值得注意的。又文中多作以四言为主之韵语，亦颇具特点。

29. 陕西潼关吊桥东汉杨震家族墓群之2号杨震多室砖墓（时代在和帝永元之后），在前室券顶封土内出土5件D型Ⅱ式朱书陶瓶，瓶腹朱书文曰：

中央雄黄，利子孙，安土。^{〔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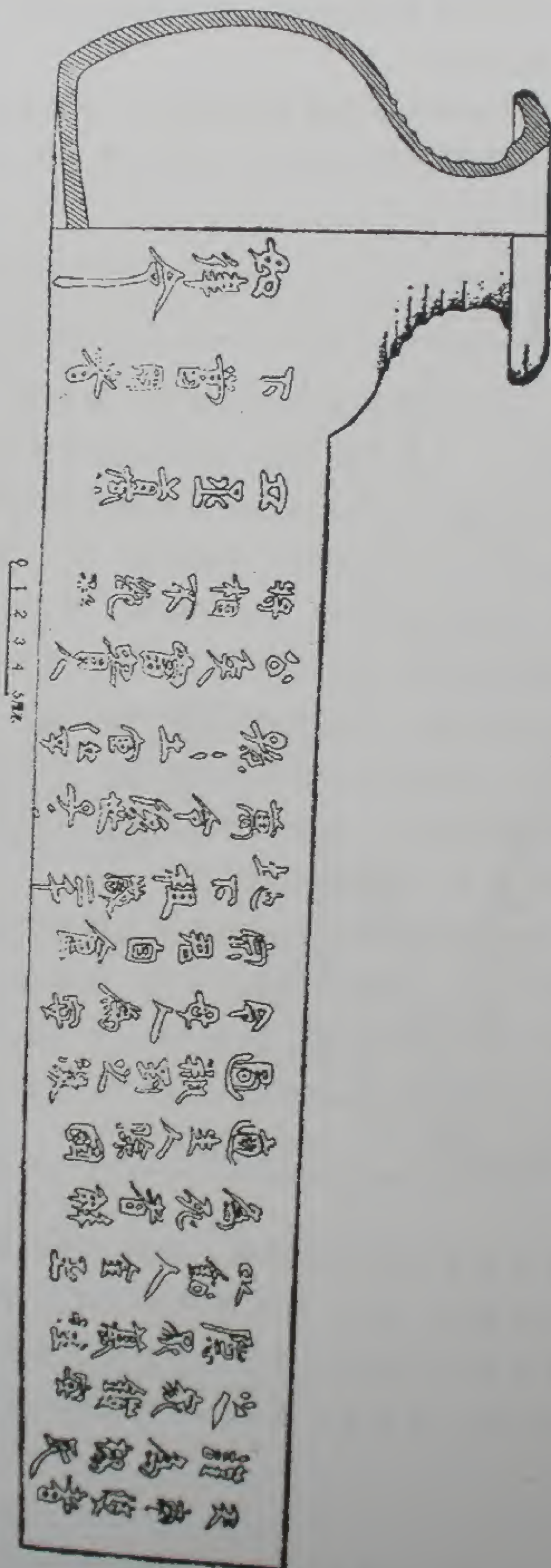
器文至为简短，颇与前述陕西户县朱家堡一器相类。简报发表材料过于简略，不仅只著释文，未附摹本图版，也没有说明其他四瓶文字是否与此完全相同，器文是否清晰。从同时出土5件的数量情况和发表的1件文字内容看，颇疑另外4件文字各不相同，分别按东、南、西、北四方不同方色，放入不同的药物，如南方以丹砂，东方以曾青，北方以磁石，西方以礞石等文字，以与中央雄黄相应。他处出土瓶文，常有说明瓶中放入“五石”神药者，此五石之五种矿物，正好分具五种不同的颜色，除了实际的药物功能之外，应该与五方、五色的五行宗教观念有关。这种在墓顶放置压镇五方解注瓶的例子，他墓亦间有之。杨震系东汉显贵，在他的墓中出土这种解注器材料，具有重要的意义，后面再详细论说。

30~33. 河南灵宝张湾东汉晚期弘农杨氏墓群之M5出土B型Ⅰ式朱书陶瓶5件，其中M5:1号瓶内盛铅人2枚，男女各一，男者铸出下垂的性器以示性别，唯字迹已剥脱莫辨。其余M5:2、M5:12、M5:14、M5:35四件，文字保存完整，内容基本相同。M5:14号器文发表有摹本（图版壹：47）及未加句读之释文^{〔2〕}。今校读如下：

天帝使者谨为杨氏之家镇，安隐（稳）冢墓。谨以铅人、金玉，为死者解适（谪），生人除罪遏（过）。瓶到之后，令母人为安，宗君自食地下租税二千万。令后世子子孙孙仕宦，位至公侯，富贵将相不绝。移丘丞、墓伯，下当用者。如律令！

〔1〕 陕西省文管会：《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记》，《文物》1961年1期。

〔2〕 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年11期，79页，图二。



图版壹：47

“以铅人、金玉，为死者解适（谪），生人除罪过”，M5：35号瓶作“以铅人、金玉，为死者解适（谪），立代生人除罪过”。金玉用来奉献地下冢墓之神，买通关系，铅人用来作为冢中已葬男女死人的替身，代受罪罚，都是起解注的作用。男铅人一枚，代男性死者，女铅人一枚，代女性死者。“瓶到之后，令母人为安，宗君自食地下租税二千万”，谓放入镇墓瓶之后，可保墓主平安，不受鬼神侵扰，并且和男性死者“宗君”一起在冥世享受二千石租税的生活。是此墓为夫妻合葬墓，夫君先死先葬，此瓶系后来葬入女尸时放入。又，一墓放入解注瓶5件，其意义器文虽未说明，当与上述潼关吊桥杨震墓者相同。

34. 日人中村不折旧藏山西某地出土陶瓶文，今按原释文另加标读。曰：

 礬石八两在东方，金日从革成积刚。□上去害纯厚高，五行相制天之常。青龙不鸣利墓皇，白虎不威两不伤。王氏富贵歌作倡。如律令！^{〔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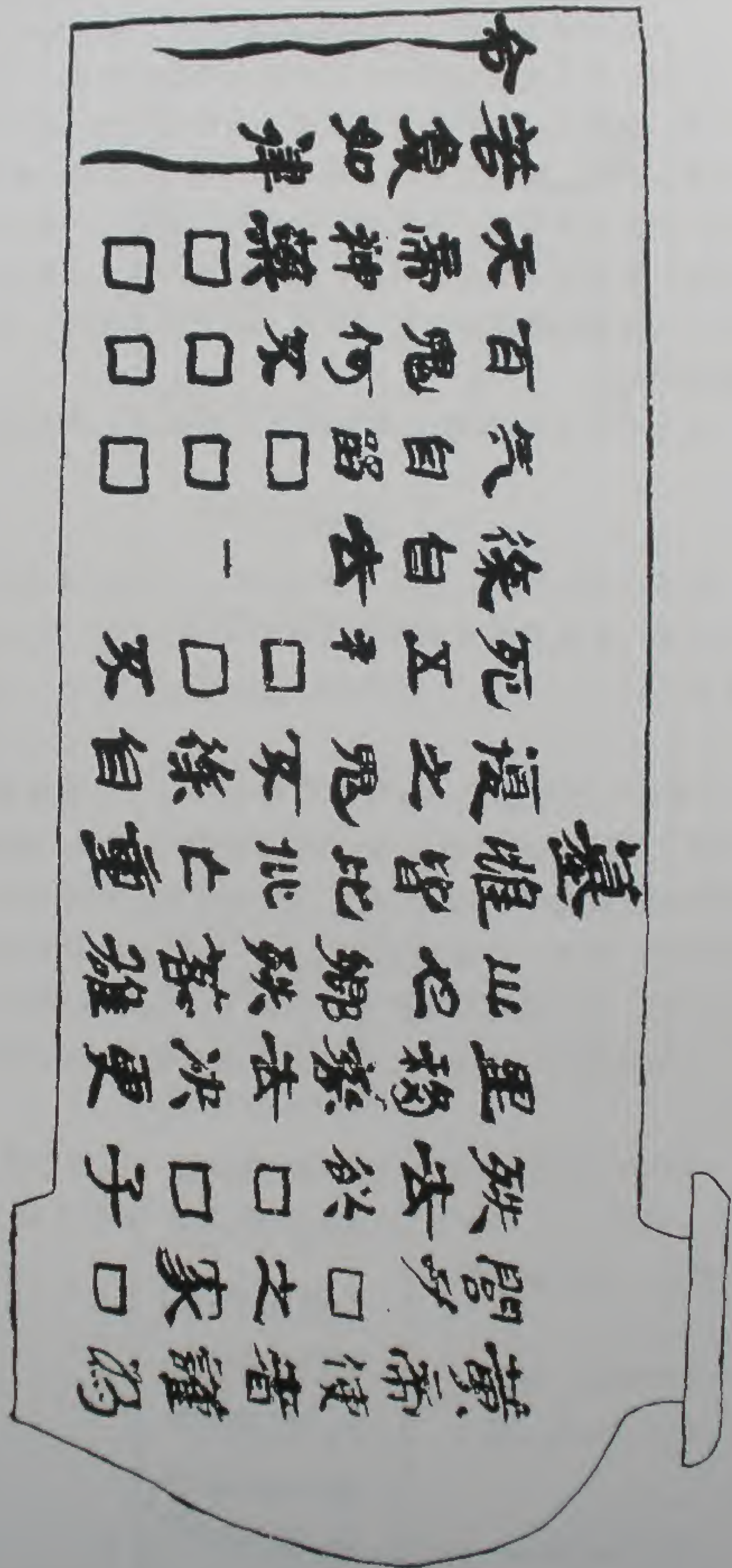
“礬石”、“墓皇”已见前释。阴阳五行相生相克，乃道教理论思想很主要的一部分内容，“礬石八两在东方……五行相制天之常”，相制即相克。此语与山西临猗所出延熹九年（166）瓶之“镇冢雄黄，四时五行，可除咎去殃”，性质寓意相类。青龙、白虎乃四神之属，也是后来常见的道神，他器不多见，在此出现，亦自有其研究价值。本器文通作隔句为韵之七言句，无“天帝神师”、“天帝使者”字样，与他器之告移或檄文式者不同，颇类咒语，也是一特点。

35. 1981年在陕西韩城市北关姚庄晨钟村一座东汉墓中，出土A型解注瓶一件，腹部朱书14行，发表材料时附有器图及器文摹本（图版壹：48）^{〔2〕}、释文。原释器文作：

 黄帝使者，谨为
 阎□□之家，移

〔1〕（日）中村不折：《三代秦汉遗物的文字》，105页。

〔2〕贾麦明：《韩城市汉墓出土阎氏朱书陶瓶考释》，《东南文化》1993年3期，60页。



图版壹：48

殃去欲，□□子
 里，移咎去殃更
 山也乡，殃咎雄
 雌，皆比□亡，重
 复之鬼，不徐自
 死。五殃□□，不
 徐自去。□□□
 □□自留□□□
 百鬼何不疾行，
 天帝神药压镇
 若急如律
 令！

另外，在第六行顶端“雌”字之上，尚有一“墓”字，高出整个十四行器文，研究者发表释文时不知何以未释录本字而未作交待。据介绍，器物出土时，文字“大部分清楚，个别因年代久远剥蚀严重，漫漶不可辨认”。比较其他瓶文，细审文意，有的字形摹写明显失真，句读亦颇有可商者。“移殃去欲”，不仅文义不通，亦与后文“移咎去殃”重复，当作“除殃去咎”。“□□子里”，其义无解，当从他器文作“𡩇𡩇他里”。“移咎去殃”，末字摹作决，不应释殃，显系“殃”字之误摹误释。“更山也乡”，其义无解，其他器文亦无此例，或应释作“更出(?)他乡”。“𡩇殃去咎，𡩇𡩇𡩇里。移咎去殃，更出(?)他乡”，是指将祸殃从墓主家人住地转移到其他乡里的意思。无论怎样，“也乡”应系“他乡”之误，这是不成问题的。两个“徐”字，文义与后文“百鬼何不𡩇𡩇”相悖，审其字形，可能摹写未确，颇疑当是“除”字。今试作校读如下：

黄帝使者谨为
 𡩇𡩇之家𡩇
 殃去咎，𡩇𡩇他
 里。移咎去殃，更
 出(?)他乡。殃咎雄
 墓雌，皆比(?)□亡。重
 复之鬼，不徐(除)自

死。五[] [] []，不
 徐（除）自去。[] [] []
 []气自留[] [] []
 百鬼何（如？）不[] [] []，
 天帝神药[] [] []。
 若（？）急如律
 令！

“黄帝使者谨为间[] []之家[]殃去咎”，是说“黄帝使者”（道士）为墓主间氏家的生人作法解除祸殃，将祸殃转移到别的地方，这是东汉解注瓶文中最常见的式句。说者以为“‘谨为’当作‘谨告’讲”，这是不对的。“重复之鬼，不徐（除）自死。五[] [] []，不徐（除）自去……百鬼何（如？）不[] [] []，天帝神药[] [] []”，是希望重复之鬼和五方邪神妖魅自行消亡或离开本地，不要注害墓主间家生人。如果不尽快自行了结，便将遭到放在墓中的丹砂、雄黄之类天帝所赐“神药”的压镇。文中明确讲到的“重复之鬼”，也就是注鬼，是很重要的材料。第六行顶端之“墓”字，若与正文相连作“殃咎雄墓雌，皆比[]亡”，则不能成句，当系单独存在而别有取义。我们推测，该字或为说明本器乃墓葬专门用品之标志。这种写法，尚未见有他例。

36. 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镇墓文》著录器型不明的朱书陶瓶文字，行书十五行，原释作：

大吉日直除天帝[]令移别（泐一行）弓[]主凉自薄命蚤[]
 [] []有[]自随不得[] []生人母弟[] [] []人[]属（缺四五字）
 []官生死异同勿[]相奸天帝所窆别约咎[]各如[]别约律令^{〔1〕}

可校读作：

大吉日直除，天帝[]令移别（泐一行）张（？）主。凉（谅）
 自薄命蚤[]，[] []有[]自随不得[] []（复注）生人。母弟[] [] []人
 []属（缺四五字）[]官生死异同（路），勿[]相奸（件）。天帝所
 窆，别约咎[]。各如[]别约律令！

〔1〕《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七册，2887～2888页。

文中在说“生死异路，勿□相作”的同时，两次提到“别约”，别约是指生死异路各自有别的约定内容。

37. 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镇墓文》著录器型不明的墨书陶瓶，隶字十七行，原释作：

南方赤□□属徵□臧在心齿其□朱爵身有□文（燎按此系仅存字之右旁）处大卩有火□□为，荧星丙丁，下入地中，丹沙石政，重□满以填□主忧五□辟金兵主填以後宜虫桑。如律令

□世无咎（此行在底部）〔1〕

由于器文泐脱，存字笔画模糊，以上释文，看来颇有未确。今试作校读如下：

南方赤帝，□□属徵，□臧在心，齿（？）其□朱爵（雀），身有□□。处大□有火□□为荧星丙丁。下入地中，丹沙石政（？），重□（？）满以填（镇）。□主忧五□（？）辟金兵。主填（镇）以後，宜虫桑。如律令！

□世无咎（此行在底部）

当时墓中，东、南、西、北、中五方，当各有一枚，其文按五行方位而有所不同，此瓶为其中的南方一器，南方、丙丁、火、朱雀、丹砂、荧星（荧惑），都是一致的，“辟金兵”当是南方之火克西方之金。“重□满以填”和“主填以後”的“填”，都是指举行镇鬼法术仪式和起镇鬼的作用。根据其他解注器文，丹砂为用于解墓注的“五石”神药的一种，其色红，亦与南方方色相应。“重□满以填”，“满”为墓主算尽当死，故疑句中泐字为“复”，谓墓主死后若为重复之鬼祟害家中生人，将通过镇解墓注法术仪式受到镇压。五方五帝，南方赤帝，故文首“南方赤□”泐脱之字，当为“帝”字无疑。宫、商、角、徵、羽为五音，与五行相配属火，故疑“□□属徵”，当作“圆属徵”，但因在整个东汉解注器文中尚未见有他例，这只是一种推测。本器文字，总的说来虽然和其他解注瓶文大体相同，但有不少值得注意的独特内容。与上述日人中村不折旧藏灵帝光和二年（179）瓶文：“天帝神

〔1〕《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七册，2886页。

师，黄〔神〕越章，谨为段氏甲之家通东、南、西、北土气 木王……东方起土，太白□之；南方起土，辰星威之；西方起土，营惑□之；北方起土，填（镇）星□□之……段氏移央（殃）去咎，远行千里，移咎去央（殃），更到他乡。故罍石灰（压）直□，曾青灰（压）东南”；又山西某地出土陶瓶文“罍石八两在东方，金日从革成积刚。□上去害纯厚高，五行相制天之常。青龙不鸣利墓皇，白虎不威两不伤”比较接近。可惜保存不够完整，又无纪年，可能是东汉晚期的遗存。

器文残缺过于严重者，有的在保存下来的字句中，也往往有一些内容对研究整个解注瓶材料有一定的价值，有的还相当重要。以下仍按有纪年和无纪年（包括原来有纪年而后来脱落者在内）及时代早晚为序，摘要综合叙述如下。

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镇墓文》著录器型不明的朱书陶瓶文字，除前面讲到的之外，尚有顺帝“永建三年（128）三月辛未朔，三日癸酉，天地绝死德”；“帝□绝□□注”；“死人精注，主□□□为今死非□□即□复□持君□瓶□别□□赫丘丞、墓伯、中□二千石，各瓶别律令！”等语^{〔1〕}。“三月辛未朔，三日癸酉”，系根据历表复原。文中两次提到的“注”字，都证明其和解注有关，也是确切可靠的年代较早的纪年解注实物材料。

前及河南洛阳唐寺门前左室出土 M1:106 号 C 型瓶，器残，腹部朱书有文无符，器文，简报亦仅附摹本图版而无释文（图版壹：49）^{〔2〕}。据摹本材料，尚有“天帝（二字字形特大）”；“钩注”，“后死妇算，不得相防（妨）”；“□注安”；“如□□（律令）”等字句，断续可见。文虽残缺，大致的文意和性质还是比较清楚的，除死者姓名、年龄、性别等方面的内容而外，与 M1:66 号器大体相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后死妇”之词，与 M1:66 号器之“后死子”，也都说明同墓所葬之人，死亡和入葬时间虽有先后，但有辈份晚之人先死于长辈者，性别则男女兼备。据简报刊布墓葬平面图所见之棺具痕迹，左前室 4，右前室 2，左、右后室各 1，为多人多次合葬之多室墓，与器文所见入葬者有前死、后死男、女之别完全吻合。两室所出解注瓶器型不同，或与人葬年代、性别不同有关。桓帝永康元年（167）

〔1〕《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七册，2886 页。

〔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寺门两座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 年 3 期，38 页，图六。

纪年简瓦与 M1: 106 号ⅢC 型瓶同出一室, 其年代或大体相近。

陕西华阴县原岳庙公社油巷大队新村东汉晚期司徒刘崎家族墓群之 M5 出土 M5: 33 号 A 型陶瓶, 朱书九行, 残存部分, 除文首“天帝使者(神师)”及文末“如律令”而外, 尚有“刘氏”、“先死”、“去各(咎)”、“属阳”等字断续可见。中间一行“黄神越章”, 字形特大, 引人注目(图版壹: 50)^{〔1〕}。这和河南陕县刘家渠 M2 号东汉后期墓出土 B 型 I 式朱书瓶残存之“黄神越章”文字情况相同。

1997 年, 陕西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街道办事处瓦胡同村东汉晚期砖室墓出土 M33: 63 号 D 型 I 式朱书陶瓶(有铅人一件同出), 残存文字可见者有: “……死人公……死亡归□土……何……来相聚, 苦(若?)生人自属西长安, 死人自……”等语(图版壹: 51)^{〔2〕}。大意当为生死异路, 自葬之后, 各安其所, 不得再来相聚。“苦”字当释为“若”, 句作“不得来相聚, 若生人自属西长安, 死人自属囹圄”者甚明。

此外, 2001 年 3 月, 我们应邀前往大邑县文管所鉴定馆藏道教文物, 熟知该馆情况的原任馆长胡亮见告, 藏品中有本县汉墓出土朱书陶罐两件, 一件字迹清晰, 另一件已模糊难辨。因该馆迁至安仁与民俗博物馆合并, 库房文物位置变动, 新任保管人员一时未能取出观看。我们认为, 无论器形如何, 其文字内容均当与解墓注有关, 用途性质也应属于与上述诸器相同的范畴, 是研究整个东汉解注器极为重要的材料, 今后当争取机会对原器进行审视, 补作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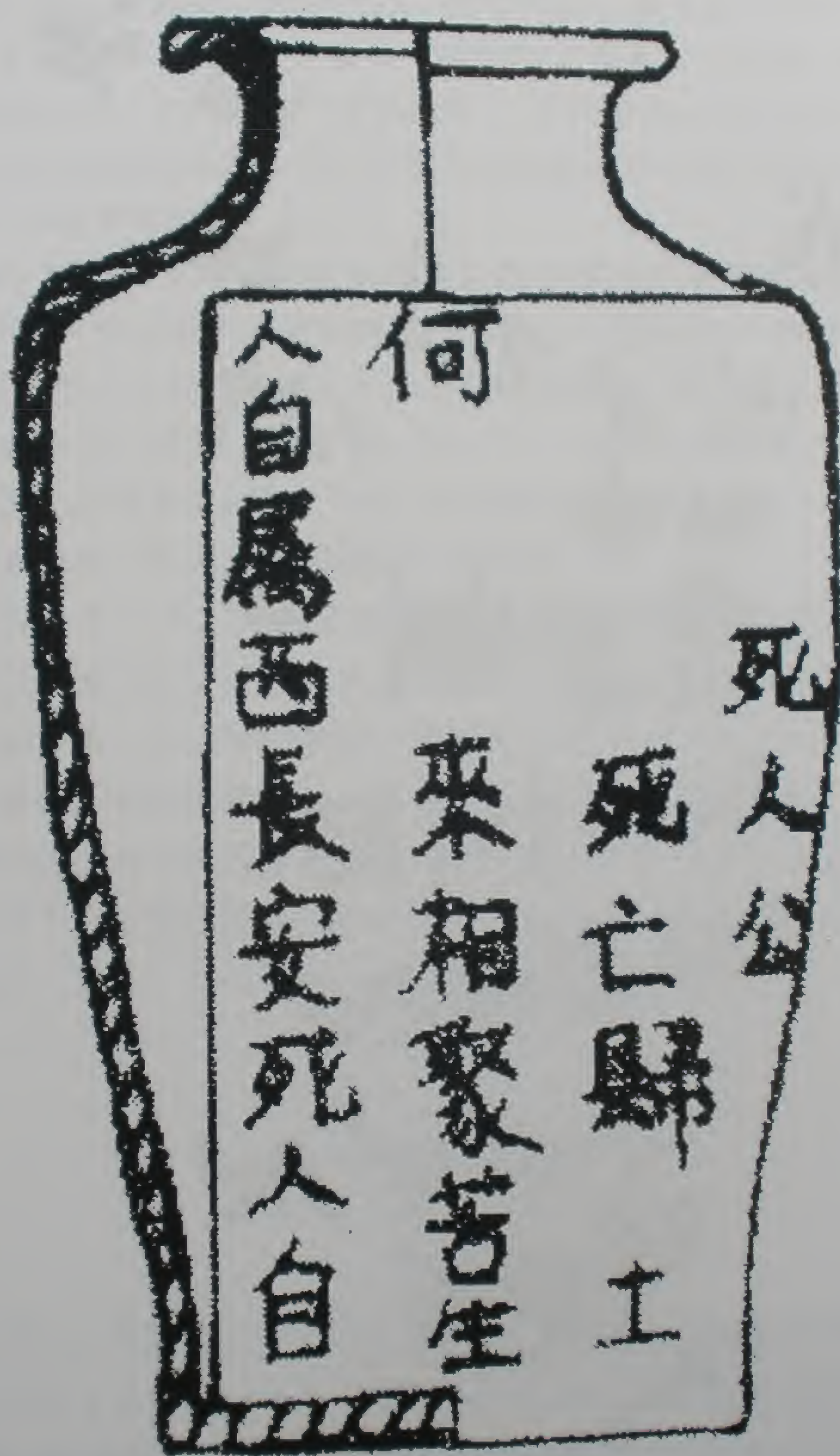
第三节 券版

东汉墓葬出土带解注文字的券版实物, 有铅券、铁券和砖券三种。铅券镌刻文字, 砖券文字镌刻或朱、墨书。1956 年, 河南陕县刘家渠发掘清理东汉墓 44 座, 其中 2 座墓曾出土带有朱红矿物颜料痕迹的铁“买地券”。

〔1〕 杜葆仁:《东汉司徒刘崎及其家属墓的清理》,《考古与文物》1986 年 5 期, 448 页, 图三。

〔2〕 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汉、后赵墓发掘简报》,《文博》1997 年 6 期 9 页, 图六, 10。

天
氏心息一子先无到
去各
神越童刺
家六方西
書銀者雪
下念清長不元
陽不元



图版壹：51

M107:1号券长27.6、宽6、厚0.35厘米,出土在前室近墓门处;M120:6号券长27.64、宽6.2、厚3厘米^{〔1〕}。类似的材料在其他地区的东汉墓中也有发现。罗振玉贞松堂旧藏铅券有“丹书铁券”之语^{〔2〕},可知铁券不仅是解注文器物之一种,而且是券版型解注器中一种主要的器型,所以本来是铅券也自称为“丹书铁券”,铅券实际上只不过是铁券的代用品罢了。可惜铁质易于锈蚀,出土铁券文字无一存者,仅略见朱迹而已。

罗振玉最先注意到,东汉墓葬出土的所谓“买地券”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完全是模仿人间实用的买地契约加以明器化,另一种则是与土地契约关系不大的“镇墓券”。并说后者“与地券不同。殆墓中并藏两券也。”“余旧藏延熹陶甗,有‘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东太山’”之语。“汉季崇尚道术,于此可见一斑。米巫之祸,兆于此矣。”^{〔3〕}一墓中并藏“买地券”与“镇墓券”的看法,是否符合实际虽尚未得到科学发掘材料的证明,但将两者加以区别,并且把这种“镇墓券”和解注瓶文字内容联系起来作比较,认为是同样性质的遗迹,提出它们应是张陵五斗米道前身性质的材料,这一见解却是完全正确的,可称卓识。我们这里作为解注器的券版,是指属于“镇墓券”类型而言,不包括属纯“买地券”型的材料在内。不过,事实上常常是在一券文字中同时包含有“镇墓券”与“买地券”两方面的内容,有人认为是“买地券与镇墓券结合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形式”。但完全不带“买地券”内容的“镇墓券”并不多见,其数量远远不及所谓“过渡形式”者。我们认为这种兼具两类券文内容的墓券,不是从“买地券”向“镇墓券”发展的一种过渡形式,而是买地券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后来新出现的解注性质镇墓券内容影响的结果。它是我们从解注器角度研究墓券类型的一个主要部分。这些,都是有必要加以说明的。

以下仍按年代先后为序,对有关文字分别加以校录考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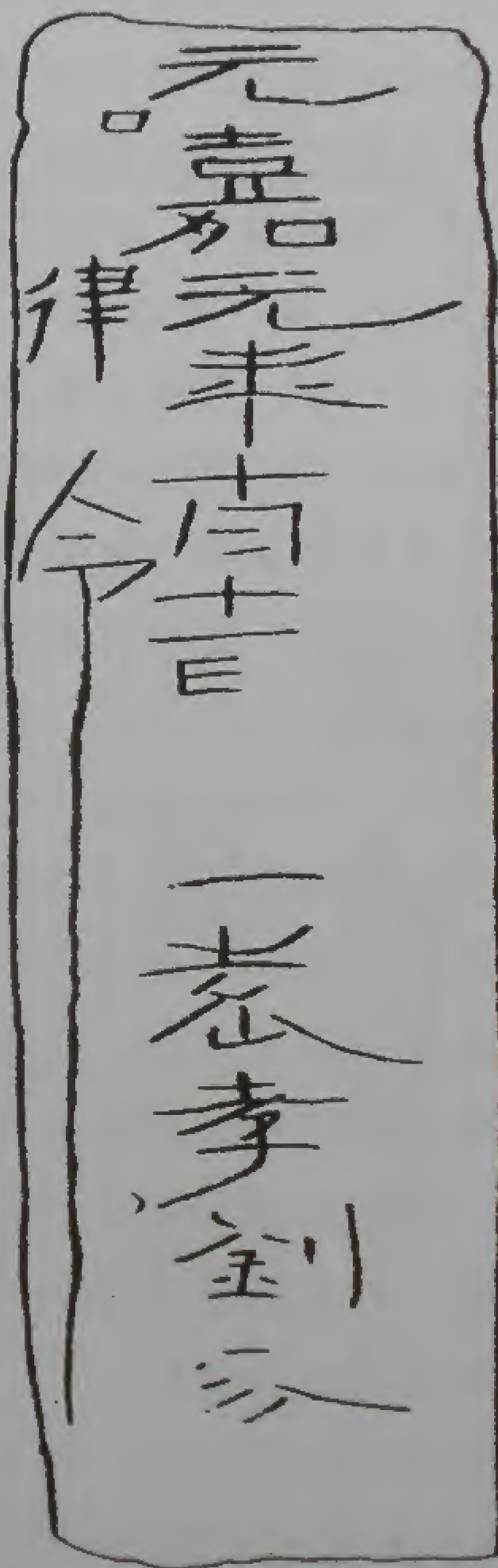
1. 罗振玉著录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袁孝刘铅券摹本及释文,“此券表里刻,背文大字如符篆,不可识,往岁见之津肆。”(图版壹:52)^{〔4〕}

〔1〕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年1期。

〔2〕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十三册,5219、5234页。

〔3〕 《东汉刘伯平镇墓铅券跋》,《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汉杂器,铅券门,《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十三册,5232页。

〔4〕 《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汉杂器,铅券门,《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十三册,5226~5227页。



正面刻字：“元嘉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袁孝刘冢……律令”。背文“大字如符篆”者，确为神符。如果单纯从文字部分看，不能说明多少问题。从神符形制内容看，其中包含日、月、山、鬼等字，写法也和上述解注陶瓶所见者相同。此券纪年无干支材料，学界有判其“元嘉元年”为南朝刘宋文帝年号（424）者。但从整个考古发现镇墓券和买地券材料考察，正式发掘出土的六朝实物不少，就形制而言，从西晋统治结束开始，进入东晋以后者皆为砖券与石券，绝无铅券出土。其神符的画法风格，亦与南朝地券材料迥异。此铅券当属汉器者无疑。

2. 罗振玉著录二十世纪初河南孟津出土灵帝延熹四年（161）钟仲游妻铅券。据罗氏释文，校读如下：

延熹四年，九月丙辰朔，卅日乙酉，直闭。黄帝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墓左、墓右主墓狱吏、墓门亭长，莫不皆在。今平阴偃人乡茌富里钟仲游妻，薄命蚤（早）死，今来下葬，自买万世冢田，贾（价）直（值）九万九千，钱即日毕。四角立封，中央明堂，皆有尺六桃券、钱、布、钒（当为铅字之别写）人。时证知者先□曾王父母□□□氏知也。自今以后，不得干（干即忤）□生人。有天帝教如律令！〔1〕

器铭除涉及买葬地部分外，余文与前述诸解注陶瓶没有什么差别，仍系以黄帝名义命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墓左、墓右主墓狱吏、墓门亭长等主管坟墓事宜诸神，自墓主钟仲游妻早丧（多属非正常死亡）下葬之后，即应断绝与生人之间的接触，不得再来侵犯生人。文中的铅人，自然是用来作钟仲游妻的替身代其在地下世界受刑狱之苦，为其解谪的。前文曰“黄帝告丘丞、墓伯……”，文末称“有天帝教如律令”，不唯黄帝与天帝的关系值得研究，“天帝教”一词的出现尤为值得注意。文中提到的平阴在洛阳附近一带，则此券当系洛阳汉墓所出。

3. 日人中村不折旧藏河南孟津出土灵帝光和元年（178）曹仲成铅券，

〔1〕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铅券有摹本及释文，称“此件近世出孟津，往岁见之津市。”《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十三册，5227～5229页。此据吴天颖《汉代买地券考》引日人仁井田陞按中村书道博物馆藏原器校释引读，见《考古学报》1982年1期。

据发表无标点之释文校读作：

光和元年，十二月丙午朔，十五日。平阴都乡南里曹仲成，从同县男子陈胡奴买长谷亭部马领佰（陌）北冢田六亩，亩千五百，并直（值）九千。钱即日毕。田东比胡奴，北比胡奴，西比胡奴，南尽松道。四比之内，根生伏财物，一钱以上，皆属仲成。田中有伏尸□骨，男当作奴，女当作婢，皆当为曹仲成给使。时旁人贾、刘，皆知券约。他如天帝律令！〔1〕

原释“女常作婢”，其义无解，“常”应释作“当”，以字形相近笔画模糊造成的误释。“四比之内”，谓前文所述四面与曹仲成地界相比邻范围之内。此券本属纯地契类型而不属解注型器物，但券末文作“他如天帝律令”而不作“如律令”，与前述日人中村不折藏熹平四年（175）晋文台瓶文称“他如天帝日止镇令”情况相类。它们和有关“天帝使者”、“天帝神师”等材料一样，特地突出“天帝”一词，显然也是受其影响所致。这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材料。东汉之平阴县在今河南孟津县境，故本券当出自河南孟津县汉墓。

4. 1974年河南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四十分厂1号东汉土圹前堂横列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耳室五部分组成，在出土5件B型Ⅱ式无字解注陶瓶的同时，前室西侧的耳室棺床上出土铅券一件，长40.5、宽4、厚0.2厘米，置于棺床西偏北位置，阳文五行，约250余字。简报发表有原器照片（图版壹：53）〔2〕、器铭摹本图版（图版壹：54）〔3〕及释文，未有解义。释文未加标点，与摹写均多有可商之处。因此器为经科学发掘所得实物，文字保存也比较完好，对研究此类材料具有特殊的价值，为慎重起见，今先过录原简报释文，再作校读。

光和二年十月辛未朔三月癸酉告墓上墓下中央主土敢告墓伯魂
门亭长墓主墓皇墓畱青骨死人王当弟伎偷及父元兴等从河南
□□□□□子孙等买谷郊亭部三陌西袁田十亩以为宅贾直钱万钱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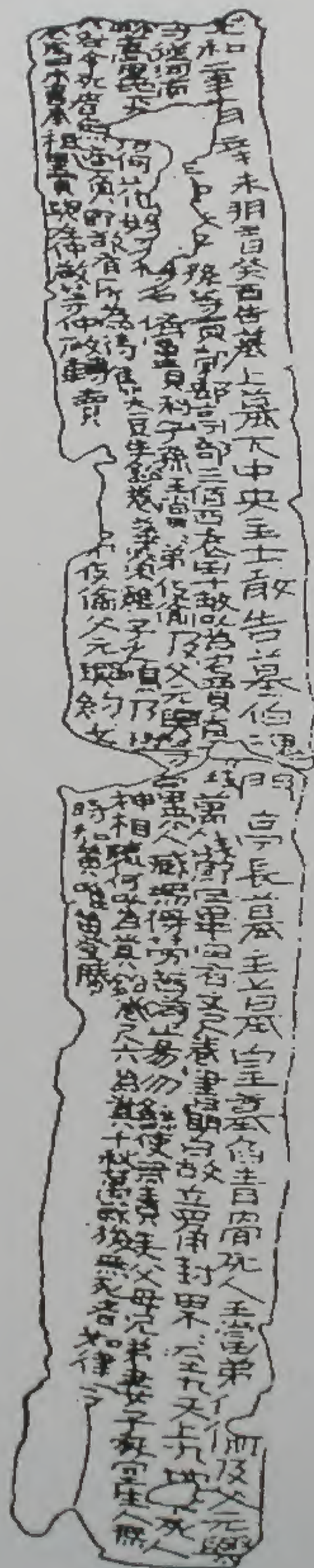
〔1〕（日）中村不折：《书道全集》卷三，16～17页；《三代秦汉遗物的文字》，95页。

〔2〕洛阳博物馆：《洛阳东汉光和二年王当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6期，54页，图四。

〔3〕洛阳博物馆：《洛阳东汉光和二年王当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6期，54页，图五。



图版壹：53



图版壹：54

日毕田有丈尺券书明白故立四角封界至九天上九地下死人归蒿里地下□□何□姓□□□佑富贵利子孙王当当弟伎偷及父元兴等当来人藏无得劳苦苛葛勿繇使无责父母兄弟妻子家室生人无责各令死者无适负即欲有所为待焦大豆生铅券华荣鸡子之鸣乃与□神相听何以为真铅券尺六为真千秋万岁后无死者如律令券成田本曹奉祖田卖与左仲敬等仲敬转卖□□□弟伎偷父元兴约文□□时知黄唯留登胜^{〔1〕}

细审摹本字形，参考有关他器材料发现：“谷邾亭部三陌西袁田十亩”，其义难解，“三”字实为一单字残存之左旁笔画，且画迹模糊，明显不能释为“三”字。前述罗振玉藏河南孟津出土延熹四年（161）钟仲游妻铅券此处文作“自买万世冢田”；中村不折旧藏光和元年（178）曹仲成铅券作“伯北冢田”；河北望都汉墓刘公砖券称“自以家田三□”作冢地，颇疑此文当释“谷邾亭部北陌西冢田十亩”或“北陌西家田十亩”，意谓从河南某姓子孙手中买得家传谷邾亭部西北方向私地十亩以作冢地也。“故立四角封界”之后，漏释一“界”字，文当作“故立四角封界，界至九天上九地下”。“当来人藏”，“人藏”无解，乃“入藏”之误释，入藏即入葬之意。“无得劳苦苛葛勿繇使”当释作“无得劳苦苛止，易（亦）勿繇使”，谓不得让死者王当等在冥世受到苛责，罚充劳刑苦役。道书文献记载死者受谪，罚作劳役，担沙负石，填江塞海，前论注鬼成因，已多有引录。“生人无责各令死者无适负”，乃“生人无央咎，令死者无适负”之误释。如此者尚多，文义难明。又“何以为真铅券尺六为真”之二“真”字，按后及罗振玉释安徽寿县东汉刘君墓石羊文“以为不信，石羊为真，谓“为真”乃“为证”之讹写例，当读作“何以为真（证），铅券尺六为真（证）”。今作校读如下：

光和二年，十月辛未朔，三月癸酉。告墓上、墓下、中央主土。敢告墓伯、魂门亭长、墓主、墓皇、墓咎：青骨死人王当、弟伎偷（？）及父元兴等，从河南□□□□□子孙等，买谷邾亭部北陌西家（冢？）田十亩以为宅，贾（价）直（值）钱万。钱即日毕。田有丈尺，券书明白。故立四角封界，界至九天上，九地下。死人归蒿里，地下□□何□姓□□□佑富贵，利子孙。王当、当弟伎偷

〔1〕 洛阳博物馆：《洛阳东汉光和二年王当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6期，55页。

及父元兴等，当来入藏，无得劳苦苛止，易（亦）勿繇使。无责父母、兄弟、妻子、家室，生人无殃（殃）咎。令死者无适负。即欲有所为，待焦大豆生，铅券华荣，鸡子之鸣，乃与□神相听。何以真（证？）铅券尺六为真（证）。千秋万岁，后无死者。如律令！

券成。田本曹奉祖田卖与左仲敬等，仲敬转卖□□□弟伎偷父元兴。约文□□，时知黄唯、留登胜。

此券除了少数文字与买地有关之外，大部分与上述解注瓶文完全相同，叙述详细，告诸墓神冢吏，令死者无谪，隔绝死生，免注祟生人，以保葬家生人平安长寿，文意明白。唯“即欲有所为，待焦大豆生，铅券华荣，鸡子之鸣，乃与□神相听。”为陶瓶文所未见，意何所指，需加考释。按此乃术者与墓神冢吏及王当、当弟伎偷及父元兴等人藏死者盟誓之言，谓严禁人葬死者之鬼魂再回到家中为祟生人，保证“后无死者”。如果他们不听从命令，要想使不利生人的行动合法化，除非烧焦了的大豆再发芽生长，铅券长叶开花，鸡蛋像活鸡一样啼鸣，那时才有可能。一言以蔽之，就是绝对不能实现的意思。在下面将要讲到的河北望都汉墓刘公砖券中，也有类似的文字出现。晋张华有言曰：“燕太子丹质于秦，秦王遇之无礼，不得意，思欲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白头，马生角，乃可。’”〔1〕乌鸦头上长出白毛，马头上长角，与此“焦大豆生，铅券华荣，鸡子之鸣”同义。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三《断除非所祭祀鬼神伏连章》记载：有注鬼“如欲更来复连某人者，当得河水逆流，白石水上浮，乱丝千丈，马角六尺，三足乌五十头，九尾狐三百头，可来相求。不能如此者，即与某人天别地绝，千年万岁，无相侵扰。”〔2〕我们把这一记载和上述券文相比较，简直如出一辙，甚至可以说就是对它很好的一个注解，两者的渊源关系，也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无得劳苦苛止，亦勿繇使”，“苛止”即盘问留难。《周礼·射人》：“不敬者，苛罚之。”东汉郑玄注：“苛，谓诘问之。”《汉书·王莽传》：“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颜师古注曰：“苛，问也。”“繇”即徭役，“繇使”即使服徭役。句谓王当兄弟父子下葬之后，墓伯、魂门亭长等主管冢墓诸神，不得任意盘诘留难，罚作徭役，使之备受劳苦。“券成”以后一段文字，说明墓地原是曹奉祖产，后来卖给左仲

〔1〕（晋）张华：《博物志》卷八，史补。范宁：《博物志校注》，95页。

〔2〕《道藏》十一册，324～325页。

敬，这次是从左仲敬手中直接卖给了王当兄弟父子，有黄唯、留登胜二人作证。当是记实文字，与前面的内容性质有所不同，故在“如律令”之后提行单独书写。这是一件很特殊的券例，附说于此。墓中同出五件无字解注陶瓶，当是与铅券配合使用，当年瓶内可能盛有丹砂、雄黄、五石之类的五种断五方之注的神药。从券文记载看，王当和他的弟弟伎偷、及父元兴等，似是一次同时下葬，这也是值得注意的材料。

5. 1955年，河北望都2号汉代大型多室砖墓出土砖券一件，长18、宽20厘米，朱书十行300余字，部分字迹模糊不清，同时发表摹本图版（图版壹：55）及释文^{〔1〕}。原释文未加标点，录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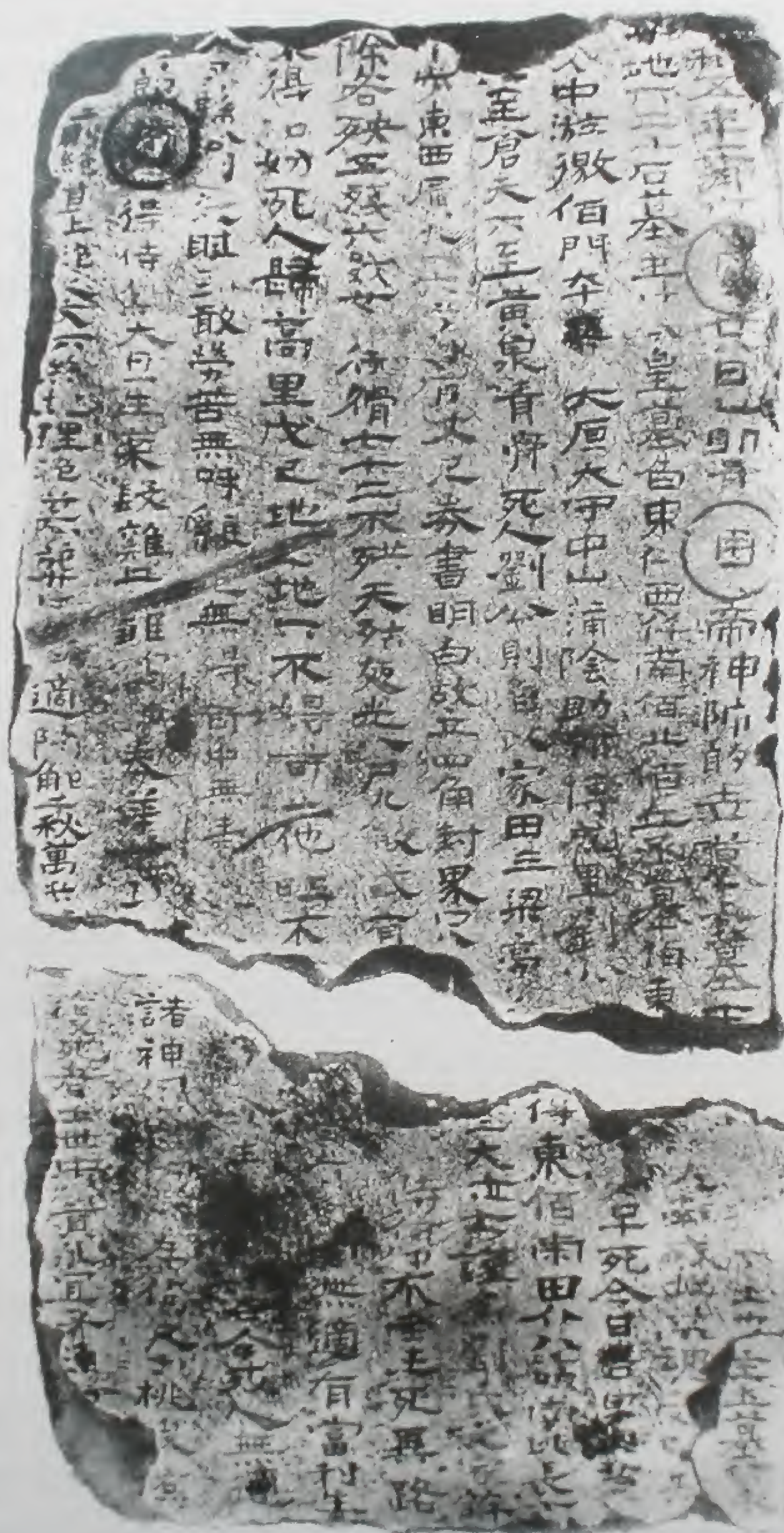
□和五年二月□□□廿八日乙卯□□□帝神□敢堯墓上墓下
……土□主上墓□永□地下二十石墓主墓皇墓召东仟西仟南佰北佰
丘丞墓佰东……南成北□魂□□□□□中游徼佰门卒史□太原太守
中山蒲阴助所博成里刘公……早死今日合墓□□□□上至仓天下至
黄泉青骨死人刘公则自以家田三梁□……东佰南田廿八亩南北长七
田步东西广九十六步田有丈尺券书明白故立四角封界□……大□士
谨为刘氏之家解除咎殃五残六□女□□猾七十二不□天□□光八尸
九□或有……□□不□生死异路不得相妨死人归蒿里戊己地田地下
下不婢□□他□不……无适有富利生人子孙□□□无敢劳苦无呼鸡
□无得田中无责……今死人无道□即□□得待田大豆生菜毆鸡上雒
□□券□□……诸神□□□□为□尺六桃□□□□则绝□上绝田文
下绝地理□墓葬□□适陰解千秋万……复死者田亩富贵永宜子孙
……〔2〕

细审摹本图版字迹和整个文意，以上释文错误脱漏不少。今校读如下：









































光和五年，二月戊子朔，廿八日乙卯，直（值）□。田帝神师
敢告墓上、墓下、……土□主上墓□永□、地下二千石、墓主、墓
皇、墓召，东仟（阡）、西仟（阡），南佰（陌）、北佰（陌）丘丞、
墓伯，东……南成北□魂田亭长、田中游徼、佰（陌）门卒史：□





〔1〕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望都二号汉墓》，21页，图一六。

〔2〕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望都二号汉墓》，1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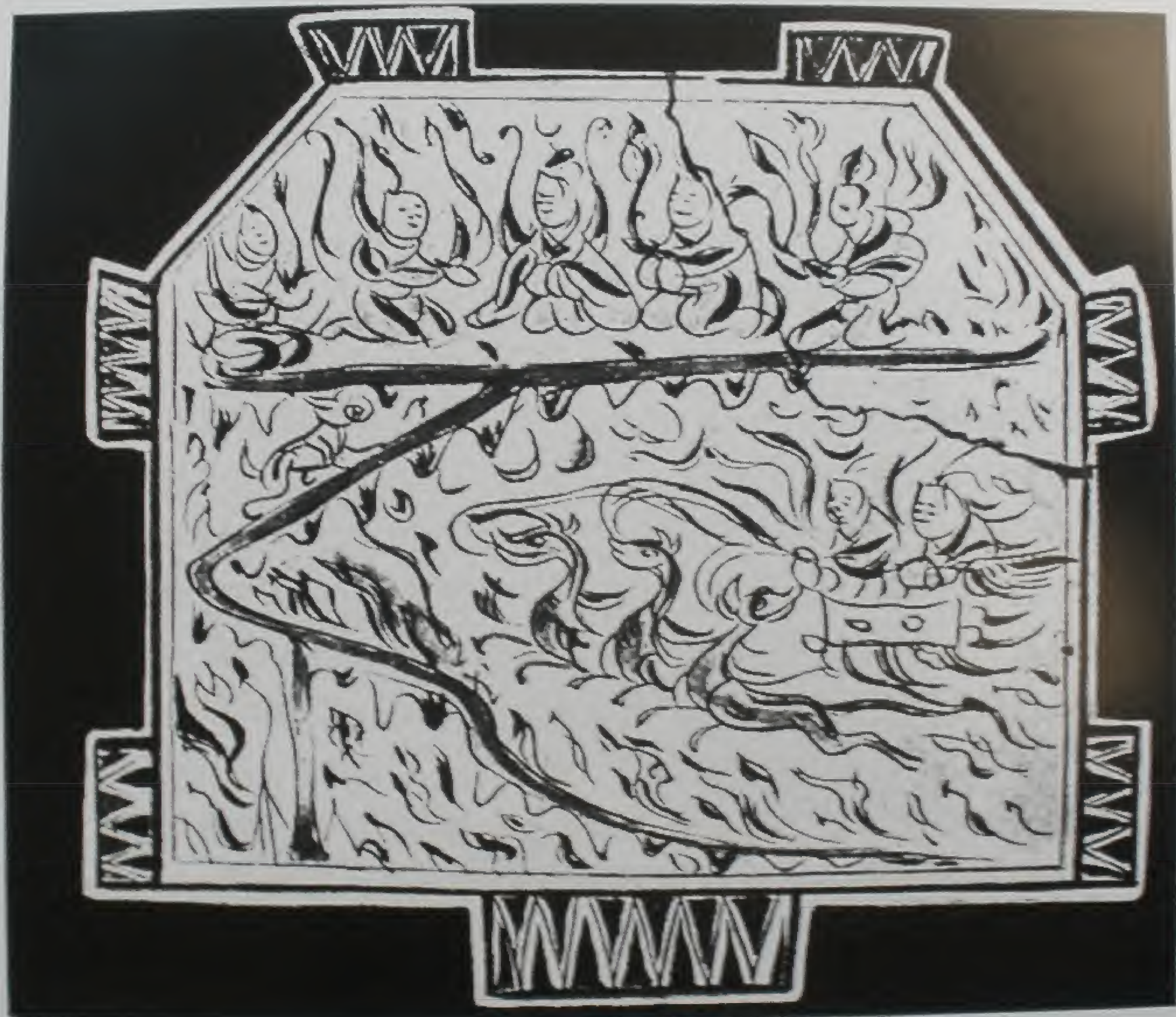


图版壹：55

太原太守中山蒲阴助所博成里刘公……早死，今日合墓，
上至仓天，下至黄泉，青骨死人刘公则自以家田三梁
 ……得东佰（陌）八亩，南北长七步，东西广九十六步，
 地有丈尺，券书明白。故立四角封界，……天帝谨为刘氏之家解
 除咎殃，五残六伤，女猾，七十二不（？）殃，天殒（？）夜
 光，八尸九煞，或有……不，生死异路，不得相妨，死人归
 蒿里戊己，地下，不得苛止，他时不……无适有富，利生人子
 孙，无敢劳苦，无呼鸡，无得苛止，无责……令死人无适
 （谪）。即，得待焦大豆生叶，段（断）鸡子雏，券
 ……诸神，何以为真（证）？尺桃（证）。则绝，
 上绝天文，下绝地理，墓葬适除解，千秋万岁，后世无复死
 者。世世富贵，永宜子孙……

此券与前述河南洛阳出土光和二年（179）王当铅券同出于灵帝光和之世，前后只相差三年，内容基本相同，可以互证。如“即，得待焦大豆生叶，断鸡子雏”，与王当券“即欲有所为，待焦大豆生，铅券华荣，鸡子之鸣，乃与神相听”，完全是同一个意思。也就是说，死人刘公葬入墓中之后，就应当“上绝天文，下绝地理”，断绝和家中生人的接触，不要来为崇害。如果要想如此，除非让炒焦了的大豆发芽长叶，破鸡蛋孵出小鸡，才有可能。“无得苛中”，其义无解，当为“无得苛止”之误释，王当券文可为参证。又此墓尚同时出土“压纹灰陶罐一件，唇口外卷，鼓腹平底，口径12.4、腹径24.2、通高24.8厘米。”从器物图版看，是典型的C型解注陶瓶，也是和砖券配合使用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墓出土“彩绘石枕形器”二件，平面为长方形，横断面为六角形，每件以长方形石板十二条、六角形石板三块组成，长35.3、宽11.6、高11.2厘米。石板两面皆彩绘云气、琪花瑶草、仙禽瑞兽、四神以及神话故事图像，先以墨线画出单线轮廓，然后再加填朱色或贴金，极为精美。我们认为，整个器物图像也都颇具道教色彩，与墓券性质相一致。位于中部之六角形石板图像，一面有东王公，一面有西王母，端坐上部，两侧各有二神仙侍坐。东王公一面仅有照片图版，图像不甚清晰，西王母一面并附摹本，下部绘云中三天马拉一车奔驰云中，车厢无盖，车内并坐二人物（图版壹：56）^{〔1〕}。东王公与西王母，在道教形成

〔1〕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望都二号汉墓》，29页，图三七。



图版壹：56

之后，被从原始神话中吸收过来加以美化，成了为天帝掌管仙籍的重要道神。此图所绘，颇疑为神人以云车迎墓主刘公往见王公、王母，经审查登仙籍而入天界的情景。

6. 安徽亳县出土灵帝光和六年（183）戴子起铅券，现藏于亳县博物馆。1970年春季，亳县城郊农民平整土地，发现中型砖墓一座，出土釉陶鸡、狗、楼房等明器和这件铅券。铅券出土时被农民折为三段，现长41.5、宽4厘米，与上述河南洛阳王当铅券大小基本相同，阴刻隶书四行，因多处锈蚀和断裂，现能辨认出的文字共175字，字面涂满朱砂。发表照片图版字迹不清，以下先照录韩、李二氏释文，再加考校于后。原释读云：

光和六年十月戊寅朔，卅日丁未。都乡戴子起自有父世一丘一顷田。南至海，北至陆；东至陌（原写作夏），西至千（阡），上半（伴）天，下入渊。子起□知之。子起薄命，去（原写作育）来归土，十月卅日死塋（葬），为子起买冢田万三亩，亩告冢□。为子起买冢田万三百，申告冢皂、丘丞、墓伯、□□、□伯，使子起来死塋（葬），无得□留止。子起食地下米，随[地]下糒；子起食地下□，随地下俗。墓王、魂神无责子起妻子、兄弟、父母。欲责囹圄，囹乌白头，马生角，乃与神[相听]。何以为信，尺六桃券丹囹圄为信。时乡里丁福沽酒各半，时正南使者丁子与神约，万岁不更。如律令。^{〔1〕}

按：“上半（伴）天，下入渊”，“半”字疑当释“升”，“升”、“半”字形相近易混，上升与下入相对，意亦贴切，若释为“半”或“伴”，皆不相宜。“子起薄命，育来归土”，原释“去来归土”，文义不通。原券“去”字仅为字之上部，下部尚有似“目”形笔画，参考上述有关诸器“薄命蚤（早）死”文例，疑当释为“蚤（早）”，谓戴子起短命而亡，早早地就来归葬土中。“申告冢皂、丘丞、墓伯”，“冢皂”其义无解，亦不见他例，疑当释“冢皇”，即他器所见之“墓皇”。“墓王、魂神无责子起妻子、兄弟、父母。”疑“墓王、魂神”当作“墓主魂神”。若按陕西宝鸡市铲车厂东汉墓 M1：11 陶瓶“睢方等，无责妻子、孙子、□妇□，因累大神”，在此当指入葬墓

〔1〕 韩自强，李灿：《亳县、阜阳出土汉代铅券笺释》，《文物研究》第三期，253～258页。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

中戴子起的魂神。“墓主”与“魂神”相连，与山西出土熹平二年（173）瓶文“告张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陕西西安和平门外汉墓出土献帝初平四年（193）陶瓶“告丘丞、莫（墓）伯、地下二千石、蒿里君、莫（墓）黄（皇）、莫（墓）主、莫（墓）故夫人……”中的“墓主”之指一种司墓事之神者不同。“欲责生人，待乌白头，马生角，乃与神[相听]。”“乌白头，马生角”，已见前释引张华《博物志》，与河南洛阳光和二年（179）王当券“即欲有所为，待焦大豆生，铅券华荣，鸡子之鸣，乃与□神相听”，及河北望都光和五年（182）刘公券“得待焦大豆生叶，断鸡子雏”义同。原释文中之“时正南使者丁子与神约”，“正南使者”于义无解，无论文献记载和出土材料，亦均无他例，参考上述性质相同之其他汉器文字，颇疑应释为“天帝使者”，盖“正”与“天”、“帝”与“南”，均各字形相近，券文此二字笔画模糊不清，以致误释如此。今试作校读如下：

光和六年十月戊寅朔，卅日丁未。都乡戴子起自有父世一丘一顷田。南至海，北至陆；东至夏（陌），西至千（阡），上半（升）天，下入渊。子起□知之。子起薄命，青（蚤）来归土，十月卅日塋（葬），为子起买冢田万三□，□告冢□。为子起买冢田万三百，申告冢皇、丘丞、墓伯、□□、□伯，使子起来塋（葬），无得□留止。子起食地下米，随[地]下裡；子起食地下□，随地下俗。墓主魂神，无责子起妻子、兄弟、父母。欲责□□，待乌白头，马生角，乃与神[相听]。何以为信，尺六桃券丹□□为信。时乡里丁福沽酒各半，时天帝使者丁子与神约，万岁不更。如律令。^{〔1〕}

从“墓主魂神无责子起妻子、兄弟、父母”的文字看，戴子起死葬之时，家中亲人不仅妻子、兄弟尚在，父亲和母亲也还活着，他们也都可能成为戴子起复注的对象，所以特为标出。

7. 1970年，安徽阜阳三十里铺前马庄东汉晚期残砖墓出土元延镇墓铅券一件，今藏于阜阳地区博物馆。铅券出土时完整，博物馆收得时，已被折断为六段，上部两角被剪去，成了如今的圭形。该券残长39.5、宽4.7~4.8厘米。阴刻隶书五行，存197字，字面涂朱。原释读云：

〔1〕 韩自强、李灿：《亳县、阜阳出土汉代铅券笺释》，《文物研究》第三期，253~258页。合肥：黄山书社，1988年。



[元]延至死时，**家室**甚痛，帐帟宿之，不敢失时。趋（该字原写作趋）走卜问，良日□□，东西迎工，南北迎医，立（该字原写作辛）（钱）财尽朔（索），非有狐疑。元延女凉自**薄**命禄尽，夭年逢灾，宗疾（族）悲痛伤侧（恻），处生癡人为元延解补：镜菰（奩）踈（梳）比（蓖），衣被禅覆，绮袍长襦，至有城郭棘室，**鸡**豚狗猪，所有皆具，**庄**（状）如生人之死。元延甚质，复来何来！前年枉死，延至今兹，家室悲伤，哭无解休。生人日夜蒿，死人日**覆**□；生人行地上，死人入地下，随倪离署，谁当坐者！墓伯、丘丞，案致比伍。自今以后，无得复来。女（汝）欲复来，持女（汝）卷齿，须乌如白，大□□□，千秋万岁，无复相索。玉帝为之，自有部介（界），他如天帝符卷，律令！^{〔1〕}

释文当有不确之处。“元延女凉自薄命禄尽，夭年逢灾，宗疾（族）悲痛伤侧（恻），”当释读作“元延女（汝）凉（凉——量）自薄命，禄尽夭年，逢灾宗（终）疾，悲痛伤侧（恻）。”“凉”字当为“凉”字形近之别写或误识，而“凉”与“量”同音，故此“凉”字当即“量”字。东汉刘熹《释名·释丧制》说：“人死气绝曰死，……士曰不禄，不复食禄也。”“老死曰寿……少壮而死曰夭，如取物中夭折也。”^{〔2〕}此券文谓元延量知，由于自己命薄，不幸食禄已尽，时逢凶灾之年，得病夭折而亡，令人感到悲痛已极。元延很可能是患了瘟疫之类的传染疾病，短命而死。“女（汝）欲复来，持女（汝）卷齿，须乌如白，大□□□，千秋万岁，无复相索。”“持”当释“待”。“大□□□”，若按罗振玉藏刘伯平券“须河水清，太山平”之例，或当释为“大（太）山平”。句谓自元延下葬之后，即不得再回到地上注祟家中生人，索取性命。如果要这样行事，除非等到自己直竖的牙齿变得卷曲起来，乌鸦变成白色。“他如天帝符卷，律令！”当释读为“他如天帝符卷（券）律令！”“玉帝”一词，要到南北朝以后才开始出现，汉代绝不会有作此称者。“玉帝为之，自有部介（界）”，当释读为“天帝为之，自有部介（界）。”汉晋墓出土买地券，多见“从天买地，以地买宅”之语，“从天买地”即从天帝买地，故此得言“天帝为之，自有部界”。券文末尾“他如天帝符卷（券）律令”

〔1〕 韩自强、李灿：《亳县、阜阳出土汉代铅券笺释》，《文物研究》第三期，253～258页。

〔2〕 （清）王先谦：《释名疏证补》，402～403、410～411页。

之语，尤足为其证。戴子起券言“子起薄命，蚤（早）来归土。”本券更说“元延女（汝）凉（量）自薄命，禄尽天年，逢灾宗（终）疾”。也都特地突出说明券主是非正常死亡。上述券、瓶文，亦多有其例，这是有特殊意义的材料，容后详论。今试作校读如下：

[元]延至死时，甚痛，帐帟宿之，不敢失时。赳（赳）走卜问，良日□□，东西迎工，南北迎医，辛（钱？）财尽朔（索），非有狐疑。元延女（汝）凉（凉——量）自薄命，禄尽天年，逢灾宗（终）疾。悲痛伤侧（恻），处生癡人，为元延解。补镜菴（奩）踈（梳）比（蓖），衣被禅覆，绔袍长襦，至有城郭棘室，鸡豚狗猪，所有皆具，庄（状）如生人之死。元延甚质，复来何来！前年枉死，延至今兹，家室悲伤，哭无解休。生人日~~夜~~蒿（？），死人日~~夜~~□；生人行地上，死人入地下。随倪离署，谁当坐者？墓伯、丘丞，案致比伍。自今以后，无得复来。女（汝）欲复来，待女（汝）卷齿，须乌如白，大□□□。千秋万岁，无复相索。天帝为之，自有部介（界）。他如天帝符卷（券）律令！

我们可将券文通译如下：

在元延死前生病过程中，家人十分着急，一方面在卧床上设置帟帐，让病人安处；同时又四处奔走，请医生诊断，找术者问卜，判明病因，找工人备办有关事宜，花费钱财，尽其所有，不曾稍有迟疑怠慢。但是，元延后来还是死了。元延应当知道，是因为自己命薄，阳命已终，所以死于凶灾（可能是瘟疫之类），染病夭亡。葬墓之时，家人悲痛之余，请来术者为之举行解注仪式，并特地补置了镜奩、梳篦和各种衣服、被盖等日常生活用品，城郭、房屋居室建筑以及鸡、狗、猪之类的家禽家畜模型明器随葬，大凡生时所有之物，一切齐备。元延是很聪明、很懂得事理的，对此应该理解，以后完全没有再回来纠缠的必要了。再回来又有什么意义呢？虽然从前年元延不幸死亡，迄今已时隔两年，家人仍然感到悲伤，时常痛哭不止。但按照生死有别的安排，生人在地上活动，死者在地下幽冥世界活动。元延入葬之后，就只得和丘丞、墓伯等丘墓之神打交道，听其管束。从此以后，不得再回到家中。如果要想再回

来，除非让直竖的牙齿卷屈起来，乌鸦长出白毛，也就是说，那是绝对不行的！总之，无论千年万年，都不要因感到冤屈而回到家中索取生人性命以为替代，求得自身的解脱。这是最高的神天帝所划定的界限，以上内容，有如天帝所颁发的符律令券文一样，必须严格执行！

从整个券文内容看，元延是在死后第三年才正式下葬，铅券是元延入葬时放入墓中的。

8. 20世纪50年代，河北无极东汉著名贵族甄谦家族墓群出土砖券一件，长44、宽19、厚9厘米，朱书十二行，残缺严重。简报未附摹本图版，仅发表释文如下：

……年……东……西……里故茂陵甄谦字孝恭……命……买广
……南北长百廿步东西广□步有……券书明白故立□（四）角封界
上至□天上□□为……家解除殃咎五……不□天……八尺九□或有
死日不……复不吉……不得相昉死人归蒿……地下瓦下不得……子
孙孝恭夹一岁……苦无呼繇无……苛山无主……孝恭绝草上绝天文
下绝地□（理）永宜子孙^{〔1〕}

以上释文当有脱误，有者可参考其他相关器文意补。如“甄谦字孝恭……命……”，乃云甄谦薄命早死。“上至□天上□□”，乃谓所买墓地地界上至青天，下至黄泉，皆墓葬出土买地券所习见虚拟之词，后一“上”字当有误释。“为……家解除殃咎”，谓为死者甄谦之家解除殃咎。“或有死日不……”，意谓死逢不吉之日，犯忌遭谪。“不得相昉死人归蒿……地下瓦下不得……”，当作“不得相妨，死人归蒿里……地下死人，不得……”，谓甄谦下葬之后，归于幽冥世界，即与阳世子孙家人永远断绝往来，“上绝天文，下绝地理”，各不相妨，以绝注害。“……苦无呼繇无……苛山”，当作“……苦无呼，繇无……苛止”。“繇”即徭役，谓死者即使在冥世被谪罚劳役或遭受其他痛苦，也不得呼唤家中生人代其受苦。山、止二字形近，“苛山”当系“苛止”之误释，解义见前。此券虽字迹残缺，内容与他券基本相同，文义亦大致能明。

〔1〕 孟昭林：《无极诸墓的发现及其有关的问题》，《文物》1959年1期。

9. 罗振玉旧藏东汉刘伯平铅券，上下两端皆有断缺，两面刻文共四行。今据罗氏释文校读作：

……□月乙亥朔，升二日丙申，[直]（值）执。天帝下令移：前雒东乡东郡里刘伯平薄命蚤（早）死……医药不能治，岁月重复，适与同时，魅（魅）鬼尸注，皆归墓丘。大（太）山君召……
囹圄相念，苦勿相思。生属长安，死属大（太）山，生死异处，不得相妨。须河水清，大（太）山平……□六丁。有天帝教如律令！

罗氏释文，并见《古器物识小录·镇墓文》^{〔1〕}与《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汉杂器，铅券门^{〔2〕}，后者并著摹本和释文。两书所载释文略有出入，今以《遗文》为主，《小录》作参考酌定。除“太山平”的平字，系罗氏《遗文》跋语按文义补释者外，余为引者校补。券文“薄命早死”；“乐莫相念，苦勿相思。生属长安，死属太山，生死异处，不得相妨”；“岁月重复，适与同时。”如此等语，为汉代其他解注器所常有。而“乐莫相念，苦勿相思”；“魅鬼尸注，皆归墓丘”，则例不多见，“魅鬼尸注”一语，于判定此等汉代镇墓文器与道教解注论、解注术之关系及定名，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魅，他处未见，古代字书亦无记载，颇疑当释作魅字，“魅鬼”即“魅鬼”。又券尾“有天帝教如律令”一语，除上述罗氏旧藏河南孟津出土延熹四年（161）钟仲游妻铅券一器之外，于此再见，证非孤例。有人释读作：“刘伯平薄命□药不能治，岁月重复适（谪）与同时，魅鬼尸注，皆归墓父。大山君召□相念，苦莫相思，生属长安，死属大山，生死异处，不得相防（妨）。”^{〔3〕}释文不全，姑置勿论，即以“皆归墓父”而论，亦义不可解。又“岁月重复，适与同时”，“适”之本义为“恰好”、“正好”。句文本谓刘平伯之早死，系因与前面死者的生辰干支相同，犯了重复之忌，为其注鬼崇害所致，可谓文从字顺，是正确解释解注文中“重复”一词的最好材料。“岁月重复适（谪）与同时”，按他器常见以“适”为“谪”借字之例释之，则文义反不能通。

〔1〕《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七册，2885页。

〔2〕《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十三册，5239～5232页。

〔3〕刘昭瑞：《〈太平经〉与考古发现的东汉镇墓文》，《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4期。

10.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汉杂器，铅券门，著其旧藏另一铅券摹本和释文^{〔1〕}。今据罗氏释文校读如下：

（上缺）□□西，生人𠙴𠙴，死人出郭，生死异处，莫相干（午即忤）□。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东〕太山。丘丞、墓伯，□（以上正面文）……南，故为丹书铁券，□及解适（谪）。千秋万岁，莫相来索。如律令！

“生人𠙴𠙴，死人出郭”，原释作“生人□□人出郭”。按前述河南洛阳烧沟M147出土初平元年（190）解注陶瓶，亦有“生人人成（城），死人出郭”之语，故原刻当脱写一字，或罗氏于此漏注一泐字符号。“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东〕太山”，补一“东”字，不仅可使“东太山”与“西长安”字数、方位相对应，此语亦见前例。“莫相来索”，谓入葬之死者不再回到家中索取生人魂魄以为替代，乃解注文的典型用语，亦见他器文字。

11、日人中村不折书道博物馆旧藏铅券之一。今据发表释文材料校读如下：

告立之印，恩在墓皇、墓伯、墓长、墓令、丘丞、地下二千石、地下都尉、延（挺）门伯史、蒿里父老、冢中守老蛇，程氏当葬父母，一藏五棺，无责家室孙子、儿妇，还𠙴𠙴𠙴。墓埋以后，（以下背面）长宜子孙。他〔如〕律令！^{〔2〕}

12. 日人西川宁次旧藏铅券之一。长 31.2 厘米，宽 3.9 厘米。今据发表释文材料校读如下：

告立之印，恩在墓皇、墓伯、墓长、墓令、丘丞、地下二千石、地下都尉、延（挺）门伯史、蒿里父老、冢中守𠙴𠙴，程氏当葬父母，一藏五棺，无责家室孙子、儿妇，还𠙴𠙴𠙴。墓埋以后，

〔1〕《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七册，5233～5234 页。

〔2〕日人编印《书道全集》卷三，17 页。

长宜（以下背面）子孙。他如律令！〔1〕

13. 日人西川宁次旧藏铅券之二。长 30.8 厘米，宽 4.5 厘米。今据发表释文材料校读如下：

告立之印，恩在墓皇、墓伯、墓长、墓令、丘丞、地下二千石、地下都尉、延（埏）门伯史、蒿里父老、冢中守老蛇，程氏当葬父母，一藏五棺，无责家室孙子、儿妇，还往归后。墓埋以后，长宜子孙。他如律（以下背面）令！〔2〕

以上三券当同出于一墓，除每面字数不同和少数原券文有个别脱字之外，完全是一样的。池田温《中国历代墓券考略》所载三券释文作：“告立之印，恩在墓皇、墓伯、墓长、墓令、丘丞、地下二千石、地下都尉、延门伯史、蒿里父老、冢中守志蛇程氏，当葬父母一藏，五棺无责。家室孙子儿妇，还往归后。墓埋以后，长宜子孙。他如律令！”《书道全集》所载一券“一藏五棺”，释作“之域五棺”，于义无解。又“告立之印”，“立”字未释。今从池田温《考略》释文改订。《书道全集》之“程氏”，原释“翟氏”，池田文释作“程氏”，未得原器照片及摹本材料对照，未知孰是，姑从程氏一说。墓道称为“埏道”，“延门”即埏道之门，地下守墓神之一的“延（埏）门伯史”，当即“墓门亭长”一类的守墓神，亦多见于东汉解注陶瓶文。“冢中守老蛇，程氏当葬父母，一藏五棺，无责家室孙子、儿妇，还往归后”，原释读作“家中守志蛇程氏，当葬父母一藏，五棺无责。家室孙子、儿妇还往归后”之释读，于义无解。“蛇”即蛇字之古代写法，“冢中守老蛇”之名，他器所未见，与墓皇、墓伯、墓长、墓令、丘丞、地下二千石、地下都尉、延（埏）门伯史、蒿里父老等相连属，当指一种地下守墓之神。“程氏当葬父母，一藏五棺”，是说程家子孙后人一次同时葬入父母的五副棺具于墓室，应该是一夫四妻妾同墓异棺合葬，与上述河南洛阳拖拉机厂光和二年（179）王当券同时葬入王当及其弟伎偷父元兴等数人情况相似。“告立之印”，其义

〔1〕 原载日人编印《中国书法名迹》，每日新闻社，1979年。今据池田温《中国历代墓券考略》转引。

〔2〕 （日）池田温：《中国历代墓券考略》，《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八十六册，228～229页，1981年。

解，不知识读是否准确。

三券无纪年，墓皇、墓长、墓令、地下都尉、延（埏）门伯史等墓神名称及文式，皆为东汉墓券及解注陶瓶文所习见，与魏晋时期的材料不同，当属东汉器物无疑。池田温《中国历代墓券考略》，将该三券称为“晋年次未详（四世纪）虵程氏葬父母镇墓券”，断为晋代遗存，不知何据。

上述 13 券，有纪年者 6 件，分属于桓帝元嘉元年（151）、延熹四年（161）和灵帝光和元年（178）、光和二年（179）、光和五年（182）、光和六年（183）六个年分，也都出在桓、灵两代，没有更早的实物发现。从目前所发现的材料看，说明此种券文解注器是在东汉末年桓灵时期新发展出来的一种类型。从地域情况看，凡材料明确者也都出在河南及毗邻之河北西南部及安徽北部，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第四节 石羊

前述 1963 年河南密县后土郭两座东汉晚期大型多室画像石墓，除出土朱书解注陶瓶而外，还各出 5 件石羊。M1 所出的 5 件，形制大体相同。羊角下卷，两眼圆睁，吻部有的平齐，有的缺角或缺一部分，呈不规则状。最大的一件（M1:115）高 29、长 24、宽 19 厘米（图版壹：57）^{〔1〕}；最小的一件（M1:137）高 21、长 21.5、宽 17 厘米（图版壹：58）^{〔2〕}。标本 M1:108（图版壹：59）^{〔3〕}、M1:85（图版壹：60）^{〔4〕} 附有图版，未注大小尺寸。M2 出土的 5 件，形制亦同。标本 M2:103，高 33.5、长 23、宽 19 厘米；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土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128 页，图二三，8。

〔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土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128 页，图二三，10。

〔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土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128 页，图二三，11。

〔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土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128 页，图二三，9。



图版壹：57



图版壹：58



图版壹：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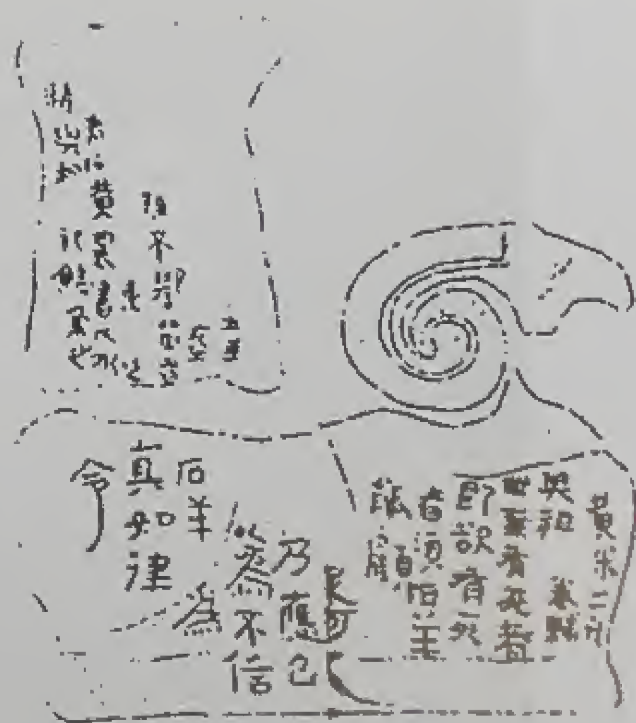


图版壹：60

M2: 95, 高 31、长 21、宽 18.5 厘米。(图版壹: 61)^{〔1〕} M2: 70 号器高 29.5 厘米, 长 24 厘米, 宽 20 厘米。标本 M2: 105 亦附有图版, 未注大小尺寸(图版壹: 62)^{〔2〕}。同时伴出的解注陶瓶, M1 有 A 型、B 型 I 式、B 型 II 式朱书 8 件, M2 亦有 B 型 II 式无字器。

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中室(主室)、后耳室、北耳室、南耳室、东耳室和西耳室等八个部分组成, 平面呈双十(卅)字形, 我们最初看到这一材料, 以其与解注瓶同出, 且每墓皆有 5 件之数而引起注意, 颇疑不是一般代表吉祥之物而与解注有关, 因无文字, 未敢确断。后来联系到早年安徽寿县刘君冢出土石羊文字判定, 这种石羊确为镇墓解注用品无疑。遗憾的是石羊和解注陶瓶在墓中的位置报告文字未加说明, 所附器物分布图由于缩小后制版, 用放大镜也无法看清, 不能对它们之间的组合关系作出进一步的具体了解。

罗振玉《石交录》卷一记载说: “汉代镇墓, 或用石羊。建德周氏藏小石羊四……二大者则高约一尺□寸, 长约一尺四寸余。两羊皆文字甚多, 书刻潦草, 大半不可识认, 唯后半略可识, 曰: ‘祀鰿鱼□黄米二升与祖口卷, 转世无有死者。即欲有死者, 须石羊能顾□□, 足可□□, 乃应招呼。以为不信, 石羊为真。如律令!’ 语亦不可解。其曰‘为真’, 殆‘为证’之伪耶?”^{〔3〕} 罗氏所称之建德周氏, 乃周进季木, 拓本影印材料见周氏所编《居贞草堂汉晋石影》, 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有一号羊拓本(图版壹: 63)^{〔4〕}、摹字(插图壹: 7)^{〔5〕} 和二



插图壹: 7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土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 157 页, 图四六, 2。

〔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土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 年 2 期, 157 页, 图四六, 1。

〔3〕 《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 三册, 887~888 页。

〔4〕 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 十一册, 497 页。

〔5〕 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 十一册, 58~59 页。



图版壹：61



图版壹：62

漢居巢劉君冢中石羊題字第一石



图版壹：63

号羊拓本（图版壹：64）^{〔1〕}、摹字（插图壹：8）^{〔2〕}。此亦为与铅券、陶瓶相同的解注文器物。“转世无有死者”，“转”字疑当释“后”，“后世无有死者”，上述解注镇墓券、瓶文常见此语，谓死者下葬之后，天帝下令司冢诸神，为死者解谪，为生人除祸殃，生死异路，断绝注祟，让墓主家生人，后世不再有死者，已于前屡说之。“即欲有死者，须石羊能顾□□，足可□□，乃应招呼。”谓入葬之死者欲为注祟，取家中生人性命以为替代，须待石羊的头能自己前后顾盼转动，足能行走，方可实现。



插图壹：8

这和上述洛阳王当券之“即欲有所为，待焦大豆生，铅券华荣，鸡子之鸣，乃与□神相听”；望都刘公券之“□即□□，得待焦大豆生叶，断鸡子雏”；刘伯平券之“须河水清，太山平”；安徽阜阳元延券之“自今以后，无得复来。汝欲复来，待汝卷齿，须乌如白……千秋万岁，无复相索”，属同类措词，一样的意义。“以为不信，石羊为真。”罗氏以为“真”或应释为“证”，观上述诸券版、陶瓶文例，当以释“镇”为宜，盖以石羊为镇压邪神鬼魅之法物也。

周季木《居贞草堂汉晋石影》影印另外三件石刻拓片，一称“西岳神符刻石”，拓本高27、宽35厘米（图版壹：65）^{〔3〕}。罗振玉云，此石“前有大字二行，首行上凿方孔，方广约寸有半，其文仅‘凶息鬼佐’四字可识。‘凶’上一字及‘佐’下之字，状若符篆，不可晓。以后文字七行，虽潦草，大约可辨。曰：‘西岳神符，金师之精，其斧越积石崖，位在西岳参拔之旁，□□百适，及与□形魂，以下臧归窈冥□□□□□□□除□□□定死人名魂门主□乃与三精。急急如律令！’语殊不可晓。然知五方必有五石，此乃西方一石也。往视唐人墓中有女青文，亦五方各置一石，观此，知此风已权舆于汉季矣。”^{〔4〕}罗氏推测当年冢中原应有五岳神符五石分置五方，这是对的，只是后来除“西岳神符”仅存而外，其他东、南、北、中四岳神符石刻

〔1〕 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十一册，498页。

〔2〕 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十一册，59页。

〔3〕 周季木：《居贞草堂汉晋石影》，209页。

〔4〕 罗振玉：《石交录》卷一，《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三册，888页。

漢居巢劉君冢中石羊題字第二石



图版壹：64



图版壹：65

已于出土后散失。又所存另一石周氏称“西南之精刻石”，拓本高24、宽34厘米（图版壹：66）^{〔1〕}。罗振玉云：“石上角亦凿方孔，孔以后有字七行，文曰：‘西南□精，出入人生□，际命□□执法□建六虚塞，除刘元□家冢□，青黑漆书之，以除百适。急急如律令！’前有‘西南’字，岂五方之外，西南、西北、东南、东北四隅，亦有镇石欤？”^{〔2〕}细审拓本图版，“出入人生□”当为“出入金□”之误释。另一石周氏称“建墙刻石”，拓本高25、宽20厘米（图版壹：67）^{〔3〕}。罗振玉云：此“石上角亦凿方孔，孔后存字五行，文曰：‘天墙建立，灵曜主守天门，建立十二□以山精主压□墓奎十二□狱丞主□刻石□书□不□来，鬼不得去，其有犯者，执（此间约缺四五字）天门以压冢’，此后缺损，文末亦必有‘急急如律令’。此石不载方位，不知置墓中何处矣。”^{〔4〕}细审拓本图版，“建立十二□”，缺释一字当系“填”即“镇”字。“建立十二镇”，当指举行如咸阳东汉墓永平四年（61）解注陶瓶文“建立大镇”一类复杂的大型解除墓注的宗教仪式。“主压□墓”，当释“主压此墓”。“主□利石”当释“主死利后”，谓当使死者（墓主）有利后之子孙而不为害。徐书拓本图版，石羊文字作螺旋形排列，或取似此羊角形之象。密县汉墓石羊无文而同出解注陶瓶有文，两者当如寿县刘君冢出土石羊之与“西岳神符”一类宗教性器物相互配合使用者。

徐书所著该墓所出尚另有璧形刻石一件，字数甚多，亦多模糊不能通读（图版壹：68）^{〔5〕}。据徐乃昌释文，可句读作：“曰（白？）天帝告除居巢刘君冢恶气。告东方青帝，主除黄气之凶；告南方赤帝，主除西方白气之凶；告西方白帝，主除青〔气〕之凶；告北方黑帝，除北方黑帝（以上五字衍文）主除赤气之凶；告中央黄帝，主除北方黑气之凶；告大丁天门□□名曰候社，下刻（剋）五气之要。主除刻（剋）去凶，〔子〕子孙孙寿老。如律令！”^{〔6〕}罗振玉《石交录》卷一云：此石“回环刻字凡五匝，其文字潦草，不能尽识。其可辨者，首行当中穿处，首称‘居巢刘君冢’。又有‘东方青

〔1〕 周季木《居贞草堂汉晋石影》，20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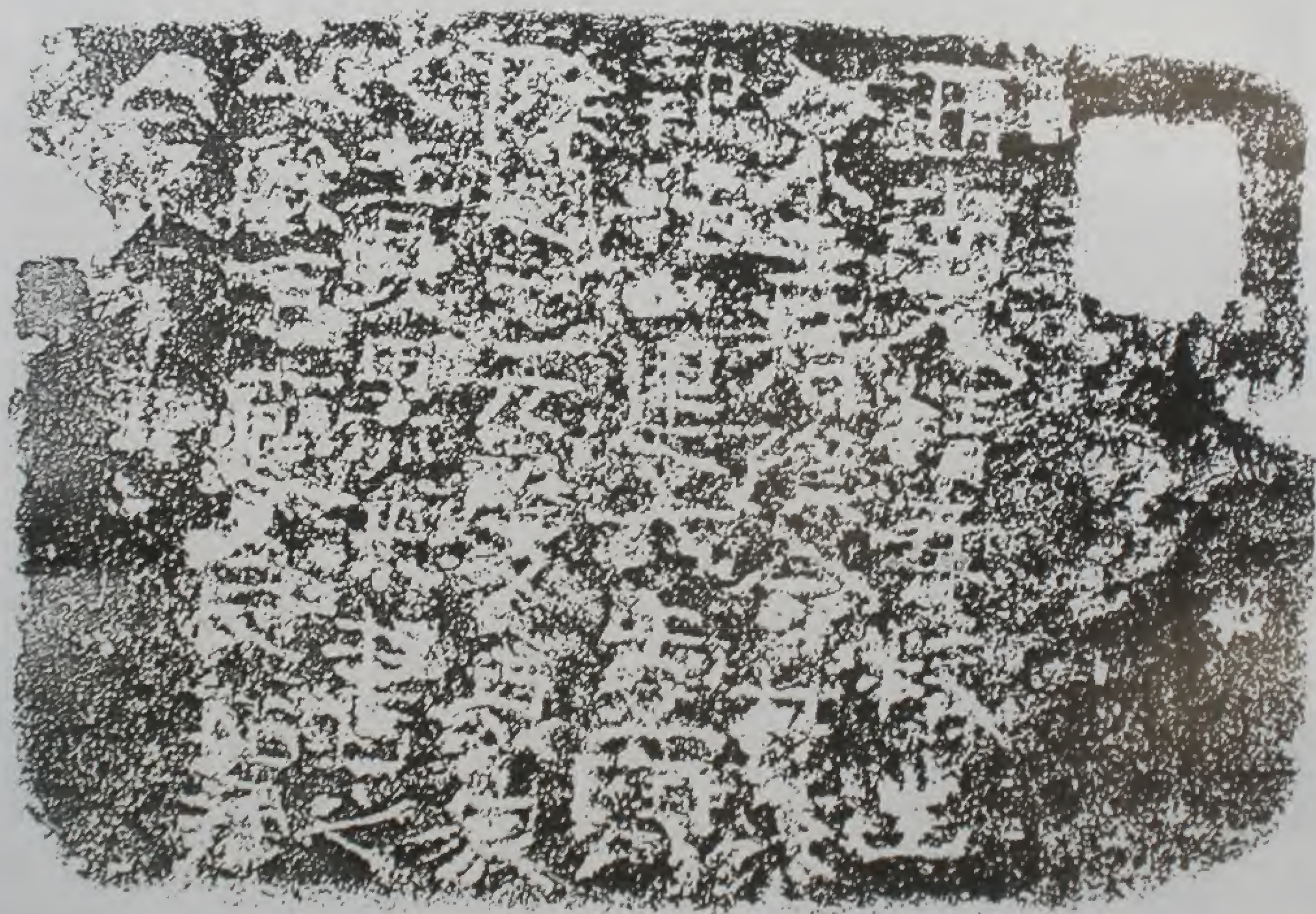
〔2〕 罗振玉：《石交录》卷一，《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三册，890页。

〔3〕 周季木：《居贞草堂汉晋石影》，2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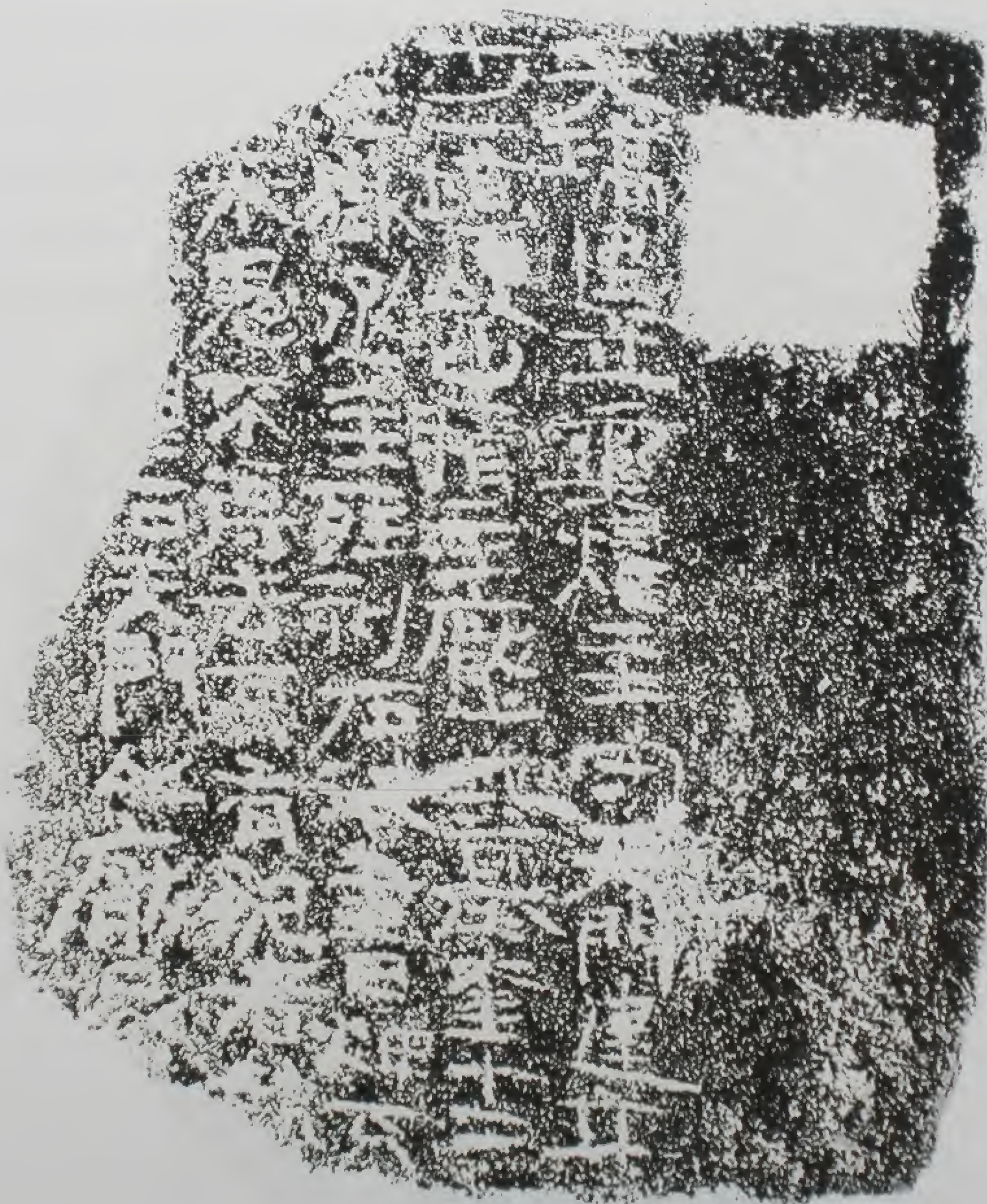
〔4〕 罗振玉：《石交录》卷一，《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三册，888～889页。

〔5〕 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十一册，58、495页。

〔6〕 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卷一，《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十一册，58页。



图版壹：66



建瓯刻石 各5872

漢刻。拓片高25厘米，寬20厘米。隸書。

漢居巢劉君冢突石題字



图版壹：68

帝’；‘主曰天帝’；‘西方白帝，主除青□□□□□之凶，吉’。‘南方赤帝，主除西方白气之凶，吉。北方黑帝，主除赤气之凶，吉’。‘中央黄帝，主除北方黑气之凶，吉。’云云，此诸语大略可读。末又有名曰‘侯社’，下刻‘五气之英，□除刻去凶，孙孙寿考。如律令！’亦粗可辨识。盖亦记五方帝，与庄氏所藏镇石相同。”〔1〕与周进识读不同。无论怎样，以天帝为主神以除鬼去凶，器文所述“天门”，当即本书第二卷《重庆、甘肃和四川东汉墓出土的几种西王母天门画像材料与道教》所考天帝所居紫微宫门。此类石刻，与石羊皆属与北方中原东汉墓镇墓解注器性质类型相同的材料则无疑问。寿县刘君冢器物非经科学发掘所获，存石羊4件，很可能本为5件而遗失其1件。每墓5羊，则如前述解注陶瓶之一墓5件，代表镇五方之鬼魅者。寿县在安徽中部的上述出土解注墓券之亳县、阜阳之南，已进入淮河以南之地。

1993年，陕西眉县白家村东汉晚期十字形砖墓，出土陶塑山羊5件，虽有陶塑之人、豹、熊、狗、绵羊、独角兽、龙、凤各1件，小母鸡2件，长尾鸟4件同出，均不足5件之数，独山羊为5件，与河南密县后土郭二墓情形相同，并有D型Ⅰ式及D型Ⅲ式解注陶瓶伴出〔2〕。我们认为，其性质用途亦或与解注有关。

此种器物，最初由于性质不明，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今后更好地注意收集，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材料发现。河南、陕西与安徽东汉晚期墓也都有解注石羊发现，与上述两地出土解注镇墓券情形一样，也都体现了一种宗教文化的传播路线范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五节 铅人和其他代人用品

上述诸解注瓶文中讲到葬入墓中的代人解注用品，除代生人的人参之外，持代死人者有蜜人与铅人两种，根据文献记载，可能还有金人、银人和其他质地的人形器物。“蜜人”当即蜡人，自然与人参之类的实物都不可能保存到今天，即便是铅人之类的器物在地下亦多早已锈蚀无存。带“铅人”

〔1〕 罗振玉：《石交录》卷一，《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三册，889页。

〔2〕 尔雅：《陕西眉县白家村东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5期。

文字之陶瓶当年瓶中应盛有实物，这是不成问题的，有的出土时既见文字又见实物，就是很好的证据。但出土时往往仅见文字而无实物，也就属于这种情形。反之，也有不少出土铅人之类的代人用品实物而未同时发现有关文字材料的例子，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带文字并盛装有代人器物的陶瓶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在墓中保存下来；另一种可能是，当年术者在放入此种代人器物时本来就没有使用文字的形式，而是在行仪的过程中，一边放入代人用品，一边口诵甚至只是心中默想与上述器文相同的内容，以致形成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道书文献记载，道士行法向神祇所上章奏，除了文字写成的“书章”之外，还有口诵、存思而不用文字的“口章”和“心章”，可供参考。后一种情况，大概多与术者本人或所在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人文环境有关。因此，无论在墓中发现代人文字还是铅人之类的器物，我们都应视为同样性质的代人实物材料。以下，我们姑且按文字与器物两类列出有关材料发现情况。

一、文字

1. 陕西长安县韦曲镇少陵原李王村 M5 号东汉晚期墓 D 型 I 式神符瓶文：“持铅人……解注”。
2. 陕西长安县三里村建和元年（147）加氏瓶文：“以自代铅人，铅人池池，能舂能炊，上车能御，把笔能书。”
3. 同蒲路工程山西某地出土灵帝熹平二年（173）朱书陶瓶文：“铅人，持代死人。”
4. 河南灵宝张湾东汉晚期弘农杨氏墓群，M5 号墓出土 B 型 I 式朱书陶瓶 5 枚，除 M5：1 号瓶字迹已剥脱莫辨，内盛铅人二枚尚存而外，其余 M5：2 号、M5：12 号、M5：14 号、M5：35 号 4 枚瓶中未发现铅人实物，器文大抵相同，有“谨以铅人、金玉，为死者解适（谪），生人除罪过”之语。
5. 罗振玉旧藏河南孟津出土灵帝延熹四年（161）钟仲游妻铅券文：“中央明堂，皆有尺六桃券、钱、布、铊（铅）人”。

以上仅见器文而无实物者 5 批，凡 8 器。

二、实物

从目前发现的实物材料看，解注代人之铅人可分为薄片型和圆铸型两种不同的类型，薄片型用模铸或用铅片剪、刻成人形，与现在的剪纸颇相类似，制作也都比较粗糙，但数量较多。圆铸型者，则用模铸成立体，工艺稍精。

(一) A 型——薄片型

1. 陕西咸阳教育学院 M2 东汉砖墓在出土 D 型 I 式朱书永平三年（60）纪年陶瓶的同时，发现 M2：26 号铅人 9 枚。“形状相同，轻薄易碎。状如人体。均头戴巾幘。站立，眉目清晰，袒露双乳，肋骨明显，双腿细长。高 0.2~0.6 厘米。”其中八件为男性，一件属女性（图版壹：69）^{〔1〕}。此器为汉墓出土解注铅人之年代最早者，说明它在墓中一开始就是和解注陶瓶配合使用。

2. 陕西长安县三里村建和元年（147）墓出土一 D 型 I 式瓶，除器书“以自代铅人”文字外，同墓出土另一件无字 A 型瓶盛有铅人 2 枚，“形式大小相同，为铅片加工而成，长 6.5 厘米。”（图版壹：7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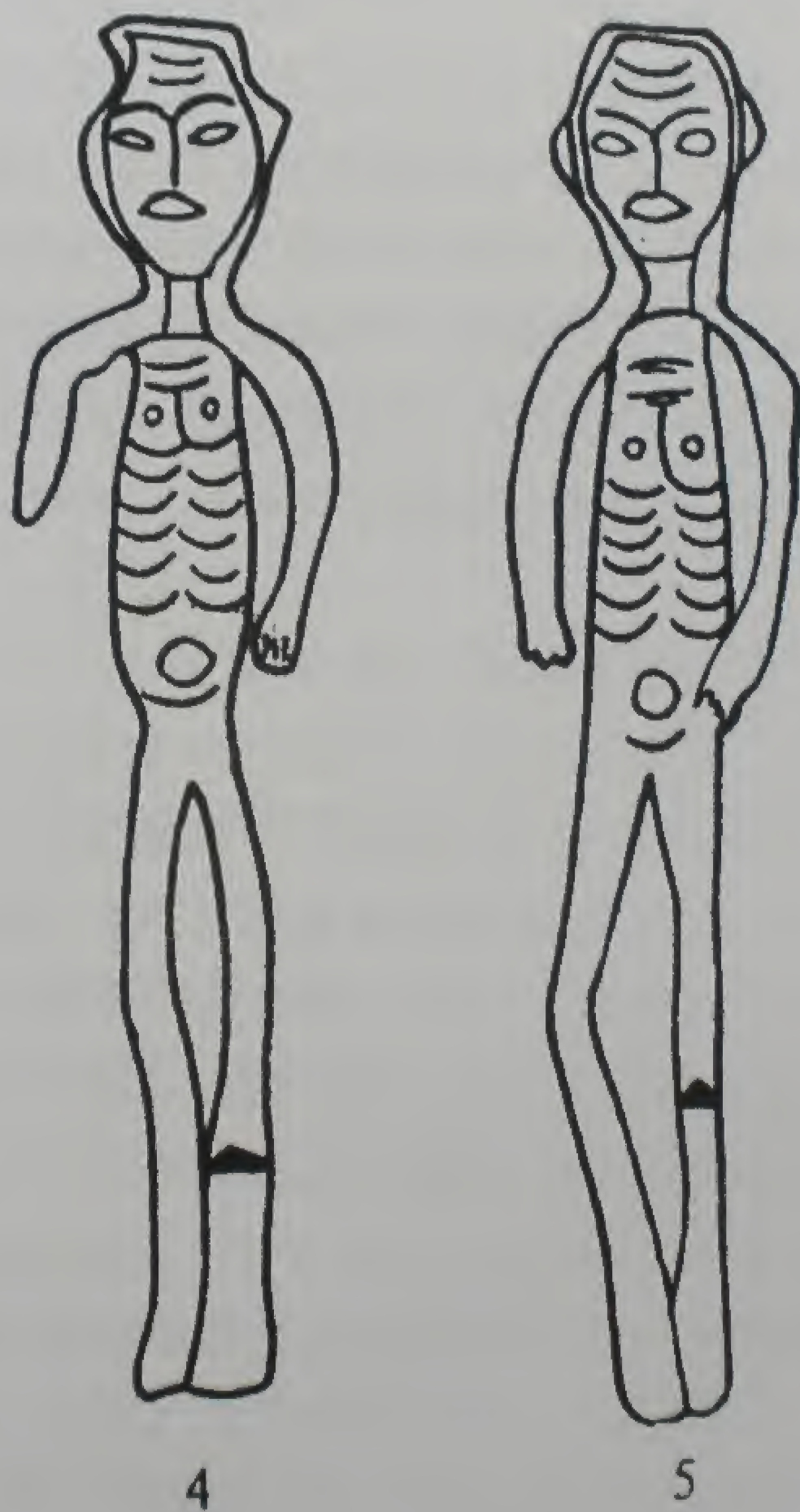
3. 河南灵宝张湾东汉晚期杨震家族墓群之 M5，除出土 II 型 1 式瓶带“谨以铅人、金玉，为死人解适，为生人除罪过”朱书文字外，同时出土另一文字脱落之朱书陶瓶内盛铅人 2 枚，男女各一，高 5 厘米，男性者铸出长长下垂的性器以为标志（M5：84 号器，图版壹：71）^{〔3〕}。

4. 河南陕县刘家渠 M87 在出土无字 B 型 I 式陶瓶的同时，出土铅人 3 枚，“模铸作扁平的裸体立人形，四肢齐全，五官清楚，并铸出脊椎肋骨。

〔1〕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阳教育学院汉墓清理简报》称为 8 枚；而刘卫鹏：《汉永平三年朱书陶瓶考释》一文则称“教院 M2 出土的 9 件铅人中，有一件为女性。”二文皆见《文物考古论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232 页，图五，4、5。

〔2〕 陕西省文管会：《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 7 期，65 页，图二一。

〔3〕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 年 11 期，89 页，图三一。



图版壹：69



图版壹：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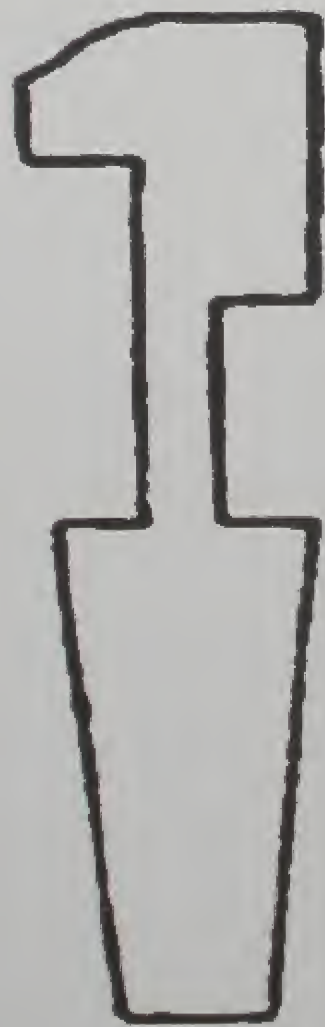


图版壹：71

高 6.3 厘米。”（图版壹：72）^{〔1〕} 据所附器物照片图版观察，其中一枚腰间铸出一穿孔，似为女性性器象征，另一枚无此特点，当为男性墓主之代形，与上述咸阳永平三年（60）墓所出者极为相似。

5. 陕西咸阳师专东汉墓墓道内出土铅人 1 枚。以朱砂描绘五官胸腹。仅见文字介绍，无图版材料^{〔2〕}。

6. 陕西西安雁塔区长延堡街道办事处瓦胡同村东汉墓出土 M33：18 号铜“人形饰”1 枚，作薄片状，仅具轮廓，形似剪影。头顶、面、颌部平直，细脖颈，头后挽一发髻。身体部分为梯形。高 5、厚 0.05 厘米（插图壹：9）（插图壹：10）^{〔3〕}。有朱书陶瓶 1 件同出，没有说明陶瓶及铅人在墓中出土位置。由其器形和与朱书陶瓶之组合关系，可判定其作代人之用无疑，唯质地以铜代铅。此材料为识别东汉墓出土同类器物性质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具有特殊的意义。



插图壹：9



插图壹：10

〔1〕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考古学报》1965 年 1 期，图版贰陆，15。

〔2〕 刘卫鹏：《汉永平三年朱书陶瓶考释》，《文物考古论集——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十周年纪念》。

〔3〕 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汉、后赵墓发掘简报》，《文博》1997 年 6 期，20 页，图十五，2。



图版壹：72

7. 据刘盼遂说：“上虞罗氏所藏古明器，有……铅人二枚，上有朱书。”〔1〕对器形情况未作具体介绍，此种器物形体不大，上有朱书，属薄片型的可能性更大。上有朱书，他器未见，尤其珍贵，可惜不知文字内容如何。姑附记于此。

（二）B型，圆铸型。

此型可分为单人式与多人连体式2式：

I式：单人式。

8. 1985年，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M4号东汉中晚期墓出土之M4：19号无字A型解注陶瓶中盛有铅人10枚，“形状各异。通高10.5~10.7、宽3、4厘米不等。”从发表的5枚照片图版看，器呈“大”字形，唯两手略下垂而不平伸，肢体细长，似为圆铸而非薄片型（图版壹：73）〔2〕。

9. 1999~2000年，陕西商州市东龙山夏商遗址之上的M3号东汉晚期砖室墓出土M3：3号铅人一枚，作站立状。面无五官，头和躯干扁圆。两腿微微分开，脚有五趾。双手曲肘置于胸下，右手尚存五指，左手掌部以下残。高13.4厘米〔3〕。该墓由墓道、前后室和甬道组成，前室长2.7、宽2.7、残高2.16米。后室长3、宽1.15米。前后室之间的甬道甚短，长仅0.39米。早年被盗，后室有漆棺残片，前室从附发表的墓葬平面图看，人骨散置甚多，当系多次合葬墓。铅人出土时靠立在前室与甬道拐角处的南侧。

10. 山东曲阜陶村出土汉代铅人1枚，高12.5厘米（图版壹：74）〔4〕。从发表的照片图版看，器略呈“大”字形，两手下垂而不平伸，肢体细长，似为圆铸而非薄片型。发表材料时未说明出土情况，估计亦应为墓葬所出。

II式：二人以上的多人连体式。

本式铅人，除了用铅制成者外，亦间有以陶代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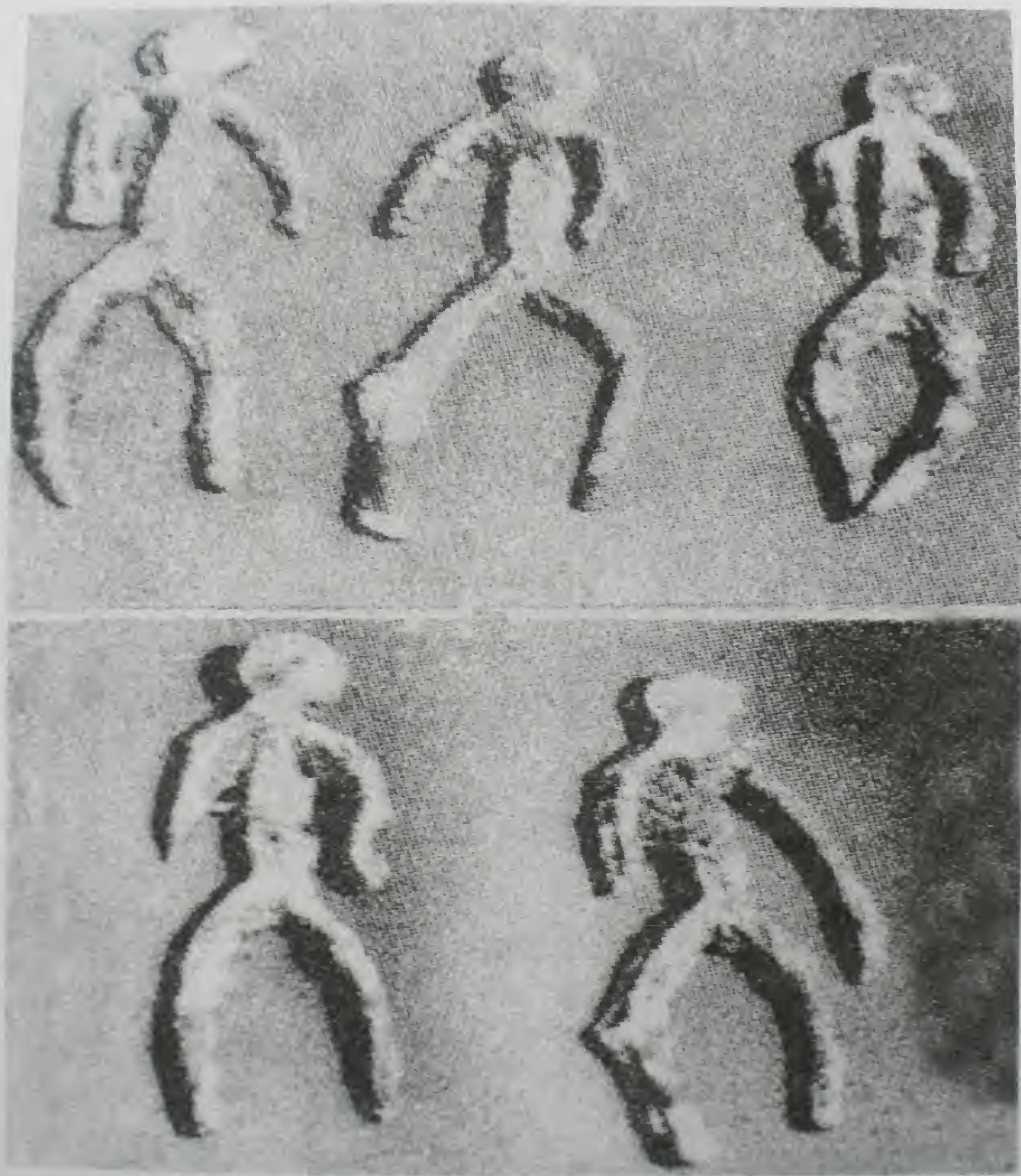
11. 1960年随先师冯汉骥教授前往四川资阳作田野考古调查，从当地农民手中收得圆铸型铅人一件，裸体，二人并排连铸，中间缕空，五官、乳

〔1〕 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终制篇》538页，注〔八〕引。

〔2〕 《陕西汉中市铺镇砖厂汉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9年6期，45页，图十四，6。

〔3〕 东龙山考古队：《商州市东龙山汉墓》，《文博》2001年4期，41页，图八，1。

〔4〕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省博物馆合编：《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76页。



图版壹：73



图版壹：74

房、四肢皆具，下肢稍有残缺（图版壹：75），高 5.5、连体宽 3、直径约 0.8 厘米。云为本地崖墓中出土，当系夫妇合葬墓主代人之物。此种二人连体铅人，目前虽仅发现这样一件，但却告诉我们当时尚有使用这种形式的代人铅人随葬习俗存在。

12. 1997 年，陕西西安雁塔区长延堡街道办事处瓦胡同 33 号东汉晚期中小型砖室墓（墓道、甬道前后两室，前室方形，两侧带耳室），出土陶制连体双人俑和五人俑各一枚。标本 M53：3，“二连俑”“模制而成。身部有刀削痕迹。面部仅具轮廓，脑后垂一小髻，两体相连，着宽袍大袖服装作站立状，涂有硃砂。”高 7.4、宽 4.4 厘米（图版壹：76）^{〔1〕}；标本 M53：5，“五连俑”，“模制而成。五人连体，跽坐，由低到高排列。头戴平顶帽，同置于板状背景上，面部仅具轮廓。身均着宽袍大袖服装，双手拱于胸前。衣袖、头、颈部涂有朱砂。”宽 10.4、高 4.4~4.46 厘米（图版壹：77）^{〔2〕}。这两件双人和五人连体陶俑，不仅造型奇特，又复涂以硃砂，与一般随葬仆侍一类陶俑明显不同，当别有取义。联系前面讲到在四川西部资阳东汉崖墓中曾有代人用连体双人铅俑出土的材料推断，此二人和五人连体的陶俑，亦应属代人用品无疑。另该墓还出有残跽坐俑及背人俑各一。M53：2 号背人俑，“模制并经雕刻而成，仅具轮廓，制作粗糙。造型为一男子背着一个驼背老妇人。男子为站立状，其腰部用朱砂画出腰带，老妇人嘴部和背部涂朱砂。”通高 10.6 厘米。此二俑是否亦与代人性性质有关，一时尚难确指。

以上出土铅人实物十二批共 35 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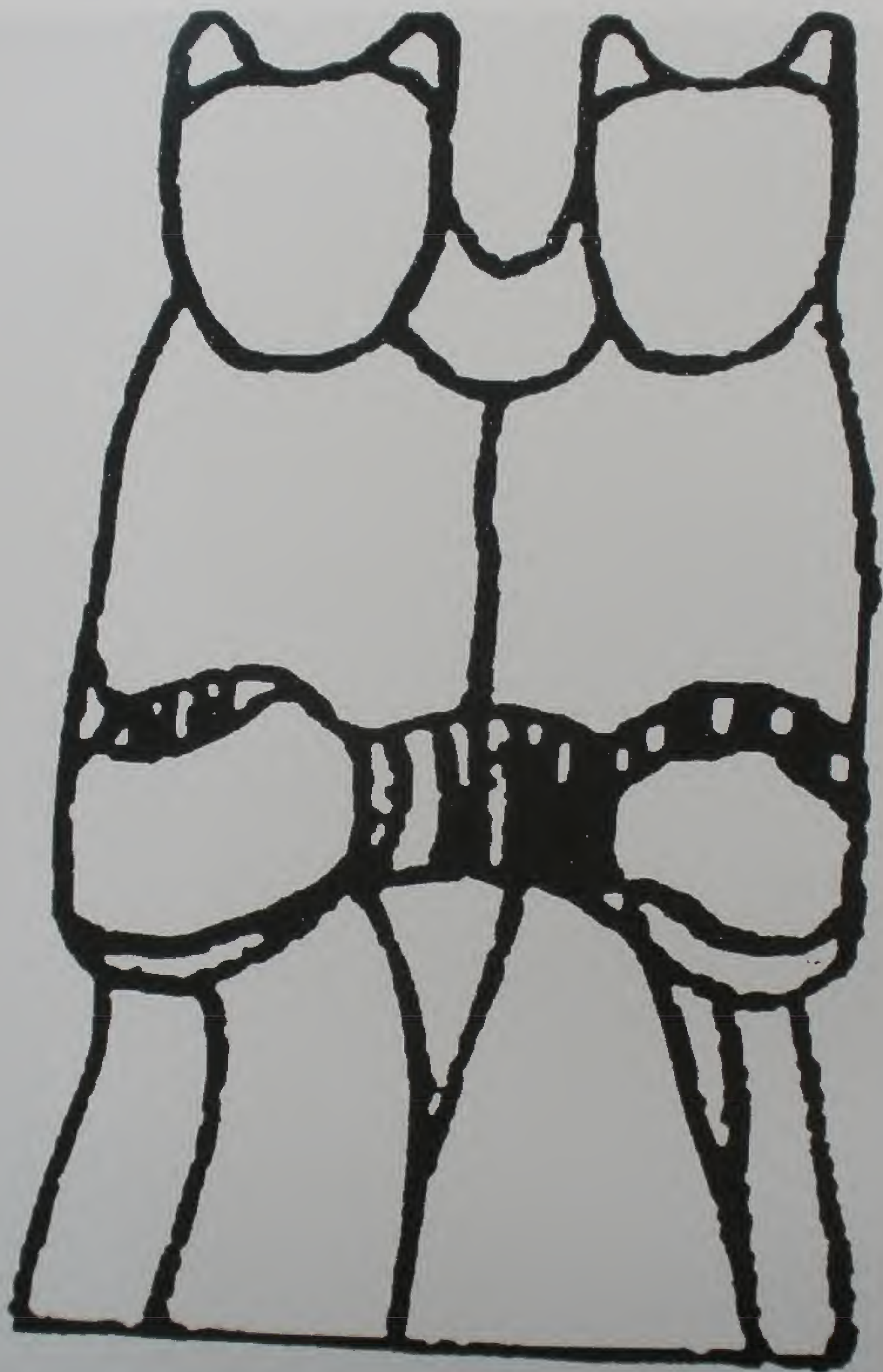
此外，1970 年云南大理下关城北熹平年间（172~178）东汉布币形多室砖墓，发现“铅块 5 件。出土于前室的东南、西南、西北角、和西后室的东南、西南角的铺地砖面上。即铺地砖保存完好的墓室每个角落放置一块，前室西南角为二块，其余角落因墓室或铺地砖被毁而不明，铅块表面均为白色，大小形状不规则。有三角形、扁体半圆形、长条形、方形等。最大一块为长条形，长 8、宽 5、厚 2 厘米；最小一块为扁体半圆形，长 6、宽 4.5、厚 1.5 厘米。”有摇钱树、陶水塘稻田合体模型、陶楼房、陶俑等同出，器形种类风格与四川东汉墓所出者相同。发掘简报编者认为墓主可能是落籍于

〔1〕 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汉、后赵墓发掘简报》，《文博》1997 年 6 期，19 页，图十四，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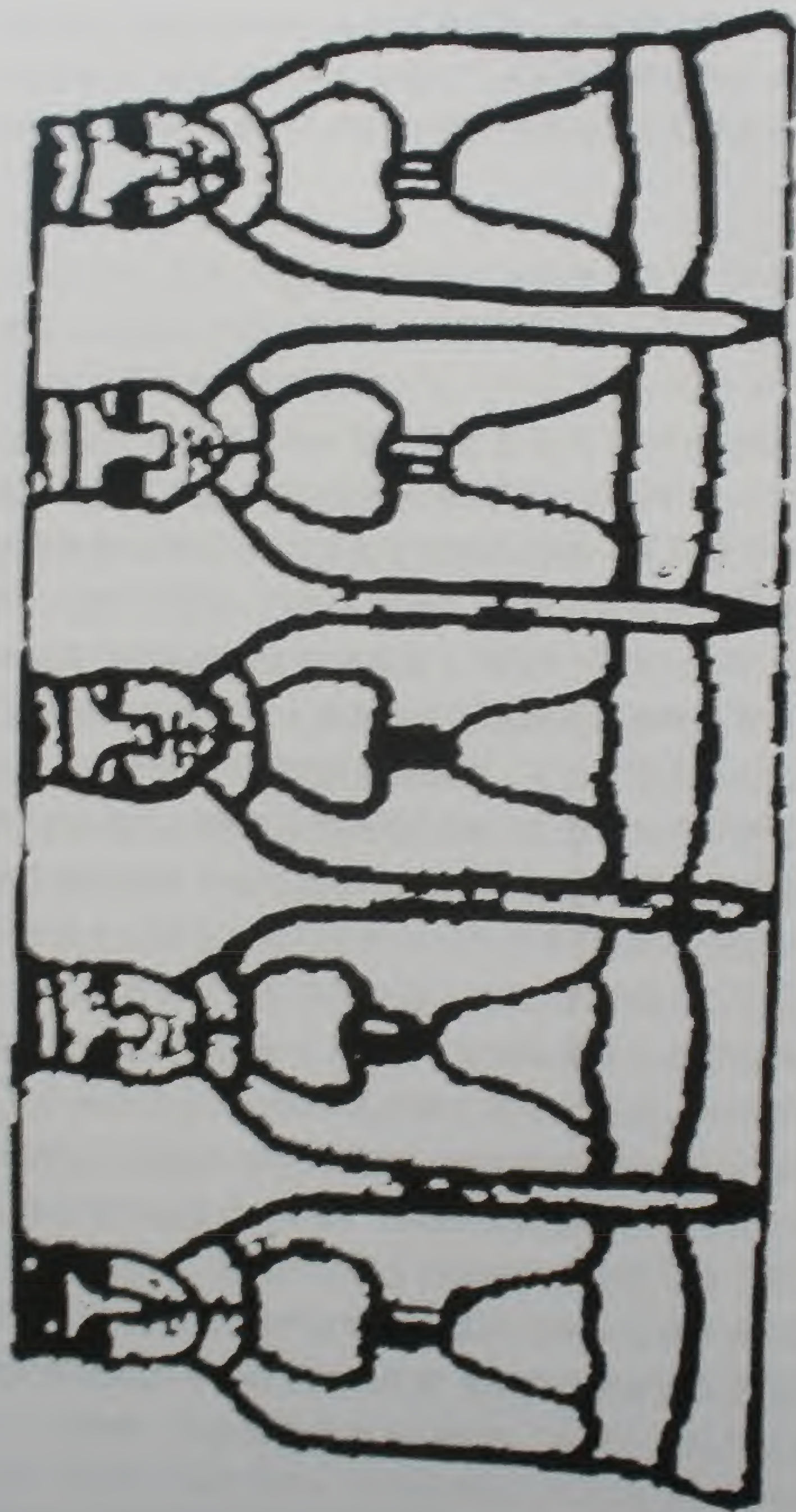
〔2〕 西安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西安财政干部培训中心汉、后赵墓发掘简报》，《文博》1997 年 6 期，19 页，图十四，4。



图版壹：75



图版壹：76



图版壹:77

边疆的汉族移民，其说可信^{〔1〕}。这些铅块，我们认为应是解注代人所用铅人的简化形式。它和上述四川资阳这两批东汉墓解注代人铅人实物，出土在西南的四川西部和云南境内，已不属北方黄河流域的范围，但川西与陕西比邻，云南又与川西接壤，和河南、安徽汉墓解注镇墓券、石羊的出土情形一样，成为这种宗教文化由陕西向西南传播的一个重要线索，故亦附述于此。

第六节 药物

河南洛阳唐寺门 M1 号汉墓出土 M1: 66 号瓶文：“天帝告天上使者、凶之吏：今有小杜（社？）里□氏后死子凡□十一算，建解。众为距（具）五石瓶十八物，雄〔黄〕神药，绝钩注重复咎央（殃）。便死利生，不得相防（妨）。”解注所用雄黄、雌黄、曾青、礬石（白礬）、磁石、丹砂和用它们合制而成的五石之类的“神药”，根据前面叙述的材料，其他陶瓶文字所见甚多，当初皆盛于瓶内入藏墓中。应该说，所谓的“解注陶瓶”，除部分盛有铅人之类的代人用品之外，大部分是用来盛“神药”的，唯所盛药物在地下埋藏达千余年之久，多已化解，能够保存下来的只是少数。陕西潼关吊桥杨震家族墓群之 M2 杨震墓出土解注陶瓶 5 件，“位于墓室顶上封土内（未被扰乱），分上下两层，间距约 50 厘米，东西并列，上层二个，间距约 2 米，下层三个，间距约 50 厘米，罐面都书有‘中央雄黄利子孙安土’一行，瓶内装雄黄，瓶口上盖绳纹瓦片。”^{〔2〕}它可以和文献记载相印证，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解注用品，对研究解注术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陶瓶文字所示，包括雄黄、雌黄、曾青、礬石（白礬）、磁石、丹砂和用它们合制而成的五石之类的解注“神药”，都是矿物药材，不仅分别呈红、黄、青、白、黑五种不同的颜色与五行相应，并且大都具有较强杀灭细菌的性能。作为解注材料放入墓中，有它特殊的作用。此外，四川西部的绵阳，南部的乐山等地东汉崖墓、砖墓，也有丹砂一类的药物发现，与上述北方陕、豫地区汉墓“神药”材料所反映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1〕 大理州文物管理所：《云南大理市下关城北东汉纪年墓》，《考古》1997 年 4 期。

〔2〕 陕西省文管会：《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记》，《文物》1961 年 1 期。

以雄黄、雌黄、曾青、丹砂等药物杀灭传染病菌治疗传染病与杀鬼解注之间的关系，第一章已有详论。

第七节 印章

上述诸器文中，多有“黄帝”、“黄神”、“黄神越章”、“天帝使者”、“天帝神师”诸名。山西出土解注瓶文称：“黄神生五岳，主死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日人中村不折旧藏光和二年（179）朱漆书瓶文称：“厌天帝神师黄〔神〕越章”。陕县刘家渠汉墓解注瓶文称：“天帝神师臣□”。日人中村不折旧藏朱书陶瓶文称：“天帝使者黄神越章，为天解仇，为地除殃”。陕西户县朱家堡汉墓阳嘉二年（133）朱书陶瓶文称：“天帝使者谨为曹伯鲁之家移殃去咎……神药压镇，封黄神越章之印。”由上诸文可知，有关印章常常用于作为瓶装神药的泥封。有关天帝、黄帝、黄神、越章之印章，除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发掘出土者外，见于旧金石学文献著录者品类数量颇多，亦间有考订。今按印文相同者分述于下。

1. “天帝之印”。吴式芬《封泥考略》卷七著录“天帝之印”封泥一枚，谓“即‘黄神越章天地神之印’之省文，方士所佩之印也”〔1〕。

2. “天帝杀鬼之印”。20世纪20年代在安徽寿县出土铜印一枚，“两面均刻白文，一面刻‘天帝煞鬼之印’，另一面刻重屋形，门有双鸟肖形。”〔2〕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道家印》收录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天帝杀鬼之印”，字间棋盘格。又“天帝杀鬼之印”两面印一枚，一面印文间以十字格，另面有屋宇马畜图像，不知是否与上述安徽寿县出土者同为一器。吴式芬《封泥考略》卷七著录陈介祺藏“天帝煞鬼”泥印，谓该印“四字蛙钮泥印，文曰‘天帝煞鬼’。‘天帝’见前，‘煞鬼’见簠斋陈氏藏铜印文中，亦方士印也。印出今寿光县纪台土中。蛙两目，大睛大口，见后两足中有穿孔。”〔3〕寿光即今之山东寿光县。近代周进藏辑《魏石经室古玺印影》亦著

〔1〕（清）吴式芬：《封泥考略》，44页上半页。

〔2〕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卷十六，玺印。《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十一册，447页。

〔3〕（清）吴式芬：《封泥考略》，48页下半页。

录“天帝杀鬼之印”二枚，白文，有田字格和边栏，其中一枚似为两面印，另一面肖形图像，上部似为一神兽，下部一排五只长嘴鸟^{〔1〕}，或与印文“杀鬼”之义有关。

3. “黄神之印”。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卷二，官印类二十著录“黄神之印”两面印一枚，另一面作“臣过□”。“臣过□”当为持用此印道士名字。白文无边栏，字作小篆，笔画甚粗，首尾如一^{〔2〕}。又近代周进藏辑《魏石经室古玺印影》亦著录“黄神之印”一枚，白文无边栏^{〔3〕}。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西汉道家印》收录龟钮无边栏白文“黄神之印”一枚，云出自故宫藏品。又同书《东汉道家印》亦著录龟钮无边栏白文“黄神之印”一枚，云出自陈介祺《陈簠斋手拓印集》，不知与上录《印举》所著是否同器。罗福颐同时指出说：“黄神之印”中的“黄神”，与镇墓瓶文之“黄神生五岳，主死人禄，召魂召魄，主死人籍”有关^{〔4〕}。罗福颐将同作龟钮无边栏白文之“黄神之印”区分作两汉不同时代，不知根据为何，判断是否准确。

4. “天帝黄神印”。韩国乐浪曾出土封泥“天帝黄神印”玺印，据云为新莽时物^{〔5〕}。

5. “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吴式芬《封泥考略》卷七列有“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封泥。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卷二官印类二十“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二枚，小篆白文，无边栏，一枚较大，一枚较小^{〔6〕}。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东汉道家印》收录东汉套印“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瓦钮印与套印各一枚，瓦钮者出汪启淑《切庵集古印存》，套印者为故宫藏品^{〔7〕}。《吉林大学藏古印选》著录有汉式龟钮“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8〕}。罗氏谓：“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日《书道全集》卷三载汉镇墓陶文有‘天帝使者黄神越章’、‘天帝神师黄越章’之语，与印文之意近。”又同书

〔1〕 周进藏辑：《魏石经室古玺印影》，80、81页。

〔2〕 （清）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63页下半页。两面印并重见卷十四，两面印类，31页上半页。

〔3〕 周进藏辑：《魏石经室古玺印影》，81页。

〔4〕 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206～210页。

〔5〕 饶宗颐：《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59页。

〔6〕 （清）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63页上半页。

〔7〕 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206～210页。

〔8〕 《吉林大学藏古印选》，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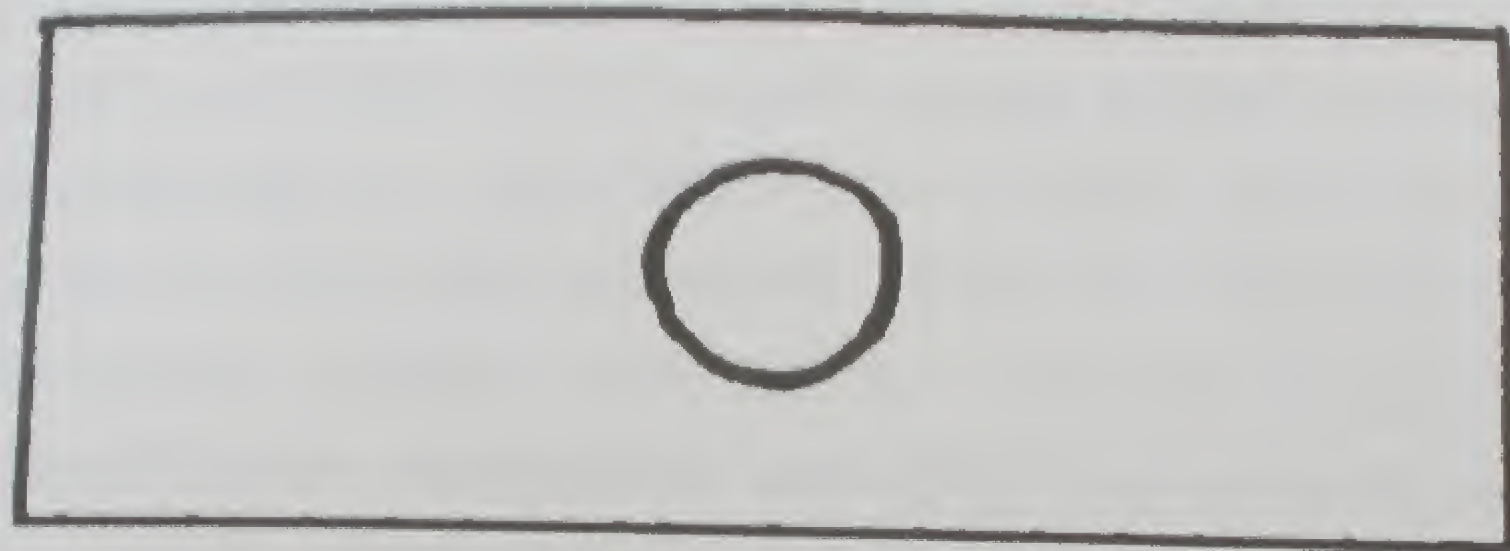
《西汉道家印》收录故宫藏品西汉白文“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二枚，一作瓦钮方形，一作环钮圆形，均无边栏，亦不知何以判其时代之不同。吴式芬《封泥考略》卷七列有“汉方士印封泥”与“汉方士泥印”专目，著录陈介祺藏“黄神越章”封泥与“黄神”泥印。“黄神”泥印考云：“右二字半通泥印，钮作羊形，文曰‘黄神’，燕庭长安获古物，今归簠斋陈氏。陈氏藏汉铜印有曰‘黄神越章’者，有曰‘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者，有曰‘天帝使者’者。《抱朴子》说见前，‘越’作‘白’，异于印，当是传写之误。曰‘印以封泥’，则确有方士印封泥一种。此意作泥封，则非封泥而与人山佩印文同，仍为方士之印。”^{〔1〕}是陕西西安（长安）亦有“黄神”印章材料出土。

6. “黄帝神印”。1996年，江苏江宁县湖熟镇经济开发区95JH120号竖穴土坑“东汉早期墓”出土穿带式木印一枚，边长3.4厘米，两侧有直径0.5厘米的对穿圆孔，两面皆有阴刻印文，一面刻“黄帝神印”四字，外廓有边栏（图版壹：78）^{〔2〕}。另一面印文共五行，行4字，并有界格，刻画浅细，可惜已漫漶不可识。此中除了“黄帝神印”印文之外，长达整整20字的另面印文，为前所未见，字体特殊，当与道教符书有关，对研究“黄帝神印”的含义乃至整个黄帝神信仰的性质和传播发展及许多其他方面的宗教问题，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遗憾的是公布材料时只有器图和“黄帝神印”铃印印文，恰恰没有这“刻画浅细漫漶不可识”的印面铃印图版。此外，出土此印的墓葬有关材料也未发表，所谓“东汉早期墓”不过只是一种“初步推断”，是否完全准确，还值得进一步研究。看来这种初步推断，大概是根据所出土坑木椁的墓葬形制确定的。1965年，江苏仪征石碑村发掘清理了相邻的一、二号竖穴土坑木椁墓，有人推定其年代时说，土坑木椁墓在这一地区乃是东汉墓常见的形制，“可将二号墓初步断为东汉中期，一号墓或许要稍晚一些”。而在年代比东汉中期稍晚的二号墓中，正好出土了一套道教授丹用具。发掘简报编者还特地指出：“东汉中晚期道教思想在江苏境内得到较大发展，事实上在高邮邵家沟东汉遗址中就发现过两件道教遗物。”^{〔3〕}所谓的两件道教遗物，也就是“天帝使者”封泥和带“天帝神师”和“北斗

〔1〕（清）吴式芬：《封泥考略》，45下半页至47上半页。

〔2〕邵磊、周维林：《江苏江宁出土三枚古印》，《文物》2001年7期，84页，图一。

〔3〕南京博物院：《江苏仪征石碑村汉代木椁墓》，《考古》1961年1期。



图版壹：78

君”神符的木简。江宁县在江苏境内，也都和高邮、仪征相紧邻，北面靠近安徽，在研究此种宗教文化的传播路线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有关方面，能够尽快地详细公布上述所谓“东汉早期墓”的材料，以供研究。

7. “黄神越章”印。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卷二，官印类二十“黄神越章”印二枚，白文小篆，笔画粗细一般，一枚正面无栏格；另一枚为两面印，正面有框无栏，背面边栏棋盘格二十字，字体与正面不同，惜字形过小，铅印模糊不能辨识^{〔1〕}。刘体智《善斋吉金录·玺印类》著录“黄神越章之印”等铃印多种^{〔2〕}。近人陈汉第《伏庐藏印》亦收有“黄神越章印”一枚，白文，带边栏^{〔3〕}。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后汉道家印》收录东汉“黄神越章”印六枚，字均作白文。其中鼻钮三枚，一枚出自吴隐《遯庵秦汉印选》，无边栏。两枚为故宫藏品，一枚有边栏，一枚无边栏。瓦钮一枚，无边栏；龟钮二枚，一枚有边栏，一枚无边栏，皆故宫藏品。“黄神越章”，亦可与《抱朴子·登涉》：“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相互印证^{〔4〕}。

8. “天帝使者”印。1987年，陕西宝鸡市阳平乡出土“天帝使者”铜印一枚，龟钮，印身長2.3、宽2.2、厚0.7厘米，印面篆书白文（图版壹：79）^{〔5〕}。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出土“天帝使者”封泥一枚（图版壹：80）^{〔6〕}，尚有带北斗七星及“天帝神师”文字之神符木简同出（图版壹：81）^{〔7〕}。见于旧金石学文献著录者尤多。吴荣曾、禚振西、王育成文中引及者外，他如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卷二，官印类二十著录“天帝使者”印二枚，又卷十四两面印类一枚白文无边栏，笔画较一般所见者不同，往往同一笔画曲屈而粗细不一。两面者另面印文不清。刘喜海《燕亭金石丛稿》，

〔1〕 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63页上半页。两面印重见卷十四，两面印类一，31页下半页。

〔2〕 刘体智：《善斋吉金录》。

〔3〕 陈汉第：《伏庐藏印》，112页。

〔4〕 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206页。

〔5〕 《宝鸡县出土“天帝使者”印章》，《考古与文物》1990年4期，110页。

〔6〕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10期，20页，图五。

〔7〕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10期，21页，图六。



图版壹：79



图版壹：80

行君
靈
鬼
圖

乙巳旦九者界名為天光天帝神降已知
汝名疾去三千里汝不即去牽山鈴口
令來食汝急心如津令

印章，封泥类，收录“天帝使者”印一枚^{〔1〕}。近代周进藏辑《魏石经室古玺印影》著录“天帝使者”印一枚，白文无边栏，笔画甚粗^{〔2〕}。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东汉道家印》收录白文“天帝使者”印四枚，鼻钮二枚，一为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印，一出吴式芬《双虞壶斋印存》；瓦钮、穿带印各一，皆故宫藏品，天字中人字二画皆左右上挑转曲，与普通汉印文字写法不同，鼻钮者印形较大，瓦钮与穿带印印形较小。徐乃昌旧藏一印尤为特殊，特别值得注意，“天帝使者”方印铸于带钩之上，器形较大，尾部略残，残长13、最宽处6厘米。带印一面，印下一大圆窠，其他图像较简单。钩背图像，主体为一神祇，两侧肩下分别有一似为龙、虎之神兽，神之右手持一短剑，神态凶恶奇诡，似作欲驱杀妖鬼状（图版壹：82）^{〔3〕}。会其意，乃在说明术者用此“天帝使者”印，即可以天帝使者的身份传达天帝旨意，为人杀鬼驱邪。这一带钩道印的整个内容组合设计，可为此种“天帝使者”印系用于镇鬼辟邪增一新证。此种与带钩合为一体之神印，既便于佩带，又可同时印之于泥封或直接作为起解除效果的法物使用，工艺精湛，是极为难得的实物材料。

9. “天帝神师”印。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卷二，官印类二十著录“天帝神师”印一枚，小篆白文，笔画较粗，始终如一，有田字格及边栏^{〔4〕}。罗福颐《故宫博物院藏古印选》著录汉龟蛇钮“天帝神师”铜印一枚，印面白文间以田字格^{〔5〕}。又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西汉道家印》著录汉龟钮“天帝神师”铜印一枚，印面亦白文间以田字格，不知与上述一印是否同器。罗福颐既引江苏高邮东汉遗址出土“天帝神师”木简为证，不知何以又将之判为西汉器物。此种神印，与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出土阴嘉四年（135）解注陶瓶文“天帝神师臣……”之语可为互证。

10. “黄神使者印章”印。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卷二，官印类二十著录“黄神使者印章”一枚，无边栏，白文小篆，笔画较细^{〔6〕}。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东汉道家印》收录东汉龟钮“黄神使者印章”铜印

〔1〕《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三十二册，6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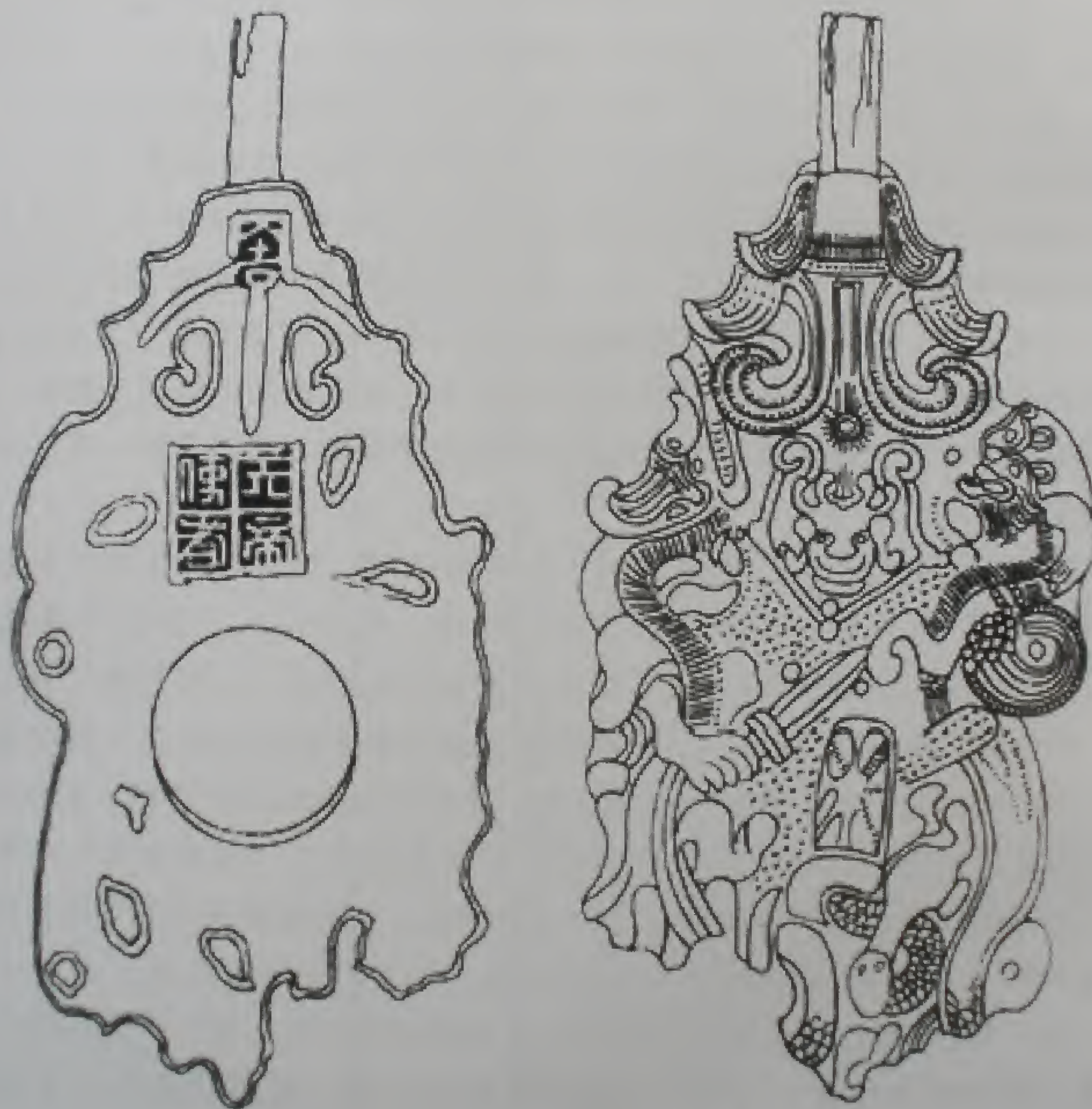
〔2〕周进藏辑《魏石经室古玺印影》，81页。

〔3〕鲍鼎：《镜影楼钩影》，25页。

〔4〕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63页上半页。

〔5〕罗福颐：《故宫博物院藏古印选》，57页。

〔6〕陈介祺：《十钟山房印举》，63页下半页。



图版壹：82

一枚^{〔1〕}，无边栏，故宫藏品。又龟钮“黄神□者印章”一枚，云出自周季木《古籀印影》。查周进藏辑《魏石经室古玺印影》著录一印，印文与此完全相同^{〔2〕}，罗氏所称《古籀印影》，当即此书。据我们观察，印文第三字作下垂之五长形点画，上细下粗，由左向右每笔渐次缩短，颇疑为“使”字之一种特殊写法，五画或与五行之义有关。

吴荣曾最早提出“黄神”即“黄帝”之说^{〔3〕}，根据考古发现材料看，这是正确的。在上述印章和汉墓出土解注陶器文字中，既有“黄帝神印”（图版壹：78），又有“黄神之印”，“黄神”应即“黄帝神”的省称，是比较清楚的。王莽时期“天帝黄神印”的材料，则更可进一步说明“黄帝”和“黄神”也就是“天帝”，“黄神使者”就是“天帝使者”。参考解注瓶文“天帝神师臣……”的材料，以“天帝神师”而称“臣”并系以姓名，其性质亦当与“天帝使者”相同，为道士身份可知。唯“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中之“越章”，其身份地位尚不甚明确。王育成基于东汉顺帝之前道教尚未形成的成说，不以“天帝使者”为道人、道士而曰“类道人”^{〔4〕}，是值得商榷的。

此外，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西汉道家印》收录故宫藏品“北斗阴通天丞章”一枚，白文无边栏。同书《东汉道家印》收录东汉道印甚多^{〔5〕}，除前及者外，另有鼻钮“郭北十亭天严煞鬼章”一枚，白文无边栏，故宫藏品。鼻钮“太山武帝神仙印”一枚，白文无边栏，故宫藏品。瓦钮“皇天上帝制万神章”一枚，白文无边栏，故宫藏品。故宫藏白文“高皇上帝之印”二枚，鼻钮者有边栏，瓦钮者无边栏。龟钮“天符地节之印”一枚，白文无边栏，亦故宫藏品。瓦钮“天乙北辰章”一枚，白文无边栏，字画曲屈，颇异常见汉印字体，云出自周季木《古籀印影》。细审印文，“天”字顶端无一横，应释为“大”，即“太”字，则印文为“太乙北辰章”。刘喜海《燕亭金石丛稿》，印章，封泥类，收录“无上使者”、“万安使者”钤印^{〔6〕}。吴式芬《封泥考略》卷七著录“天间四通”封泥一枚，谓“当亦‘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之类方士所佩之印”^{〔7〕}，吴氏考诸印多秦皇汉武求

〔1〕 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208页。

〔2〕 周进藏辑：《魏石经室古玺印影》，81页。

〔3〕 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文物》1981年3期。

〔4〕 王育成：《东汉天帝使著类道人与道教起源》，《道家文化研究》第十六辑。

〔5〕 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206～210页。

〔6〕 《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三十二册，654页。

〔7〕 吴式芬：《封泥考略》，44～45页。

仙方术士所用者。联系上述乐浪出土新莽“天帝黄神印”封泥和传世其他文字之汉代“方士印”看，此类器物，其中或有武帝、新莽时的材料，目前尚难准确判定。但据科学发掘出土者观之，出自江南者亦仅江苏一例，山东者一例，看来大部分仍应属出自陕西、河南的东汉遗存。无论怎样，从宗教思想发展历史角度视之，此种器物与汉武帝、王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渊源确是事实，吴氏之论不是完全无根之谈。此类印文虽不见于上述汉墓解注陶瓶及墓券，亦属性质相同的材料，亦可为研究此类道印发展之参考。

上述诸印文，多见于道书文献记载。《抱朴子内篇·登涉》之文，已见前罗福颐书所引。他如刘宋释玄光《辩惑论·轻作寒暑凶妄之极六》：“造黄神越章，用持杀鬼，又持赤章，用持杀人”〔1〕。北周甄鸾《笑道论·戒木枯死二十二》：“三张之术，畏鬼科曰：……又造黄神越章杀鬼，朱章杀人”〔2〕。这两条记载，学界也早有人注意到了。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释玄光和甄鸾也都明确讲到，黄神越章属“三张之术”，是早期天师道系统的材料。宋真宗时所编的《三洞修道仪》记载说“汉末三天法师张君”的正一盟威弟子，“佩带斩邪威神剑，佩黄神越章印绶”〔3〕。《正一法文修真旨要·行禁治病》详述“天帝神印”及“黄神越章”印材料云：道士与人治病，“持印印病人心一下，次印腹一下，次印痛处一下……次咒印曰：‘天帝神印，印山成湖，印石成涂……印邪邪亡，印痛痛止，印鬼鬼走，破除癥结。流殃咎注，急自走去，正神安汝处。急急如太上老君律令！’……又祝曰：‘……上请三部大将军……并请随印治病，救某人身中疾病，急急出。叱！吾今以“黄神越章”之印，印心从心出，印腹从腹出，印肝从肝出……速出！速出！急急如律令！’……又当心祝曰：‘南方之鬼、北方之鬼、东方之鬼、西方之鬼、中央之鬼、天鬼、地鬼、神鬼、男鬼、女鬼、沉尸毒注之鬼，当印者死，值印者亡。速出！速出！’……若水中蛟龙鱼龟，虫兽蛇毒之类害人者，以净黄土为泥，印封之投入水中，即死。”〔4〕此等道书，无论编纂时间早晚如何，用印于泥封，也都保存了此种神印的早期特点。当然，这里只是讲的为活人去疾除病，和用于墓葬者有所不同，但也涉及“沉尸毒注之鬼”的解注内容，和上述考古材料仍有一定程度的共同之处，也可说明同样的问题。

〔1〕（梁）僧佑：《弘明集》卷八，50页。

〔2〕（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九，155页。

〔3〕《道藏》三十二册，167页。

〔4〕《道藏》三十二册，578～579页。

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张让黄神印救疾验》载：张让于桂州得疾，“道士袁归真新刻黄神越章印，醮祭方毕，试为焚香，依法以印印之，印心及背”〔1〕，是此种神印，直到唐代以后道门中还在继续制造使用。

正如顾颉刚所言：“儒家的孔、孟都不提黄帝，他们的经典《尚书》也没有叙述到尧以前，所以黄帝在儒家中是不占势力的。至于阴阳家、道家、神仙家、医家、历家……都常说起黄帝，而且把他看作教主，因此他竟成了一个极伟大的偶像”。道家者流“使出手段来拉拢黄帝，他们把本学派的货色尽量向黄帝身上装，结果，装得黄帝也像了老子，而后道家里以老子为‘太祖高皇帝’，黄帝为‘肇祖原皇帝’”。“《汉书·艺文志》所列道家著作，有《黄帝四经》、《黄帝铭》等篇，注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这就是黄帝与老子合作的成绩，而‘黄老’一名从此打不破了。”〔2〕道教确实具有同时吸收阴阳家、道家、神仙家、医家、历家……内容的特点，与黄帝的身份完全吻合。故宫博物院藏“高皇上帝之印”，当与道家以老子为“太祖高皇帝”的说法有关，其年代或可早至西汉武帝之世，但不能肯定。

第八节 解注器发展的阶段性

从以上器物种类和文字内容的发展情况看，除部分印章材料最先出现的年代可以早到新莽或西汉之外，其他几种器物都是在东汉明帝以后才开始出现的。有的自东汉明帝年间出现，直到东汉末年都一直存在，没有间断过；有的则是稍晚阶段才开始出现，情况有所不同。解注文陶瓶和代人铅人，属于第一种情况，也是整个解注器物材料中最基本的部分。但陶瓶文字之带道符者，迄今所知以洛阳安帝延光元年（122）陶瓶为最早，以后不断有材料出土，有的自身还带有顺帝阳嘉二年（133）和献帝初平元年（190）的明确纪年，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属于后一种情况的，主要有镇墓券和石羊两项。东汉墓葬出土带解注内容的墓券，以桓帝元嘉元年（151）袁孝刘铅券为最早，以后的材料则有延熹四年（161）和灵帝光和二年（179）、光和五年（182）、光和六年（183）的纪年，没有明确属于献帝朝的材料发现。石

〔1〕 此文亦见《云笈七签》卷一二〇，《道藏》二十二册，832～833页。

〔2〕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30、35页。

羊材料，也是在解注镇墓券阶段中出现的。这些器物，虽然今后可能还会有更早的材料出土，但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出入。此外，解注瓶不同器型最初出现的年代，有的也有早晚之别，最明显的是D型Ⅰ式和A型，出现的年代最早，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是在明帝永平年间。D型Ⅱ式开始出现的年代则明显较晚，目前已知的材料没有超过灵帝之世。这些情况，或多或少也都反映了与之相联系的宗教活动在中原地区发展不同的阶段性。大致而言，可以解注陶瓶、道符和镇墓券（包括石羊）的出现为界，将东汉解注器的发展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一、永平三年（60）以后：陶瓶、铅人、药物

二、安帝延光元年（122）以后：新增道符

三、桓帝元嘉元年（151）以后：新增墓券、石羊、D型Ⅱ式陶瓶

第三章 解注器所反映的宗教历史面貌

吴荣曾曾对东汉墓葬出土“镇墓文”内容加以归纳总结说：“镇墓文一般包括以下几个内容。一是纪年月日。二是天帝使者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为死者解适，为生人除殃。三是说死生异路，死人魂归泰山，接受冥司官吏的管束。四是说利生人和后世子孙之类的吉利话。”^{〔1〕}这一概括虽然有一定可取之处，但也还不够全面和准确，忽略了一些十分关键的重要内容，使人不易从中看到几部分不同内容之间的有机联系，难以揭示出它的整体意义和实质。我们认为，东汉镇墓文，包含了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在纪一般年月日序的同时并注明建除家所订值日名称。

第二，入藏者“薄命早死”。

第三，天帝或天帝使者告丘丞、墓伯等天神地祇，为死者解适，为死者之家生人除殃。

第四，生死隔绝，“死人行阴，生人行阳，各自有分画（划），不得复交通，莫复来归地上。”死生异路，相去万里，各不相妨，不得复相求索。

〔1〕 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文物》1981年3期。

第五，“冢中前死安，千秋万岁，物（勿）复相求动伯（迫）”^{〔1〕}；“别解张氏后死者句（钩）伍（注）重复”^{〔2〕}。

第六，铅人代人，神药厌镇，解魅鬼尸注，复除之鬼^{〔3〕}，绝钩注（句校）重复咎殃^{〔4〕}，后世无复死者，利子孙，保孙子寿如金石。

第七，神符或铃印。

第八，镇墓券类型的解注器文中，除了上述主要内容之外，几乎也都有与鬼神盟誓的材料，和自称“丹书铁券”的名称或意思（以铅券或砖券作铁券代用品）。

以上八个方面的材料虽然有的开始出现的年代先后不一，但也都围绕一个中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不断完善的有机整体，包括了我们在前面讲的天师道文献所载注鬼论和解注术最基本的内容。

第一项记死者下葬和受术的时日。东汉人王充说：“世俗既信岁时，而又信日，举事若病死灾患，大则谓之犯触岁月，小则谓之不避日禁。岁月之传既用，日禁之书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是以世人举事，不考于心而合于日，不参于义而致于时。时日之书，众多非一……《葬历》曰：‘葬避九空地留，及日之刚柔，月之奇偶。’日吉无害，则刚柔相得，奇偶相应，乃为吉良。不合此历，转为凶恶。”^{〔5〕}此记岁月日，当以葬历为本。至其所注建除值日的文化渊源，将于后再论。

第二项的意思是说，入葬者系夭折或其他非正常死亡。这虽然不是全部解注器文的必有内容，但却是许多器文都特别著明的内容。安徽阜阳汉墓出土铅券文云：“元延女（汝）凉自薄命，禄尽夭年，逢灾宗（终）疾”，甚至还特地说明入葬者薄命早死的具体原因情况。有的话虽然没有直接这样讲，同样的意思仍然是有的。如陕西长安三里村汉墓出土建和元年（147）瓶文说：“为加氏之家别解，地下后死妇（其中另器作女）加亡，方年二十四。”只活了二十四岁就死去，自然也属于薄命早死的范围。这也是一项特别值得注意的突出内容。

第三项说明整个器文是由天帝发布或天帝使者（天帝神师）代为传达天帝的命令，告诉丘丞、墓伯等与墓事有关的神祇，要他们为死者解除罪谪，

〔1〕 原文见前录山西临猗延熹九年韩祢兴瓶。

〔2〕 原文见前录陕西长安南李王村墓瓶。

〔3〕 原文见前录陕西户县汉墓阳嘉二年瓶。

〔4〕 原文见前录河南洛阳唐寺门 M1：66 号瓶。

〔5〕 （汉）王充：《论衡·讥日篇》。



为死者家中的生人解除祸殃，讲的是术者的身份和行术的缘由、目的和对象。我们之所以要去掉吴荣曾归纳的“天帝使者告死者之家”的项目，首先是因为在整个东汉镇墓文中完全找不到“告死者之家”的例子。再说，天帝使者在这里是应死者之家的请托，以天帝代表者的身份行术为某家中死者和生人解适除殃。离开了天帝使者，死者的家人也就无法为死者和他们自己解适除殃，死者之家也不应该是天帝和天帝使者告诉的对象。虽然《赤松子章历》卷五《又大冢讼章》有文说：请“加符告下某家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蒿里父老，诸是地狱主者，并严加断绝某家冢讼之气、伏注之鬼”〔1〕。这里的“告下某家”是不通的，“某家”二字后面当有“死者某”之脱文。弄清这种关系，十分重要。

第四项是行术的基本原则，保证维持死者与生人之间完全隔离的正常状态，因为死者魂灵——鬼与生人发生接触，是给生人造成祸殃的根源。这是整个器文的核心部分，其他各项也都是围绕这一内容展开的。

第五项是讲在保证本次入葬死者安定的同时，还要保证此前入葬墓中的死者也不受任何骚扰和胁迫，因为如果先葬者受到侵害，他们的鬼魂又会移祸于后人葬者，直接间接地对生人造成注祟之害。后死和前死是相互联系的两个对应概念，许多器文虽然只见“后死”之词而没有“前死”字样出现，言“后死者”则意味着墓中必然同时还有“前死者”的存在。这种器文出现在两次以上合葬或虽属首次葬人而为后死者预留葬位的合葬墓中，即使根本不见“前死”、“后死”的字样，实际上也应包含有这种意思在内，只不过是行文的省略罢了。本项与第四项，虽然部分内容看似与第三项有些重复，但具体内容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是对前者所作的重要补充说明。了解这点，对于我们认识考古发现墓注材料盛行和所属宗教产生的原因，也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意义。

第六项是说采用放入代人和神药的措施来防止注鬼为害生人，讲行术的部分主要方法。

第七项虽然也不是全部器物都有的，但无论陶瓶或墓券，许多都有这方面的内容，不仅“天帝使者”、“天帝神师”、“黄神越章”等名称都可从道书文献中找到记载，全部 11 例神符也都和天师道（正一道）文献著录的符形风格相同，亦可与道书文献所著录的材料相比较对照，对确定它们的派别属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道藏》十一册，221 页。

第八项内容和前面第六、第七两项一样，讲的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解注方法。

总的说来，以上八个方面的内容，除了记录事情发生的时间之外，另外实际上只有三点：一是目的，为死者解谪，为生人除殃；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隔绝生死接触以解注，包括告命、行符、盟誓、驱杀、用药、代人等等；三是当事者身份关系，包括行术者（天帝神师使者和以天帝为首的宗教神祇）、施术对象（以当时入葬之死者为主的墓中人和其他注鬼）和受益者即墓主家中生人。总的说来，都是讲如何通过一系列繁复的宗教法术仪式让墓主鬼魂保持安定，防止其成为注鬼崇害生人。为死者解脱（解除罪谪），从一定意义上讲，似乎亦可以说是行术的目的，但为死者解脱（解除罪谪），让死者保持安定，不至成为注鬼为害家中生人，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手段。保证死者家中生人的平安长寿，应该是整个法术仪式总的目的和核心，隔绝生死接触以解注则是整个解除墓注法术仪式的关键。我们不仅应该把解注器文看作一个整体，那些墓葬出土与镇墓文相联系的其他没有文字的相关器物，旨在围绕这一内容起作用，也应把它们纳入同一范畴来加以考虑，视为同一宗教行为的组成部分。只有这样，许多现象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许多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如前所说，很早以来就有人从上述“镇墓文”内容出发，注意到它们和早期的道教有关，有的比较简单地直接和太平道或黄巾起义所依托的道教联系起来，认为就是有关道教活动的实物遗存；有的则比较谨慎地认为其性质属于与后来道教有关的一种巫术性质的材料，或者说是在道教形成以前由巫术向道教过渡阶段的东西。无论何种意见，都缺乏从作为一种宗教的基本定义标准来着眼的具体、细致的比较对照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免缺乏应有的说服力。巫术与宗教两个概念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但却常常是彼此相互联系而密不可分的。巫术只是一种原始、简单、低级的无理论、无组织的超自然力神灵信仰习俗。而宗教本身，则是一种有一定理论（成文的经典）、超自然力神灵信仰对象（神系），有一定礼仪道德伦理规范的复杂的组织行为。一种宗教，往往吸收、包含一些巫术的成分，但宗教绝不单纯只是一些巫术内容。巫术和宗教，是两个层次高低不同、不同阶段的信仰活动概念。我们认为，上述考古发现东汉解注器材料虽然带有巫术的成分和内容，但已经具备了作为一种宗教的基本要素，应当属于正式宗教的性质，是初期天师道活动的遗迹。

第一节 解注器材料所反映的宗教理论观点

过去对于死者魂灵的归宿，有鬼无鬼，并无明确的固定概念。即使有鬼，也和生人一样，有恶有善，善鬼可为生人造福，至少不加害生人，只有那些被称为“厉鬼”的恶鬼才为祸于人，一般的鬼可以和生人和平共处，随意接触。死去的祖先亲人鬼魂，仍然和活着的子孙亲人保持过去一样的亲密关系。为了恪尽孝道，活着的晚辈之人，要经常在家中対祖先进行祭祀。“孙为王父尸”，死去的祖先灵魂，可以附在活着的晚辈人身上享受祭飨。“古不墓祭”，死者的坟墓并不一定葬在和生人相隔很远的地方，祭祀死去祖先的仪式也不是一定要在墓上举行。而从考古发现的解注文和有关解注器材料所反映的情况看，其核心思想则是以阴阳五行为基础，“死人行阴，生人行阳，各自有分画（划），不得复交通，莫复来归地上。”生人属阳，死者属阴而成鬼，阴阳有别，死者的鬼魂绝对不能与生人发生任何接触，死鬼和生人的接触，是造成生者祸殃的根源。生死永远隔绝，“上绝天文，下绝地理”，即便是最为亲近的父母与子女，妻子和丈夫，也是“长相忘”，“乐莫相思，苦无相念”，“莫相来索”。死者一经入葬墓中之后，也就进入了与生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地下世界，鬼魂无论欢乐还是苦难，也都与生人和阳世毫不相干，连感情上的联系也要彻底割断，不能有任何依恋和同情心，更不能产生让生者以任何形式代为承担痛苦的愿望，否则便将造成生者的不幸。如果违背这一原则，死者鬼魂一旦和生人发生联系和接触，就必须采取种种不同的宗教手段，对死鬼的行为加以惩处，使二者脱离接触。这样的一种“注鬼论”，是和上述儒家传统生死灵魂观念和伦理道德思想完全不同的自成体系的宗教理论，绝非一般单纯的巫术所能有。这种道教的长幼尊卑不分的人鬼观念，曾经遭到儒家观点的诘难，道教学者自己也对此作过辩解。《抱朴子内篇·对俗篇》记载说：“或曰：‘审其神仙可以学政，翻然凌霄，背俗弃世，蒸尝之礼，莫之修奉，先鬼知，其不饿乎！’抱朴子曰：‘盖闻身体不伤，谓之终孝，况得仙道，长生久视，天地相毕，过于受全归完，不亦远乎？倘能登虚蹑景，云輿霓盖，餐朝霞之沆瀣，汲玄黄之醇精，饮则玉醴金漿，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先鬼有知，将蒙我荣，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监御百灵，位可以不求而自致，膳可以咀茹华璫，

势可以总摄罗酆，威可以叱咤梁成，诚如其道，罔识其妙，亦无饿之者……然则今之学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祭祀之事，何缘便绝！”^{〔1〕}“审其神仙可以学政，翻然凌霄，背俗弃世，蒸尝之礼，莫之修奉，先鬼知，其不饿乎！”就是针对道教求仙延寿，只顾生者自己的幸福，违背儒家对死去祖先经常举行祭祀之礼仪，以至让“先鬼”忍饥受饿提出的责难。葛洪所作的辩驳，是说生者求仙获福，也就能使死去的祖先得到安慰。况且，“今之学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祭祀之事，何缘便绝！”是指道教尚有五腊吉日祠先人的习俗，虽然祭祀先亡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却并没有完全断绝。葛洪的说法，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道教的家亲生死尊卑观念与儒家不同，和他们的注鬼论却是相一致的。道书文献记载阐述的注鬼论和解注术，一直是道教主流派天师道的一项重要宗教理论，从初期开始，就一直贯穿下来，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阐述。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解注器文中包含了一些明显来自纬书的内容，与道教理论掺杂不少阴阳五行讖纬神学理论成分者相一致，亦非一般的简单巫术所能有。

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中的印章、铅人之类小型器物，仅能容纳简短的词语，而陶瓶和墓券均可容纳较多的文字，虽然字数多少不一，除了少数过于简短者外，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有相对比较固定的格式。但仔细分析，所谓固定的格式，明显具有古代官府文书的痕迹，实际上都是摹仿当时阳世通行的公文加以宗教化而成，主要包含了告命、传移、符檄、契券（盟约）等四种不同的类型。契券盟约，主要是墓券加上少数石羊。告命、传移、符檄，皆系陶瓶文字，属符命与移文者最多，檄文者较少。

符命即天帝的命令，少数直接由天帝发布，多数由天帝使者代宣。如河南洛阳唐寺门 M1 出土 M1: 66 号瓶文曰：“天帝告天上使者、凶之吏：今有小杜（社？）里□氏后死子凡□十一算，建解。众为距（具）五石瓶十八物，雄〔黄〕神药，绝钩注重复咎央（殃）。便死利生，不得相防（妨）。如律令！”是直接以天帝的名义向诸神发布的命令，可为此种类型的代表。

刘勰谓：“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故其植义飏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刘歆之移太常，辞刚而

〔1〕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注》，51～52页。

义辨，文移之首也。”^{〔1〕} 移文一般是在同一等级的神祇间相互转告，文中多写出“告移”或“传到”字样，可以同蒲路工程中山西某地出土灵帝熹平二年（173）朱书陶瓶为代表。文曰：“熹平二年，十二月乙酉朔，十六日庚申。天帝使者告张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冢丞、冢令、主冢司令、魂门亭长、冢中游击等；敢告移丘丞、墓柏（伯）、地下二千石、东冢侯、西冢伯、地下击犊卿、耗（蒿）里伍长等；今日吉良，非因他故，但以死人张叔敬，薄命蚤（早）死，当来下归丘墓。黄神生五岳，主生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生人筑高台，死人归深自埋。眉须以（已）落，下为土灰。今故上复除之药，欲后世无有死者。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立制、牡厉，辟除土咎，欲令祸殃不行。传到，约勒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急急如律令！”是由“天帝使者”、“天帝神师”代为传达天帝的旨意，并要求诸神之间相互转告有关内容。“告移”、“传到”，都是古代平级官吏之间相互传达通报的意思，属古代“传移”的形式。山西临猗东汉墓出土桓帝延熹九年（166）瓶文文曰：“延熹九年，十月丁巳朔，五日辛酉，直开。移五部中都二千石、丘丞、墓伯、冢侯、司马：地下牴羊令韩祔兴、冢中前死安，千秋万岁，物（勿）复相求动伯（迫）。生人自有宅舍，死人自有棺槨，生死异处，无与生人相索。填（镇）冢雄黄，四时五行，可除咎去央（殃），富贵毋极。如律令！”尽管前面省去了“天帝使者”、“天帝神师”之类代宣者的身伤名称，仍标出“移”字一词。有的虽然在文中没有出现“传”、“移”的字样，但加上神符或钤印以为信记，即古代文书中之所谓“符传”，也仍然属于这一类型。

河南洛阳东郊史家湾汉墓出土桓帝永寿二年（156）瓶文曰：“永寿二年五月□□□□，值直。天帝使者旦（谨？）为□氏之家镇寒暑□□□□移大黃印章迫佼四时五行，追逐天下，捕取五疠（？）冢（？）之符，昼制日，夜□（制？）□，乘传居署，赍（越）度閼梁，□董（谨）摄录百鬼名字，无合得逃亡，近留行远，□生□溪山主获致荣□□□□旦女婴，执火大夫烧汝骨，风伯雨师扬汝灰。没□□者，使汝筑灰垣五百□，没戍其上，没戍其下，秦其□汝黄帝呈下，急□舟（？）□□神药其物，主者慈石。如律令！”瓶文完全是以十分严厉的口吻对侵害墓主及其家人的鬼魅加以声讨或严重警告，不得妄为祟害，否则将遭到种种最为凶酷的惩处，则可被视为檄文类型材料的典型。

〔1〕 刘勰：《文心雕龙·檄移第二十》，227页。

前引《赤松子章历》卷五《又大冢讼章》论解诸墓注文称：“魂爽艰急，日就难忍，不堪荼毒，辞诉鬼官，求引生人，代其剧苦。幽司……移檄召对……臣某复览诰传，唯应分解冢讼墓注为急……谨为伏地拜章一通……为某家分解先亡后死冢讼诉注之气，令复注绝灭，逮害潜消，人鬼异路生死乖隔。”〔1〕所言“移檄召对”，与东汉墓解注器之檄、移文字，内容正相吻合。南宋金允中《上清灵宝大法序》云：“绍兴以后，浙江以东多宗天台四十九品，不究前辈编辑之本意，首于序中直云灵宝大法者……法中编辑之辞，俱是上帝口宣之语。殊不知符檄、斋修、醮设，书禁驱治，祈请镇禳，悉是中古之后，因事立仪，随时定制……却非上古之世天帝之言。”〔2〕后来道教诸派祈禳斋醮所用符檄文词，固然有不少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后出的材料，更非“天帝之言”，但考古发现材料证明，其中确有部分在道教产生初期阶段即已出现，为后来所承袭，这也是事实，所云“符檄”一事，也就是如此。这一情况表明，当时已有类似《千二百官章仪》、《三百大官章》的宗教经典文本存在，否则不可能在这样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大量出现如此内容形式相同的器文。檄移、书符、用印、假人代形、施药等一系列科仪法术材料所表现的规范化特点，也无不体现出一种“经为法之本，法乃经之用”的原则，说明术者行术有一定的文本作为依据。

《后汉书·襄楷传》记载，宫崇上道书《太平经》，“顺帝不行”，看来在顺帝之前即应有道教经典存在，而且也不大可能就只有《太平经》一种。后面我们还要详细讨论，根据文献记载，早在西汉末年已经出现了“具有道教性质的社会改良理论”的“类道书”《包元太平经》。既然当时就已出现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具有道教性质的理论的专书，为什么经过几十年发展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不会进一步发展出类似《太平经》、《千二百官章仪》、《三百大官章》这样的道教文献呢？到东汉明帝之时有正式的道书存在，应该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事。后来的《太平经》、《千二百官章仪》、《三百大官章》一类文献之最初版本，很难说和《包元太平经》这样早期具有道教理论性质的文献没有渊源关系，而且完全有可能在道教传入蜀中之前早已存在，只是后来内容有所增损改动罢了。否则，何以上述广阔地域范围内考古发现的墓葬解注器材料，从宗教理论到后面讨论的鬼神系统名称、方术内容，许多都可以在现存有关的道书中找到相同的记载呢？又道教的三官崇拜有属于天官的

〔1〕《道藏》十一册，219～222页。

〔2〕《道藏》三十一册，345页。

各种星神，所以道书文献中有一类讲星象的书，如《道藏》所收的《通占大象历星经》即为其例^{〔1〕}。西北大学藏西安汉城东汉墓出土初平元年（190）陶瓶文中提到的《星经》，或即其书，或属其类，也应是当时与道教有关的经典之一。

另外一点需要说明的是，神仙思想一般人认为是道教的一个特点，在考古发掘中似乎没有找到多少可以相互对应的材料，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由于正如学界有人所指出的那样，早期天师道的神仙思想并不突出，远不如后来重要。我们早已注意到凡是最早讲述天师道历史的文献，无论是《后汉书》还是《三国志》、《魏略》，也都只讲治鬼疗病，几乎没有讲求仙之事，就是很好的说明；二是考古发现解注材料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墓葬方面的，而且墓主大多属于非正常死亡，主要是解决如何防止墓主死后成为注鬼注害生人的问题，与升仙问题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三则并非完全没有神仙思想的反映，如解注器文在为死者解谪、生人除殃咎的同时，还常常连带提到“地下死籍削除”，“寿如金石”；“千秋万岁，后世无复死者”等等。也就是说，墓中先亡后死之所以死而为鬼，在地下世界遭受罪谪，与不崇奉其信仰或功行不足，未能削除死籍所致，也都属于神仙观念的范畴。在河南洛阳烧沟汉墓出土初平元年（190）瓶文中，甚至还出现了“天地久相视”的字样，更明确地反映出一种长生久视的神仙思想观念。河北望都汉墓与解注文墓券同时出土了西王母、东王公画像石枕。另本书《河南偃师县南蔡庄乡东汉墓出土道人肥致碑及有关道教遗物研究》论及偃师东汉墓与无字解注瓶同出的道人肥致碑，说东汉时在偃师有人往见西王母“受仙道”而成“土仙”。碑主肥致在经过修炼之后，“与道逍遥”，与赤松子等神仙为友，“出窈入冥，变化难识，行数万里不移时日，浮游八极，休息仙庭”的材料，和道教的说法也是一致的，也从不同的角度为说明这一事实提供了不可忽视的线索。

第二节 解注器文所反映的神系内容和 “天帝使者”、“天帝神师”

上述解注器文提到的神祇，种类是相当不少的。至高无上的是天帝，是

〔1〕《道藏》五册，4～22页。

黄帝^{〔1〕}，是黄神北斗，其次是越章、司命、司禄，另外还有风伯、雨师、南极、南斗、三台、太白（东方）、辰星（南方）、营惑（西方）、镇星（北方）、二十八宿、冥收、八魁、九坎等包括天星在内的星神（星官）；辰、丑等生肖之神；属于地官的有五岳神、地下主者、地下二千石、地下都尉、地下击犊卿、决曹尚书、丘丞、墓伯（冢伯）、冢侯、嵩高长、蒿里君、蒿里父老、墓皇、墓伯、墓长、墓令、墓主、主墓狱吏、墓故夫人、伯门卒史、埏门伯史、墓门亭长、魂门祭酒、冢中游徼、陌上游徼、冢中守老蛇等。这样一些神名，我们把它和前面引到《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卷三《收葬送冢墓鬼》：“地畜灵官将一百二十人，治广灵室，主收冢侯、墓卿、右袄（右秩）鬼”。“左都侯君官将一百二十人，治太清元室，主收天下兵冢鬼，绝墓丘丞、墓相、冢中二千石为祟病人者。”^{〔2〕}以及《赤松子章历》等天师道文献记载与解注有关材料相比较，绝大多数都是吻合的。唐王悬河《三洞珠囊》卷七引《度星经》云：二十八宿皆各有名字，“皆能传送亡人，不令复连后生之人也。”^{〔3〕}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太上宣慈助化章》卷五《三天请命章》载道士上章文云：“谨状谨条天、地、水三官神鬼名字，曹府传治……诣三丘五墓冢讼门下求觅之”。“状请前条十二岁月日时中上计，并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等日天官君将吏兵……主为肉人某身中解灾度厄，削除死籍，定上生名”^{〔4〕}。器文所书建除日名，或亦与值日之神有关。当然，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两者之间也有一些出入，这是由于文献记载有的编集时代较晚，在保存一部分早期材料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加上一些后起的材料，而早期材料在这些文献中又没有能够全部保存下来，这是不难理解的现象。在此，考古材料对文献记载可以很好地起到印证和补充的作用。

最初的天师道，是在道教前史时期方士巫覡传统鬼神观念的基础上吸收一部分西汉末年和新莽时代谶纬符命神学内容发展形成的。按照过去传统的自然崇拜观念，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帝是人间最高统治者，因此天上地位最高的尊神也就是天上的帝君，被称为“上帝”、“天帝”、“天君”或“天

〔1〕 河南洛阳李屯元嘉二年（152）瓶文：“黄帝与河南缙氏”；陕西潼关杨震家族墓群 M5 号墓出土灵帝建宁元年（168）瓶文：“皇（黄）帝使者谨为煬（杨）氏之家……”。

〔2〕 《道藏》二十八册，549、550 页。

〔3〕 《道藏》二十五册，338 页。

〔4〕 《道藏》十一册，334 页。

公”。曹植《诰（诘）咎文》：“五行致灾，先史咸以为应政而作。天地之气，自有变动，未必政治之所兴致也。于时大风发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诰（诘）咎祈福。其辞曰：‘上帝有命，凤伯雨师……’”〔1〕是“天帝”即“上帝”。不过，“天帝”、“上帝”、“天君”和“天公”，虽然也都同样是指上天的最高尊神而言的一种宗教神灵信仰概念，但在一种宗教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同一宗教的不同教派中，具体称呼是有所区别的。大抵在先秦至西汉末年以前除少数个别材料之外一般都称“上帝”，从西汉末年成帝、哀帝时开始出现“天帝”的叫法。《汉书·李寻传》记载说：“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春秋保乾图》：“阳起于一，天帝为北辰”〔2〕。《易纬》：“帝者，天号也。法配天地，不私公位，称之曰帝。”〔3〕《孝经援神契》：“太山，天帝孙。”〔4〕《包元太平经》和《春秋保乾图》、《易纬》、《孝经援神契》也都是谶纬神学文献，道教的产生和它们都有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和瓜葛。早期天师道的最高尊神“天帝”、“天公”，显然是来自《包元太平经》之类谶纬学宗教神学的材料。

《汉书·王莽传》载，居摄元年（6）十一月，“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言，七月中，齐郡临淄县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十一月壬子，“得铜符帛图于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居摄三年即初始元年（8），“众庶知其奉符命……梓潼人哀章学问长安……见莽居摄，即作铜匱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匱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于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始建国二年（10），“是时争为符命封侯，其不为者相戏曰：‘独无天帝除书乎？’”人间一切重大事情，也都由天帝即天公安排决定，皇帝即位，贵族封侯，莫不假天帝符命而行，天帝自属上天最高尊神。东汉王充《论衡·纪妖篇》驳汉人所传战国赵简子病中梦见天帝事，谓当道者称其时亦在天帝之侧，事不可信。其言曰：“夫在天帝之侧，皆贵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车马备具，天帝之使，单身当道，非其状也。天官百二十，与地之王者无以异也。地之王者，官属备具，法象天官，禀取制度；天

〔1〕《艺文类聚》卷一百，灾异部，旱，文。

〔2〕《后汉书·郎顗传》李贤注引。

〔3〕《太平御览》卷七十六引。

〔4〕《太平御览》卷八八六引。

帝之官同，则其始者亦宜均，官同人异者，未可然也……简子所梦见帝者，非天帝也……赵简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晋人葛洪《抱朴子内篇·微旨篇》述其事称：“赵简子秦穆公皆亲受金策于上帝”^{〔1〕}，是以王充所称之“天帝”即“上帝”。意识是社会现实存在的反映，“天帝”为天神之首，系由人间帝王为最尊蜕化而来，王充以此为反是固误，但却可证其时天地神祇以天帝最尊的事实。唯所说虽是战国时事，但文献成于东汉，当为东汉人以天帝即上帝，遂以“天帝”改“（上）帝”之文者。查赵简子材料，原出《史记·赵世家》。载云：“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扁鹊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缪公尝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孙支与子舆曰：‘我之帝所甚乐。吾所以久者，适有学也。帝告我晋国将大乱……今主君之疾与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间，间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于钧天……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黑来，我又射之，中黑，黑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文中言及上帝之文凡八见，皆只称“帝”而不以“天帝”称之，是王充引述该文，以其时世人已习称上帝为天帝，故改“帝”作“天帝”也。这是西汉武帝时上帝尚无“天帝”之称的最好证据。《左传·僖公十年》：“狐突适下国，遇太子。太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君曰：‘喏。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于韩’。”^{〔2〕}李零译述此段文字大意作：“僖公十年传说晋惠公即位后，狐突在曲沃新城遇见太子申生的冤魂，太子说：‘我要把晋国送给秦国，让秦国祭祀我，天帝已允我之请。’狐突说：‘不是自己的神，神不受祭，民不奉享，这样做不妥。’太子说：‘那好，我再请示一下天帝，七天后你听我的回话，新城西偏将有巫者显现。’狐突按期而往，从巫者得到回话，说‘天帝将惩罚晋国，让他大败于韩原（韩原之战在后五年）’。”^{〔3〕}上述《左传》文中的“帝”就是上帝，如果从“上帝”就是“天帝”这一意义上讲，李零的译述并没有错。但从“上帝”与“天帝”属不同发展阶段同神异称的严格意

〔1〕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125页。

〔2〕 《十三经注疏》1801~1802页。

〔3〕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58页。

义上说,不如译作“上帝”更为确切。

东汉道教产生之后,在晋代以后“三清”、元始天尊之说产生之前的道教最高尊神,沿西汉末年以来之俗,习称“天帝”、“天君”或“天公”,亦仍有沿旧俗并称“上帝”者。但《太平经·大功益年书出岁月戒第一百七十九》三十处提到“天君”,《有功天君敕进诀第一百九十八》除篇名外二十处提到“天君”,也都没有一处称“天帝”或“天公”的例子^{〔1〕},全书的情况也是如此。而在早期天师道文献如《千二百官仪》、《正一盟威法录》以及六朝人据此编成的《赤松子章历》等书记载,和东汉时期的墓葬、遗址出土的器物,也都有不少天师道最高尊神天帝的材料。如《赤松子章历》卷二“三会日”条说:三会之日,“其日天帝一切大圣俱下,同会治堂,分形布影,万里之外,响应齐同,”宜上章言功^{〔2〕}。葛洪《抱朴子内篇·祛惑篇》载:“河东蒲阪有项曼都者,与一子入山学仙,十年而归家。家人问其故。曼都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来迎我,共乘龙而登天……及到天上,先过紫府……仙人但以流霞一杯与我,饮之辄不饥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谒拜失仪,见斥来还……昔淮南王刘安升天,见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称寡人,遂见谪天厕三年。吾何人哉?’河东号曼都为斥仙人。”^{〔3〕}又《神仙传》卷八《沈羲传》载:“沈羲者,吴郡人,学道于蜀中……黄老合遣仙官来下迎之……有三仙人羽衣持节……遂载羲升天……四百余年,忽还乡里……说初上天上时,云不得见帝,但见老君。”^{〔4〕}是西晋天帝犹尊于老君。东晋道书《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十,“杀鬼品”:“壬午之年,为一切人作斋,转无量三昧经者。有疫鬼来者,必不得前也。道士受三洞布化之人,天帝来助之,终不落恶道之中矣。”^{〔5〕}东晋时的情形,大概仍然如此。江苏南京市北郊郭家山东吴墓出永安二年(259)陈重砖买地券、永安四年(261)大女□□买地砖券^{〔6〕};旧出东晋咸康四年(338)江苏丹徒朱曼妻薛氏石买地券^{〔7〕};江苏镇江东晋墓出土泰(太)和元年(366)司马氏砖买地券^{〔8〕},皆有“从天

〔1〕 王明:《太平经合校》,524~543、610~613页。

〔2〕 《道藏》十一册,183页。

〔3〕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350页。

〔4〕 《说库》本。

〔5〕 《道藏》六册,35页。

〔6〕 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北郊郭家山东吴纪年墓》,《考古》1998年8期。

〔7〕 拓片图版见《文物》1965年6期。

〔8〕 林留根:《江苏镇江东晋纪年墓清理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2期。

买地，从地买宅……如有争地，当诣天帝。如有争宅，当诣土伯”或类似之文。朱曼妻薛氏一券，文末尚有“如天帝律令”之语。这些考古材料，也可说明同样的问题。

上述这种情况，大概到了南北朝时期已有所改变，天帝的数目增多，也就逐渐丧失了他在道教中最高尊神的地位。北周甄鸾《笑道论》卷中“太上尊贵”条说：

《神仙传》云：吴郡沈羲，白日登仙，四百年后还家说云，初上天时，欲见天帝，天帝尊贵，不可见。遂先见太上，在正殿坐，男女侍立百人。如此状明，则知太上劣于天帝矣。言太上尊贵，治在众天之上者，妄也。^{〔1〕}

此中所引《神仙传》事，乃前录葛洪书本传文意，甄鸾以之驳太上位在天帝之上的说法，是其时天帝为道教最高尊神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直到唐宋以后，在道士们的观念中有时还混杂了一些早期以天帝为本教最高尊神的残余观念。如刘宋陆修静撰、杜光庭增补之《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卷下说：“天帝使者捕虐鬼，得便辄杀，勿问罪，急急如律令！”^{〔2〕}《真诰》卷十四《稽神枢四》记载说：“蔡天生者……道逢河伯少女……教其朝天帝玉皇之法，遂以获仙。”^{〔3〕}《金锁流珠引》卷二十六《为诸侯三品五品等大官上元辰千车五墓却死来生令疾病除差平安如愿章法》云：“老君曰：小国诸侯有重灾厄疾病在床枕者……如不损，即上书。（古呼章为《上天公书》）今改书为章，改‘天公’为‘太平金阙帝晨后圣玄元上道君’。一又云‘玉皇上帝’，不名为‘天公’之号也。于上天公乞面敕三官，更与添年益算。”^{〔4〕}此与《抱朴子内篇·登陟篇》所说之“求仙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时，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5〕}，文意相合。后来曾为道教最高尊神的玉皇大帝，仍系由早期道教最高尊神天帝（天公）演变而来。南宋金允中撰《上清灵宝大法序》云：“绍兴以后，浙江以东多宗天台四十九品，不究前辈编辑之本意，首于序中直云灵宝大法者……法中编辑之辞，俱是上

〔1〕《广弘明集》卷九，154页。

〔2〕《道藏》六册，361页。

〔3〕《道藏》二十册，572页。

〔4〕《道藏》二十册，475页。

〔5〕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302页。

帝口宣之语。殊不知符檄、斋修、醮设，书禁驱治，祈请镇禳，悉是中古之后，因事立仪，随时定制，辅翊元化，赞助灵风，非以为法，出于后世而不可行……亦有遇异人之付传，亦有蒙神仙之授受，乃可以立功宏化者，集为中乘之法，却非上古之世天帝之言。”^{〔1〕}是以“上古”早期道经方系“天帝之言”，具有权威，非魏晋隋唐“中古之后”新出道书由神仙异人假托为“上帝口宣之语”者可比。

最初的天帝，亦称太一或泰一。《史记·孝武本纪》：“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史记·封禅书》：“天神贵者太一”。《索隐》：“宋均曰：天一、太一，北极神之别名。”《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常明者，太一常居也。”《正义》：“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刘伯庄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纬书《易乾凿度》卷下：“太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郑玄注云：“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往于八卦日辰之间，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游，息于紫宫之内，其星因以为名焉。故《星经》曰：‘天一、太一，主气之神。’行，犹待也。四正四维，以八卦神所居，故亦名之曰宫。天一下行，犹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卒则复。天一下行八卦之宫，每四乃还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因谓之九宫。”^{〔2〕}关于太乙与北辰、北极星之间的关系，文献记载颇多含混，问题相当复杂，学界尚无一致的看法，这里不去多作纠缠。不过早已有人指出，这里说的天帝“北辰”，“北极”，并不是指天文学上的北极星，而是指的北斗。饶宗颐在《道教有关新资料兼论中黄太一》一文中说：“秦汉以来‘太一’之义屡有变迁”，“天体之太一天极指北斗”^{〔3〕}。李零也说：“‘太一’是代表北斗”。《史记·封禅书》：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秋，为发南越，告祷太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这种‘灵旗’有代表‘太一’的‘北斗’（或‘招摇’），代表‘太一三星’……‘太一’即《史记·天官书》一开头讲的代表‘天极’即‘斗极’的‘太一’，可与北斗互代。‘太一三星’，即《史记·天官书》所述附于‘太一’，‘前列直斗口三星，随北端

〔1〕《道藏》三十一册，345页。

〔2〕日人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32页。《四库全书》收有此书。

〔3〕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154页。

兑，若见若不’的‘阴德’或‘天一’。”〔1〕

结合汉晋墓葬出土解注器材料看，我们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还可以补充一些证据。《尔雅·释地》：“北戴斗极为空桐。”疏：“斗极者，北斗中也。”从用自一至九垒横之数皆十五，总数四十五数之九组数字组合以表四正四维九宫八卦之汉代式盘，中央画出北斗星象者不只一件，未见有作北极六星者。镇墓瓶符与符简之只绘一星象者，亦多为北斗，也没有画出北极星的。宋代以来流行极为广泛的北极驱邪院道教法印，印面文字作“北极驱邪院印”，而所著之星象图形均为带连线之北斗七星，无一作北极五星者，虽然时代较晚，与东汉以来的材料一脉相承，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凡此种种考古发现实物材料，也都说明北斗为最尊之天神，亦是北辰（即太一、天帝）即北斗而非北极星之证。江苏高邮东汉遗址出土道符木简，上部为神符，下部为咒语。神符上端画出北斗七星，斗杓中书“北斗君”三字，星下符书“天帝煞鬼”等字。咒文中带有“天帝神师”之词。并有“天帝使者”封泥和带有“于道时”等字样的陶壶同出〔2〕。这一材料，更是明明白白地表述了这种关系。看来“天帝”和“天公”为天师道之称，《太平经》则称“天君”而不称“天帝”、“天公”，这也是研究天师道与《太平经》二者关系一项值得注意的材料。

天帝下属天官，有风伯（风师）、雨师等，则多沿旧时传统。《周礼·大宗伯》郑玄注：“风师，箕也。雨师，毕也。”贾公彦疏曰：“《春秋纬》云：‘月离于箕，风扬沙’，故知风师箕也。”又引《龙鱼河图》云：“天太白害主兵凶，其精下为雨师之神。天萤惑星主司非，其精下为风伯之神。”“天镇星主得土之庆，其精下为灵星之神。”〔3〕又《春秋元命苞》：“文昌二星曰上台，为司命，主寿；次二星中台，为司中，主宗室；东二星曰下台，为司禄，主兵。”〔4〕“司禄赏功进士，司命主灾咎，司中主佐理也。”〔5〕“司命举

〔1〕李零：《中国方术考》，74页。作者后来撰著《“太一”崇拜的考古研究》一文，收载东方出版社2000年出版之《中国方术续考》中，似乎对这一观点有所改变，但没有明确说明改变的理由。

〔2〕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10期。

〔3〕《太平御览》卷八八一引，3914页。

〔4〕《开元占经》卷六十七引。

〔5〕《史记·天官书》索隐引。

过，灭除不祥。”^{〔1〕}钟肇鹏《讖纬论略》第八章《讖纬与宗教》对此曾有论说。

如前所说，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文所包括的40多种不同的神名，分别属于天师道三官中的天官和地官，完全没有出现水官的材料。这种情况，是由于这些材料只是解墓注一个方面的内容，主要和天官、地官有关，与水官本身没有什么直接联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次，也可能和在整个道教神祇中属于水官部分的本来就相对较少有关。刘宋陆修静《陆先生道门科略》记载：“天师立治置职，犹阳官郡县城府治理民物，奉道者皆编户著籍，各有所属。令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一年三会，民各投集本治，师当改治录籍，落死上生，隐实口数，正定名簿，三宣五令，令民知法。其日，天官地神，咸会师治，对校文书。”^{〔2〕}在“天官地神”之外，完全没有提到水官一事，也是很好的说明。

在上录解注器文中，除了如像游光、地柱、星死咎鬼、师死咎鬼、自死咎鬼、乳死咎鬼等不同的具体鬼名之外，河南洛阳史家湾汉墓出土桓帝永寿二年（156）瓶文还有“摄录百鬼名字，无合得桃（逃）亡”之语，与后来道书《女青鬼律》所说“有道男道女，生见吾秘经，知鬼姓名皆吉，万鬼不干，千神宾伏”，颇为相类^{〔3〕}。是不仅有由众多神祇构成的神系，而且还有内容复杂的鬼系存在。又《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卷一《收死人耗害》章云：“郡侯君官将一百二十人，治泰玄室，主收丘墓之鬼，绝墓神兵（丘）[丞]、墓伯、冢中二千石为民作精祟。”卷三《收葬送冢墓鬼》云：“左都侯君官将一百二十人，治太清元室，主收天下兵冢鬼，绝墓丘丞、墓相、冢中二千石为祟病人者。”^{〔4〕}则上述之丘丞、墓相、冢中二千石等，既为与墓葬有关的神祇，也可为祟病人，有时鬼、神二者之间的作用并无严格区别，至少与墓葬有关者如此，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关于“天帝使者”和“天帝神师”，有人以为也是属于神名，那是不对的。我们认为，它们都应该是行术的“道中人”、“道行人”神化自己，自封为天帝代表者的自称之词。以人代神，神凭依于人，既为人，又为神，具有双重身份。《汉书·郊祀志》记载，成帝建始二年匡衡、张谭曾上疏建议

〔1〕《开元占经》卷六十九引。

〔2〕《道藏》二十四册，780页。

〔3〕《道藏》十八册，239页。

〔4〕《道藏》二十八册，539、549页。

“长安府厨官县官给向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十三所应礼及疑无明文，可奉祠如故。其余四百七十五所，不应礼或复重，请皆罢。奏可……又罢高祖所立梁、晋、秦、荆巫九天南山莱（秦）中之属……候神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此中之“候神方士使者”和“候神方士使者副佐”，已被正式列入国家编制的巫祝方士官职，所谓“天帝使者”、“天帝神师”，当属其类。当然，亦有非官置而民间援例自封者。

《太上正一盟威箓》卷三载：“上皇诸符，朱书桃刺一尺六寸，刺头当中封‘天帝使者’印，板玉吏兵，芒绳大张，繒采封题，随以意所言召问，勿使泄吾真……自带符箓，百鬼即自知之”。又“召万物神符，丹书桃刺长一尺六寸，封以‘天帝使者’印，约以左索，召鬼，其神立至。佩带符，百鬼皆畏。”〔1〕桃刺乃桃木做成的木片，画符于上，用绳子捆扎而后用“天帝使者”印泥封之，这是纸张广泛使用以前简牍封章之制，应属汉魏材料无疑。刘宋陆修静撰、唐杜光庭增补的《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卷下：“天帝使者捕虐鬼，得便辄杀，勿问罪，急急如律令！”〔2〕也是指道士为人治鬼疗病，仍以“天帝使者”旧名称之例。

东汉“天帝使者”印章及题名实物出土不少，河南、陕西发现最多，题名则多见于墓葬解注瓶器。1957年，江苏高邮邵家沟东汉遗址，除出土符简有“天帝煞鬼”、“天帝神师”符书及草隶题名外，还出土篆书“天帝使者”封泥一枚〔3〕，应即上述《盟威箓》所载以“天帝使者”印封符箓桃刺之实物遗存。

古代除了私人名姓印章之外，官印则系官员以所属政府机构名称为印文泥封官府文书者，道教用于密封章文之“天帝使者”印，自应为执印者职名，此文献记载亦可证“天帝使者”为道士自封之称号。“天帝使者”、“天帝神师”皆道士自称为天帝委派代表为人行道作法之意。前述日人中村不折旧藏陕西西安郊区出土顺帝永和六年（141）朱漆书瓶文中同时出现“天帝神师使者”与“天帝使者”之称，说明“天帝神师”与“天帝使者”属同义词，“天帝神师”即“天帝使者”，皆为此种葬仪之主持人，既可称“天帝神

〔1〕《道藏》二十八册，446页。

〔2〕《道藏》六册，361页。

〔3〕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10期。

师”，亦可称“天帝使者”。天帝为早期道教之最高尊神，天师道的“天师”乃“天帝神师”之简称，故天师道实际上亦可称为“天帝教”。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卷十五著录“近世孟津”出土之桓帝延熹四年（161）钟仲游妻镇墓铅券，和另一件河南洛阳出土残脱纪年文字之洛东乡男子刘伯平镇墓铅券，券末皆有“有天帝教如律令”之文。残券券首纪年月日之后，并有“天帝下令移……”之语，说明整个铅券文字是由天帝下令转告有关方面的移文，此尤为天帝系东汉天师道所奉最高尊神之明证。

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九载：“丹阳道士谢非，往石城买冶釜，还，日暮，不及至家。山中庙舍于溪水上，入中宿，大声语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犹畏人击夺其釜，意若搔搔不安。二更中，有来至庙门者，呼曰：‘阿铜！’铜应诺。曰：‘庙中有人气，是谁？’铜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顷便还。须臾又有来者，呼铜问之，如前。铜答如故。复叹息而去。”〔1〕干宝书虽成于晋世，今本或更掺入后来文字，然不少材料尚保存早期之说，亦为“天帝使者”乃道士自称之明证。同书卷四又载：“沛国戴文谋，隐居阳城山中，曾于客堂食际，忽闻有神呼曰：‘我天帝使者，欲下凭君，可乎？’文闻甚惊。又曰：‘君疑我也。’文乃跪曰：‘居贫，恐不足降下耳。’既而洒扫设位，朝夕进食，甚谨。”〔2〕这是天帝使者本为神，可降世凭依于人，故道士得假为神所凭依而自称即“天帝使者”的最好说明。

道士称“天帝使者”，以天帝诸神与人交通之中介者身份出现，代人给天帝上章祷请，代天帝向诸神移文传达旨意（后之所谓“考召”），故亦称“天帝神师”，即代表天帝与人神交通的“师”（与巫师相类之称），解注器文中有“天帝神师臣”之语可证。道士上章，多自称“臣某某”者是。《登真隐诀》卷下《章符》云：“若急事上章，当用朱笔题署。（谓……上章乞救解者，当朱书‘太清玄都正一平气系天师某治气祭酒臣某’，又后太清细字拜臣姓所属……得此朱署即奏闻，犹今阳官赤标符为急事也）”〔3〕上章道士于天帝犹以“臣”称，其例相同。上述陕西西安所出解注瓶文，有“天帝神师使者为……”之语，是“天帝神师”与“天帝使者”为同义词、同位语，“天帝使者”即“天帝神师”，皆指行法道士而言。从东汉墓出土解注陶瓶文“天帝使者黄神越章”、“天帝神师黄越章”的文意看，是说该黄神越章之印

〔1〕（晋）干宝：《搜神记》，147～148页，引用胡怀琛标点本，句读有改动。

〔2〕（晋）干宝：《搜神记》，32页。

〔3〕《道藏》六册，620页。

系天帝神师即天帝使者所持用之法印，亦为“天帝神师”、“天帝使者”乃道士自封称号之一证。正因为如此，东汉与天帝有关之道印，“天帝使者”与“天帝神师”二印所见数量甚多，尤以“天帝使者”为最，做成带钩以便悬佩者亦不只一品，当与此事有关。饶宗颐谓马王堆帛书已有“天师”之名，以此批评吴荣曾天师道之“天师”乃“天帝神师”简称的说法不可信。不错，在天师道形成以前“天师”之名早已有之，西汉以后有“天师”之称者亦不限于天师道一个道派，正如学界有人指出的那样，在太平道经典《太平经》中甚至还出现了“天师道”的字样。但是我们不能脱离考古材料所在的具体环境条件，不顾及初期天师道及东汉墓葬解注文之整体情况，孤立地完全从字面上来考虑问题。“天师”之名虽在东汉以前早已存在，但和道教解注之天师（“天帝使者”、“天帝神师”）不能画等号。《庄子·徐无鬼篇》肩“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之语。马王堆西汉早期墓出土医书《十问》，有文以“黄帝问天师曰”起首者。《素问·上古天真论》：“〔黄帝〕成而登天，乃问于天师。”王冰注以为，“天师，岐伯也。”这些“天师”，学界已有人指出是“指通晓天道，具有精湛道术”和善医者而言。马王堆帛书之“天师”，尚未与天师道所宗之最高尊神天帝结合在一起，没有具备作为人神中介者之天帝代表的特定宗教人物条件，与天师道的“天师”、东汉墓解注器之“天帝神师”具有相同身份、性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即使初期天师道之“天师”与马王堆帛书之“天师”二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那也只能是一种远源关系，具体发展阶段、身份、性质、含义也是不同的，道教的“天师”和东汉墓解注器之“天帝神师”，已属进一步职业化的“道中人”、“道行人”角色了。四川洪雅米巫祭酒张普题字既云“道正一元”，又称“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是因为蜀中五斗米道（正一道）是由中原初期天师道发展而来，本属天师道支派所致，实际并非至五斗米道（正一道）出现之后才能有“天师道”之称。

关于黄帝，很早以来就和道教发生联系，故早期有“黄老道”之说。传为刘向所作之东汉《列仙传》说：“黄帝者，号曰轩辕，能効百神，朝而使之。”东汉王充《论衡·道虚篇》云：“黄帝好道，遂以升天……夫修道求仙……世见黄帝好方术，方术仙者之业，则谓帝仙矣。”^{〔1〕}西汉武帝以来，亦以为官办祠祀主要神祇之一。解注器文或称“黄帝”，或称“黄神”。纬书及解注器文皆有“黄神北斗”与“黄神北斗之精”之说，又曰“黄神生五岳”，

〔1〕《诸子集成》本，68页。

“黄帝”、“黄神”、“天帝”三者之间的关系，目前似乎还不太明确。但从河南孟津出土灵帝延熹四年（161）钟仲游妻铅券，有“黄帝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之类的材料看，“黄帝”在券文中的位置身份，与解注瓶文中之“天帝”相同。陕西潼关东汉杨震家族墓群 M5 出土的一件灵帝建宁元年（168）D 型 II 式陶瓶，朱书文首“建宁元年，十一月乙巳朔，九日癸丑，直除。皇（黄）帝使者谨为煬（杨）氏之家……”。“皇（黄）帝使者”在整个解注瓶文中的位置与“天帝使者”无异。又前引《十钟山房印举》著录“黄神之印”两面印，另一面作“臣过□”，当即道士自称之名，谓此“黄神之印”乃名“过□”之道士所用者。若然，则黄神、黄帝皆指天帝而言。上述解注器文中多作“黄神”而“黄帝”仅二例。按南方地区出土汉晋铜镜铭带“黄帝除凶”者极多，而未见“黄神”之名出现，是否二者属同一神名而有地区性的差异，值得进一步研究。

第三节 解注器文所反映的宗教组织情况

考古发现以带有解注文为中心的解注材料，反映出一套与道书文献记载相吻合的复杂理论和科仪法术，具有相当高级的系统化内容，而且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以后在相当广阔的地域范围之内广泛出现，反映出一种完全属于宗教组织活动的特点。各种简单低级的巫术，早在东汉明帝以前一直就在不同阶层中流行，西汉尤盛。如果这些解注材料仅仅是一种巫术阶段的遗存，何以不见于东汉明帝之前，到明帝时才开始出现并逐渐在一大片地域范围内流行起来呢？这种以带有文字为主的大量系列解注器物的出现本身，也就是从巫术发展为宗教的一种飞跃性质的变化，整个材料也都明显具有宗教组织活动的色彩，透露出一种宗教组织存在的信息。

此外，解注器文中有时也直接讲到行术人所在的宗教组织问题。上述河南洛阳中州路 M813 出土献帝初平二年（191）陶瓶文曰：“初平二年三月乙未朔，二日丙申……告丘丞、墓伯，移置他乡……转其央（殃）咎。付与道行人。如律令！”陕西西安和平门外汉墓出土献帝初平四年（193）瓶文曰：“初平四年，十二月己卯朔，十八日丙申，直危。天帝使者谨为王氏之家后死黄母，当归旧闕（？），兹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蒿里君、墓皇、墓主、墓故夫人、决曹尚书：令王氏家中先人，无惊无恐，安稳如故。令后曾

(增) 财益口，千秋万岁，无有殃咎。谨奉黄金千斤两，用镇冢门，地下死籍削除，无他殃咎。转要道中人，和以五石之精，安冢墓，利子孙。故以神瓶镇冢门。如律令！”“……付与道行人”，是行术人要求把前面说的如何为死者除咎去殃的解注内容托付与道教中的人；“……转要道中人”，也是将前后文所说的解注内容在道教人士中相约彼此转告。两器文中的“道行”和“道中”，显然都是指的道教组织而言。这两条材料对我们认识了解东汉墓葬解注材料所隐藏的道教组织存在的事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外，罗振玉收藏两器文中“天帝教如律令”的“天帝教”也特别值得注意。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教”，也应该是指的一种宗教组织。最初的天师道本来就是以天帝为最高教神，如果说“天师道”是以道士自封代表天帝的“天帝神师”名之，直接以“天帝”名教又未尝不可。甚至可以说，如果把最初的天师道叫作“天帝教”，也许比称“天师道”还更为贴切。

前面提到日人中村不折旧藏大概是在陕西出土的灵帝熹平四年（175）墨书瓶文，有“云门蔡酒”之名，我们考订系“魂门祭酒”之误书或误释。道教官职、神名，多系袭用阳世职官之称，既然其时冥官地吏中已有“祭酒”，就没有理由肯定其时道官不用此称。文献记载三张正一盟威之道道官有祭酒之名，由此推知在为中原东汉墓葬行解注术之道士中很可能也有“祭酒”的道官名称存在。后来蜀中三张五斗米道（正一道）的祭酒制是中原初期天师道有关职制的继承和发展，这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后面讨论蜀地五斗米道和早期中原天师道的关系时还要讲到，五斗米道讲的道治制最初也是创自中原，二十四治中的“北邙治”应是最早所设的道区，其设治年代当在“张陵”将中原天师道传入蜀中加以发展形成五斗米道之前，其创“北邙治”的具体年代虽尚不能确指，但如果旧称“张陵”在蜀创五斗米道是在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的说法可信，则洛阳治为代表的中原道治制的初创当在顺帝之前。当然，道区制本身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先出现在中原地区的道治不仅数量远不如五斗米道时期多，内容大概也不会有那么完善，这是可以想见的。

凡此种种，虽然目前有的看法还缺乏足够的证据，但或许多少可为中原初期天师道有一定的组织活动存在的情况提供一些线索。

第四节 解注器所反映的宗教科仪法术情况

我们前面把东汉明帝以来墓葬出土的解注器物文字和实物材料，分成了带符告、檄文、传移、盟契、铃印文字的神（魂）瓶，券版，石羊，代生人的人参、代死人的铅人、“蜜人”等代人用品，丹砂、雄黄、礬石、曾青、慈石五石等神药用品若干大类，形式内容统一而又多种多样。前面讲到，在陕西咸阳东汉墓出土年代最早的永平三年（60）纪年解注瓶上，已有“建立大镇，慈、礬、雄黄、曾青、丹砂，五石会精”的文字。所谓“建立大镇”，是指道教在举行压鬼魅的醮仪时，使用解注文陶器、契券以及铅人、蜜人、人参等代人器物，并在墓中放置慈石、礬石、雄黄、曾青、丹砂五种矿石，会合五石之精华而成的“神药”，这是有别于一般小型解注醮仪的大型解注醮仪。由此可见，当时这种宗教活动仪式，已经有了规模大小不同的等级之分，不同等级有不同的固定名称和内容，这是一种相当成熟的高级宗教活动形式，非一般简单巫术性质活动所能有。这些形式内容统一而又多种多样的材料本身，也就说明了当时在举行解除墓注的过程中，使用了一套相当复杂的科仪法术。这些科仪法术，在我们前面讲到的道书文献记载早期天师道的有关文字中，也都可以找到相同或类似的内容。文献记载的另外一些内容，在墓葬遗迹中乍看起来似乎没有直接的材料，但当时实际上可能也是存在的。例如，在《赤松子章历》中根据东汉《千二百大官章》著录举行解注斋醮仪式中所上的大量章文，在出土材料中不曾发现。实际上，无论陶瓶或墓券文字，都是道士上章后所得到的批文或按批文意思撰写的材料，如果在此之前道士没有向天帝上章乞请，无论如何是不敢妄自以天帝的名义下发告命移文的。死者或死者家人，需要了解或掌握作为凭证材料的只是天帝神的批文，而没有必要把道士的请示报告也写在随葬器物之上。所以，这些符告传移文书的出现，也就意味着道士在举行解注过程中必定有过上请“三官吏兵”解墓注章文的仪式内容。其他方面的情况，有的也可依此类推，找到一定的线索。

总而言之，综合上述几个方面的情况分析说明，以河南洛阳、陕西西安为中心的中原北方地区从东汉明帝开始出现的大量墓葬解注材料，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文化成分在内，从内容到形式也都相当规范化而又十分复杂，已经

是一种正式宗教形成后的活动遗存，而不是简单原始的巫术遗存。

这些材料，过去有人虽然注意到它们和道教有关，但又认为“镇墓文中的某些迷信内容，在后来的道教中也能见到。据此是否可以认为镇墓文就是道教迷信的一部分呢？从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记载或地下材料，对这点似乎还难以证实。”“镇墓文的迷信功能，就是为死者解谪，而东汉时解谪是民间巫术迷信解除中的一种。”“东汉时诸如解除、泰山治鬼、黄神越章等和巫术有关的民间迷信，后来都被道教所吸收。”^{〔1〕}通过以上整个考古发现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实物、文字的分析考察，可以判定东汉“镇墓文”的解谪实为解墓注和防墓注，所表现的是一种以注鬼论和解注术为中心具有复杂而系统的经典理论、神系、法术仪式的高级宗教活动，应该是道教正式形成以后的宗教组织活动，而不是道教形成之前的一种简单的一般民间巫术个体行为；不是什么一些和巫术有关的民间迷信后来被道教所吸收的问题，而是道教已经形成后道士（“道中人”）和信众们从事葬仪活动的遗存。如果说它反映的只是宗教形成以前的原始巫术活动，各种不同的巫术活动在此之前早就在各地广泛存在，何以在东汉明帝以后，才在如此广泛的地域范围内突然大量出现这样一批从形式到内容都非常一致的材料呢？如果因为包含大量巫术成分、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就只能算是巫术而不能算是宗教，汉末在蜀中的三张五斗米道（天师道、正一道）已是一种正式的宗教，这是大家也都公认的看法，而在雅安东汉末年所立的《樊敏碑》中却仍然还把它叫作“米巫”。人们之所以把天师道系统的五斗米道（正一道）叫作“米巫”，正是因为五斗米道中包含了大量巫术成份，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我们能说这种“米巫”不是宗教吗？刘宋人刘义庆曾经讲到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巴丘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复活。云死时土地神将送诣泰山，人过礼舍门前，土地神向吏：‘此是何等舍？’门吏曰：‘是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礼入门，见数千屋，皆县（悬）竹簾，自然床榻。男女异处，有诵经者，唱偈者，自然饮食，快乐不可言。礼文书名已至太山门，而身又不到，惟入。土地神云，道见数千间瓦屋。即问吏言，道人即以付之。于是遣神即录取。礼观未遍，见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遂欲撞之，便怖走还出，门神已在门迎捉。太山府君问礼云：‘卿在世间，皆何所为？’礼曰：‘事三万六千神，为人解除，祠祀或杀牛犊、猪、羊、鸡、鸭。’府君曰：‘汝罪应上热熬。’便牵著熬，所见一物，牛头人身，捉铁叉，叉礼著熬上宛转，身体焦烂，求死

〔1〕 吴荣曾：《镇墓文中所见到的东汉道巫关系》，《文物》1981年3期。

不死，一宿二日。府君问主者，礼寿命应尽，为顿其命，校录余算八年。乃命将录，求牛头，复以铁叉叉著熬边。府君曰：‘命遣卿归，终其余算，勿复杀生淫祠。’礼乃还活，不复为巫师。”^{〔1〕}本来“道人”一词，既可以用来称呼道士，也可以用来称呼僧人，但从上引整个文字考察，误以舒礼为道人的“道人”，显然指的是道士而不是僧人。这一材料说明，直到东汉以后几百年的东晋南北朝之际，人们有时还弄不清巫师和道士的区别，把巫师舒礼误认作道士，正是因为道教（主要是天师道）本身带有大量的巫术成份，具有浓厚巫术色彩的缘故。这一材料，也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认识上述大量东汉墓葬解注文材料宗教性质，作为我们上述结论的辅助证据。

第五节 解注器材料所属教派和初期天师道的酝酿形成过程

一、教派问题

过去研究者认为东汉镇墓文是张角太平道遗迹。早的不用说了，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指出：“传称修同蒲铁路时所出东汉熹平二年太平道方士告地下官吏的镇墓解除文上有‘传到约勒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等言”^{〔2〕}。直到20世纪90年代有人仍持此说^{〔3〕}。我们通过对这批考古发现的解注材料和道书文献记载内容的比较分析，发现其无不与早期天师道材料相吻合，而与以张角为代表的太平道共同之处较少。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以下四个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第一，整个解注理论、解注方法内容。前面我们已经详细作过论证，包括父子、夫妇、兄弟等最亲密关系的人在内，一旦死亡，便是生死异路，乐无相思，苦莫相念，长相忘，不得复交通，这是天师道的理论观点，而与《太平经》之主张死者可为善鬼造福生人，和此种

〔1〕 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三十一编，七册，4025页。

〔2〕 见《关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座谈纪要》中俞伟超的发言，《文物》1975年9期。

〔3〕 以刘昭瑞《〈太平经〉与考古发现的东汉镇墓文》为代表，见《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4期。

上绝天文、下绝地理的绝对观念完全没有共同之处。

第二，从神系神名看，如前所论，解注器文中所见从天帝（解器文中屡见）到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等，都和《赤松子章历》等天师道（正一道）文献记载相合而不见于《太平经》之书。

第三，从符形结构风格看，汉墓解注器者系由图形和变体汉字混合组成，和道书所见天师道或受天师道影响道派的道符风格别无二致，而与《太平经》所著之由两个以上的隶书汉字组成的“复文”符书完全不是一个系统。

第四，从地域分布情况看，“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顿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接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谥、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常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营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追捕角等。”于是爆发了以张角等为首的黄巾大起义^{〔1〕}。“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2〕}这里记载东汉末年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活动范围，太平道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以今山东、河北为中心，包括江苏、湖南、湖北和部分河南之地。河南虽然也有太平道的活动，显然不甚流行，而且处于秘密活动状态，统治者内部，也只有少数谋叛朝廷的人参加。在此之前，两个道派的所在地域虽无明确记载，但太平道在东，天师道在西，这是很清楚的。再结合《三天内解经》记载看，属天师道系统的“张陵”曾在河南洛阳一带活动过，二十四治中有“北邙治”在洛阳，从不见太平道曾有设治之制——特别是在洛阳设治的材料。

从以上四个方面的情况看，也都可以说明以西安、洛阳为中心的陕西、河南和河北西南、安徽北部东汉墓出土的解注器材料属于天师道系统的遗

〔1〕《后汉书·皇甫嵩传》。

〔2〕《三国志·张鲁传》裴松之注引魏鱼豢《典略》。

存，而与太平道无涉。

二、文化渊源

道教以“杂而多端”为特点，不仅包含了不同阶层、不同学派的文化，也包含了来自不同地域范围的各种地方性宗教文化在内。在上述以陕西河南为主的东汉墓葬解注材料中，实际上也包含了来自东西南北不同地区的区域性宗教文化的成分在内，可以说是多种早期宗教文化的结合体。就构成整个解注术框架的解除术本身而言，也就是继承、融汇来自全国不同地域范围古老的巫术文化并加以发展的结果。东汉初年王充《论衡·解除篇》考说：“解逐之法，缘古逐疫之礼也。晋颍项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为虐鬼，一居弱水为魍魉，一居欧隅之间，主疫病人。故岁终事毕，驱逐疫鬼，因以送陈迎新内吉也。世相仿效，故有解除。”“江水”是泛指南方长江流域地区。“弱水”古文献记载有多处，大抵在西北甘肃、青海附近一带，此处当泛指西北边远之地。罗泌《路史·后纪十三下》：“越王无疆次子蹄，封乌程欧余山之阳，后人以地为姓。”“欧隅”或即“欧余”，指江浙之地。王充之言，盖云解除方术包含来自若干不同地区的文化，实际并不限于提到的三个地方，也应包括中原地区的材料在内。又如，饶宗颐《道教与楚俗关系新证——楚文化的新认识》考订，道教中的“黄帝”、“黄神”、“禹步”、符箓等，在云梦秦简《日书》（“禹步”），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养生方》及《淮南子·冥览训》中已见记载，当源于楚俗^{〔1〕}。又云王莽自以“黄帝”之后，新莽权量铭称“黄帝初祖，祖德于新”；韩国乐浪尝出土“天帝黄神”封泥。是至迟至新莽时始，其流行范围已不限于原来的楚境而达于北方中原之地，且为不同阶层人士所信知。如果说“黄神越章”中的“黄神”与长沙马王堆帛书中的“黄帝”有关可信的话，汉武帝在灭两粤之后，“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言其土俗尚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号。乃命粤巫立粤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2〕}吴式芬据此说“‘越章’之‘越’，或‘越祝’之‘越’与？”认为“越章”来源于南方的越巫文化^{〔3〕}，也不是没

〔1〕 饶宗颐：《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52～68页。

〔2〕 《汉书·郊祀志》。

〔3〕 吴式芬：《封泥考略》卷七，47页。

有道理的。湖北江陵、湖南长沙、江苏邗江等南方旧时楚越之地的西汉墓中，曾屡次出土被黄盛璋称为“告地策”的随葬木牍^{〔1〕}，早已有人指出其与中原东汉镇墓解注器文之间的联系。如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文帝十二年（前168）木牍文云：“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家丞奋移赘（藏）郎中，移赘（藏）物一编，书到先选具主赘（藏）君”；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西汉文帝初元十三年（前167）墓出土的一件木牍文云：“十三年五月庚辰，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市阳五大夫隳少言与大奴良等廿八人，大婢益等十八人……可令吏以从事。敢告主。”又十号景帝四年（前153）墓出土木牍文云：“四年后九月辛亥，平里五大夫伧（张）偃敢告地下主：偃衣器物所以蔡（祭）具器物，各令会以律令从事。”此种器物，后来出土尚多，如90年代，湖北江陵纪南城外高台18号西汉文帝前元七年（前173）木牍文称：“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中乡起敢言之：新安大女燕自言，与大奴甲、乙，大婢妨徙安都，谒告安都受小数。书到，为报。敢言之。十月江陵龙氏丞敢移安都丞卬亭手。”^{〔2〕}俞伟超就曾指出：这种由“地下丞”转告“地下主”的随葬木牍，与“传称修同蒲铁路时所出东汉熹平二年太平道方士告地下官吏的镇墓解除文上有‘传到约勒地吏，勿复烦扰张氏之家’等言，虽然年代与这种汉初的文书相距甚远，内容也有变化，但仅就‘约勒地吏’这层意义来说，却是一脉相承的”。^{〔3〕}将同蒲铁路所出东汉熹平二年镇墓瓶文订为太平道遗物的结论，虽然如前所论值得商榷，但认为它与南方西汉墓木牍文字之间存在着一定渊源关系，这却是事实。

除了南方楚、越地区的宗教文化成分之外，天师道之鬼道特点本身，同时也包括了来自西方秦文化的因素和成分。秦人亦信鬼。曹植《诰（诘）咎文》云：“五行致灾，先史咸以为应政而作。天地之气，自有变动，未必政治之所兴致也。于时大风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诰（诘）咎祈福。其辞曰：‘上帝有命，风伯雨师……’”^{〔4〕}这里的“天帝”与“上帝”属可以通用的同义词。有人以为此中之“诘咎”即秦代檄移诘咎檄文，其文

〔1〕 黄盛璋：《云梦龙岗6号秦墓木牍与告地策》，《中国文物报》1996年7月14日第3版；《龙岗秦墓简牍“事”、“吏”、“史”与告地策定名及其引起问题》，《中国文物报》1997年12月14日，第3版。

〔2〕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高台18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8期。

〔3〕 《关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座谈纪要》，《文物》1975年9期。

〔4〕 《艺文类聚》卷一百，灾异部，旱，文，引。1725页。

体乃《文心雕龙·檄移第二十》之“檄移”。刘信芳有文论秦简《日书》所载驱鬼术甚备，谓有“刺偶以代刺鬼”、“埋偶以代埋鬼”、“移偶而去人之疾患”等^{〔1〕}。我们认为，此等内容颇与东汉墓解注代人相类，说明初期天师道代人解注术与秦人《日书》文化有渊源关系。唯《日书》之时，诸术尚未如后来道教之与天帝发生联系。有人比较甘肃天水放马滩和湖北云梦睡虎地两地出土的两部《日书》内容，认为秦人重政治轻鬼神，楚人重鬼神轻政治。其实所谓轻重，只能是相对而言。在放马滩秦人《日书》中，亦有如下一类记载：“死以女日葬必复之，男日亦如是”；“择日出邑门。禹步，三向北斗，质画地视之。曰禹有质五横，今利行，行毋为，禹前除，得。禹须臾所以见人，曰目龙日，秉，不得。”“三向北斗”即拜北斗，与“禹步”皆为道教常见之科仪。而此中所言之“复”，亦似有本文所论天师道之复连、复注之意。又简文云：“人妻妾若朋友死，其鬼归之者，以莎芾牡棘枋热（熬）以寺（待）之，则不来矣。”（803简背面文）人谓“以莎芾牡棘枋熬以待之”，意为烧荆棘以驱鬼^{〔2〕}。若其说不误，人死魂归而为鬼，又以其将害人而以法术驱御之，已带注鬼之意味。则东汉墓解注文注鬼论的基本思想的渊源，很可能出自西方的秦文化。

至于东汉墓解注文之建除记日的来源，学界有不同的意见，饶宗颐认为即阴阳家容成之说，见于云梦秦简《日书》及湖北江陵楚简《九店日书》，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亦有记载，《庄子·阳则》“除日无岁”即建除家言^{〔3〕}。王国维：《流沙坠简屯戍丛残考释》著录敦煌出土东汉《永元六年历谱》木简，正、背两面有“……十七月乙巳平，□八魁……二日甲寅除，八魁”之文，不仅记注建除日值，同时还注出了八魁神杀所临。罗振玉考说：“每日之下记建除并所值神杀，与今历同。唯今历则建除接书于日下，而神杀则别书于每日行末最低处，此为异耳。建除之说，始见《史记》、《淮南子》。《史记·日者传》：孝武时聚会占者七家，内有建除家。”^{〔4〕}二家之说，皆似主起源于南方。然1986年甘肃天水市北道区党川区放马滩M1号秦始皇八年墓，曾出土M1：14号《日书·建除十二简》，有“正月，建寅、除卯、盈辰、平巳、定午、执未、彼申、危酉、成戌、收亥、开子、丑闭”；

〔1〕 刘信芳：《〈日书〉驱鬼术发微》，《文博》1996年4期。

〔2〕 吴小强：《论秦人宗教思维特征》，《江汉考古》1992年1期。

〔3〕 饶宗颐：《先老学初探》，《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3页。

〔4〕 《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七册，2806页。

(甲1)“二月：建卯、除辰、寅巳……”(甲2)^{〔1〕}有学者研究指出：“简中的‘正月’、‘二月’至‘十二月’等月序，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历法中的月序，而是星命家的‘月份’。星命家的‘月份’以二十四节气中的十二个节气（非中气）作为各月的开始，如正月是从‘立春正月节’那天开始，二月是从‘惊蛰二月节’那天开始。古代建除家在历日中安排建除十二客，正是按照星命家的‘月份’而不是按照历法月份进行的，不论‘立春正月节’是在上年十二月的某日，凡遇‘立春正月节后’的第一个‘寅’日，便开始注‘建’字，由此循环下排。以后遇各月第一日（即节气所在之日），则需重复前一日的建除十二客一次，然后再接续下排。”^{〔2〕}此简时代在秦统一之前，从出土地望看也应属于先秦时期秦文化的范畴。由此可知，东汉墓解注文在建除注日材料，也有可能渊源于秦文化。无论来源于南方之荆楚或西方之秦，反正最初都不是属于中原本土文化的内容。

总而言之，以中原地区东汉墓葬解注器所代表的初期天师道文化，并非是在单一地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许多不同区域性原始宗教文化在中原地区形成的聚合体。

三、初期天师道的酝酿形成过程

我们认为，道教的形成，主要是方士、巫祝文化交融发展的结果，最初的天师道不大可能是由某一个人所创，而是秦及西汉以来（特别是汉武帝以来）的方士、巫祝们（后来有的称为“天帝使者”）的集体创作。顾颉刚认为：“鼓吹神仙说的叫方士，想是他们懂得神奇的方术，或者收藏着许多药方，所以有了这个称号。”^{〔3〕}所谓的巫覡、巫祝，李零将之概括为是指掌握各种降神下鬼、祈福禳灾、厌劾妖祥、移殃转咎、祝疗疾病、预测吉凶以及擅房中诸术的男女。汉代的巫有官巫与民巫之别，但有的民巫可以变为官巫。“方士与巫相近似，但主要特长不是祷祠或祝诅，而是方术。”^{〔4〕}实际上，方士与巫覡二者关系密切，有时很难区分。秦始皇追求长生不死，大规模组织方士大搞服食求仙宗教活动的情形，尽人皆知，这里就不去多说了。

〔1〕 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2期。

〔2〕 邓文宽：《天水放马滩秦简〈月建〉应名〈建除〉》，《文物》1990年9期；邓文宽：《敦煌古历丛释》，《敦煌学研究辑刊》1989年1期。

〔3〕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10页。

〔4〕 李零：《中国方术续考》，64页。

在西汉时期，刘邦、刘安、汉武帝和成帝、哀帝的宗教政策活动，对后来道教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道教的形成，是在他们的宗教政策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一）刘邦、刘安、汉武帝与道教有关的宗教活动

《史记·封禅书》载：高祖刘邦，“于长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正义：先炊，古炊母之神也）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彘（索隐：巫保、族彘，二神名）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时月。”《集解》引文颖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从西汉初年的第一位皇帝开始，就有意识地把全国各地的方士、巫祝聚集到中原京师之地活动。刘邦继秦建立汉政权之初，实行分封诸王的制度，封长子刘长为淮南王，后以称帝被诛。文帝十六年（前164），刘长的儿子刘安袭封为淮南王，食封于南方江淮之地，因罪受过处分，为了避祸，大概受了秦始皇和刘邦的影响，也尽力网罗各地方士集中于淮南，大行求仙成道之事。《汉书·刘安传》称其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有《中篇》之书八卷，专言神仙黄白之术。东汉高诱《淮南子序》说：“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煮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世间诡异瑰奇之事……无所不载。”《论衡·道虚篇》：“儒书言：‘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此言仙药有余，犬鸡食之，皆随王升天也。好道学仙之人，皆谓之然。”刘安虽仅一方之诸侯，但以高级贵族身份，把专门从事各种宗教性质活动的人招会在一起，让全国各地“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融会不同地区、不同流派的方术巫觋文化，使过去的方仙道得到巨大的发展，向正式的宗教方向迈进了一步。《淮南子·坠形训》：“西方有形残之尸，寝居直梦，人死为鬼。”东汉高诱注曰：“西方金，金断割，攻战之事有形残之尸也……不终其命，死而为鬼，能为妖怪病人也。一说曰，形残之尸，于是以两乳为目，腹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天神断其手，后天帝断其首也。”高诱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后起的“天帝”与治祟人的鬼连在了一起，也说明了后来天师道形成和刘安方士巫觋活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当然，以刘安在汉王朝统治者中地方诸侯的身份地位，继刘邦之后秦始皇以来的方仙道，经过他在南方地区的活动，虽然起到了一定促进融合发展的明显作用，毕竟还远不能和后来的汉武帝相比。

西汉武帝是继秦始皇之后一位笃信鬼神仙道方术的皇帝，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之下，把全国不同地区的鬼神信仰习俗都搬到了京师之地，并在中原地区加以推广，使得宗教鬼神观念进一步大大发展。史载：“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1〕}，将李少君等方士招至京师加以重用，“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更多来言神事矣。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于是天子命太祝立其祠东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后人复有上书，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朶破镜……阴阳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领之，如其方，而祠太一于忌太一坛旁。”“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像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后来少翁弄假事败被杀。“天子既诛文成，后悔其早死”，于是又弄来自称与少翁同师的方士栾大。“大曰：臣师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令有亲属，以客礼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至尊其使，然后可致也……乃拜大为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印，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大为乐通侯，赐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舆，斥车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卫长公主妻之，齎金万金，更令其邑曰当利公主。天子亲如五利之第。使者存问供给，相属于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献遗之。于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而佩天道者，且为天子道天神也。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2〕}正如吴式芬考汉“黄神”方士泥印所说：今存汉代方士印有多种，根据《汉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汉武帝“拜少翁为‘文成将军’，方士自此有官名。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此当是天帝神之所由名。又栾大言：陛下必欲致之，则贵其使者，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于神人。此

〔1〕 褚少孙补：《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并同，“今天子”作“武帝”。

〔2〕 《史记·封禅书》。

当是方士佩印之所由起。”^{〔1〕}当时方士佩印，不只上述文献所记数种，金石学家们过去还收集的一些其他印文材料，亦或尚有属其类者。如吴式芬讲到，陈介祺旧藏“天阊四通”封泥，考曰：“封泥四字小长方印，文曰‘天阊四通’，当亦‘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之类方士所佩之印。考《史记·孝武本纪》：‘夏遂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阊。石阊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间也，故上亲禅焉。’此‘天阊’或即指石阊欤？又曰：‘为坛，开八通之鬼道。’《封禅书》曰：‘黄帝西南除八通鬼道’。此曰‘四通’，或即‘八通’之义欤？”^{〔2〕}前及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前汉、后汉道家印》收录汉代道印甚多，除前面已经提到的“天帝神师”、“天帝使者”等与东汉墓出土解注器相同之文字或实物而外，同时还著录了如故宫藏鼻钮“太山武帝神仙印”等一些类似的其他材料^{〔3〕}，若非武帝之遗，也应与武帝上述活动影响有关。

不仅在京师之地如此，另外还有不少地方性的活动，武帝或亲自参与，或鼓动方士巫祝们自行其事。当时地处陕西、河南之间的五岳名山之一华山的材料，最能说明这一情况。东汉桓帝延熹八年（165）郭香察书《西岳华山庙碑》文说：“《周礼·职方氏》：‘河南山镇曰华，谓之西岳。’……孝武皇帝修封禅之礼，思登假（遐）之道，巡省五岳，禋祀丰备。故立宫其下，宫曰‘集灵宫’，殿曰‘存仙殿’，门曰‘望仙门’。”^{〔4〕}此事欧阳修以为：“所谓‘集灵宫’者，他书皆不见，唯见此碑。”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郊祀，祠宫，有“汉集灵宫、望仙观”条云：“《地理志》：京兆华阴县太华山，在南有祠。豫州山集灵宫，武帝起。《黄图》：集灵宫、集仙殿、望仙台、望仙观，俱在华阴县，皆汉武帝宫观名。”^{〔5〕}东汉张昶《华山堂阙碑序》说：“岳有五而华处其一……世宗又经集灵宫于其下，想乔松之俦，是游是息。郡国方士，自远而至者，充岩塞崖。乡邑巫覡，宗祝乎其中者，亦盈谷溢谿。咸有浮漂之志，愉悦之色，必云霄之路可升而越，蕃昌之福可降而致也。”^{〔6〕}世宗即汉武帝。正如顾颉刚所说，汉武帝所网罗的方士，其工

〔1〕 吴式芬：《封泥考略》卷七，46～47页。

〔2〕 吴式芬：《封泥考略》卷七，44页。

〔3〕 罗福颐：《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206～210页。

〔4〕 洪适：《隶释》卷二。

〔5〕 宋王应麟：《玉海》，1819页。

〔6〕 《艺文类聚》卷七，山部，“华山”条引，132～133页。

作主要有三：一是召鬼神；二是炼丹砂；三是候神，寻访仙人^{〔1〕}。而武帝的求神仙、任方士的结果，使得“许多的民间信仰都变成了国家宗教。”^{〔2〕}封禅祭祀五岳自然神的礼仪虽然早已有之，汉武帝却把它从过去那种一般天子例行的自然神祭祀礼仪的性质改变成了一种追求成仙的宗教性活动，利用封禅五岳的机会，大行求仙之事，在山下修建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建筑，给它们加上“集灵宫”、“存仙殿”、“望仙观”、“望仙台”、“望仙门”之类带“仙”字的宫、观、殿、台、门名称，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巫覡、方士居处其中，从事祝祷修炼求仙等种种宗教活动，很有点类似后来道教宫观的味道。

通过作为一国之君的汉武帝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一面把方士巫覡集中在京师长安活动，修祠坛，开创了类似封“道职”、置“道印”的制度，为后来的道教所承袭。另一方面又在后来的道教名山华山修建类似后来道教宫观的集灵宫、集仙殿、望仙台、望仙观等建筑，让全国各个不同地区郡国乡邑的方士巫覡，从很远的地方集中在此进行祷祝鬼神和求仙的宗教活动，本身就是有意识融合交流各地方士巫覡宗教文化的一种强有力的措施，必然会对各地方士、巫祝宗教文化的融合交流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也为分散活动的方士巫覡向有组织集中活动的教团转化和道教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二）成、哀时期《包元太平经》的出现和西汉末年与道教有关的宗教活动

与后来道教有关的宗教活动，武帝以后直到新莽年间虽时有起伏，但始终没有中断，特别是我们在前面提到成帝和哀帝时期的材料，尤为重要。史载：“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亦以无继嗣故，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皆得待诏，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费用甚多”。“哀帝即位，寝疾，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3〕}在此期间，被称为“类道书”的《包元太平经》一书的出现，是道教发展形成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事件。为什么说《包元太平经》是“类道书”性质的书？它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况下出现的？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是研究道教发展形成历史过程应当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汉书·李寻传》记载：“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

〔1〕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18页。

〔2〕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98页。

〔3〕 《汉书·郊祀志下》。

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忠可书，以不敬论。贺良等复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挟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刘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时郭昌为长安令，劝寻宜助贺良等。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召见，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多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人民。哀帝久寝疾，几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汉书·成帝纪》记载，成帝即位以来，天灾人祸不断，一方面是外戚王氏专权，后宫干政。官吏富人极端奢侈浪费，“方今世俗奢僭网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婢，被服绮縠，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吏民慕效，寢以成俗。”另一方面则是频年“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职者众。”永始二年（前15）诏称：因修昌陵，“建置郭邑，妄为巧诈，积土增高，多赋敛徭役，兴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连属。百姓罢极，天下匱竭。”建始三年（前30）“秋，关内大水……九月，诏曰：‘乃者，郡国被水灾，流杀人民，多至千数。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殆苛暴深刻之吏，未息元元冤，失职者众。’……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蚀之。夜，地震未央宫中。诏曰：‘盖闻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领之。君道得，则草木昆虫，咸得其所；人君不得，谪见天地，灾异屡发，以告不治。朕涉道日寡，举措不中，乃戊申日蚀、地震，朕甚惧焉’”。河平三年（前26）“春二月丙戌，犍为地震山崩，雍江水，水朔流。”鸿嘉四（前17）年诏称：“刑罚不中，众冤失职，趋闻告诉者不绝。是以阴阳错缪，寒暑失序，日月不光，百姓蒙辜。”“农民失业，怨恨者众，伤害和气。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青、幽、冀部尤剧……勃海、清河，河溢被灾”。鸿嘉二年皇帝自己也不得不下诏承认说“朕承洪业，十有余年，数遭水旱疾疫之灾，黎民屡困于饥寒……帝王之道，日以陵夷”。永始二年（前15）诏称：“天下虚耗，百姓罢劳”。以至农民起义不断。如阳朔三年（前22）河南颍川铁官徒申徒圣组织起义，“百八十人，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永始三年（前14）“十一月，尉氏男子樊并等十三人谋反，杀陈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称将军……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鸿嘉四年

(前 17), 广汉郑躬等起义, “党与寝广, 犯历四县, 众且万人”。日蚀、慧星、流星不时出现, 也和水、旱、地震一样被看作是天变灾异示警, 搞得皇帝心惊肉跳, 寝室不安。如永始二年(前 15)二月“癸未夜, 星陵如雨。乙酉晦, 日有蚀之。诏曰: ‘乃者龙见于东莱, 日有蚀之, 天著变异, 以显朕邇, 朕甚惧焉’”。“(永始)三年(前 14)春正月己卯晦, 日有蚀之。诏曰: ‘天灾仍众, 朕甚惧焉’”。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使统治者神经陷入一种高度恐慌的状态, 甚至连皇帝没有儿子的事, 也和天变示警联系起来。绥和元年(前 8)“二月癸丑, 诏曰: ‘朕承太祖鸿业, 奉宗庙二十五年, 德不能绥理宇内, 百姓怨望者众。不蒙天祐, 至今未有继嗣, 天下无所系心。观于往古近世之戒, 祸乱之萌, 皆由斯焉。’”于是立了侄儿定陶王刘欣的儿子为皇太子, 即以后继承皇位的哀帝。

把天灾人祸, 人事和异常的自然现象联系起来, 附会阴阳五行学说加以解释, 认为异常的自然现象是因为人事不修, 上天示警, 只有针对这些“天变”采取相应的政治措施, 才能解决有关现实危机问题, 本来就是一种“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 属于阴阳五行、讖纬学说的范畴, 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各种自然、社会问题给人们造成的灾难, 给封建政权统治形成严重的危机, 统治者无法解决, 只好把希望寄托于神。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 也都需要借助于神的力量, 发展宗教学说, 通过宗教手段来改变现实以致太平, 这就是被学界称为“类道书”的《包元太平经》一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真正原因。

钟肇鹏在《讖纬论略》一书中指出, 《汉书·哀帝纪》说: 建平二年(前 5), “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所谓的“赤精子之讖”, 就是天帝命赤精子传给甘忠可后由夏贺良等加以传播的《包元太平经》。《汉书·王莽传》就更明确说: “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诏书, 更为太初元年, 案其本事, 甘忠可、夏贺良讖书藏兰台。”早在明代学者王祎所著的《青岩丛录》中, 就据此指出《包元太平经》是夏贺良等人造作的纬书。钟氏说: “《包元太平经》就是图讖纬候一类的书, 殆无疑问, 而其造作者, 就是甘忠可、夏贺良之流。甘、夏都是方士, 所以《后汉书·光武帝纪论》云: 方士有夏贺良者, 上言哀帝云: ‘汉家历运中衰, 当再受命’。”讖纬本来就是“儒学宗教神学化”的产物, 依托于今文学派之说, 是“作为汉代统治思想宣传的神学世界观”^{〔1〕}, 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 讖纬之学本身就是一

〔1〕 钟肇鹏:《讖纬论略》, 1~23页。

种宗教性质的东西，道教与谶纬关系非常密切，道教的一部分内容直接来自谶纬，而纬书《包元太平经》的作者夏贺良等又是方士，《包元太平经》是谶纬、神学、宗教、方士结合的产物，和早期道教特点非常一致。此外，还有三点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文献记载称《包元太平经》系“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真人”、“赤精子”具有显著的道教神人名号色彩，“天帝”是早期天师道的最高主神，而“天帝”的名称，文献记载最早也是在这里开始出现的。二是传播《包元太平经》被称作“执左道”，“罔上惑众”，与后来的道教曾被称作“左道”的事实相吻合。三是《包元太平经》与其他儒家今文学派“五经六纬”的纬书有所不同，而是直接以“经”名书，说明它在一般谶纬学说的基础上具有更多的宗教色彩，已经成了一种以“天帝”、“赤精子”等为主神的宗教经典性著作。以“太平”名书，则是企图以其术解决上述种种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所形成的“不太平”问题。它和后来的道教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它的出现，对不久之后太平道、天师道的正式形成起到了巨大影响作用。说它是一种“类道书”性质的著作，是很恰当的。既有“类道书”性质的著作，也就应该有“类道士”性质的成员和活动存在，这一推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西汉末年“天帝”名称的出现，新莽时期“天帝使者”印章实物的发现，与此之间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哀帝继位以后，成帝时期直接威胁封建政权统治的各种政治经济危机没有得到缓和，继续恶化。如《汉书·李寻传》记载：“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贵，祖母傅太后尤骄恣，欲称尊号。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执政谏争。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政治上后宫干政、外戚专权的问题更加严重。《汉书·哀帝纪》记载，绥和二年（前7）诏称“间者，日月无光，五星失行，郡国比比地动。乃者，河南颍川郡水出，流杀人民，坏败庐舍……朕基惧焉”。元寿元年（前2），“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蚀之。诏曰：‘……惟阴阳不调，元元不赡……至今有司执法，未得其中，或上暴虐，假势获名，温良宽柔，陷于亡灭。是故残贼弥长，和睦日衰，百姓愁怨，靡所错躬。’”因此文献记载说，成帝时齐人甘忠可编造出《包元太平经》之后，由甘忠可传给了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人。虽然遭到儒家古文学派代表人物刘向等的激烈反对，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让创始人死在狱中，其著作学说却不仅没有杜绝，反而得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流传。到哀帝即位之后，夏贺良、郭昌等人又将《包元太平经》继续加以传播，郭昌以长安令的官僚身份，又去劝说李寻等人帮助夏贺良等打通关节，向皇帝游说，公然把皇帝也说动了。可见当时企图以宗教的办法解决“灾异”的思潮

在上层统治者中已有相当的市场，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只是由于条件还没有成熟，一时无法收到明显的效果，“其言无验”，“卒无嘉应”，既未改变“久旱为灾”问题，也没能把皇帝的病治好，最后以参与其事的夏贺良等人被诛杀，李寻、解光等被流放到甘肃敦煌边远之地而告一段落。但整个事件说明，这种“具有道教性质的社会改良理论”学说，毕竟一度在相当范围内得到包括皇帝本人在内的一些人的信奉，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也都需要比过去一般巫术更富于理论性质、更为高级的宗教来缓解现实生活中因天灾人祸造成的痛苦和矛盾，通过宗教手段来帮助改变现实以致太平。只是《包元太平经》的论说还不够完善，有待此后进一步加以改进才能适应这种社会需要，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还应当看到的是，西汉末年天灾人祸并行与后来的道教有关活动，除了《包元太平经》流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发生。《汉书·哀帝纪》记载：“建平四（前3）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西王母是后来道教的一位重要女神，此时道教虽然尚未形成，但人们为了禳灾而举行宗教活动，祈祷这一神祇，是否与《包元太平经》的内容直接有关虽不能肯定，至少在考察道教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也是值得注意的材料。

成哀时期随着方士《包元太平经》“类道书”的创著，过去的“上帝”开始改称为“天帝”，这是道教发展进入即将形成新阶段的标志。围绕《包元太平经》展开的一系列有关宗教活动，我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它看作是创立道教的一次集中尝试，是道教临产前的一种先兆，也可以说是后来东汉明帝时道教发展形成的序幕。

王莽以谶纬符命篡夺刘氏政权，亦崇神仙方士巫覡，尤信天帝（天公）黄帝之说。居摄三年（前8），“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一暮数梦，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晨起视亭中，诚有新井，入地且百尺。”“梓潼人哀章……见莽居摄，即作铜匱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匱图’，其一署曰‘赤帝行玺某传于黄帝金策书’。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1〕，“天公”即天帝，也都假称得天帝旨意，王莽这个摄皇帝应当升格做真皇帝。“莽篡位二年，兴神仙事。以方士苏乐言，起八风台于宫中，台成万金……又种五粱禾于殿中，各顺色置其方面……言此黄帝谷仙之术也……莽遂密鬼

〔1〕《汉书·王莽传》。

神淫祀。至其末年，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1〕}王莽“性好时日小数，及事迫急，亶为厌胜。”“莽日与方士涿郡昭君等，于后宫考验方术”。地皇四年（23）九月，叛军逼京城，“天文郎按栻于前，日时加某。莽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余，汉兵其如余何？’”^{〔2〕}王莽平时就很相信方士巫覡之说，遇有殃祸之事，便找人行压胜之术。直到叛兵开始攻长安城，还叫天文郎拿着式盘为它测算吉凶，自己坐在式盘中心所绘北斗星斗柄所向的席位上，很自信地说：“我的皇帝位置是上天赐与的，叛兵又能把我怎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臣民百姓中，方士巫覡之盛，可以想见。前面曾经提到，在今朝鲜境内的乐浪也有王莽时期“天帝神师”之类的印章发现，与此当不无联系。朝鲜境内出土“天帝神师”印章中的“天帝”，与成哀时方士甘忠可、夏贺良等托言“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创作类道书《包元太平经》的“天帝”，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可谓相当明显。另一方面，企图反叛王莽的势力，也在利用宗教为推翻新朝统治恢复刘氏政权制造舆论。如《汉书·王莽传》记载说，“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王涉不仅听信了道士西门君惠的话，而且还游说大司马董根、刘歆、刘歆子伊休侯等人，“同心合谋，共劫持帝，东降南阳天子”，就是一个例子。而且已经开始出现了把这种奉行星象讖纬神学的方士叫作“道士”的情况，说明到西汉末年的方士已和讖纬神学相结合，在宗教形成发展进程中向前迈进了一步。

道教系由方士、巫祝所创，如前所论，西汉武帝时的华山，不仅为一般祭典所重五岳之一，已成了方士、巫覡集中活动的场所，具有极为浓厚的道教色彩，其集灵宫与后世之宫观已相类似。而此时之方士、巫祝已经有了官名和佩印之类的制度，呈现出一种向后来的道士转化的趋势。成哀时学界称为“类道书”的讖纬神学著作《包元太平经》的作者甘忠可、夏贺良等，文献也明确记载说他们是“方士”。《太平经·师策文》：“乐莫乐乎长安市，使人寿若西王母，比若四时周反始，九十字策传方士。”^{〔3〕}《太平经》乃形成于东汉末年主要属太平道的经典，和天师道也有某些关系，谓“九十字策传方士”，因为最初的太平道也是以方士为主的方士、巫覡集团所创造，所以该教道士仍称曰“方士”，这是后来的道士系由原来的方士演变而来很好的

〔1〕《汉书·郊祀志》。

〔2〕《汉书·王莽传》。

〔3〕王明：《太平经合校》，62页。

一个证据。天师道的情况也不例外，早期的天师道道士在一般人看来似乎和方士、巫祝并无太大的差异，很难加以区别，所以大多仍以“方士”、“巫祝”、“巫覡”称之。如四川雅安东汉《樊敏碑》，“米巫殍（凶）虐”；《后汉书·灵帝纪》：中平元年（184），“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李贤注引东汉末年人刘艾著《纪》（《汉灵、献二帝记》）云：“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五斗米，是为五斗米师。”对五斗米道道徒均不称“道士”而称“米巫”、“妖巫”、“巫人”，这也是很好的说明。早期的天师道，是巫祝、方士们以治鬼疗病为主要内容，糅合其他一些传统文化而来，其中包括战国西汉方仙道长生久视的成份在内。以治鬼疗病为主要工作的巫医、方士，在东汉中期以前，虽然在相当范围内有一定的影响，但还没有太大的势力，一般人很难对它有清楚的了解，形成明确的概念，在当时的文献中还没有系统的详细记载，只能从一些片断的文字中看到一些有关的信息，有待我们更多地从地下出土的遗迹中看到更多的材料，得到更为具体和准确的认识。

我们认为最初的天师道应该是由某些方士巫祝集团的人集体创作逐步形成，而不是像佛教、基督教、回教那样有一个明确的创教人。不仅天师道如此，太平道也是如此，文献记载只说于吉献《太平清领书》，并没有说于吉创太平道。文献上即使讲到后来张陵创五斗米道（正一盟威之道），张陵本人的身世（特别是生年）和具体创教活动，除去后来经过人们层垒加上的附会材料而外，实际是很不清楚的，有的过于简略，有的自相矛盾，连一部比较完整的经典也未能保存下来，远不能与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相比。应该说，道教最初由巫祝方士集团的人集体创造，没有明确的实际创教人，这正是中国本土宗教不同于世界其他三大宗教的一个显著特点，不能在一切方面都完全按统一的标准来衡量道教。

从明帝永平年间开始到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墓葬出土解注文器物，无论从内容还是从时代上看虽有很强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但如前所论在不同的时段也出现了某些新的内容，说明这种宗教自身在这一地区也是处在不断变化过程中。根据器物特点所划分的三期：明帝永平初（58）至安帝永宁年间（121~122）、安帝延光元年（122）至桓帝和平年（150）、桓帝元嘉初年（151）或稍前至献帝初平末（293），反映出这种宗教自身在这一地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后面还要讲到，天师道二十四治中的洛阳治是最早建立的道治，它的建置应在顺帝汉安元年（142）之前。若此推断不误，则其时正当在第二阶段之中。道符的发明使用，和道治的创建，说明安帝至顺帝末年之前是初期天师道发展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史载：“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

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国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1〕对推动初期天师道进入另一新的发展阶段可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六节 中原地区初期天师道和张陵五斗米道（正一道）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天师道既然早在明帝时即已由方士巫祝们集体创造形成，道书文献却有张陵曾创道教于洛阳又创五斗米道（正一盟威之道）于蜀中的说法，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一矛盾？这实际上牵涉到蜀中五斗米道（正一盟威之道）和中原地区与东汉墓相联系的初期天师道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三天内解经》等文献记载，说顺帝末年兴起于蜀中的五斗米道（正一盟威之道），和此前中原地区东汉明帝年间即已存在的早期天师道的创教人都是张陵。分析文献所载张陵卒年，可以断定那不是事实，明显是张冠李戴，将张陵以前的事也附会到了张陵名下。考古发现的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材料属于天师道活动的遗存，从它们的年代和地域分布可以了解到，天师道最初应该是东汉明帝时期在以长安和洛阳两京为中心的陕西、河南地区形成，然后逐步向西、向南和向东发展，和过去认为天师道（正一道）系顺帝初年张陵始创于蜀中的传统说法完全不合。张陵创教活动的具体年代和地点，道书记载本有歧说，有的说法所出文献年代较晚。在早期文献记载极为简略、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下，究竟应以何者为可信，长期的研究实践证明，如果不充分依靠地下出土的实物史料，显然是不行的。张陵是否实有其人，姑且不论，我们不妨把他当作创教时期的一个假想的代表人物来看待。不少文献都说张陵生于东汉初光武之世（建武十年）。上引刘宋时人徐氏《三天内解经》卷上明确讲道：

自从光武之后，汉世渐衰，人鬼交错。太上悯之，故取张良玄孙道陵，显明道气，以助汉世，使作洛北邙山，立大法。帝王公臣以下，莫不归宗。〔2〕

〔1〕《后汉书·祭祀志》。

〔2〕《道藏》二十八册，415页。

又说：

自从汉光武之后，世俗渐衰，人鬼交错。光武之子汉明帝者，自言梦见大人，长一丈余，体作金色。群臣解梦，言是佛真，而遣人入西国写取佛经，因作佛图塔寺，遂布流中国。三道交错，于是人民杂乱，中外相混，各有攸尚，或信邪废真，祷祠鬼神。人事错越于下，天气悖乱在上，致天气混浊，人民失其本真。太上以汉顺帝时，选择中使，平正六天之治，分别真伪，显明上三天之气。以汉安元年（142）壬午岁五月一日，老君于蜀郡渠亭山石室中，与道士张道陵将诣昆仑大治新出太上。太上谓世人不畏真正而畏邪鬼，因自号为新出老君。即拜张为太玄都正一平气三天之师，付张正一盟威之道，新出老君之制，罢废六天三道时事，平正三天，洗除浮华，纳朴还真，承受太上真经，制科律。积一十六年，到永寿三年（157）岁在丁酉，与汉帝朝臣，以白马血为盟，丹书铁券为信，与天地水三官、太岁将军共约，永用三天正法，民不妄祀他鬼神……民人唯五腊吉日祠家亲宗祖父母，二月八月祠社灶。自非三天正法，诸天真道，皆为故气。疾病者，但令从年七岁有识以来，首谢所犯罪过……立诸醮仪章符，救疗久病困疾。医所不能治者，归首则差。立二十四治，置男女官祭酒，统领三天正法，化民受户，以五斗米为信。化民百日万户，人来如云。制作科条，章文万通，付子孙，传世为国师。法事悉定，人鬼安帖。张遂白日升天，亲受天师之任也。^{〔1〕}

这是道士们自己系统记载天师道（正一道）早期历史的文献。他如陆修静《道门科略》，《赤松子章历》（卷一），《张天师二十四治图》，南宋谢守灏《混元圣纪》，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明初张正常《张天师世家》等书所载，虽详略不一，间有差异，主要内容也都大体相同。唐人王悬河《三洞珠囊》卷七引《张天师二十四治图》云：

张天师沛国丰县人也，讳道陵，字辅汉……学道有方。永平二年（59），汉帝诏书就拜巴郡江州令。以元和元年（84）三月十日

〔1〕《道藏》二十八册，414～415页。

辛丑，诏书拜为司空公，封食冀县侯，以芝章图经历神仙，为国采延年长生药。以汉安元年（142）丁丑，诏书拜应太上方任，遂解官入益州部界。以其年于蜀郡临邛渠亭山赤石城中，静思乐情……

又曰：

太上以汉安二年（143）正月中时，下二十四治……付天师张陵奉行布化。^{〔1〕}

《混元圣纪》、《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张道陵传也说：张陵“于光武建武十年（34）甲午正月望日生于吴郡天目山”，“七岁读《道》、《德》二篇十许通而达其旨。于天文地理、河洛图纬之书，皆极其妙。通习故典，所览无遗……后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中之。（一云：天师……学道有方。汉明帝永平二年（59）诏书拜巴郡江州令，时年二十六岁。身虽仕而志修炼形轻举。久之，退隐北邙山（北邙治在洛阳）三年，有白虎衔符置座旁，朝廷就征为博士，称疾不起。和帝即位，闻其有道，以三品印绶、驷马车等征为太傅。后封县侯，三诏不就。语使者曰：金阙帝君将诏吾以为臣矣……时永元四年（92）壬辰岁也。遂自河洛，乐蜀之溪岭深秀，遂隐其山）”后游嵩山、房陵等地，于“顺帝汉安元年（142）壬午岁”，得太上老君赐以“玉札金文及都功版券”，“三清众经九百三十卷，符篆丹灶秘诀七十二卷，一千二百官章，雌雄二剑，都功印”等，“令制科律，助国行化”。最后，至桓帝永寿二年（156）“于云台山白日升天。时真人一百二十三岁也。”^{〔2〕}当然，即使如徐氏之书，距汉世已数百年，其中部分内容不免已经过增饰改造，往往把汉代前后不同阶段的内容混在了一起，但他说“张陵”是先洛阳修道，道教是在张陵入蜀之前即已在中原洛阳之地存在，以后张陵由河洛入蜀，蜀中之地始有道教，这和考古发现材料所反映的早期道教发展历史大体相合，很值得注意。

我们认为，天师道最初应是东汉初年光武帝之后不久在西安、洛阳为中心的附近地区创立起来的，“天师道”是因为以天帝为最高教神，道士以天

〔1〕《道藏》二十五册，331页。《云笈七签》卷二十八引并同，《道藏》二十二册，204页。

〔2〕《道藏》五册，200～207页。

帝与信徒交通的中介人自居而称为“天帝神师”得名，“天师”即“天帝神师”的简称。如前所论，它的创始人实际不是张陵或其他某一个人，而是方士巫祝们的集体创作。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只不过是把兴起于中原的天师道引入蜀地后发展出的一个新的支派罢了。五斗米道是天师道的一个新的支派，自然一方面有它不同于中原初期天师道的一些特点，同时又保存了大量中原初期天师道的内容。东汉应劭《风俗通》：“户律：汉中、巴、蜀、广汉，自择伏日。俗说：汉中、巴、蜀、广汉，土地温湿，草木早生晚枯，气异中国，夷、狄畜之，故令自择伏日也。”^{〔1〕}四川（川西）及陕南汉中之地自古为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汉时虽大量接受中原文化影响，仍有很大的特殊性，包括少数民族因素在内，汉末张鲁挟五斗米道成政教合一政权，雄据巴汉垂四十年，非出偶然之事。“张陵”所创之五斗米道，虽渊源于中原，必有新于中原之土著文化成份者。后来的人难以将二者加以区分，也就很自然的把它们混淆在一起加以记述了。他们的记载虽不尽可信，但不少内容与上述考古发现是一致的，证明其中确实保存了若干初期天师道可信的材料。经归纳分析，我们认为主要有这样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早期天师道的核心是分离人鬼，杀鬼生人，避免疾病死亡（疾病死亡皆鬼祟所为）。即徐书所说解决“世人不畏真正而畏邪鬼”的问题，“立诸醮仪章符，救疗久病困疾，医所不能治者”。“制作科条，章文万通，付子孙……法事悉定，人鬼安帖。”《道门科略》所说汉代“三五失统，人鬼错乱，六天故气，称官上号，构合百精及五伤之鬼，败军死将，乱军死兵，男称将军，死称夫人，导从鬼兵，军行师止，游放天地，扞行威福，责人庙舍，求人飨祠……枉死横夭，不可称数。太上患其若此，故授天师正一盟威之道，禁戒律科……下千二百官章文万通，诛符伐庙，杀鬼生人，荡涤宇宙，明正三五，周天匝地，不得复有淫邪之鬼。”^{〔2〕}唐末五代天台道士刘松年《仙苑编珠》卷中引《正一经》谓张陵至蜀，“时蜀中人鬼不分，灾疾竞起，感太上老君降授正一盟威法以分人鬼，置二十四治，至今民受其福。有戒鬼坛，见在。”^{〔3〕}《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十八《张天师传》称：张陵至蜀，时蜀中“人鬼无别，枉暴生民”，“暴杀万民，枉夭无数。其八部鬼帅，领鬼众居西蜀青城，山巅有鬼城鬼市。分形变化，混杂人间，布行疫疹，人

〔1〕《艺文类聚》卷五引。

〔2〕《道藏》二十四册，779页。

〔3〕《道藏》十一册，32页。

莫知之。人鬼合杂，市利交易。”张陵战败鬼王，“鬼帅等无所逃避，同声哀告，愿乞余生。即当远去，不敢害及生民。真人遂命五方八部六天鬼神，会盟于青城山黄帝坛下，使人处阳明，鬼行幽暗……乃执丹笔曰：‘吾笔所指，鬼众尽灭。’要之，人鬼分治，幽明异境……即与盟誓，折石为契，刻作天地日月之形于黄帝坛下绝崖之上……乃以神印封鬼营市，使不得相通。”^{〔1〕}“要之，人鬼分治，幽明异境”，这正是上述中原地区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文的核心内容。而“即与盟誓，折石为契”，亦与出土墓券材料相符。又蜀中有关黄帝传说遗迹甚多，亦与中原解注器文之“黄神”、“皇（黄）帝使者”一致^{〔2〕}。前述大邑东汉墓出土两件朱书陶罐，资阳东汉崖墓出土解注代人铅人，乐山、绵阳等地东汉晚期墓出土的神药丹砂，原川东万县东汉灵帝熹平五年真道冢地碑石刻中的“天帝”^{〔3〕}等，也是这种性质的遗迹。这些材料，也都是张陵在蜀所创五斗米道与此前早已流传于中原地区的天师道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的极好证据。

第二，徐书说“张陵”创教最初是从东汉初年光武末年至明帝之世在河南洛阳邙山一带开始，后来才转到蜀地，这点由上述考古发现已经得到证明。如前所说，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文材料，主要集中在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陕、豫两省中部地区，洛阳、偃师邙山一带，数量尤多。从器物纪年情况看，虽然目前所知陕西咸阳明帝永平三年（60）年代最早，而河南洛阳市区M 24出土瓶3件，其中一件朱书神符解注文瓶之“延光元年（122）”是安帝的年号，也比张陵入蜀的顺帝早过一代皇帝。若按张陵在顺帝汉安元年（142）在蜀创五斗米道的说法计算，则整整早了20年。今后在河南洛阳邙山地区，完全可能还会有年代更早的材料发现。从明帝永平三年（60）到顺帝汉安元年（142）前后相隔已80余年，说最先在蜀中出现的五斗米道和此前中原地区早已存在的天师道，两者的创立者都是张陵一人所为，看来可能性不大，而两者之间有着前后相承发展的渊源关系，却是事实。说张陵顺帝汉安元年（142）在蜀中创五斗米道，立二十四治，设置了二十四个教区，这几乎已是过去学界大家也都公认的事实。但我们对二十四治进行仔细剖析，就会发现实际上里面的问题很多。正如明代蜀人王汝霖在《公慕化开山

〔1〕《道藏》五册，202～204页。

〔2〕见前录陕西潼关东汉杨震家族墓群M5出土之灵帝建宁元年（168）陶瓶文。

〔3〕（宋）洪适《隶续》卷十九（442页）。洪适未注碑石所在何地，南宋陈思云在今重庆万州境内。

记》所指出的那样：“余尝观道迹灵化二十有四，其在蜀汉者二十有三，在伊洛者一”〔1〕。二十四治除了大部分布在四川西部之外，有一部分却在汉中，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北邙治问题。北邙治的地望，文献记载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云笈七签》卷二十八引《张天师二十四治图》说：“北邙山治，在东都洛阳县。”〔2〕唐王悬河《三洞珠囊》卷七引《张天师二十四治图》则说：“北邙山治，在京兆郡长安县。”〔3〕唐末五代著名道士杜光庭《奏于龙兴观醮玉局劄子》说：“北邙化在嵩州，积年以来，醮祝皆缺”〔4〕，更有说北邙治在今四川西部之越西境内者。四川省博物馆王家祐对这些相互矛盾的记载解释说：“早在汉末，道教之治地已超出四川”，“北邙治本在越西，又列于长安、洛阳……这些地名的变迁说明历代设治的变迁与道治的迁移”〔5〕。同一治名而诸书所载地望不同，说明历史上不同时期道治曾有迁移，这是极有见地的创说。但一个道治最初的得名，皆系以所在地名而来。洛阳的北邙山是汉代以来众所周知的地名，至迟在东汉初年就已出现。创稿于和帝永元十二年（100）的许慎《说文》一书，邑部释“邙”字云：“邙，河南洛阳北亡山，上邑。从邑，亡声。”〔6〕《续汉书·五行志·谣》：“灵帝之末，京都童谣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乘上北芒。’”皆可为证。《西京杂记》卷三记载：“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百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八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7〕虽有“北邙山”的记载，但该书系东晋葛洪所编，不免掺入后起的材料。此文与《三辅黄图》卷四《苑囿》记载相同，当系转录其书。《三辅黄图》“于北邙山下筑园”，原作“于北山下筑园”〔8〕，本无“邙”字，是西安附近的北邙山地名乃后出之明证。陈直作《三辅黄图校证》，取《杂记》之文以补《黄图》，改“北山”作“北邙山”〔9〕，正好把材料弄反了，

〔1〕（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七十二，神仙记，川西道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五九二册，182页。

〔2〕《道藏》二十二册，208页。

〔3〕《道藏》二十五册，334页。

〔4〕杜光庭：《广成集》卷二。《道藏》十一册，237页。

〔5〕王家祐：《彭县三道治考释》，《成都文物》1994年1期。

〔6〕（汉）许慎：《说文解字》，133页。

〔7〕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笔记小说大观》本。

〔8〕《四部丛刊》三编本。

〔9〕陈直：《三辅黄图校证》。

显然是靠不住的。至四川越西之有北邙地名，始出更晚，也很少人知道有这一说法。从文献记载北邙治之有洛阳、西安、越西三种不同的说法，无论道书所载作为早期天师道和五斗米道象征的“张陵”活动的历史或考古发现材料，也都证明了早期天师道在西安、洛阳一带形成以后，从洛阳传入四川的事实。唐前道书《玄都律文·章表律》记载说：“律曰：于洛阳靖天师随神仙西迁蜀郡，赤城人浊不清，世深不平，于是攀天柱，据天门，新出正一盟威之道，立二十四治，署男职女职二十四职……断绝复连，消除灾害。”〔1〕“靖”就是治，“洛阳靖”就是洛阳的北邙山治；“天师”就是以张陵为标帜的早期天师道道士。“于洛阳靖天师随神仙西迁蜀郡赤城……新出正一盟威之道，立二十四治”，就是说以“张陵”为标帜的天师道道士，最初是从洛阳北邙治西迁来到蜀中，在旧时天师道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发展出新的道派，并另外增加新治成为二十四治之数。所谓“正一盟威之道”也就是五斗米道，这已为四川雅安樊敏碑“米巫凶虐”和《隶释》所载洪雅《米巫祭酒张普题字》石刻“道正一元”的考古材料所证实。因为是在中原地区原有天师道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道派，所以特地加上“新出”二字。因为在五斗米道之前还有别的道派存在，被他们认为不是真正正统的道教，所以把自己的教派称为“正一道”，意思是强调说在不同的道派中，只有自己的五斗米道才是唯一正宗的道教。如果在五斗米道（正一道）之前没有中原地区初期天师道的存在，又何来“新出正一盟威之道，立二十四治”的说法呢？《赤松子章历》卷一序文称：“天师遂迁二十四治，敷行正一章符”〔2〕。说张陵“迁”二十四治，而不说“立（建）”二十四治，也说明了张陵在蜀所设诸治确有从他处迁来者。如果我们把北邙山治不同地望的材料视为天师道（五斗米道）道治由四川经西安迁移到洛阳的证据，不仅与上述“张陵”修道活动是先洛阳后入蜀的文献记载相矛盾，和以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东汉墓葬出土天师道解注材料的时代也完全不合，北方中原地区初期天师道的材料要远远早过顺帝汉安元年（142）最先在蜀中创五斗米道的说法。再说，北邙治如果最初是在四川西部之地，后来随着五斗米道北传而先后北迁至西安、洛阳，为什么其余二十三治也都没有一个北迁的例子呢？这些材料说明：河南洛阳附近的邙山是初期天师道最先设立的一治，然后由此西迁，经过西安西南入汉中开始另设新治，至西蜀稳定下来以后，新治愈多。除此

〔1〕《道藏》三册，462页。

〔2〕《道藏》十一册，173页。

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解释呢？总之，结合所谓张陵创立二十四治（教区）的“北邙山治”材料看，陕豫地区天师道教区制的建立应该是从洛阳开始的，北邙山治应该是天师道最早建立的一个道治，其年代当在顺帝末年之前。北邙山治的出现，是天师道形成以后进一步走向成熟的标志。《真诰·稽神枢第二》云：

明晨侍郎周爰之者，汉河南尹周畅伯持之女也。畅，汝南安成人，好行阴德，功在不觉。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阳城旁客死骸骨万余人，为立义冢，祭祀之，应时大雨丰收。所行多是此辈。太上处以畅有阴行，令爰支从南宫受化得仙。爰支亦少好道，服伏苓三十年，后遇石长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支解也。（畅即周嘉从弟也，性仁慈和笃，某帝时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祷无应，因收葬万余人，应时大雨。位至光禄勋）^{〔1〕}

永初为东汉安帝年号，永初二年即公元108年。《抱朴子内篇·至理篇》云：“仲长公理者，才达之士也。作《昌言》……云：‘河南密县，有卜成者，学道经久，乃与家人辞去，其始步稍高，遂入云中不复见。’此所谓举形轻飞，白日升天，仙之上者也。陈元方、韩元长，皆颍川之高士也，与密相近，二君之所以信天下之有仙者，盖各以其父祖及见卜成者成仙升天故耳。”^{〔2〕}“仲长公理”即东汉人仲长统，所著《昌言》一书久佚，仅有辑本流传，以上葛洪所引，当为仲书佚文，说密县人卜成成仙虽属传说之言，学道之事当不诬。由此等记载可以说明，早在东汉顺帝之前河南洛阳和附近密县一带确有盛行讲求学道成仙风气的事实，可与考古发现材料相互印证。又本书另文《河南偃师县南蔡庄乡东汉墓出土道人肥致碑及有关道教遗物研究》考论偃师东汉墓出土道人肥致碑所反映的情况，也可作为佐证。天师道的第一个教区之所以首先出现在东汉京城洛阳，和它能为封建政权服务，为包括帝王公臣在内的上层统治者所信奉一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此外，《受箓次第法信仪·天师治仪（上）》详载诸治名称及地望，谓“吉阳治主土，在魏郡邺县。”^{〔3〕}邺县在今河北临漳县，与上述望都汉末刘公墓出土解注砖券材料相

〔1〕《道藏》二十册，563页。

〔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115页。

〔3〕《道藏》三十二册，224页。

合。《法信仪》一书虽为明人所编，但其中《天师治仪》部分特注“十三世孙武陵王府参军张辩撰”，是必有早期材料为本。1987年，在陕西宝鸡阳平乡出土龟钮“天帝使者”铜印一枚。如前所述，陕西宝鸡是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较多的地方，在此出现的“阳平”地名，和早期天师道的“阳平治”有无关系，也是值得考虑的。

在此我们还要强调指出：作为中原地区初期天师道的东汉墓葬解注材料，不仅开始出现的年代比五斗米道要早得多，而且是从明帝永平年间到汉末一脉相承发展，其间并没有中断，作为一个整体的宗教而言，是在当地土生土长发展起来的，没有从外地传入的色彩。而蜀中五斗米道出现的年代相对较晚，与之相连的东汉墓葬解注材料，一方面有许多不同于中原的特点，同时又有诸如代人铅人、朱书陶罐（解注瓶）、矿物药料（解注神药）等明显来自中原的若干相同内容。宋代在原四川东部万州（今划归重庆市管辖）发现的东汉灵帝延熹五年（162）《真道冢地碑》，碑文记载真道从真敖兄弟买墓地事，除著明钱数丈尺之外，特地约定：“子孙但得宿山居留，不得争舍地。争讼，天帝诛。疾！”^{〔1〕}这里的“天帝”，也就是上述北方中原地区东汉墓解注器文所属天师道神系中的最高尊神“天帝”。这些材料说明，中原地区的初期天师道和蜀中的五斗米道（正一道）二者的移徙方向和彼此之间的渊源关系，应该是很清楚的，过去流行的一些自相矛盾的传统说法，必须重新加以认识。

通过上述东汉墓葬出土多种解墓注的材料，可以看出天师道从明帝开始在以西安、洛阳为中心的陕西、河南形成以后，大约在东汉中期、晚期先后向四周发展，东面除河北西南部地区活动较多之外，有少数已进入山东之地。北向发展不远，仅至山西南部。东南从河南的洛阳、偃师、密县经过安徽的亳县、阜阳、寿县一直发展到了江苏的江宁、仪征、高邮等地。西向沿丝绸之路经甘肃发展可至青海西宁。西南向则经汉中进入四川，发展为五斗米道。这一情况，为魏晋以后不同地区不同教派的兴起和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1〕（宋）洪适《隶续》卷十九，北京：中华书局年影印清洪氏晦木斋刊本 442页。洪适未注碑石所在何地，南宋陈思云在今万州境内，见《宝刻丛编》卷十九。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道教考古/张勋燎, 白彬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06. 1
ISBN 7—80106—382—1

I. 中 ... II. ①张 ... ②白... III. 道教—宗教考古—
中国 IV. ①B959.2 ②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12175 号

书 名 中国道教考古

著作责任者 张勋燎 白 彬 著

责任编辑 任梦强 孙嘉镇

特约编辑 范 勇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 100009

电话传真 010—64045283

排 版 四川大学古籍所微机室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889 毫米×1194 毫米 1/16 127 印张

1550 千字 511 图版 8 彩插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6—382—1

定 价 4680.00 元



ISBN 7-80106-382-1



9 787801 063823 >

ISBN 7-80106-382-1

定价 4680.00 元(全六册)